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与美国

 **eBOOK**
内容资料 非商业

前 言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是一位卓越的外交战略家。他以广阔的视野和宏大的气魄处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个国家的关系。自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起直到他去世，他始终亲自制定外交战略，亲手掌握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和政策，亲身参加大量外交实践活动。他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位，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的友好关系，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发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以缔造党、缔造新中国的光辉业绩彪炳于共和国的史册，而且以一个外交大师的光辉业绩彪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史。

毛泽东在他的卓越外交活动中，处理与世界上另一个最大国家美国的相互关系，是他的外交战略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从 1910 年起，毛泽东便知道了美国，在青年时代，他便关注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1916 年，他对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第一次发表意见。这之后，美国这个东太平洋国家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涯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他对美国的关注兴趣愈来愈浓，对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研究认识愈来愈深刻全面。当他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了最高地位之后，他把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放在极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他关于美国的知识极其丰富，并在不断学习和研究中增进这种知识，这对于他正确处理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他在处理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具有深远的眼光和世界的大视野。他制定的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方针政策，既实事求是，又着眼于两国的根本利益，着眼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政策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又具有很大的灵活性。由于他给予了中美关系的极大关注，他为争取建立中美良好的合作和平平等互利的国家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终在他的晚年，奠定了中美两国正常关系的基础。

毛泽东高度重视建立和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他对美国人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肯定。他一生结交了许多友谊深厚的美国朋友，如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他以极其平易近人、极其诚恳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和他们亲切交往，虚心向他们学习，给他们无比的信任、关怀、友谊和支持，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以及中国人民待人以诚、珍惜友谊的传统美德。他重视利用一切机会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把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真相和介绍中国人民伟大建设成就，看作是一件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了解和友谊的大事亲自来抓。他在和美国朋友和各界人士的交往中，留下了许多传诵千古的动人故事。美国朋友和美国各界人士，对毛泽东为缔造中美人民友谊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而深为感动。

从毛泽东第一次知道美国，到 1976 年逝世前他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止，前后长达近 70 年。在这近 70 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复杂曲折的变化。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中美之间有过较长时间的不平等的关系，有过对抗、冲突，也有过合作、缓和和和解。在任何情况下毛泽东都坚定不移地相信，中美关系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的关系，他为这个目标奋斗了终生。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

不是他个人与一个西方国家的关系，而是他代表的党和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但是毛泽东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处理中美两国关系的时候，发挥了极大的能动作用，以他的宏图大略和远见卓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关系，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打上了他个人深刻的烙印。

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构成了中美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毛泽东传奇的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历史不是一个人写就的，但个人却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他辉煌的一笔。毛泽东便是用如椽大笔为中美关系的历史写上如是一笔的人。不研究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作为，对撰写完美的中美关系史无疑是一大憾事，对于毛泽东的研究无疑也是一大憾事。本书便是循着历史的足迹，追寻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一部尝试之作。

为了对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有客观的把握，我们考虑应当从三条线来说明问题。第一条线是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及在此基础上由他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这是一条主线，从这条线所揭示的基本线索中，可以看到他对中美关系认识的演变和其中的一贯性，以及他制定的处理中美关系的政策的演变和一贯性。尽管中美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他争取中美建立平等友好关系的主旨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的几十年的工作中，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第二条线是毛泽东和美国各界人士、美国朋友的交往的实录。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和美国各界人士、美国朋友有频繁而密切的交往，这些交往增进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中美两国政府的了解，这无疑是中美关系史上绚丽的一笔。不反映这方面的情况，就无法全面把握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丰富内容。第三条线是美国学者及各界人士对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毛泽东的伟大业绩、他的个性性格和思想，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反响，美国各界接触了解过毛泽东和他的事业的人，撰写了介绍毛泽东的各种文章书籍。美国学者对毛泽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探索。所有这些构成了毛泽东与美国相互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得到反映。本书便是依据这三条线索进行写作的，当然在行文中总是交叉。

本书是一本描述历史之作，因此它必然有历史之作的特点。这就是它必须如实地反映历史，对于中美关系史上曾经有过的种种事件，对于当事人使用的语言，我们无权更改。历史就是历史，借鉴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今天的中美友好关系。为了客观地反映历史，本书在写作时，主要依据毛泽东的文章、报告、书信、电报，他草拟的文件、制定的政策，有关历史记录，美国人上撰写的书籍、文章、回忆录，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及毛泽东的文章、著作等。有些具有闻名于世的历史性的描述，本书无权作新的编撰，如实地收录书中。

《毛泽东与美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以作者很浅的学识、很低的能力，是难于胜任的。加之没有科研经费，无法外出搜集资料，无法听取国内前辈和专家指教，要想使该书达到理想水平几乎不可能。书中粗疏、错误之处一定不少，作者只是凭着一种历史的责任和探索历史的勇气而前行，因而其粗疏和错误一定能得到谅解和指教。鉴于这个课题作为一个完整的项目，还少有专著研究它，本书可以作为引玉之作，希冀能引起专家学者和读者的兴趣，这便达到了它的目的。

明年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书作为纪念。

作者 1992年6月于成都

毛泽东与美国

第一章 对美国的早期认识和对其帝国主义政策的初步批判

1893年12月26日，在中国中部省份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农村里，诞生了一个农家的儿子——毛泽东。中国穷乡僻壤的芳香的泥土环绕着他，他的父母、乡亲都是道地的乡下人。他们眼中的世界是狭小的，对于中国的事和世界的事，他们几乎不知道，也不想去关心。“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¹他们中许多人最多只到过湘潭县城，仅隔120多里的省会长沙城，在他们眼里是神秘而遥远的大地方，也许一辈子也没有福气到那里去。

然而，与这些乡下人相反，他们的儿子，一个在乡音和芳香的泥土中生长起来的农家孩子——毛泽东，却干了和他们完全相反的事情。在漫长的生涯中，他和距离中国很遥远的国度——美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建立了亲密友谊，并代表他的党和他亲手缔造的新中国，与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许多曲折而又复杂的关系。他领导的革命以扭转乾坤的磅礴气势，最终结束了近代历史上中国作为美国的宰割对象所蒙受的种种屈辱的悲惨命运，并最终改变了中美近两百年来不平等的关系，使地球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构成了中美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毛泽东传奇的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与美国的关系，无疑是一幅长长的历史画卷。从这幅画卷上，人们能清晰地看到中国和世界历史演进的历程：弱小民族的斗争和崛起，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崩溃；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气魄和雄姿；霸权主义的横行和失败；中国外交政策的胜利和毛泽东的睿智；中美两国最终在北京奠定的平等关系；毛泽东对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高度警惕；……。历史不是一个人写就的，但个人却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他辉煌的一笔。毛泽东便是用如椽大笔为中美关系的历史写上如是一笔的人。不研究毛泽东在这方面的作为，对撰写完美的中美关系史无疑是一大憾事。

本书便是循着历史的足迹，追寻毛泽东与美国关系的一部尝试之作。

一、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湖南

西方帝国主义对湖南的侵略 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在近代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传统的省份，又是一个得风气之先，思潮最为活跃和开放的省份。年轻的、有前途的、敏感的学生们集中在长沙这个受到帝国主义巨大冲击的省城里，他们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表示出强烈的关心。毛泽东作为这些在省城经常把自己置于政治旋涡中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也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开放意识，对于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新知识具有浓烈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同时，他也强烈地体认了民族斗争的传统和湖南人民反帝斗争的传统，因而民族意识深入了他的骨髓。正是这种种因素，促成他很早便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态度

¹ 毛泽东《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和坚定立场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他反对帝国主义，自然也包括在那个时代作为西方侵略者闯进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美国与西方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耀武扬威，推行炮舰政策，瓜分中国领土、财富和权力，对中国大肆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但是，美国比其它西方列强更突出的是，特别注重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同化，注重培植在华的亲美势力，在策略上，更喜欢玩弄骗术，或者打着和平的幌子，或者高唱“尊重主权”的调子，以骗取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以至产生幻想……。

毛泽东和美国的早期关系，是半殖民地社会中，一个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者反对外来压迫者的关系。他对美国在中国这个和平国家以主人的姿态而高视阔步、颐指气使的作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的这种立场，最初便是由美国的侵略行径和它在湖南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的。

在毛泽东出生前很久，中美就已经发生了关系。1784年2月，从遥远的美国纽约港，一条载重360吨的木制帆船“中国皇后”号起航，满载着棉花、人参、毛皮和其它货物，乘风破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驶入中国广州。这艘木帆船，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1784年开始的中美关系，最初还是一种平等的贸易关系。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中美关系便发生了严重的倾斜。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加紧对中国实行政治、文化渗透。这样，美国扮演了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刽子手的角色之一。

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限制华工条约》，以十年为期，绝对禁止华工赴美，掀起排华浪潮。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狂妄地宣称：“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列强国家）融洽相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这是赤裸裸地助长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的有力佐证。

1899年，即毛泽东六岁那一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以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他要求中国政府在承认各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将中国市场向全世界开放，凡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享有的权利，美国也要享有，实行所谓“利益均沾”原则。同时，在政治上，他要求各国在北京采取一致行动，赞助为巩固满清帝国政府及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的行政改革。就是说，各帝国主义国家要通力合作，共同维护它们的走狗清政府在中国的反动统治。“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由一个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奉行独立侵略政策的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

进入二十世纪头一年，美国便与西方七国组成八国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指挥下，以“保护”各国在华使馆和侨民为由，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开古老的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1901年，在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指使下，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美英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史称“辛丑条约”的卖国奇耻条约。中国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9.82亿两。美国在对中国的这场野蛮战争中，获得3293万两白银赔款，合24440778.81美元，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道，取得北京到山

海关的驻兵权。

1903年，美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强迫中国内地通商口岸向美国完全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实行精神侵略的新战略。1908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美国国会核准将中国庚子赔款给美国的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将此数与原应赔给美国之数的差额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用以帮助中国发展教育。美国此举打着“笃念邦交，义行独倡”的旗号，宣称这是对华“友谊”之举，实则是因其独霸中国的需要，以文化侵略辅佐炮舰侵略。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便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文化侵略的目的：“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方式。”詹姆士宣称：“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办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这样，美国的文化侵略伴随着它的炮舰政策向中国一齐进攻，到处办起了教会、学校、医院等，它们用所谓“基督教文化事业”加紧推行“殖民地化文明”，制造奴化的知识分子，为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培植代理人和代言人。

湖南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湖南是一个具有反帝传统的省份。早在1840年林则徐禁烟时，湖南营兵一千名，便由福祥、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率领赴粤助战。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便编撰《海国图志》，“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个中部省份垂涎已久。但是，整个十九世纪，湖南人民英勇而成功地进行了斗争，阻遏了任何外国人进入该省。1892年，湖南长沙发生了周汉刊刻图画，编唱歌谣反对帝国主义“洋教”的事件，周汉的歌谣传遍两湖，影响极大。然而，美国却是最先在湖南取得权益的国家。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攫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即包括湖南铁路的修筑权在内。嗣后，美国和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向湖南渗进，都遭到湖南人民的英勇反抗。1900年衡州的民众捣毁了大约30多个基督教小教堂，杀死了两个德国传教士和一个意大利主教。1901年传教士们卷土重来，在省城长沙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教会。到1902年，湖南又爆发了反传教活动的斗争。看来，光靠传教士的力量永远也突破不了湖南的城墙。于是侵略者们决定炫耀武威，英国人派了一艘炮舰到长沙协助清政府镇压了这场斗争。在炮舰的支持下，基督教以对湖南的全胜而告终。至1907年，湖南全省已有123个基督教传教士以及116个华人助手，在87个不同据点进行活动。

1904年，湖南省城长沙继岳州开为商埠（1899年）之后，被迫向日本和西方列强开放。之后美国在湖南的侵略势力急剧扩展。美国在岳州、长沙所设的恒信洋行，专门经营锑矿、萍乡焦煤及湘西、湘南的桐油，并替奸商承办夏批美国商品，成为美国对湖南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此外，如美商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南星洋行、旭升洋行等，也在长沙、湘潭等地

转引自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转引自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设有经理处和分销处，大量榨取湖南人民的膏脂。1904年，日本商号的近一百个代表团访问了这个城市，以探究在那里建立工厂、开发矿藏的可能。美国和西方各国还把脚迹伸向湖南苗、瑶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在那里寻找开矿的权利。长沙不仅成为美国和西方列强的一个重要商品销售市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地。

帝国主义各国在湖南的势力日益扩张，成为湖南人民日益担忧的事情。美国和西方传教士、商人、教师、外交人员、海关人员纷纷进入湖南。到1908年，在长沙的日本人已达1395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大体上也有这样的数目。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从一个普通的人升入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等级，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人上人，西方列强对湖南的冲击速度和规模之大，是湖南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原因。长沙的民众对帝国主义的耀武扬威极为反感，因而反帝风波随时都在酝酿和发生，以致在长沙的英国领事W·梅立克·休特勒惊呼：“没有女皇陛下的一艘炮舰，法律和秩序是维持不了的。”休特勒要求要有一艘军舰留驻长沙。1909年，英国炮舰8次“访问”长沙，长长的、阴森森的大炮简直指长沙城。英国领事把每次“访问”都看做是“强行决定未解决的案件的有价值的杠杆。”这种无耻的炮舰政策，激起了湖南人民更高的反帝情绪。湖南的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湖南的侵略行径。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开放常德和湘潭两商埠的计划遭到学生抵制。同年，又爆发抗议美国歧视中国人民的移民法律的斗争，以及从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的斗争和抵制美货的斗争。长沙召开了四千多人参加的抵制美货的大会。在抗议和抵制美货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杰出人物——湖南教育会会长禹之谟。在他的策动和领导下，湖南工业学堂的教职员与学生，首先进行了抵制美货的宣传活动，接着中路师范、府中学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演说、宣传，造成了长沙抵制美货的浩大声势。1906年禹之谟英勇牺牲于清政府手中。禹之谟的事迹和人格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他崇敬禹之谟，为禹的反帝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并常常到禹的墓地凭吊。1909年至1911年，湖南又发动了收回路权的运动。1910年，长沙由抢米风潮引动民众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美国在湖南除竭力扩大经济侵略外，特别突出的是文化侵略，力图通过文化渗透，在湖南培植它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早在1890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便赤裸裸地说：“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使他在他的一生中，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他们的教育使他们不可能在社会有崇高的地位。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中国来说，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在湖南，美国人就是循着这条路子走的。

从1906年起，美国便在长沙大肆营造教堂、海关建筑、领事馆、住宅和商店。1902年美国雅礼会决定派人到中国活动，规定他们的任务是“把美国文化‘精华’传播给中国人民。”1903年，雅礼会代表洛仓斯德士敦到中国，湖南十个基督教会集会，邀请雅礼会来长沙。1906年，雅礼会在长沙西牌楼创办雅礼医院，1908年复设护士学校，其经营者为美国人胡美。

转见：〔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页。

《在华新传教士一八九一年大会记录》第457页。

1914年12月，美国雅礼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毛泽东对美国在湖南的势力作了如下概括，他指出，外商在湖南的势力：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国又次之。三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而在文化方面，美国的势力特别大。“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事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股浓厚的亲美空气。”从毛泽东的记载可以看到，美国在湖南的文化渗透，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美国虽然在湖南造成了一批亲美知识分子，但是也造成了它的对立面——一批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的先进知识分子。长沙不仅是湖南教育的中心，而且也是讨论和批评政治的中心。二十世纪的长沙学生界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特别的敏感，他们的一颗跳动的中国心，使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不安，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早惊醒的一代。早在1892年周汉编写的歌谣揭贴中，对美国的凶横就有描写：“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1903年杨笃生在他所写《新湖南》的小册子中，展示了对帝国主义的最早分析。对毛泽东有极深影响的陈天华，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中，就已经表示了对帝国主义的高度警惕，他向国人大声疾呼：“噯呀！噯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们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湖南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保持警惕和觉悟，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中国的落后又迫使他们只有向西方学习，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向西方学习真理的认真程度和他们对西方的警惕程度不相上下。毛泽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体现出这种文化氛围造成的鲜明特征。1910年，毛泽东到达长沙时，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湖南的侵略，已经有亲身感受和一定的知识。他在这个具有浓烈反帝空气的长沙城，受到了反帝思潮的熏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他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和思潮的影响，但是在政治上他却鲜明地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这就构成了他早期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的基本出发点。

毛泽东：《省宪之下的湖南》，《前锋》第1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

二、美国知识的增长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第一次知道美国 从现有的文献和材料中大约可以推断，毛泽东最早知道美国是在 1909 年，即他 16 岁那一年。当时他辍学在家，他的表兄文运昌从唐家托给他借了两本新书，一本是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另一本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郑观应是一个熟悉中外贸易的官商，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粗浅地但较全面地介绍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他在介绍美国的学校时，较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学制、教育内容和如何对教育的重视，夸其“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发出“不修学校，人才不出！”的感叹。介绍美国的议院，称其“民权过重，因其本民主也。”介绍“美利坚之政”，“其制尤善，可为万国之通法者也”。

介绍美国的社会保险，称赞其“利己利人莫善于此”。介绍美国的铁路，赞其使“百货流通、商贾辐辏”。介绍美国有邮局 64337 所，称赞其信件必多，风气日辟。介绍美国工业技术发达，称赞其“心思日辟，智巧日增”。

如此等等。这本书勾起了毛泽东对新知识的求知欲和新鲜感。美国在他的印象中还模糊得很，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他对了解西方的兴趣。后来他曾回忆说：“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要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

毛泽东对美国的第一个清晰的印象，是他在 1910 年秋，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之后。在这里，他第一次对美国的开国史和著名人物的传记有了初步了解。有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书中记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英雄人物。他为书中的人物深深吸引，特别是读到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娜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时，他情不自禁在书中浓圈密点，敬佩不已。他对于华盛顿在担任土地测量员时，在青草萋萋的原野上和狂风骤雨中磨炼自己的体魄、砥砺自己的意志的行为极为欣赏；对于他乐于接近下层人民，培养对西部土地的强烈感情的作法尤感兴趣。华盛顿受命于美利坚民族危难之际，高举反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郑观应集》（上），上海上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61 页、第 312 页、第 372 页、第 528 页、第 651 页、第 721 页、第 671 页。

转见〔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年出版，109 页。

殖民主义的旗帜，坚持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民族独立的胜利。华盛顿在布拉多克麾下的战场上艰苦奋战；华盛顿率军渡过特拉华河，击败英国殖民军；在保卫费城之战失败后，华盛顿在瓦利福奇营地向上帝跪拜祈祷；华盛顿对士兵讲话：“我不仅仅是北军战士，而是毫无区别地对我的祖国服务。”……华盛顿的这些事迹震撼了毛泽东，给他极大鼓舞。34年后，他对华盛顿抗击殖民主义者的业迹还记忆犹深。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话时，还把白修德在延安所看到的情况和华盛顿在瓦利福奇会见一位记者时看到的情况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在外国人看来，也许延安各方面的情况都很落后，就象他们当年也许只看到了华盛顿简陋的司令部而没有认识到华盛顿的主张能使他们取得胜利一样。毛泽东问道，乔治·华盛顿有机器吧？乔治·华盛顿有电力吗？没有。英国人虽然拥有这些东西，可是华盛顿胜利了。因为人们拥护他。他知道正确的政治思想能使人民拿起武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他发明了现代的游击战学说，在这种战争中，人们是否穿军装是无关紧要的，男女老少不管是否出于自愿，必然卷入斗争和造反的洪流，没有保持中立的余地。

几十年后毛泽东的回忆，证明在几十年前，遥远美国的英雄华盛顿的形象和业绩，已经代替了他一个时期崇拜的遥远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水浒》中英雄好汉的形象和业绩。他从历史走向现实，从中国走向世界，美国的华盛顿成为开阔他的世界性眼光的一个人。他对肖三说：中国也要有象华盛顿这样的伟人，必须开创现代的业绩。他在和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时，首先受到华盛顿、林肯等人的激励。似乎可以说，从那时起，他便立志要做华盛顿、林肯那样的英雄，把中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1944年，他在与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在你们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中国就是几亿受剥削的农民。哈里森·索尔兹伯格认为，那些年里，说毛泽东已开始走华盛顿的道路，这种说法并不过分。毛泽东在心目中的确把乔治·华盛顿、林肯作为自己的楷模。

在还书时，毛泽东对同学肖子璋感慨地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又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27年后，他在保安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说：“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过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德

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第175—176页。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格：《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第87页。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格：《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第87页。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第26页。

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看来，华盛顿、林肯们的形象给了他深刻的记忆，以至 27 年之后，他还可以复述书中赞美华盛顿和杰斐逊领导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业绩。他说：华盛顿和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剥削美国人。按照斯诺的看法，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也表现了他对华盛顿的特殊感情。“毛从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和华盛顿的游击战略中汲取了重要教训。尽管接连不断地退却和受挫，他和朱德在持久的消耗战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他们的军队的主力，等待有利条件和‘时机’。”肯尼思·休梅克认为，斯诺关于毛泽东与朱德曾研究过华盛顿的游击战术是没有根据的，其实这个看法不对。八路军的游击战略战术是自己的独创，但毛泽东和朱德研究过华盛顿的游击战术却是确实的事实。1944 年朱德在接见美国记者福尔曼时指出，我们对华盛顿的游击战，细加研究过，这一战术，证明对于反抗武器较精的英国雇佣兵，非常成功。我们的士兵，正如华盛顿和他的士兵一样，把极端的流动性与人民的密切的使用结合，可以挫败一切可怕的侵入的敌人。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人民的军队，他们受人民支持，在这点上，他们和华盛顿的自愿军相似。并且他们有创造性及战斗能力，这使他们能以正规军的姿态作战，并且也能以游击队的姿态作战。

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关于美国的知识迅速增长，当然这些知识是零碎不全的和第二手的。他的表兄文运昌送了他一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使他大开眼界。从《新民丛报》的有关文章零星涉及到的知识中，他对美国这个遥远的国度有了进一步了解。例如梁启超在他所著《自由祖国之祖》一文中，便介绍美国和华盛顿说：

“北美利加洲有一族人焉，距今二百七十余年前，其族之先人百有一人，苦英苛政，相率辞本国，走而自窜于北美洲篷艾黎蒿之地，栉风淋雨，千辛万苦，自立之端绪稍萌芽焉。其初至之地普利摩上，遗迹至今犹有存者。尔后有志之士接踵而来，避秦而觅桃源者所在皆是。积百有余年，户口渐繁，财政渐增。至千七百七十五年，既弥漫于十三洲之地，遂建义旗，脱英羁轭。八年苦战，幸获胜利。遂为地球上一大独立国，即今日之美国是也。回忆此一百有一之先人，于千六百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冽汛阴雪中，舍舟登陆，蜚足而立于大西洋岸石上之时，其胸中无限块垒抑塞，其身体无限自由自在，其襟怀无限光明俊伟，殆所谓本来无一物者；而其一片独立之精神，遂以胚胎孕育今日之新世界。天下事固有种因在千百年以前，而结果在千百年以后者。今之人有欲顶礼华盛顿者乎？吾相率之以膜拜此百有一人也。”

对美国知识的增长和对美国的第一次评论 1911 年春，毛泽东从湘乡到达长沙，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0 月，武昌起义发生后，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为响应辛亥革命而起义的新军。1912 年春，他退出了新军，一连报考了好几个学校。次年，他进行了半年的自修学习，在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刻苦自修，读了一批反映十八、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毛泽东回忆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14 页、120 页。

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 1 卷，求实出版社，1984 年版。

《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的同时，也研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这一期间的学习，使毛泽东关于美国的知识大增。到毛泽东在长沙一师读书的阶段，中国的文献书籍中关于美国的介绍已随处可见。毛泽东广泛阅读的书籍中，他可以得到许多美国的知识。例如毛泽东熟悉的湖南学者魏源，在他的著作中，就用“武、智、公、周、富、谊”六字概括美国。魏源从有利于“行军”和“筹运”出发，希望从对美国的了解中寻求中国独立富强之道。他在《海国图志》中，把大量外国人的著作加以摘编，将林则徐的《四洲志》扩编为《海国图志》，使美国的介绍更加系统而完备。《海国图志》介绍了美国的地舆形势、历史演变、独立战争、民主制度、经济发达形势等等，使人读了眼界大开，振聋发聩。

魏源热烈赞扬美国人民驱逐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指出美国“非英吉利所固有，皆民力之自为辟除”；英国殖民主义者“袭而夺之”，激起美国人民反抗。“于是弥利坚十三部起义驱逐之”。他肯定美国民众在独立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粮道，逐走强敌，尽复故疆。”他认为美国的选举制是一种民主制度：总统“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之，众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二从，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由公举，可不谓周乎！”

毛泽东崇拜过的梁启超，在他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中，详细地介绍了他游历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触。他详细介绍了美国纽约的壮丽繁盛，实在使他“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渲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又介绍美国的经济，“工业发达之实力，实已在英国之上”。

游历波士顿时，梁启超回顾了美国独立的历史，盛赞“波士顿为美国合众自立之母”。游历华盛顿市时，更对华盛顿推崇备至。他在新大陆游记中，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总统制、美国社会的人口、人种、风情政俗、美国政府结构、美国的海军和军舰、太平洋海岸的电报线路、美国南部的黑人、美国各大城市、在美的华人及留学生、华人团体、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政党、美国的妇女与劳动者等等，可谓一部详尽的游美记录。以梁启超的大手笔，写来栩栩如生，使读者如临其境，犹如有亲身感受。加之梁启超在游记中随处发表议论，有褒有贬、有感有叹，实在具有很大的感染力。毛泽东这样求知欲极盛的青年学生，怎么能不为之吸引！

通过对美国的学习了解，他对美国的一切，进一步发生了浓厚兴趣，也受到了不少启发。他对美国的发达的国力、民主制度等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

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1985年，第438页、第449页、第476页。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1985年，第438页、第449页、第476页。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岳麓书社，1985年，第438页、第449页、第476页。

好感。1944年4月18日，他在延安对美联社记者莫里斯·武道谈话时，曾指出：我们批判地接收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以华盛顿和林肯为范例的民主政治，18世纪法兰西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来自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收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扬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他对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战胜困难、坚韧不拔的乐观精神十分敬佩，留下了终身不可磨灭的印象。1959年2月2日，他在省市书记会上的讲话中，要求象列宁所说那样，把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起来，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把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作为贯彻理论的必要条件。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1914年春，四师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重读预科半年。秋天，毛泽东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从这一年起直到1918年毛泽东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这一段时间，他对美国的知识迅速增长。对于美国不再是零碎的、或轮廓式的了解，而是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延安时，王安娜认为，毛泽东关于欧洲和美国的认识，大都是从他青年时期所读书籍中得来的。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对美国的事态极为关心。1916年，他第一次向朋友肖子升发表对美国政事的评论。1913年墨西哥发生了韦尔塔发动的政变，推翻了马特洛政府，并捕杀了马特洛。韦尔塔就任总统。美国政府以韦尔塔亲英，对韦尔塔的政府拒不承认。1914年，自由党领袖卡兰沙发动政变推翻韦尔塔政府，由卡兰沙继任总统，继续奉行亲英政策。1916年3月，由波兴将军率领的美国干涉军入侵墨西哥，遭到墨西哥人民的坚决反抗。此时，美国国内正在大选，参加竞选者有代表民主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以及任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的查尔斯·伊万斯·休斯。毛泽东针对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国内竞选态势，以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得失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与肖子升的信中写道：

“墨乱未已，美以兵力干涉，喧传已久，然未见实行，仅有墨乱徒侵入美南部，恣杀民人之事。威尔逊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罗士福。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事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连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竞争，由共和党裂为进步党，以此使民主党之威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

毛泽东在这段评论中，表示了他最早对国际形势的见解和对中美关系的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9页。

〔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49页。

毛泽东：《致肖子升信》，1916年7月25日。

见解。毛泽东认为美国不应参加世界大战而在欧洲用兵，相反，美国应当作好积极准备，以待时机成熟之后，在太平洋用兵，与日本决一雌雄。毛泽东的见解，实则包含着对美国的含蓄批评。美国在欧洲用兵，是其世界霸权主义的表现，美国对于亚洲也有霸权主义的野心。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及其他》，记录罗斯福的两次太平洋演说，罗大谈其亚洲霸权主义，宣称：“太平洋，洋中之最大者也。而此最大洋，在当今世纪中，当为吾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在当今世纪中，惟能在一等国之位置。若吾国民能以精心果力，利用此地理上之优胜乎，吾信其将来以和平之手段，制此莫大之霸权，决非难也。”罗斯福明确宣布了美国对亚洲和中国的霸权野心，其势咄咄逼人。梁启超指出，美国其所以对太平洋抱如此大的野心，皆因“中国不能自为太平洋之主人翁，而拱手以让他人”之故，他对美国的太平洋野心表现了很大的忧虑。应当说，梁启超及其他学者提醒国人注意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霸权主义的野心，早为当时进步青年学生所接受。毛泽东反对美国对太平洋的霸权，但主张美国要积极参与太平洋的事务，对于野心勃勃力图独霸亚洲的日本予以制裁，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中美平等互助的关系。他指出，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也是美国的仇敌，在日本问题上，中美可以携手建立联合战线，对日本共同用兵，造成太平洋的和平形势，使中美亲善，发展政治经济交流，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毛泽东的见解，显然还十分幼稚，对于美国的对外扩张政策及美国与日本的矛盾还缺乏本质认识，对于美国抱着美好的希望和幻想。不过他希望中美能友好相待的愿望却是那么真切直率，尽管他后来对美国的认识 and 态度发生了转变，但他的这一良好愿望，成为贯穿于他一生的对美国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他尊崇美国创新人物 从早期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可以零星地找到这一时期美国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思潮，以及他在少年时代便养成的叛逆精神，使毛泽东不喜欢维护传统的英雄，他喜欢创新的英雄、开拓未来的英雄。他从这些英雄身上吸取力量，效法他们，引他们为楷模。他佩服华盛顿，一再引他为说明问题的例证。1915年9月6日，他在《致肖子升信》中，称道华盛顿不论地位高低，总是不忘习劳励志的品质。他写道：“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延安时期，他一再向斯诺指出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对他的巨大影响。他同时也佩服和欣赏老罗斯福。在上面提到的与肖子升的信中，他对1910年10月14日老罗斯福在密尔沃基发表竞选演说时遇刺，血流肠溃，仍岿然不动，从容演说毕乃就医的凛然行为大为赞叹。同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信》中，称罗斯福为“东西大体育家”。他熟悉西奥多·罗斯福终生热爱体育锻炼的事迹。儿童时代的罗斯福患有气喘病，视力也很差。但是他凭借百折不挠的意志，从事骑马、打猎和拳击等活动，练就了一付强健的体魄。担任总统后，他仍热衷于徒步旅行、骑马、打球等，并把体育锻炼之风带进了政府。他的内阁被人称之为“网球内阁”。卸任之后，罗斯福仍坚持体育锻炼，还到非洲森林去狩猎。罗斯福这些事迹使毛泽东至为感叹，他向黎锦熙推荐罗斯福说：“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

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他向黎锦熙表示，由于自己身体不健，决心效法罗斯福之流，以野蛮之道，强健其体魄，以求其身体、精神两并完。1917年4月1日，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论文《体育之研究》，再次由衷地称道罗斯福顽强锻炼，使身体由至弱而至强的精神。他写道：“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自强之效。”他认为，国民必须效法罗斯福等辈，振奋民族精神，改变“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较细”的可忧现象。

毛泽东不仅对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罗斯福这样一些政治人物深感兴趣，抱有好感，而且对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也终身敬佩不衰。富兰克林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宣传的西方“十贤”之一（梁介绍的西方“十贤”包括：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富兰克林、瓦特、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因此，毛泽东很早就知道了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美国人民长期爱戴的一个英雄。他的事迹家喻户晓：富兰克林吞食面包；推独轮车穿过费城大街；放风筝证明雷电；编纂通俗警句装饰几百本书的封面；在凡尔赛宫挥动他的皮帽等等，所有这些使富兰克林成为美国精神的代表。毛泽东很早就知道了富兰克林的创造发明和身世。16岁时，富兰克林还在他哥哥开办的印刷所里当报童，他每天一边到镇上各处把报纸送给订户，一边在晚间工作完毕或早晨工作之前挤出时间来阅读各种书籍。这种刻苦求学精神，与毛泽东的境遇颇为近似，他为富兰克林所深深感动。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似乎在某种方面也受到富兰克林的启发。21岁时，富兰克林在费城邀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织了一个小组。他们定期组织讨论会，在会上，每个会员都提出关于科学、政治、文学或哲学上的问题进行讨论。小组的宗旨是：热爱同胞，不管他们的宗教和职业是什么；不要伤害任何坚持己见的人；为了真理而热爱真理；不带偏见；努力发现真理并传授给别人。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与富兰克林的小组是同一个性质，其宗旨和实质也都相同，从富兰克林那里受到启发是显而易见的。

以后他不断称道富兰克林，肯定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创新探索的精神。1913年12月6日，他在课堂笔记中对富兰克林的业绩作了简单提要：“富兰克林，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鸢引电之法。”此后，他对富兰克林的钦佩终身不衰。45年后，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要求写一个近三百年来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以证明“贫贱者最聪明，尊贵者最愚蠢”这条真理，借以增强民族自尊心。他要求在这批小传中，把报童出身的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写进去。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富兰克林。他这一次是从做学问要靠独立钻研这个角度赞扬美国这位伟大科学家的。他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书，学问都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的，他也做成大学问。1965年春，他在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时，引用富兰克林的话“人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动物”，来说明人类的创造能力。8月18日，他在北戴河作哲学问题的讲话，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对美国的了解时说：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到还看到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

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富兰克林贫苦出身，后来变为文学家，还试验过电。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这些说法是封建时代就有的，后来马克思说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12月在杭州再次作哲学问题的讲话时，他又提到富兰克林，肯定大学问都是在实际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关在书房里搞出来的。他说：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里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从上述讲话中可以看出，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对于那些备尝艰辛，依靠奋斗精神成长，具有开拓精神的英雄人物充满了崇敬之情，他认定世界是属于那些艰苦奋斗、勇于攀登的人们的。

他把美国的门罗主义运用到湖南自治运动中 由于此时毛泽东还没有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对于美国政府推行的若干政策，还停留在表面的观察上，往往从感性的角度或者从为我所用的角度予以接受，他在政治上还缺乏老练，不成熟。他赞成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政策便是一例。 1936年，他对斯诺说：“我在长沙一边当教员，一边继续我的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纲领要争取湖南‘独立’，所谓独立，实际上是指自治。我们的团体对于北洋政府感到厌恶。认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离关系，可以更加迅速地现代化，所以主张和北京脱离。那时候，我是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坚决拥护者。”

门罗主义是美国总统门罗提出来的。《门罗宣言》，实际上是一个企图把拉丁美洲隶属于美国霸权主义势力范围的重要文件。当时，欧洲的一些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甘心它们在拉丁美洲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失败，存有干涉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企图。 1823年春，“神圣同盟”镇压了西班牙国内反封建革命，组织远征军，支持法国所策划的干涉拉丁美洲诸国的独立运动，并企图插手拉丁美洲各国。 1823年8月，英国外交大臣坎宁邀请美国联合起来反对欧洲“神圣同盟”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干涉，并提出由英美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美国统治集团的头目和著名政客，都反对和英国一道发表声明，认为这有助于英国在拉丁美洲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实力的扩张，还将使拉美地区从日益削弱的西班牙手中转到英国控制之下。这样，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政策和霸权主义的实现，便将受到很大的障碍。美国为了实现对南美的控制，必须抵制法国在南美的殖民政策和英国的扩张，这就构成了门罗主义产生的背景。 1823年12月2日，门罗在向国会的咨文中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均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获得独立自由的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咨文提出，“欧洲国家实行的政治制度（指君主制）和美国是基本不同的”，因而美国认为，“欧洲列强方面把它们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咨文宣称：“美国对于欧洲列强的现存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不予干涉，将来也不会干涉”，对于那些已宣布独立并已经由美国承认的美洲国家，“任何欧洲列强凡以压迫它们或以任何方式控制它们的命运而进行的干涉，我们只能认为是对合众国不友好的态度的表现。”这样，门罗主义便打着反对神圣同盟武装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的旗号被抛了出来，成为美国独霸拉丁美洲，实现地区霸权的一个宣言。

毛泽东从美国的历史著作中，对门罗主义已有所了解。本来门罗主义在各国政治家那里便存在着多种解释，可以各取所需为我所用，毛泽东对门罗主义便抱着为我所用的态度。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肖子升信》中，对湘省政局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湘人主张湘省只能由湘人治理，是一种门罗主义政策。7月25日，他在再次《至肖子升信》中，重申了他的上述看法：“前书言湘人取门罗主义，举刘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所谓刘，是指湖南各界公推1915年反袁（世凯）驱汤（芑铭）运动中，颇为积极的湘人刘人熙为临时都督，接着又任命刘为湖南代理督军和代理省长这件事。毛泽东此时对驱除汤芑铭有不同看法，因而对于湖南各界推举刘人熙为都督也有不同看法，他把这种推本省人为官的作法称之为门罗主义，表示“始终不赞成”。他说：“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可以看出，此时他对门罗主义并不赞成。

1920年，毛泽东对门罗主义的态度有了一个根本转变，成为一个门罗主义的热心拥护者。1920年夏秋，湖南驱张（敬尧）运动胜利之后，毛泽东立即在湖南发动了一个自治运动。自治运动的基本思想是肯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和省份众多的落后大国，要从总体上短期得到治理和改善根本不能实现，因而可以效法瑞士、德国、美国那样，先邦后联，在先造成独立邦、国的基础上再实现大的联合。这就是毛泽东说的：“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

这样，毛泽东便提出了湖南独立为国，及把中国分为27个小国的自治主张，并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等文章，对他的自治主张进行阐述。

自治运动开始时，毛泽东便有了在湖南推行门罗主义的想法。1920年6月23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便明确地表述了这个思想。他说：“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他又说：“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他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湖南门罗主义的政治概念，主张湖南独立于全国之外，关起门来搞革新和建设。

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发表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支持毛泽东关于湖南独立为主的主张，并具体提出实行湖南门罗主义应当做到：“我们用心于我们自己应于的事”；“我们绝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他把美国门罗主义的精神搬到湖南自治运动中，作为湖南独立为国的理由。

第二天，毛泽东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的文章，支持龙兼公的观点。他肯定，照龙兼公解释的湖南门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实行湖南门罗主义的关键是湖南不去干涉别省的事情。只有“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到“别人不干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20年3月12日。

毛泽东：《“全自治”与“半自治”》，湖南《大公报》，1920年3月3日。

涉自己”。他肯定，湖南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这些占社会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的，只有少数人才不赞成；而主张“湖南侵略主义”。因此，要坚持用“湖南门罗主义”战胜“湖南侵略主义”。

10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反对统一》的文章，再次重申实行门罗主义的主张。并且更进一步主张不仅湖南要采用门罗主义，全国各省也要采用门罗主义。他说：“胡适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用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他对门罗主义采取为我所用的办法，把它说成是各自互不干涉的主义，使门罗主义成为支持他实行自治的重要理论根据。

毛泽东提出实行门罗主义的主张后，受到各方面的批评。徐庆誉在《怎样叫做湘人治湘》的文章中指出：实行美国的门罗主义利少弊多。“现在湖南人拿这种主义做招牌，有一个优点，也有一个缺点。优点是因为湖南人可以利用这块招牌，兑掉许多的外来干涉。缺点，湖南人放弃干涉湖南以外的特权。”“然而湖南以外的事，有非湖南人干涉不可的。因为湖南以外的事，有时候间接与湖南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如湖南人对湖南以外的事，采不干涉主义，那就是湖南人自列于中华民国之外，说到山东问题，福州事件，湖南人就不能过问了，试问这到底对不对呢？”徐庆誉对毛泽东主张门罗主义的批评，的确切中了问题的要害。

接受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 毛泽东早期接受美国的影响，还表现在他曾受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詹姆士，特别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大多数是从杨昌济、胡适那里间接得来的，但是也有一些是直接来自杜威那里得来。毛泽东是《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的热心读者，他从这些杂志上读到胡适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颇为醉心，他接受实用主义哲学观点，大约在1915—1920年之间。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在图书馆谋得助理员职务。1919年1月25日，北大哲学研究会在胡适、蔡元培等倡议下成立，毛泽东成为该研究会会员。这时，他从哲学研究会胡适等人的讲演中，从北大《日刊》和其它新杂志刊登的文章中，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有了进一步了解，受到深刻影响，并把它作为一种新思潮来加以接受。他还直接阅读杜威等人的有关文章和著作，肯定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适合于改造中国传统的思辨哲学和脱离社会生活实际的陈旧教育。

从有关文献中可以看到，他对实用主义哲学的研究极为重视。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记载，毛泽东在京期间，曾邀请胡适给在京新民学会会员作学术及人生观问题的座谈，此时他便与胡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直接从胡适那里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回长沙后，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中，宣布实用主义是思想解放的旗帜，人类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引者）”。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他称陈独秀所推动的新思潮，就是实验主义的新思潮，陈独秀为了实践这种新思潮而得罪于北洋政府，但陈独秀的行动，却给这个新思潮“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192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适逢杜威到此

讲学，江苏省教育会举行欢迎杜威讲演的大会。大会由黄炎培主持，杜威出席，毛泽东是热心听众之一。1945年，他还记忆犹新地向黄炎培提及此事。1920年6月7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谈他每日自学读杜威哲学的情形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种。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所谓三大哲学家，便是指柏格森、罗素、杜威。

7月23日，毛泽东在其拟就的《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中，高度肯定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在对我国旧教育进行批判之后，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方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在《问题研究会章程》（1919年9月1日）中，毛泽东把“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列为教育中要研究的第17个问题，要大家注意研究。在毛泽东亲自草拟的《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和《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的传单的记载中，文化书社所推销书籍，便有《杜威五大讲演》、《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发展》等。

1920年10月，杜威到湖南长沙讲学。毛泽东亲自担任大会记录员之一，杜威的讲演毛泽东一有机会便要前去聆听。

所有这些，反映了毛泽东对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的倾向。

毛泽东接受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表现在：

他接受实用主义反对传统的思辨哲学离开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而虚构形而上的本体的作法，赞成把哲学命题与经验事实联系起来研究。杜威肯定，经验对于人十分重要，没有经验就没有人的世界。经验起源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它是“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人作用于环境，环境又作用于人，人又受到自己行动后果的影响。“这种行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的经验。”由于经验并不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而只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经验决定于主体的状态。主体的状态不同，得到的经验也就不同。所以经验依赖于主体而不依赖于客体，这便形成了实用主义的主观经验论。皮尔士说：“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概念的对象所能有的效果（可以设想，这些效果具有实际意义），那末，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对象的概念。”胡适把这种主观经验论说得更加清楚，他说：“我们各有特别的兴趣，兴趣不同，所留意的感觉也不同。因为我们所注意的部分不同，所以各人心目中的实在也就不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只见得日朗风轻，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是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

毛泽东在经验问题上，明显地受到实用主义主观经验论的影响。他在许多地方也把经验归结为一种主观自身的体验。例如，人对时间的经验，并不是得自客体对象的本身，而是感官对作用的客体进行整理的结果。“时间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人关于善的经验，也不是得自对象本

见湖南《大公报》，1920年8月3、4日。

《皮尔士文集》第5卷，英文版，第402页。

胡适：《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2，第439—410页。

身，“某事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呼加”。关于恶也是如此，某物之所以为恶，“以其与生活有损坏之关系而以恶呼之。”幸福也是如此，识见不同，幸福的经验也不同。“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故手段有高下之别。”看来，无论是善恶还是幸与不幸，人的经验只具有主观性质，依人的主观状况而转移。所以，经验都不是实在的反映，而是随人而转移的东西。“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获取，由概念之所构成，所以体会环象，赖以善其生存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强调经验的重要意义，惜以反对传统中国哲学脱离社会实际生活，陷于抽象思辨的道体研究或宋明以来的理欲研究，主张以现实生活为哲学研究对象，以经验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无疑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哲学研究必须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应当“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的原因。同时，指出主体在经验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反对把经验理解为一种消极直观，强调主体在对客体的作用过程中产生经验，突出了人的认识的能动性，这也是应当肯定的。但是，把主体的作用作不适当的夸大，把经验说成是主观体验，便滑进了唯心主义泥坑。毛泽东在经验问题上接受实用主义的观点，这和他此时还处在哲学的学习和探索之中，对于唯物主义的理论还知之不多，而对于实用主义还缺乏分辨之使然。

如同詹姆士、杜威一样，从主观经验论出发，毛泽东对传统的哲学本体论也持否定态度。实用主义哲学宣称，探讨世界的实在性是荒谬的，因为实在并不是独立的本体，而是和人联系着的，由人创造出来的。詹姆士说：“理性主义（即传统的思辨哲学——引者）的实在一直就是现成的，完全的；实用主义的实在，则是不断在创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来才产生。”又说：“如果说人的思维以外还有什么‘独立’的存在，这种实在是很难找到的……这种所谓实在，绝对是哑的，虚幻的。”实用主义把实在和人联系起来，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中理解实在，也并非完全荒谬，在认识论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在人的世界里，实在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对象世界，它和人构成了统一的主客体关系，但是，实在还具有超越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实在的一面。没有进入主客体关系的世界依然是实在，而且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实在，这就是本源的实在，取消了这种本源的实在，把实在完全依附于人的存在，便导致唯心主义，这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

毛泽东接受实用主义哲学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对传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持否定态度，把实在说成是由人的扩张、创造而构成的客体世界，在这个客体世界之外，不可能再有独立的实在世界存在。他写道：“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毛泽东所讲的实在，不是一种超越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实在，而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活动的实在，并打上人的意识和活动烙印的实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 批注》，1917—1918年。

毛泽东：《伦理学原理 批注》，1917—1918年。

毛泽东：《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1号，1919年7月21日。

詹姆士：《实用主义》第131页、127页。

《（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

在，没有人也就没有这种实在，这种实在，便是实用主义哲学所讲的实在。人的时间意识便是立于人所创造的实在之上，即所谓“时间意识必立其根本于实在意识，而后可以说明其发生及存在。”

人所面临的世界，的确是已经打上了人的活动的烙印的世界，人的活动的扩张，促使人化世界不断扩大。就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和人是密切而不可分的，这充分地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但是，人化的世界并不是凭空创造，它是由独立的自然界转化而来。而且在人化的世界之外，永远存在着独立的自然界，它具有本源性和唯一性，并从本源上对人这个主体起着规定作用。实用主义哲学夸大人的主体意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作用，把实在的世界看成是主体的创造，这便导致了主观唯心主义。“五·四”新文化思潮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潮的一个反动。它提倡崇尚实际和实践来反对崇尚玄虚和空谈，这种思潮的转变，为实用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土壤。胡适用实验主义来区别杜威的实用主义，更强调实践的作用。胡适说，实验主义哲学最注重的是实验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说，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必须用行来实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民主与科学，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方法标榜的是科学的方法，注重的是所谓科学实验，因而颇能受到人们的欢迎。人们把实验和实践等同起来理解，甚至主张实验主义应称之为实践主义，因为它肯定主体对世界的能动改造作用，是反对迷信和虚妄，偶像和客体崇拜的有力武器。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毛泽东接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实在论的观点，便是能够理解的事情了。

此外，毛泽东还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杜威忠实地实践自己的哲学教条，把实用主义推广到教育改革中。他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在许多地方和高等学校讲演、传播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在华的讲演被汇集成书，使他的教育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对当时中国的教育发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赞同杜威的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1919年，杜威在上海讲演时，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阐述了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杜威说，教育事业若不从大多数平民着想，换一句话说，若不提倡平民主义的教育，那么，一般平民觉得终日劳动都为了衣食，人的生活是很没有趣味的，久而久之，他们对于一切事业渐渐产生不愉快的反应。在杭州、南京，他又以《平民主义的教育》为题再次发表演说，指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是极突出的事例；这是愚民政策，决不是民国所宜采用的。我观察中国的社会教育，受教育者也大多为有势力有金钱的贵族子弟，根本没有平民教育，并且又偏重男子，轻视女子，象这样的教育就叫做阶级教育。平民教育乃是公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所以美国小学校称之为公共学校。社会上劳力的人，有为生活所迫，不能子女谋教育，则应当设法使他们享受，这样才可以称之为公共教育，而学校也称为公共的学校。这样说来，普及教育

《（伦理学原理）批注》1917—1918年。

毛泽东接受实用主义的经验论，只是他早期哲学思想的一个方面，毛泽东还接受了唯物主义的经验和本体论的观点，形成了他早期复杂的哲学思想，这里并不是对他的早期哲学思想进行全面评价。

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编：《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年10月版，第9页。

是为国民所急需而不可缓的。杜威认为，社会所以出现平民过激的革命行动，全是由于他们没有受到教育，身心不愉快，情感久抑突破约束的结果，因而革命只能收那没有效果的破坏。补救的办法就是实行平民主义教育，“世界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不在加工资，也不在减短工作时间，实行普及平民教育，使得一般工人在用力之余，也有机会去用脑，这样，才能产生一种精神上的乐趣。”

毛泽东从严厉批判只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贵族主义教育方针出发，肯定杜威提倡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合理性。他指出，为了要使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毛泽东阐述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方针说，平民主义的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遍选举，民主政治，在经济上要求平均分配，而且要求在教育上要有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其首要之义，就是强调全体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必须普及，特别需要普及到生活贫苦的平民中去，“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的学问”。

毛泽东认为，杜威关于教育与民主的关系的分析是正确的。教育不倡，国民知识贫弱，国家就不是民主的国家，而是民奴的国家。他说：“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什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究其原因，在于民智不开，多数平民没有接受教育机会所致。他指出，欧美虽然教育发达，但仍十分注重平民教育，夜学、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保姆学院、聋盲学院、残废学院等林立，使平民有受教育的机会。我国的教育历来贯彻的是“贵族主义”的教育方针，教育为少数官僚子弟和有钱人家子弟所享有，“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毕一个业，非千余无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因此实行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就必须给平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同时，贯彻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还必须打破学术的神秘性和少数人对学术的垄断，“看学术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共，每人都可取得一份。”毛泽东对平民主义的教育方针的阐述，反映了他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接受和改造中国封建旧教育的见解。

毛泽东接受杜威关于“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的观点，和工具主义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必须面向实际生活，为解决实际生活提供知识工具和能力预备。杜威指出：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说来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象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形成呆板

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编：《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年10月版，第22页。

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编：《杜威在华讲演集》，1919年10月版，第22页。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第1卷第1期，1923年4月10日。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新时代》第1卷第1期，1923年4月10日。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劳伦斯·A·克雷明主编《杜威论教育》，1959年英文版，第21页。

而死气沉沉。胡适把杜威的上述思想原原本本地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教育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杜威这一教育思想深有所感，他指出，我同的教育，“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毛泽东主张，要使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克服旧教育“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鹜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的，“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一需要。第三，此种工作的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

他看到广大农村文化落后、文盲充斥，以致农民缺乏参政意识和民主意识，“代议政治”不能推行，又看到“学生毕业之后，多鹜都市而不乐田园”的弊病，认为学生毕业后到农村中去，既有利于克服学生自己的毛病，又有利于推动农村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这样的教育，与社会实际生活联成一气，使学校成为社会之一局部，而视“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的大学校”，教育才能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杜威强调，学校教育既然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与家庭生活联系起来。“既然学校生活是如此简化的社会生活，那么它应当从家庭生活中逐渐发展出来；它应当采取和儿童继续在家庭里已经熟悉的活动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一致，才能使学校教育成为过程的和实际生活的。如果社会与家庭的宗旨和风气，同学校的教育目标不一致，就必然使学校的教育方针难以贯彻，甚至抵销学校的教育成果。毛泽东完全赞成杜威的观点。他指出：“盖依现今之情势、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其关系非为有机的，非为精神的而为形式的。形式尽相结合，而精神上则常相冲突。”“家庭、学校、社会相违日远。”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必须同时改革，“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毛泽东接受杜威的观点，反复强调把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致起来的必要性，并对中国家庭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揭露。

杜威从工具主义出发，主张知识必须成为处理生活实践的工具，教育最根本的基础是在于儿童活动的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正沿着现代文明所由来的同一的、总的建设路线而活动的。因此，让学生“直接地去接触自然，实际的事物和素材，他们的手工操作的实际过程，以及关于他们的社会需要和用途的知识，对于教育目的极为重要，我们对此不能忽视，这一切，都在不断地培养观察力，创造力，建设性的想象力，逻辑思维，以及通过直接接触实际而获得的那种现实感。家庭纺织、锯木工场、磨坊、制桶工场的教育力量，都不断地在起着作用。”杜威反对学生只学些空洞的知识，强调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变成能力，学生具备动手操作的能力，就能活用知识，为社会生活服务。毛泽东根据自己在学校的经验，对杜威的观点深有所感。他认为中国旧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劳伦斯·A·克雷明主编《杜威论教育》，1959年英文版，第21页。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一卷、第2号，1919年12月。

杜威：《我的教育信条》，《杜威论教育》，英文版，第23页。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

杜威：《学校与教育》（1900年）英文版，第5页。

教育的根本弊病之一就是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只学些无用知识，于社会生活毫无益处。因此应当如同美国学校那样，着眼于培养学生操作能力。他根据杜威的上述思想，专门写作了《学生之工作》的文章，详细地设计了新学校学生的教育、生活、工作等，主张实行工读主义，学生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田园树畜，以神圣视工作，创造一种新的生活。他介绍美国的经验说：“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

毛泽东在接受杜威的哲学、教育思想的同时，也接受了他的政治思想。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主张湖南自治宜采“社会主义和民治主义”，并一再强调，只有尊重民治主义，才能使湖南实现民主建设。而民治主义则是杜威的政治主张，是对林肯的“民治”思想的发挥。杜威的民治主义包括：（1）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2）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3）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了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4）生计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除贫富的阶级之类。毛泽东把民治主义等同于民主主义，要求湖南军阀洗心革面，放弃专制主义：“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他要求通过搞好湖南的民治建设，以推动“中国民治之总建设。”

美国哲学家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所以能对青年毛泽东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接受美国的实用主义为一种最有希望的新思潮。实用主义标榜成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哲学，它强调真理的价值性。任何可供我们利用的思想，从工具的角度来说，都视为真理。实用主义标榜是一种民主的哲学，它使哲学变成仆人而不是主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它强调人可以指挥精神，就如同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它认为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无知和卑微者的选票和高贵者的选票具有同样的效力，凭着这张选票，人人都可以捕捉到自己的真理。实用主义又标榜是一种主体性的哲学。它给每一个人都安排一个主角，让他们在实现自己认为有效的活动中作出努力并承担责任。人不能从上帝和大自然中得到安慰，一个人的成败取决于自己的努力。实用主义还标榜是一种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哲学。它完全赞成进化的理论，不过它强调进化的情况决定于个人的努力和所冒的风险而定。人类的智慧和精神也是进化机体的一部分，因而人们掌握着自己的未来，所以它充满了乐观主义。如此等等。实用主义的宣传，构成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追寻真理的人们接受它的根据。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生深刻影响以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对于僵化、保守、脱离实际的旧思潮确实是一个有力打击，因而它能在中国思想界一时占据统治地位。

可以看出，美国这个神奇而又富于冒险精神的国家，是毛泽东学习和探

毛泽东：《学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

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上海《申报》1920年6月28日。

毛泽东：《湖南人再进一步》，上海《时事新报》1920年6月11日。

索的对象之一。他关心美国、研究美国、学习美国，从美国的历史和精神中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他在向美国学习中表现出灵活性、选择性和改造的精神等等，这构成了他后来学习外国的基本精神。虽然毛泽东很快便对美国的政策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民却始终保持着美好的感情和虚心学习的精神。他一生都关心美国的事情，对美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中，他第一次见到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除了对政治问题进行了谈话外，他承认对美国极感兴趣，研究过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内战和独立战争。他关心美国的革命问题，他在和斯诺讨论了美国革命的可能性后，开玩笑他说：美国将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毛泽东对美国的各种事情都喜欢打听，甚至爱听美国的各种轶事。他尽量向斯诺打听卓别林主演的影片《摩登时代》，其中的情节引得他开心大笑，把眼泪水都笑出来了。

1939年9月，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陕北。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又向斯诺了解了美国的种种情形：美国的民中党和共和党的关系及他们的政策，有关美国的地理、气候、人民的生活等问题。他还问美国南方的黑人在争取选举权上取得的进展，文盲的统计数字，美国的印第安人以及他们的遭遇。得知没有一位天主教徒当选为美国总统时，他很吃惊，他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有强烈的宗教冲突。他还问大多数美国人婚姻嫁娶是怎样的。他曾读过有关黄石公园的文章，问斯诺是否去过那里。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类似这样的公园。……他说他始终不理解美国的禁酒法令是怎样在国会中通过的。他对美国文明中的每一个科学技术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他也被他所听到的加利福尼亚的一切深深吸引。斯诺回忆说，毛泽东经常说渴望到美国一游。他告诉斯诺很想亲自看看大峡谷和黄石公园。他还向斯诺说过，希望能在他不太老之前，到密西西比河和波达麦河中畅游一番。他认为华盛顿不可能同意他到波达麦河，但大概会乐于让他到密西西比河中游泳。“在河口而已”，他附加一句，而河口足有50英里宽呢。

以后，他每遇到一个美国人，都要向他们详细打听美国的情形，甚至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例如他曾向美记者问起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是否有了电灯等等。他甚至注意到美国新闻通讯社在新闻报道中，十分注重注释的作法，认为这能方便读者，加深读者对有关人物的印象。他后来曾说：美国的新闻报道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姓名，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它国家的人看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道，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毛泽东甚至注意到美国军人的礼节，当你向其他人敬礼时，别人在未还礼前，手是不能放下来的。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对那些在审干中受到委屈的同志赔礼，他把手举在帽沿边说：照美国人的规矩，敬礼时一定要还礼，如果不还礼他的手就放不下来。毛泽东的行动，感动得许多同志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对美国的关心，使美国人对他的美国知识也感到吃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非常广泛，天南地北，古往今来。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对于美国的许多事，我发现他比我了解得还要多。这真使人感到吃惊，因为二十年来他从来没有跟外部世界接触过。”

毛泽东一生坚持不懈地了解美国，关于美国的全面知识，是他制定中美

关系政策的依据。斯诺指出，毛后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袖。成了一位向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强烈挑战的人，应当说，是和他对美国的深刻了解分不开的。

三、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早期批判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独立意识的革命者。他学习西方，学习美国，绝不是为了跟在它们后面亦步亦趋；也绝不是对西方和美国盲目肯定和歌颂，做拜倒在西方和美国脚下的奴仆。恰恰相反，他对美国 and 西方恃强凌弱，对中国恣意蹂躏的行径极其愤怒，对这些外来的侵略者抱着强烈反感和批判的态度。

在五四运动中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 毛泽东对美国的批判，始于五·四爱国运动。1919年7至9月，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对美国的批判言论。诚如埃德加·斯诺指出那样，由凡尔赛和约激起的愤慨情绪，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毛泽东参加了这次运动，他对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的愤怒，使他打开了接受俄国革命思想的闸门。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是他走向马克思主义历程中的一个内容。

美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占据重要地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对华关系上，坚定不移地奉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但他的手段更加狡猾，更具有欺骗性。他口口声声高唱“和平”、“正义”、“公理”，声称“美国在大战中加入协约国一方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俾使子孙后代不复对峙相残。对美国来说，这是一场用以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美国参战的时间不长，但却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从负债累累一跃而为各国的债主。战前美国是一个从欧洲输入资本的国家，曾欠欧洲各国债务，战后反而借给参战国家1033800万美元。从1913年到1924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占世界二分之一，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专制国。“正象一家亿万富翁的报纸以纯粹美国式的直率态度、以纯粹美国式的无耻态度所讲的那样：‘在欧洲现在进行着争夺世界霸权的战斗。要想称霸需要两件东西：美元和银行。美元我们是有的，我们要建立银行，我们要称霸世界。’”事实表明，美国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它称霸世界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尔逊立即抛出所谓“十四项原则”，以虚伪的和平辞令欺骗世界舆论，掩盖和粉饰美国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威尔逊以欺骗的手法，企图在中国人民中树立一个“主持世界和平和公道”的“良好形象”，换取中国人民对他的好感。他在白宫接见北洋政府的驻美大使时，极尽欺骗之能事。据顾维钧回忆：“总统在白宫接见了，回答了我的问题。他的回答进一步证实了美国的同情态度。他对我将赴巴黎表示高兴，并希望我和美国代表团保持联系。但是显而易见，他一心想着的还是他的那个和会方案。他对我详谈了他对和会的希望，反复申述他在著名的‘十四项原则’中论述过的原则。他说，要想世界永久和平，必须有一个新秩序，不应再用老一套的外交方式来解决战争问题，战胜国不应要求割地赔款，应该废除秘密外交，应该通过建立维护世界和平的组织来创立新秩序。”威尔逊的满口欺骗，使不少天真的中国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幻想。

但是，威尔逊在嘴上说得好听，在巴黎和会上却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页。

列宁：《战争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76页。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169页。

道排斥中国，为了换取美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1919年4月22日，他在巴黎美国代表团寓所会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勒孟梭，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摊牌，在山东问题上，彻底出卖了中国的利益。顾维钧回忆这次会见说：“威尔逊首先讲述和会面临着众多问题，而其中有些问题又是如何难以找到解决办法，山东问题就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接着，他说，法国和日本早就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求，由于插进来这一情况，问题愈发难以解决了。他所代表的美国现在是唯一在山东问题上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国家。他说，现在提出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是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然后，他便讲述了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这就是最高会议所同意的方案内容。威尔逊说，中国可能不待他们的陈述就已经完全了解了。这可能并不合乎中国的愿望，但是，目前‘会议’的其它成员国处境十分困难，最高会议所能求得的最佳结果也只能如此了。”这样，威尔逊便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完成了一次大拍卖。列宁指出：巴黎和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拿着钢刀的强盗逼迫手无寸铁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

威尔逊的出卖政策，只是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的侵略政策的继续，它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敌视中国人民，勾结各国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狰狞面目。它对中国人民是一剂清醒剂，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人民不能对它们抱丝毫幻想，殖民地国家的权利，只有靠人民的坚持斗争才能争取。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态势的发展。如果说，美国参战前，毛泽东对威尔逊的所谓和平政策还抱有较大幻想，希望美国不必参加欧洲战争，而准备在亚洲与日本开战，为亚洲和平做出贡献，那么从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表演中，毛泽东便看透了威尔逊其人狡猾伪诈的本质，也看透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践踏中国人民主权的本质，他对威尔逊和美国政府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抗议。

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揭露帝国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争霸世界的战争。胡适模仿威尔逊的口气，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成是和平对强权的斗争；大战的结束是“合理”、“正义”的胜利，是“和平战胜强权”的结果。毛泽东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是公理、正义、和平与强权的斗争，而不过是强权与强权争霸的斗争，目的是要建立更大的强权，因而对于各国人民丝毫没有益处。“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他指出，威尔逊和“协约国满嘴的平等主义”，但是从他们无耻的所作所为中我们要问：“平等正义”又在哪里？他指出，世界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而此

《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第196—197页。

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演说》，《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2页。

毛泽东：《湘江评论 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后的强权，不仅是军事上的强权，而且将是“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世界人民将面临着一个英法美争夺世界霸权的时代。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从威尔逊的欺骗宣传中得到的一个宝贵教训是：帝国主义只有强权政治，不存在公理可言。16年后，他回顾这段历史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了强权’四个字，更是烜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威尔逊的殖民政策不得人心，不仅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人民也起而反对。他在《湘江评论》上发布的美国新闻指出：“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于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从美国人民反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的政治行动中，毛泽东建立了初步的信念，必须把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美国人民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是友好的，支持的，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他们共同奋斗。

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为了建立美国的霸权，抛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威尔逊企图通过国际联盟这一工具，使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盟主。他的这一霸权计划，引起了英、法、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英法等国为了换取美国在其它问题上的合作，只给了美国一点虚誉，在国际联盟盟约第五条中，允许第一届十人会议和议事会由美国总统来担任，威尔逊的如意算盘便落了空。美国国内政派的反对和工人罢工的反对，使威尔逊内外交困。毛泽东对巴黎和会上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你争我夺的丑恶嘴脸看得十分清楚，对威尔逊如意算盘的落空不无快意。他以幽默嘲讽的口气评论道：“威尔逊在巴黎，好象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透（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的意见’。我看了‘卒已己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从威尔逊急切建立国际联盟的行为中，毛泽东对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有了初步认识，对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保持了一定警惕。对于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看得更加清楚。他肯定，由帝国主义大国来主宰世界人民的命运的“大国政治”时代，以及由威尔逊、路易乔治、克勒满沙这样一些大人物来决定别国前途的“伟人政治”时代，已经过去，以后将是各国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他警告路易·乔治和威尔逊之流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人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

毛泽东：《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人民日报，1985年12月1日。

毛泽东：《各国的罢工风潮》，《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可怜的威尔逊》，《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政治家》，《湘江评论》第3号，1919年7月28日。

毛泽东十分敏锐地注意到，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已日趋尖锐。“法英美三国的官僚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美国工人的罢工，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反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却越来越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战争期间，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为牟取巨额利润，对无产阶级不择手段进行压榨和剥削，积累了惊人的巨额利润。从1916年1月到1921年7月，美国所获纯利为38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参战的开支。与之相反，工人的收入却逐年下降，1918年较1915年减少4%，加之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工人1917年的工资只等于1913年的89.9%。无产阶级日益贫穷，是他们不断掀起斗争反抗的重要原因。1916年全美罢工3789次，有2270000工人参加；1917年全美罢工24450次，有2349600工人参加；1918年，由于政治间谍法的严厉推行，罢工仍有3353次，有1931000人参加。

毛泽东对于美国工人反抗斗争的情况注意研究。他看到，在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掀起了反对实业专制的热潮。“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辣斯的恶制，即起于此。”所谓“托辣斯的恶制”，毛泽东解释，就是通过“资本集中”的办法，使“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而只有一佛郎一辨土的零星给予。”实业专制（垄断）造成了极大的贫富悬殊。他指出，在美国，“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美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尖锐化了，劳动者都在高呼“不许实业专制”！当千百万劳动者都觉悟起来，“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很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毛泽东肯定，美国人民埋葬垄断专制制度的斗争，将成为人类解放斗争的一部分。他充分地估计到美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力量，对他们的斗争的前途欢欣鼓舞。他以辛辣嘲讽的笔调写道：“人人知道很文明很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帖说，‘阶级斗争’业已发生，以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欠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如何睡得着？议院那里痛低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毛泽东对美国的最初评论，显露了他后来的一贯风格：滞洒、幽默、辛辣、尖锐、大胆，出其不意，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等等。从这篇对美国最初

毛泽东：《各国的罢工风潮》，《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湘江评论》第2号，1919年7月21日。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不许实业专制》，《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毛泽东：《炸弹暴举》，《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

的国内政治评论中，可以看出他一开始就对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国垄断资产轻蔑不置。他断言他们最嚣张、最猖狂的表演，也就是他们最虚弱、最无能的表现。他宣布垄断专制的“末日审判”已经到来，他毫不留情地要求美国垄断阶级的分子们为了挽救个人的命运，立即收起那一套自我粉饰、虚张声势的作法，为自己的未来着想去做平民。虽然毛泽东的结论还未免天真，但是却充满不容置疑的自信，他预告不仅这个地球上的专制大国将得到彻底改造，而已全世界也将得到改造。表现了他的坚定的理想和他后来的一贯追求。毛泽东指出，美国的出路，就是美国工人阶级“步俄国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世界革命主义”，美国人民的解放之日便可以到来。毛泽东从一开始考虑的不仅是中国革命，而且更深远地考虑了世界革命。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美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保持了更高的警惕。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毛泽东揭露和抵制美国在湖南的经济侵略的文件，是毛泽东 1919 年底上北洋政府总统的呈文。1919 年底，毛泽东继领导湖南的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又掀起驱除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对于张敬尧纵容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盗卖湖南矿厂于美商的事件进行了无情揭露和坚决抵制。先是张敬尧欲将宁乡锡矿拍卖给美国，因湖南人民坚决反对而搁置。其后张荣楣由矿务局长升任省政务厅长，又欲盗卖湖南白铅炼厂于美商，湖南民众再次掀起反对浪潮。12 月 27 日，毛泽东在北京代表湖南民众，草拟《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揭露张敬尧勾结美国商人掠夺湖南矿厂的行为。毛泽东写道：

张敬尧曾支持张荣楣勾结英商葛兰特，密议售卖全省矿权，“湘人全体反对。事遂中止。不意张荣楣利心不死，诡谋百出。复暗串该局水口山矿师德人韦佳克，介绍美商马意儿布流金等，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名义，抵押借款。其借款合同，闻系湖南政府以铅砂作价入股，为美金八十万元。美商投资为美金一百四十万元。由张荣楣于本年本月十二日下午一点钟，在京与美商秘密签订草约。限期五年，期满可续十年。期内湘省所采铅砂。概归该厂，以每吨定价美金十元收买。草约签订之日，已交美金六万元。议定：正约签订，再交美金十四万元。自草约签定日起，限三星期调印，逾期无效。查水口山铅矿，为湖南财政唯一命源，白铅炼厂，为湖南矿业唯一生路。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唯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亦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张荣楣丧心病狂，希图贿扣，饱入私囊，竟不惜以湘省重大利权，轻轻断送。盗贼之行，罪岂容诛！查矿业条例，凡本国人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今据该约所定，美商实溢股六十万元。甘以主权让渡外人，显违矿业条例。此湘人万不能承认者一。湖南水口山系湖南自办之矿。今该约以专买权授之该厂，且预为规定价金，无论铅砂价格将来不无腾涨之时，一为该约所束缚。汉治萍与日人所订之覆辙，将重见于水口山，损失自不待言。且专买权既属该厂，无异以水口山移为该厂之附属品，是于炼矿权断送之外，并采矿权而亦断送之。后患何堪设想！此湘人万不能承认者二。又，查该约签定之时，美商交款二十万元于湘政府，是明明以合资炼矿之款，供炼矿以外之用，美商何以乐为报效？张督以此作何用途？此中黑幕，不问可知。牺牲一省最大之矿权，填一二贪官污吏之欲壑，事前绝

不与湘人与闻。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三。”

毛泽东的呈文，不仅声讨张敬尧的无耻卖国行为，同时声讨美国无耻的经济侵略行为。从呈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不反对中外合资开发实业，但是合资办厂，必以尊重我国主权为前提，做到互利互惠。美国商人以攫取我国矿厂主权为目的，勾结军阀，贿赂贪官污吏，使炼矿权、采矿权轻易落入手中，不能不激起毛泽东和湘人的无比愤怒。在《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中，毛泽东再次声讨美国在湖南的经济侵略行为。指出：“湖南水口山铅矿，湘督既盗押外人，又将白铅炼厂，押与美商，得银百四十万。”如此下去，湖南公产私产盗卖干净，湖南民生将无以为继。毛泽东不仅对美国的经济侵略深为忧虑，而已对美国在中国的横行和无耻深有认识，这个事件大大地强化了他的主权意识。几十年后，即使是以朋友面目出现的赫鲁晓夫欲在中国办一供应苏联罐头的工厂，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也就是中国对该厂拥有的主权问题。主权意识是毛泽东民族独立意识的核心，这在早期他对美国侵略的批判中，便鲜明地表现出来。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批判 1920年底，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急风骤雨似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在这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风暴中，毛泽东深化了对美国的初期批判。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七一干部晚会上的讲话中，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可是只替帝国主义帮了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却未能改变，反而加深了。中国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便必须坚决进行反帝斗争。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转折点，毛泽东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侵华政策，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他从不同角度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特别要求全国民众要彻底识破美国反动政策的欺骗性。他对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策的批判不但尖锐、猛烈深刻而且富于原则性，并逐步形成了他对美国的原则政策。从这时起，在意识形态和原则立场上，他和美国发生了对抗。

毛泽东对美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的反动实质进行坚决揭露。1921年11月12日开始的华盛顿会议，是美、英、日等国召集的一次国际性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美国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依其战后的地位和势力重新划分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华盛顿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是中国问题。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发给代表团的指令中要求：“最注意者厥有四端：（一）取消英日续盟。（二）取消特殊地位。（三）订立公断条约。（四）关税自由。”其余的如山东问题、“二十一条”问题、修改不平等条约等均可列为次要。中国代表团根据指令在会上提出，不承认“日本在蒙满有扩张之特要”，不同意“国际共管中国”，要求保障中国不受外力侵占，“须要还以自由发展之权”并给予“公平待遇”。还提出十原则，力求与美国政策看齐，以求得美国的支持。即使如此，中同的立场和十原则也受到法、英、日的反对，日

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等：《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1919年12月27日。

湖南各界公民毛泽东等：《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1920年1月19日。

天津历史博物馆编：《秘艾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8月，第388页。

《秘艾录存》第388—389页。

本坚持其满蒙的权力只能扩大而不能缩小。美国国务卿罗脱便抛出所谓四原则来协调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声称：“（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中国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最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效而整固之政府。（三）各国在华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四）各国不得营谋特权或优先权，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罗脱的四原则，除了说了一句尊重中国独立及完整的空话而外，完全是协调各国在华利益，保持各国在华既得权益、无视中国要求的原则。在所谓四原则基础上，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通过所谓《九国公约》。它以美国提出的所谓“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为基础，“为适用在中国之门户开放，或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更为有效起见”，取消了日本在大战时对中国取得的垄断权，代之以由美国作首领和英、日等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因此，《九国公约》实际上是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掠夺中国的一个协议。

华盛顿会议是美国帝国主义践踏中国主权的又一明证，它使中国又一次蒙受耻辱。中共“二大，宣言对华盛顿会议的实质进行了无情揭露，指出华盛顿会议是美国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重新分配市场，调和关系的一次会议，“它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毛泽东认为，华盛顿会议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次值得高度注意的会议，这次会议所具有的作用是：

首先，它是美国协调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来侵略中国的会议，因而它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1923年4月13日，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社会在目前及将来一个时期内，“政治将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中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

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既是帝国主义协调矛盾的会议，又是它们共同准备力量，休养生息的会议。其结果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都得到强化，而且它们必然要勾结中国各派军阀，支持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军阀的争夺进一步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争夺。“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这就是中国政治将越发黑暗的原因。毛泽东同时指出，华盛顿会议虽然协调美国、日本的矛盾，但这种协调只是表面的，暂时的，美国在华政策所取得的优势地位，实际加深了美、日帝国主义的矛盾，因此“中国分裂于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必然的事情。

其次，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明明是帝国主义勾结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共同侵略中国的会议，但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最为狡猾阴险，它惯用冠冕堂皇的好听词句粉饰自己，欺骗中国人民，因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居然对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页。

美国发生迷信，抱天真的幻想，“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这是最危险不过的事情。必须看到，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都是种种骗人的闹剧，美国的在华利益，与它有“生死关系”，在“生死关系”问题上，和中国人民是“势不两立的”。经过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已经变成了屠宰中国的“第一等刽子手”。他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尖锐指出：“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手，试把美国近来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他们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他强调，对美国政府要察其言而观其行，不能只信其嘴上说得好听。从它的行动中便可以看出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那有什么亲善，那有什么和平可言？他列举美国、英国在华盛顿会议后在华种种侵略行径，向国人大声喝道：“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那里？”“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在那里？”

对华盛顿会议的基本分析和认识，是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分析和批判美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个基本出发点出发，毛泽东抓住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进行分析批判。

在政治上，美国与各国帝国主义国家紧紧勾结各派军阀，使中国的政治完全成为“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政府反动腐败、卖国媚外，“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

华盛顿会议后，各派军阀进一步勾结外国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为帝国主义之前驱，帝国主义为封建军阀之后盾。“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英国帝国主义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结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战场，军阀间的战争，就是帝国主义间的战争。美国与日本在中国的争夺，尤其突出地成为军阀战争的乱源。

毛泽东指出，曹锟、吴佩孚自从1920年7月以来，在美、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垄断北京中央政权，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寝食不安。1922年4月29日，美国支持的直系与日本支持的奉系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很快以张作霖的失败告结束，美国在华势力进一步上升。1924年9月，美英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和日本支持的奉系张作霖与皖系军阀卢永祥，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美国企图从此全面结束日本在华势力，建立一个由美国支持的直系主政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展，与美国的愿望相反，直系大败，美、日在华均势重新形成。毛泽东回顾和分析美国在这几次战争中的作用时指出：“去年奉直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于江浙战争，及美国帝国主义欲垄断江苏无线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线电报借款，故其时美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曼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一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计，宁愿拉拢英国以共同役使张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第31、32期合刊，1923年7月11日。

毛泽东：《纸烟税》，《向导》周报第38期，1923年8月29日。

毛泽东：《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作霖。”毛泽东指出，无论是美国支持的直系，还是英国支持的奉系，无论谁胜谁败，均于中国不利。美国的统治并不比日本好，日本的统治也不比美国强，都是奴役和宰割中国人民。因此，必须变帝国主义和军阀相互争夺的战争为人民革命战争，人民起来夺取政权。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对中国政治现象背后隐藏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复杂关系，作了了如指掌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美、日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已经成为支配中国军阀政治的一条主线；美、日矛盾的尖锐化，不仅将导致它们之间的争夺战争，而且也将直接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指出，不仅中国的军阀或者勾结美英帝国主义，或者勾结日、法帝国主义，中国的政治派别也是如此。它们或者倒在美国、英国的怀抱，或者倒在日本、法国的怀抱，做卖国的运动。“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卖国运动。上海、南通等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虫，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中国盘根错结的政治看起来十分复杂。但只要抓住美日争夺这根主线，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许多领导人对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英国帝国主义的分析上。这是因为英国的势力主要在南方和长江流域，革命从南方发展起来，必然要触犯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遭致它的猖狂反扑，因而英国总是表现得气势汹汹，特别凶恶横暴。中共许多领导人，视英国这个老牌侵略者为最凶恶的敌人是有原因的。毛泽东对英帝国主义以香港为基地，高举反革命的旗帜，号召一切反动势力齐集于其旗帜之下的反动行径，也予以猛烈抨击和揭露。但是他肯定欧战以后，美、英、法、日四国中，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现在已处在保守的地位，英国帝国主义较之美国帝国主义已经更加虚弱，它在中国的霸主地位，已经不得不让位于美国帝国主义，而成为美国的附庸。因而从长远来说，美国将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在欧战中骤然膨胀起来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在中日已成为两虎相争的局势。因种种关系，法国和日本站在一起，他们各自勾结一派军阀，中国将成为美、日争霸太平洋的大战场。虽然华盛顿会议美国给了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战争，美国给了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而直系兴师攻浙，是美国给日本第三次大打击，但是美国并没有战胜日本在华势力。因此，从长远和从根本来说，要特别注意美、日在中国的争夺。毛泽东的见地是十分深刻而有远见的，在美国与日本问题上，显示了他世界性的战略大眼光。

毛泽东指出，华盛顿会议只给了中国一句纸上的“不干涉内政”的漂亮词句，在实际上美国要怎样干涉中国的内政就怎样干涉，丝毫不受写在纸上东西的限制。以浙江的纸烟税这一小小事件为例，美国、英国商人在浙江大开烟厂，以至卷烟盛行；每年仅浙江一省销售竟逾千万，流毒之烈不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税；美商借口条约权力与政府交涉，美英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税，结果浙江政府竟然屈服于美英压力，停止了征收。毛泽东指出，仅仅从这一件事中，即可看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无耻和横蛮。抽取纸烟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干，何况抽税与否纯粹中国主权，

断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公使竟然横加抗议，美国究竟如何尊重中国抽税一事，可见一斑。可见华盛顿会议之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是大大地加深了。“美英烟草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毛泽东要求国民深刻地注意到，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治侵略是相互配合的，无论是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不能对美国抱善良愿望。

毛泽东还要求全国人民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是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重要敌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明确主张大力宣传“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展了空前的反帝斗争，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封建军阀的残暴，掀起了反帝的风暴，因而帝国主义各国及各种反动派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向革命人民进攻。“中国在这种情势下，一方面中层及下层民众的革命要求，自然日益迫切，革命之风潮日益加紧；一方面英美日法及一切帝国主义、国内大小军阀、安福研究联络各派政客、香港上海各地买办、阶级、全国土豪劣绅，亦必联成一气，作反革命的运动。”帝国主义攻击共产党、攻击改组后的国民党，妄图扑灭中国的反帝运动，中国反动军阀叫嚣铲除“赤化”，受到它们的欢迎，“颂声”“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他坚定地相信，美国政府出自于维护在华利益的目的，出自它对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敌视，不仅目前、而且在将来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然成为中国革命的障碍，是反对和扼杀中国革命的主力。他对美国干涉中国革命，很早就保持了高度的警惕。

从五四时期到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侵华政策进行的早期批判，显示了他在中共众多领袖中，是对中美关系有最清醒认识的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卖国的反革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作为目标。毛泽东在领导红军进行土地革命的同时，不忘对美国在华动向的注意和分析。1929年7月，在“毛同志指导之下很密切具体的讨论”通过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便对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态势作了分析，指出：“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象是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决议案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对蒋介石的斗争，就是与美、英、日诸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进行土地革命与反帝有一致

毛泽东：《纸烟税》，《向导》周报第38期，1923年8月29日。

毛泽东亲拟《中国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第一次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27日。

毛泽东：《颂声来于万国》，《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中国闽西第一次代表会议情形》，《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2页。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06页。

性。

毛泽东高度注意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1930年发生蒋冯阎大战，在由红一方面军前委会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联合发出的指示中，一致强调蒋冯阎的战争，就是英日美的战争，日本利用英美冲突的紧张，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日美之间有暂时妥协的可能。美国还在组织一个由蒋介石领导，即由美国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遇到国内军阀的镇压；而且要遇到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斗争。指示要求认识，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围绕着争夺中国展开的，必须抱高度的警惕。

“9·18”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以凶焰万丈的行动，暴露了它独吞中国的阴谋和野心。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布苏维埃政府将坚决领导全国民众，进行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同时发表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揭露由美英帝国主义为首组织的“强盗组合的国际联盟”及美、英、法、德等国家瓜分中国的计划。10月16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联调查报告书通电》，通电对反映美、英意图的李顿报告书进行严厉谴责，指出李顿报告书是“最无耻的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他号召民众一齐起来坚决反对日本、美英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

可以看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高度警惕的。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繁重的军事指挥任务，由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不畅，由于其他原因，他对美国情况的了解比较一般，对美国侵华政策的分析批判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大体一致。他这时没有在中共中央负责，有关重大问题的看法，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对美国反动政策的批判，既服从于总体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要求，又服从中央的认识，可以说这是这一时期他对美国的态度基本出发点。

《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53—254页。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3页。

第二章 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的巨人和他们的事业

1927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地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央苏区，在中国南方大地上举起了百万工农革命的旗帜。蒋介石对苏区进行了疯狂的军事围剿，同时实行铁桶般的严密封锁。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人能够进入苏区，毛泽东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找到南京几张残缺不齐的报纸。这时，中央和毛泽东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断了，对于美国的情况很难得到。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美国几乎没有发表什么具体评论，美国人民也几乎不知道他和他的那支叱咤风云的红军的真相。

但是，封锁必须打破，真相必须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必须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这条道路怎样开辟？这是毛泽东长期反复思考的问题。然而，道路终于打通了。在开辟这条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中，毛泽东与美国的友好人士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一、打破反动新闻蒙蔽下的世界舆论

美国舆论界限中的中共和红军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更加不能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多年来，在江西红色根据地中只有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其他外国人在重重封锁下，根本不能进入苏区。

打破蒋介石的封锁，把中共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公布给全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这是毛泽东反复探求如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立即面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促成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建立的任务，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更是十分必要。

从大革命失败到 1936 年期间，美国人民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蒋介石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毛泽东和红军是一些“无法无天”的“赤匪”，并悬赏 25 万元换取毛泽东的人头。美国人民耳朵里灌满了的，只是从蒋介石反动宣传中转载来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辞。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美国人，多达一万三千多人。他们对中国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人对中共和红军有客观公正的报道，甚至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中大多数或者与蒋介石站在同一个立场，或者更关心他们在华的冒险事业，中共和红军的问题，在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美国报刊也很少刊登中国内部斗争的消息。1930 年 7 月，美国出版的《太平洋事务》杂志，在“太平洋来信”栏内，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是自 1927 年以来的首次，完全采用蒋介石的口吻，把共产党和“土匪活动”相提并论。在之后的报道中，美国人民得到的消息是：“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匪活动”频繁；“共产党匪帮”的“普遍破坏和洗劫”；“持续不断的土匪及共产党骚动”等等，重复的不过是蒋介石的反动宣传。《太平洋事

〔美〕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 页。

务》上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歪曲报道，给美国人民造成一种假象：中共和红军在给中国各地制造麻烦，他们的力量已受到政府的致命打击；南京政府只是偶尔才关心一下这些“赤匪”。

虽然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对蒋介石的反动宣传也不无怀疑，但官方对他们却实行压制。1929年春到达北平的美国青年外交人员柯乐布，在北平与汉口和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之后，1932年3月出版了一本长达123页、题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报告。这位美国驻汉口的副领事，对中共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模糊和间接的，许多是错误的。他报告周恩来已于1931年6月23日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他提醒美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一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他的报告所附的一张地图说明，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

柯乐布的报告受到其他美国外交官员的蔑视。北平公使馆一位高级官员看后说：“我们不想再要这种报告了。”尽管如此，柯乐布还是继续收集、分析和报告他所能了解到的中共的一切情况。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报告毛泽东的情况的人。1934年4月，他向华盛顿报告了毛泽东在三月前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的政策声明。但是，国务院以一贯轻蔑的态度对待他关于中共的报告。华盛顿一位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把毛泽东的声明草草看了一眼后评论说：这是研究苏联宣传的人所关心的，但远东司并不感兴趣。

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支持，主宰了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们的头脑。他们相信中共已成为溃散和流窜在穷乡僻壤的“土匪”，并坚决相信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说法。在北京担任《领袖》杂志编辑的美国人克拉克不值一提地认为，中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块极为贫脊而多石的土壤”。远东专家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冷漠无情的中国土壤”里生根是极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中国供职的美国外交官，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很重要的运动。

当然，象柯乐布那样的美国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美国人士中，也有力图弄清真象，对中共和红军作真实了解的人，1931年，担任美国国家研究所助理所长的杨钦，对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时获得的一些中共文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共产党人是始终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心要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批评美国政府发布所谓“残匪已大部被歼”的新闻报道，是欺骗美国公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在汉口担任《人民论坛》编辑的美国人威廉·普罗梅也含蓄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土匪，他们的领袖是土地革命者，目前中国苏维埃的发展“仍然是某种不清楚、不确定的东西”，“看起来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利特·阿本德在《中国能够生存吗？》（1936年纽约）的文章中，对蒋介石把红军的反抗说成是对“掠夺”的爱好深表怀疑。他认为，红军队伍以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生命力，抵挡了一支装备上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大举进攻，这与红军是“土

〔美〕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柯乐布所指可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

〔美〕伊卡恩：《中国通》第59页。

〔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4页。

〔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9页。

匪”组成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

在上海由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偶尔也对红军的行踪作一些较客观的报道。1934年10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

“两年前，一支数千人的红军队伍开入四川，随后不久，红军就对田颂尧将军统率的川军转入进攻，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在四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虽然田颂尧将军也收复了几座丢失的县城，但最后仍然被红军击溃，损失步枪一万支。一年不到的时间，红军兵力扩大为十倍。1933年9月，红军对杨森将军发起进攻。红军还攻击了刘文辉将军所部，占领了遂宁、中坝。省军的战败有力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使红军获得了许多装备，大大扩充了军队。遂宁兵工厂被用来武装红军。现在红军又开始进攻，力图夺占万县和重庆。”

《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些报道，非常可怜地向美国人民透露了一些红军的情况。而著名的《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也没有一处说到红军。11月9日《纽约时报》在第六版上，用了四行字歪曲报道了红军的长征。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三个星期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看来，歪曲的报道及宣传的目的，是要使全世界认为中国红军已微不足道，无碍大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奄奄一息。

至于毛泽东，他的名字对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此时更是鲜为人知。1935年以前，除了蒋介石的污蔑宣传以外，外部世界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的第一个传记是1935年12月13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由署名A·哈马丹撰写的。他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叙述了毛泽东从中共“一大”到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经历。这个传记，只是根据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撰写的。作者企图勾画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但由于缺乏对毛泽东的真正了解和对事实的占有，作者使用的许多材料并不确实，过多的形容词，夸张的说法，一些凭想象的杜撰，反而损害了毛泽东本来的形象。严格说，这篇不够传记水平的简单传记，根本不能真正达到介绍红军领袖的作用。

A哈马丹撰写《司令员朱德》也是如此，虽然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位红军的司令员，但是他对朱德的事迹毕竟了解得太少了，因而不得不借助于民间传说。诸如：“他来自遥远偏僻的山区。身躯高过任何大树。他伸出双手，就能喷出团团烈火，烧死任何敌手，他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锐利的眼睛。他的军队不计其数，全体人民都跟着他走。连外国人也怕送命，纷纷逃出中国。论力量、论勇敢和智慧，无人可与他较量，可他为人朴实，性格和善。他睡在山岭、旷野，全体人民都为他警戒。他一觉醒来，又率领人民前进、再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他。他走遍中国大地，给一切穷人、无家可归者、善良的

苏联《真理报》1935年12月6日。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6—531页。

人们带来解放。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的人民热爱他，到处都有人热爱他。他来自人民，人民给了他朴素而响亮的名字——朱德。”“朱德现在正向中国西北开辟战场。多年前他离开四川，现在他又回到四川。”“朱德正站在离军阀的堡垒成都（四川省会）不远的山岗上，用望远镜瞭望省会的城墙。正如民间传说那样，‘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哈马丹对朱德的这些描写，使用了过分夸张的文学语言，缺乏客观事实的严肃叙述，无助于塑造朱德的真实形象，西方世界借此把这些传记说成是莫斯科的“宣传”。

由于蒋介石的封锁，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也是抽象和肤浅的。1935年11月14日，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提到朱、毛和红军时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飞机的轰炸起见，多半在夜间和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和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种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与战斗精神。”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了解，还缺乏对大量事实的把握。

看来，要冲破蒋介石罩在中共和红军周围的厚重铁幕，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种种真相，戳穿蒋介石的种种污蔑和反动的宣传，就必须让外部世界亲眼看到根据地和红军的生活、战斗的真实场面，让事实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布真相。1935年10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诗词《念奴娇·昆仑》中，心情澎湃地写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他的心中没有忘记美国。

在美国人士中也有对中共和红军持客观立场的人。毛泽东和中共了解到，在外部世界中，诸如在美国较有影响的人士中，仍然有对中共和红军抱着客观态度的人士。

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约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美国科罗拉多矿区工人的女儿史沫特莱小姐，在上海同共产党人相识。她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决心为帮助穷人的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服务。她曾经把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周赤萍安置在自己的住处养伤，听他讲述激动人心的有关共产党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从周那里得到共产党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据说她曾到过苏区，直接了解过红军。当时在上海和她有来往的苏共谍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回忆说，这位女性常常随随便便，毫不惋惜地放弃舒适的住宅，而去中国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艰苦跋涉。有时她突然消失，几个月不在上海露面，到什么地方去走走转转，甚至同红军士兵一起行军，去冒各种危险。回到上海时，皮肤晒得黝黑，但却有许多感受。一双明亮的眸子光彩熠熠。

1933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今日中国概述》；1934年她在纽约出版了另一本她在苏联养伤期间完成的报道中国红军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两本在美国出版的书，第一次向美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代替国民党宣传的东西。奋发向上、富于理想、英勇善战的红军是她笔下的英雄；腐败无能、烧杀抢掠的蒋介石军队才是土匪。这两本书尽管被美国的权

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55页。

〔苏〕·M·科罗利科夫：《绝密行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86—87页。

威人士称之为“十足的宣传”、“故事”，但是它的真实性却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史沫特莱遭到中国官方新闻界的猛烈攻击，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和经常的打扰。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活跃在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1936年以后闻名于世界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他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深刻观察和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客观地评价了蒋介石政权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

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他是一个敢于直率指出蒋介石政权反动本质的人。他写道：“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比以前那些督军政府好不了多少的地位。”“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农村，都由有势力的高利贷者和地主（包括许多官员）控制着；他们也通过鸦片买卖赚钱，这种买卖在半官方的经营之下扩大到极大的规模。资本、企业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官员、军阀和银行家手里；敲诈、贿赂、贪污和裙带之风盛行。剥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小贩来养活地方军阀和军队；工人处在饥饿线上。”

斯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起在农村中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南方各省农民武装部队赶走或杀死国民党官僚和豪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些地区共有农村人口五千万至七千万人，现在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它的热心而干练的领导人主要是五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毛泽东、贺龙、叶挺、朱德和彭德怀。

斯诺公正地指出，红军决不是“赤匪”，而是穷苦人的救星。他们“连根拔掉剥削制度。地主、高利贷者和地方军阀被清除。废债务、撕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士兵。寺庙、祠堂地产、公共的设施和资源归政府管理。废重工、禁鸦片，废除娼妓和娶妾的制度，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以公民权。”斯诺客观地看到，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合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士兵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斯诺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报道和评价，虽然根据的只是一些零碎事实和间接材料，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他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态度，以及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他在中国见到的种种事实。这一时期，斯诺还在上海广泛接触了中国进步作家，1933年，他出版了《活的中国》一书，收集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的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中国进步势力的支持，使他成为有幸访问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

毛泽东和中共相信，凡是正义的事业就能打动人心。只要有客观态度的人，哪怕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也会尊重事实。毛泽东和中共决定，大胆地吸引外国记者到苏区来，让他们亲自看看事实，让他们向世界宣布真相，会比我们自己去说更加有力。这便是打破蒋介石的铁幕封锁，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这样，在打通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美国、首先是与对中国抱着友好态度的美国进步记者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以上参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17页。

二、毛泽东、斯诺旋风：撕开新闻封锁的口子

毛泽东和斯诺的历史性会见 1936年夏天，在同国民党对陕北苏区加紧严密封锁的时候，一个打破封锁缺口的行动正在无声地进行着。

6月，曾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担任助理主编，同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讯员，其时正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离开北平乘上一列破旧的火车向陕甘宁边区进发。他要穿过蒋介石设置的铁幕，到毛泽东和红军那里去。他有数不清的问题需要解答，有数不清的疑问需要澄清。同时，他还肩负着美国兰登书屋和英国《每日先驱报》的重托，要为它们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虽然早在1934年和1935年，它们便向他提出了有关建议，并愿意为他去共产党根据地提供资助。但是，那时斯诺认为，进入苏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斯诺虽然仍满怀疑惧，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十年来的恐怖的宣传故事，但他毕竟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的旅行袋里装着中共华北局负责人刘少奇委托柯庆施用隐形墨水写给毛泽东的介绍信，这使他踏实了许多。在郑州他将与另一个美国人马海德会合，马海德是受宋庆龄之托把埃德加·斯诺带到中国西北苏区去的，而宋庆龄此举则是受中共上海地下党之托。看来，斯诺到西北苏区，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这是中共和毛泽东为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歪曲宣传而进行的一次战略行动。毛泽东将通过斯诺刮起一股强劲的旋风，把封锁的铁幕撕开一个口子，从此以不可阻挡之势把中共和外部世界中断的联系建立起来。就这个意义来说，斯诺到西北苏区虽然有他个人的动机和目的，但对中共来说，突破新闻封锁，让美国记者向全世界公布真相，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的一次战略进攻。

斯诺到达保安，迎接他和马海德的人中，有半数以上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几乎在保安的全部中共政治局委员。中英文书写的“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的大幅横标，鲜艳醒目。一切表明，毛泽东精心组织了这场突破蒋介石新闻封锁的战斗。

斯诺与毛泽东的会面，是斯诺参观、调查苏区的重头戏。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不是对个人的印象，从毛泽东那里，他得到了对中共和红军的实质性了解，也得到了他无数问题的答案。毛泽东则把与斯诺的会见，当作历史性的。因为这不仅是对斯诺个人对中共与红军的一次了解，而是中美人民的一次相互了解，通过他来建立中美人民的友好关系。毛泽东和斯诺的这次历史性会见，开始了毛泽东与美国人士的直接接触。之后他越来越频繁地接见美国各界人士，并逐渐发展起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接触，最终以中美关系的最后决策的权威人士的身份，把中美关系奠定在平等的基础上。

斯诺到达保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来窑洞看望了他。简短的会见，使处于激动中的斯诺几乎没有记住毛泽东的样子。但很快他又见到了毛泽东。一天傍晚，他见到一个高个子在街上走，一边走，一边做着手势在和两个农民谈话，这就是毛泽东。斯诺感到十分惊奇，南京已悬赏25万元要毛泽东的首级，而他却毫不介意地到处走动。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他是一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个子高于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是一个非常精

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很快，斯诺和毛泽东便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谈话。据斯诺所写《毛施会见记》记载：1936年7月15日，与毛泽东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初，谈个人的生平和红军的长征史。除去7月下旬到9月中旬，斯诺去前线采访不在保安这段时间外，斯诺几乎每天都和毛泽东会面；他们进行了极为广泛的谈话。这些谈话无疑是投向国民党的铁幕封锁的烈性重磅炸弹，从而粉碎了蒋介石的新闻宣传机构编织的种种谎言；这些谈话又是中共对世界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共的奋斗目标和现阶段的种种政策。

毛泽东无情地剥去蒋介石在中共和红军身上涂抹的“赤匪”的厚重油彩。他向斯诺指出，蒋介石和国民党栽给中共和红军的种种罪名，什么“杀戮”、“奸淫”、“焚烧”、“吸毒”、“侵吞公款”、“贿赂”、“高利贷”、“卖淫”等等，完全是国民党自己的腐败现象的自供状，没有一条与中共、红军和苏区有什么联系。他对斯诺说：你自己去周围参观一下，你到任何地方去看看，你找任何人间问，请他们谈谈对中共和红军的看法。

斯诺完全相信毛泽东的话，因为事实胜于雄辩。他一踏上苏区的土地，事实就在不断地粉碎他过去所知的由国民党所制造的种种谎言。他首先见到的中共要人周恩来，“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他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至于毛泽东这个被国民党宣传机器描绘成“十恶不赦”的“赤匪”头子，生活简朴得和普通老百姓一般。“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的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斯诺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仅中共要人是那样淳朴可亲，富于理想和信念，红军战士也个个振奋、生龙活虎，和老百姓保持着如鱼似水的关系。他用激动的笔调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们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那样的感受了。

至于苏区，绝不存在外界想象的民生凋敝、饥民遍野的现象。斯诺看到的是“成熟的小麦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玉米田”，“在那里，鸦片烟是禁止的，贩卖儿童和妇女同样受禁止。权利平等如同男女平等已初步实现。妇女也可以分享一份土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普遍实行免费教育。”“在这个中世纪的世界里，突然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61页。

《毛施会见记》，载《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11月版。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7页、第65页。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47页、第65页。

《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第210-213页。

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确实使人感到意想不到。”

总之，所有这一切，使斯诺得出一个与国民党完全相反的结论：“凡我在西北所见到没有什么可称之为‘恐怖’的，而且我怀疑当时根本就不存在‘恐怖’。”斯诺以亲历的事实，证实了毛泽东对他的谈话。一年后，斯诺在向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的信中自信他说，对于南京政府官员们的反共宣传，实在是不值得“攻击”的，“虽然我有足够的材料可以用来这样做，如果我想这样做的话。”

但是，毛泽东和中共使斯诺感到最为吃惊的是：蒋介石此时还正在高唱“剿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坚持最后五分钟”便可以消灭共产党的调子；与此相反，中共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却以恢弘的气度，不计前嫌，宣布愿意和自1927年以来一直处心积虑捕杀、围剿、诬蔑中共和红军的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毛泽东对斯诺说，日本侵略的严重性日益加剧，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的面前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和国民党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即使是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如果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共产党将相应地调整政策，例如关于没收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止。

毛泽东的话使斯诺震惊，他深刻地理解到，毛泽东发布的关于和他的敌人蒋介石、国民党和解的消息，不是为了个人和政府的利害，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世界和平的命运。毛泽东代表中共所表现出的这种广阔的胸怀、无私的境界和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忍辱负重的精神，使斯诺感受到中共党人和毛泽东理想高远、人格伟大。斯诺断定，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不是罗宾汉似的人物，他们比罗宾汉式的英雄好汉高出千百倍！他要把这个信息迅速传递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11月14日，他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和他的这一次重要讲话。

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通过斯诺向全世界公开阐述，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这将有助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

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人民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的对外政策受到这个总目标的制约。日本的侵略不仅威胁中国，同时也威胁到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日本不仅是中国人民和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同人民的敌人，而且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中同人民欢迎这种态度，并且愿意和他们组成一个反侵略、反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220页。

《复始之旅》：《斯诺文集》第1卷、第210—213页。

《斯诺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80页。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8—123页。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0—131页。

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毛泽东指出，象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可以在援助中国抗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样的援助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南京政府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有益。否则，象过去一样，南京政府从美国、英国许多国家接受了援助，而这些款项和供应品大多用于消灭红军，这样的援助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

当斯诺问到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时，毛泽东发表了对美国的详细的外交评论。他说：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是指罗斯福政府有一定的反法西斯倾向，而在 1936 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工人阶级投了罗斯福的赞成票，抵制了亲法西斯垄断集团执掌政权的阴谋，支持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也表现出了政治远见性。毛泽东对美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和对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高度赞赏；对罗斯福政府寄托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它能以世界和平及美国的根本利益为重，与中国人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德、日法西斯。

毛泽东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将使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关系。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欢迎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但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民主和独立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也只有在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对于影响中国独立和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中国将一概不予承认。对于外国借款也是如此。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但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借款。总之，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至于与外国的贸易，将会得到大的发展。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巨能够吸引许多国家。

毛泽东阐明，在未来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中，中国将遵守主权原则、平等互利原则和对外开放的原则，发展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维护太平洋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毛泽东与斯诺的上述谈话，不仅表明了中共现时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也表明了未来新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原则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已经确定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准则，这些基本原则和准则，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外交方针的基本组成部分。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虽然只是一个美国记者个人的访问，但是，斯诺认为这个访问关系美国和世界人民真实地了解中共和中共事业，有助于美国和世界人民澄清被种种歪曲宣传和报道包围，因而搞得十分混乱的认识；有

助于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前途。他要向中国人民表达美国人民的理解、支持之情。他在西北军民联欢会上的演说中激动他说：“我现在要报告你们几条消息：1.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同你们一样，力争取自由独立解放而斗争，如西班牙、比利时。2.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到处在罢工示威，来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剥削，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进展之下，使他们更加兴奋，斗争更加坚决。3.日本侵占中国，美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劳动大众起来反对日本的行动，来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们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你们。所以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是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去告诉今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更努力把中国革命的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西行漫记》——美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10月12日，斯诺在访问延安四个月之后，依依惜别，踏上了归程，10月底回到北平家中。毛泽东的谈话和苏区的观闻，深深地使他激动，以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中。他要立即把在西北苏区的美好印象写出来，把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写出来，向全世界公布真相。

斯诺苏区之行，轰动了北平、美国和世界新闻界。他在美国驻北平大使馆举行记者招待会上，发布了去西北苏区的重要消息。美国《纽约太阳报》、《时代报》、《星期六晚邮报》、《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先驱论坛报》、《生活》杂志等等，纷纷向斯诺约稿。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将斯诺提升为该报驻远东的首席记者。《纽约太阳报》和《时代报》，则为把斯诺的报道据为各自的独家新闻而争论不休。

斯诺日以继夜地撰写有关稿件，迅速发表。11月12日起，美国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刊登了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大美晚报》立即予以转载。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斯诺演讲稿《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刚创办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接着美国《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的自传》，以及有关长征的报告。《新共和》刊登了斯诺的《中国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生活画报》和《时代周刊》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的高价购买了斯诺在苏区拍的25张照片。《每日先驱报》除了头版头条连载斯诺的报道外，并配以大幅照片和有关的社论，而他单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三十篇报道。

毛泽东为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所感动，这个美国人是中国人民的值得信赖的朋友。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书斯诺：

斯洛（诺）先生：

自从别去以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斯诺在中国》照片第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斯诺在收到毛泽东随信捎来的与史沫特莱的谈话后，迅速交给北平爱国青年学生王福时，由他编入由斯诺提供全部材料编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并于当月出版。

与此同时，斯诺抓紧撰写《红星照耀中国》（我国翻译为《西行漫记》）这样一本全面报道中共、红军和苏区的专著。斯诺知道这本书一定会触怒国民党，但良心驱使着他。他说：“我作为一个美国记者有权报道我所发现的事实真相——正如一个中国驻美记者有权这样做一样。对我来说，我只是想描写我所亲眼目睹的事，并且解释红军这个现象，这就够了。”7月，这一杰作完成。10月，《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销售了五版。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一月销售1万2千册，以后又连印数次。

《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不啻是毛泽东和斯诺刮起的一场世界性旋风，它引起了美国和世界的巨大震动。这是“被封锁了九年的世界性头号新闻”，美国舆论界大震，各界人士纷纷指出，《西行漫记》成为当代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它使斯诺成为一位众所周知的人物，牢固地树立了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诠释者的声望。

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被《西行漫记》刮起的旋风所完全折倒。各种评论代表的社会反响简直使斯诺“大吃一惊”。一位知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称赞斯诺完成了“本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壮举”。欧文·拉铁摩尔称《西行漫记》是多年来新闻工作的最大成功；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秘书长爱德华·G·卡特，评价这本书开辟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时代。《大地》一书的作者，著名作家赛珍珠（玻尔·巴克）认为，斯诺非同一般的记述，每一页都是意义重大的。哈罗德·R·艾萨克斯指出，《西行漫记》是美国人对中国人产生印象的第一个重要来源。就象《大地》使美国人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普通的中国人一样，《西行漫记》使美国人和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家由衷他说，对于他，读斯诺的书始终是一种“惊心动魄的体验”。一位远东问题专家赞许《西行漫记》是用英文写出的、有关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可靠的记述。另一位历史评论家指出，斯诺的著作“为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最好的原始资料”。

美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一致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斯诺为一代美同人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同时也是在打破形象。斯诺彻底推翻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土匪”的论点，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形象。他是第一个向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正式提出问题，并得到答案的美国人和西方人。也是他第一次将对照鲜明的一幅图画，映入美国和西方人的脑海——质朴、爱国的中国共产党人，与腐败无能、背信弃义的中国国民党人。费正清认为，斯诺的报道对正义世界是巨大的鼓舞。“在全世界面临战前灾难的前夕，报道了一支远离西方各国的独立的战斗力量”，它给全世界人民带

《斯诺在中国》第80页、第78页。

《斯诺在中国》第80页、第78页。

费尔班克：《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与美国》（剑桥、马萨诸塞，1967），第84—85页。

来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信心。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金获得者巴巴拉·拉奇曼用三个“首次”高度评价《西行漫记》的贡献：它“首次向全世界报告了中国红军英勇的长征。首次刻划了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首次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信念和目的。斯诺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事业给予了充分的报道。这一事业对于本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惧怕抗击法西斯的人们，是一个强有力的鼓舞。”

斯诺的报道和《西行漫记》，不仅震动了美国舆论，也使美国官方和政府中共、红军和毛泽东不得不刮目相看。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指出，《西行漫记》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了《红星照耀中国》，后来他三次召见了斯诺，并受其一定的影响。1942年2月24日，罗斯福在华盛顿白宫总统办公室第一次召见斯诺时，他告诉斯诺，他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和《星期六晚邮报》上有关报道认识斯诺的。在三次召见中，斯诺向罗斯福进一步介绍了中共的政策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使罗斯福产生了和中共建立某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想法。他对斯诺说：“我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不仅如此，斯诺夫人还指出，通过埃德的居中介绍，苏联领导人认识了毛泽东，欧洲和中国人也认识了毛泽东。在此之前，俄国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蒋介石却估计高了。他们的代理人奥托·布劳恩向他们提供了错误的情报；他在中国没有经验，并且憎恨毛泽东及其政策。埃德的报道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使苏联更有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与美国结成联盟。

正如斯诺自己所说，《西行漫记》所以在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响，并不是这本书采用了什么惊人的艺术手法，而是事实本身征服了读者。正是事实给美国人民塑造了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宣传的、中共的崭新形象。在美国人民面前，“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所能出现的最优秀的人物。在一块缺少代替物的土地上，他们正在跨越难以想象的障碍，为一个新的、更好的、现代的中国打下基础。”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是毛泽东借助美国记者打破蒋介石新闻舆论封锁、洗刷反动宣传泼在中共、红军和苏区身上的污泥浊水的一次成功的战役。毛泽东通过斯诺使美国 and 全世界对中共 and 红军有了真实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领袖的名字也进入千百万美国人民的脑海中，中共对美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为美国人民接受。通过斯诺，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架上了友谊的桥梁。美国人民知道了中国的巨人和他们的事业。

谢伟思；《斯诺是中美人民间活的桥梁》：《纪念埃德加·斯诺》第72页。

《斯诺在中国》第175页。

海伦·斯诺：《旅华岁月》第196页。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35页。

三、蜂涌而至延安的美国各界人士

斯诺的西北苏区之行，轰动了中国和世界新闻界，许多外国记者、包括一批美国记者都想步斯诺的后尘，试图赶上或超过斯诺的成功，更想象斯诺一样，有幸采访毛泽东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

自斯诺离开西北苏区之后，1936年12月，西安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扣留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人从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大局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很快达成建立统一战线的协议，中国国内的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国民党并没有放松对西北苏区的封锁，蒋介石的中央军队再次封锁了从西安到延安的通道。外国记者要穿过这个通道必须冒很大的危险。不过，西北苏区如磁石一般吸引着他们，为了能看到这个全世界都感到神秘的地方，冒冒风险他们认为值得。这样，自斯诺之后，一批批勇敢的美国人，踏上了艰险的去西北苏区之路。在苏区，他们耳闻目睹了那里的现实，其中大多数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在这些美国人眼中形成了各种印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们都共同地承认：毛泽东的智慧、力量、信念是中华民族的化身；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红军的理想、信念；看到了他们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思想源泉。这批美国记者用各种笔调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将不仅仅认识的是毛泽东，而是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的希望。

第一个在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 继斯诺之后，第一个到延安的美国记者是艾格尼斯·史沫特莱。西安事变时，史沫特莱是在西安的唯一美国记者。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红军驻地距西安城北仅35英里，她抓住机会，于1937年1月12日，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到达了延安。她是在延安第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美国记者。

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便在他窑洞里会见了她。在史沫特莱的眼里，毛泽东穿着一件带补丁的大衣，个子很高，前额宽阔而突出，具有风流调悦的气质，总是流露出个性刚强、睥睨一切、当机立断的性格。第一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便常到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住的窑洞中去，三人一起吃便饭，纵谈几个小时。每一次，他都向史沫特莱提出成堆的关于外国的问题。他们有时谈印度，有时谈文艺。有时，毛泽东朗诵中国古代诗人的名句，有时也低吟他自己所写的律诗。他有一首怀念他第一个夫人杨开慧的悼亡诗，她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史沫特莱发现，红军的领袖毛泽东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具有古代诗家的风格，但诗人流露出他个人探索社会改革的一股清流气味。史沫特莱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审美大师和幽默大师。他的幽默总是讽刺挖苦和冷酷无情，象是从与世隔绝的无底洞里蹦跳出来的喜笑怒骂。史沫特莱对毛泽东有这么一些印象：他思想深沉，心灵深处有一道门，从来不对任何人开放。他一口湖南腔，试着跟我的女秘书学北京官话，跟我学英语，学唱英文歌，由于语言单调，听来沉闷不大入耳。

史沫特莱根据她的观察指出，所有在延安的这些外国人，他们都喜欢毛泽东，都大谈大讲毛泽东的稀奇古怪的传说。他们中间有一个又瘦又长的英国爵士朋友，毛泽东狠狠地开这个英国瘦长个子的玩笑，甚至说他只要留在延安，就可以介绍一个中国姑娘和他结婚。这位英国爵士回到了汉口，他说

他永世不忘毛泽东。

史沫特莱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和常人一样，他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永世难忘的隐秘。他喜欢开玩笑，但是，他又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毛泽东虽然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没有到外国旅游过，也没有到国外留学过，但他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相类似。毛泽东以理论家闻名于世，而他的一套思想理论，深深扎根于中国历史和军事经验之中。毛泽东写文章作报告也引经据典，但他很少这样做，他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德等国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吸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他把历史的重担担在自己的肩上，时刻为着他的人民而奋斗。史沫特莱以崇敬之情向美国人民介绍，毛泽东是当代中国的新人的领袖，她以能有幸见到他而感到自豪。

1937年9月，史沫特莱离开延安。她还是平时那样，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衣和一条宽肥的裤子。不过在进入西安时，她换上了一身红军的军装，她完全知道这样做会引起轰动。她所以要穿这身红军的军装，目的是要鲜明地表明，她是站在毛泽东和红军一边的。她要人们注意，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史沫特莱作为美国人民普通的一员，表达了她对中国人民正义事业的一贯支持。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抗日战争期间，她凭借自己锐利有力的文章和亲自参加救护伤员的机会，帮助中共和军队从国外获得各种医疗用品。她的信件随毛泽东的信件一起寄到美国，使白求恩和其他几位西方医生来到中国。通过她个人和朱德向尼赫鲁的呼吁，使印度派来了五位医生并提供了医疗用品，她还为建立中国红十字会积极工作。她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她在给朱德的信中说：“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世界再也不会象老样子那样了。我活到亲眼看见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能够这样讲的人是不多的。……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尊敬她、感谢她。1950年5月6日，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在伦敦与世长辞，中国报纸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丁玲、茅盾等纪念她的文章。遵照艾格尼斯的遗言，她的遗骨于1951年在北京安葬。墓碑上刻着朱德的亲笔题字：“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在史沫特莱鼓动下来到延安的美国人 毛泽东每一次在史沫特莱的窑洞中谈话时，在座的总是还有另一位外国女士，她就是中共党人王炳南的妻子、德国妇女王安娜。她是和美国有名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利夫于1937年春夏进入延安的。在这之前，还有一名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鼓励的美国《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多·基恩，于1937年春天悄悄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前往延安，在延安逗留了十天。基恩对共产党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吃惊地发现，这个红色首都竟看不到一个乞丐。他在会见毛泽

以上参见史沫特莱的回忆录《中国的战歌》。

史沫特莱：《革命时期的中国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第2页。

东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如同列宁斯大林一样，他能够写出熟练而笔锋犀利的政治宣言和中国文言文。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为共产主义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在史沫特莱的鼓动下，厄尔·利夫和王安娜又来到了延安。仅在延安逗留一天就改变了厄尔·利夫过去得到的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这位美国摄影师发现，共产党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的存在，但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毛泽东“奇异的个性”，迷住了厄尔·利夫。他被毛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及民主的作风深深吸引。他认为：“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

王安娜一行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她和史沫特莱住在一起，非常渴望见到毛泽东。很快，她便在剧场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艾格尼丝向她指着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男子说：“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在剧场看戏。”王安娜看见，那个男子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象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着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象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使王安娜立即感到，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王安娜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见，是她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带着一名“小鬼”，慢慢悠悠地踱到她和艾格尼丝住的院子。他们坐在一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王安娜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样子，然而，面对着，却不能不为他的才智焕发而深感钦佩。这穿着满是皱折、不拘款式的衣服的瘦瘦的男子，由于他的毫不动摇的信念，使中共和红军都确信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和王安娜谈起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苏联的情况，以辣椒粉做调味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王安娜在与毛泽东谈话时，发现毛泽东这个有着严肃的理想的中共领袖，也会有孩子般的好胜心，在这种好胜心中蕴藏着对中华民族的自信。当艾格尼丝谈到王安娜的儿子时，毛泽东马上很认真地问：“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象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色的呢？”当王安娜稍有一点吃惊地告诉他，她的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时，毛泽东又余兴未尽地问：“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再次得知她的小孩的皮肤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时，毛泽东很得意地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象比你们强呢！”这一番谈话，使王安娜感到，这个被德国人李德瞧不起的毛泽东，反击起李德来，会使李德无招架之功。

王安娜去看毛泽东时，证实了毛泽东是一个博览群书，特别爱好研究哲

学的人。毛泽东让她看他读的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他对这些书有时会连续三、四个晚上不停地看，直到深夜两、三点都还不睡。他向王安娜谈红军内战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内战中发展起来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各项行之有效的战略原则。他引用许多京剧里演过的、尽人皆知的故事，来说明这些战略战术。他几乎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而常常引用诗歌和群众中流行的俗语来说明问题。外国人要很好地理解他的话是不大容易的。但从中国听众的角度来说，毛泽东的话比起许多党的理论家那些罗列许多抽象词句的、难以理解的演说通俗易懂得多。

毛泽东的谈话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充满了魅力，他一次也没有到过外国，也不象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他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他谈起趣闻话时，能使人笑出泪来。他喜欢长时间的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他讲话说得很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人惊讶不已的是，即使是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他有这样的习惯，在延安城内溜达时，不管碰到谁，小商贩、赶车人、农民、羊倌……都是详细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王安娜对毛泽东最深的感受是：这个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穿着满是皱折制服的人，他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她看到了发表“阿波罗神谕”的“崇高形象”——继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穿过重重封锁线到达延安的，是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她1907年出生于美国犹他州，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历史学有浓厚的兴趣。1931年，她在犹他州大学毕业，通过了文职人员的考试，随后来到中国，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担任总领事埃德温·S·坎宁的私人秘书。1932年，海伦与埃德加·斯诺结婚。1933年和斯诺一起迁居北平。1934—1935年，海伦在燕京大学攻读哲学。她对黑格尔哲学有浓厚兴趣，并取得了优异成绩。斯诺夫人有一个宏愿，就是要写出一本关于中国很有见地的著作。她认为，她是一个愿意作出真正努力，去探索一个新问题的典型的美国青年。

埃德加·斯诺滞留保安期间，斯诺夫人于9月到达西安，企图去保安与丈夫会合。驻西安红军联络员鉴于局势动荡不定，建议她最好等斯诺先生离开苏区后再说，于是她返回北平。1937年4月，斯诺夫人听说5月将在延安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人将在延安聚会，她认为这是一个访问红军将领的最好机会。于是她由北平进步青年、东北学生王福时等陪同，化名尼姆·韦尔斯由北平出发到陕北。

在西安，尼姆要去陕北简直困难重重。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被迫出国。西安特务横行，中央军控制、封锁了所有去陕北的通道。由于斯诺的成功报道，使西安的外国记者受到严密监视，任何外国人没有1937年的护照签证，只能在西安停留24小时。官方恨透了报道边区的美国记者斯诺，姓斯诺的外国人，在西安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尼姆在西安受到西安警察局的警告和跟踪，要她立即返回北平。西安红军办事处因国共之间正处在谈判之中，所以在帮助尼姆这个对方认为是有越轨行为的人的问题上，持小心的态度。办事处向延安发报请示：有一位美国记者夫人要赴延安访问，同意与否，请示。毛泽东得知电报后，立即想到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一位记者夫人，当得知是斯诺夫人后，同意让其到延安。

这样，斯诺夫人就积极策划如何通过封锁线。她幸运地遇到一位愿意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骑士般的美国青年肯普顿·菲奇，他在西安为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工作。经他介绍，尼姆结识了一位斯堪的那维亚冒险家埃弗雷姆·希尔。他们设计了一个大胆的行动方案，几经周折，在一天半夜里从西安宾馆逃走，神奇般地驱车三个小时，终于逃离了国民党统治区，驶到了三原红军驻地。尼姆成功地来到了陕北，但这段冒险生活却拖跨了她的身体。

尼姆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早晨，毛泽东和朱德便到她的窑洞里去拜访她。尼姆对毛泽东的印象，如同她丈夫斯诺一样。她是这样描写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的：“毛泽东把他的椅子拉离桌旁，摘下他柔软的红军帽，让他那浓密得令人吃惊的黑发滑落到耳旁。他交叉着那美丽的、出奇的、强有力的、高贵的双手，好奇地看着我，甚至带着善意的幽默。这两只手显示了真正的力量，它一点也不象知识分子的普通的手，也不象工人阶级的手。毛很魁梧，而且就一个中国人而言，体格很健壮，他的手和他的体格很相称。”

尼姆很快和毛泽东建立了友谊。她对毛泽东说：“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尽快把你的传记打出来了。”“这是一个杰作，会给每一个读者以深刻的影响。于是我决定不惜任何代价访问你们的地区，我丈夫希望我从你这儿得到最后一章的材料”毛泽东亲切地点头。如同斯诺一样，尼姆给了毛泽东一张长长的问题清单，毛泽东对她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其中有许多是要求解释看来似乎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呵呵地笑着说：“你知道，中国有些事是很奇怪的。”在谈话中，毛泽东有时征询式地问尼姆：“你的意见怎样？”虽然使尼姆有些紧张，但她后来弄明白，这是毛泽东诚恳地想知道一个美国人的想法。

尼姆是第一个和毛泽东谈论哲学的美国人和外国人。毛泽东知道尼姆在燕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并对黑格尔哲学深有兴趣时，便和她讨论哲学问题。毛泽东尽量通俗地向尼姆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一般的道理，并且同意和她合著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小册子。

7月4日美国独立节那一天，毛泽东和尼姆进行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与一个美国人系统阐述中国革命性质的谈话。毛泽东实际上通过尼姆，向全世界阐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系统主张。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毛泽东自1926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来，对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所作的又一次系统分析。它表明了毛泽东的思想的连续性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如果说，毛泽东向斯诺着重介绍的是红军的历史，中共的奋斗目标等等，那么他与尼姆的谈话则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主题，触及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认识和根本主张。毛泽东是要力图通过与斯诺和他的夫人的谈话，让美国 and 全世界真正地、全面地了解中共党人。

尼姆·韦尔斯在她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内幕》中，记下了毛泽东与她进行“中国社会性质”谈话的珍贵内容。这份谈话不仅使美国人和全世界人了解了毛泽东对中国性质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成为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史料。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较之1939年他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小册子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要早两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毛泽东向尼姆指出，就中国的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这个社会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而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以农村经济为主要基础的小商业经济。这种小商业经济，也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比资本主义落后，但比最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略有一些进步。不过，中国也进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门槛。否认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明智的。中国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份构成：1.民族资本；2.国营资本；3.外国资本。这三种成份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

在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是与封建经济相冲突的新的经济形式。它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交通、工业、矿山等方面。不过，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在中国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因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国营资本不可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实际上，外国资本在许多生产部门中都超过了中国资本，甚至铁路等国营企业的资本也属于帝国主义所有。不仅如此，中国的关税也处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上说是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同时，封建经济的存在，也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全面看，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经济。而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殖民地经济。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的性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社会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毛泽东以深刻的理论分析，说明中国社会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毛泽东接着向尼姆指出，只要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不难回答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但是，托派不同意以上分析。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托派认为，关税独立证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阶段业已过去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业已完成。后来他们进一步宣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封建主义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最近我看到托派的杂志。尽管他们在帝国主义问题上已经改变观点，承认中国仍然处在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但就中国经济的性质而论，他们仍然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既承认中国社会为帝国主义所控制，又一口咬定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这真是矛盾百出的逻辑。托派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估计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决不赞成这种观点。毛泽东深刻说明，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分析，实际上是要取消民主革命的战斗任务，而社会主义革命是以民主革命为基础和前提的，否定了民主革命，也就否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托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说法只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向尼姆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他强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又有妥协动摇的可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为什么不由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呢？中国革命与过去历史上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什么区别呢？原因在于，中国处在半殖民地状况之中，因此无产阶级的力量大于资产阶级。操纵中国大工业的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工业的工人加上中国国营工业和私营工业的工人，其力量之大足以领导力量薄弱的资产阶级。全国工人约二百万，与全国人口相比较这是一个极小的数目，但与资产阶级相比较却是一股较大的力量。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压迫下，中国无产阶级形成了最为坚定的革命性。同时，由于国际革命力量的影响，特别是由于苏联无产阶级革

命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并开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创立起来了。我们可以说，尽管数量不大，但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共产党的结合，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最强大的势力。

毛泽东分析说，在革命中，中国的无产阶级有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盟友，也就是中国的农民。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80%以上，因为深受中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剥削下，中国的农民不得不缴纳占收成50%至80%的地租，和30%至100%的高利贷利息。获得自己所耕着的土地所有权，铲除帝国主义的剥削，也就是农民所面临的问题。资产阶级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民问题的解决，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才有可能。中国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强有力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第三个动力是城市小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包括广大的学生群众、文化知识分子、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各种自由职业者。这几种力量的大多数都是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一方的。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着重分析其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地位。他们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动力。他们有时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有时又动摇不定，甚至站在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方面。有时他们还站在地主方面，或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之所以如此，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兼有买办和封建的特性。当然，我们不能将买办包括在民族资产阶级之中。一般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资本，不过其资本与外国资本或地主土地具有某种特殊的联系。至于买办资产阶级，他们是完全依赖于外国资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依赖于封建地主的。地主、买办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在某个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中国并直接危害地主、买办之利益的情况下，地主和买办均有可能不反对甚至拥护针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斗争。因而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全民族的，除卖国贼以外的全体人民。这就是民族战线与人民战线不同的特点。统一战线还有一个特点，它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发动、发展起来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才可能完善自身的组织并完成自己的任务。无产阶级是中国唯一觉醒的坚强有力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则不能承担领导统一战线的重任。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必有可能转化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

尼姆记录的毛泽东上述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谈话的珍贵史料，成为中美人民相互了解的友谊见证。

紧接着，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哲学讲演，这是他在读了尼姆长长的问题清单后，并同意对非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解释后发表的。毛泽东给尼姆的答复是：不能用形式逻辑来理解中国革命，而只能用矛盾的观点。尼姆认为毛泽东是实际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她写道：“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如果他是的话，那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他是灵活的，愿意改革和研究的，最重要的是——忍耐——直到转折点。他等待最低点，然后在既不早也不晚的时刻，采取行动，扭转车轮，引导历史随之前

进。”

8月，党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尼姆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一份《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了她。尼姆表示离开延安后准备到前线去进行采访。毛泽东当即给她写了一封信给任弼时和邓小平，信中写道：“弼时、小平同志：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用等问题请为解决。”时间是1937年8月19日。这封信斯诺夫人后来并没有用上。她离开延安后，本来想作为战地记者到前线去旅行一次，但在西安却碰上了她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他们坐快车到了青岛，这封信便一直没有用上。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作为贵宾出席华盛顿市为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正式招待会，海伦在42年后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他，这封具有历史意义的短信，是中美人民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尼姆·韦尔斯把她从4月30日到10月17日在延安采访的所见所闻，写成另一本轰动美国和西方的著作——《续西行漫记》。这是美国人第一本描写延安的书，也是由美国人记述的第一本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活动的书。她把这座“镶嵌在城墙上的珠宝和戴在群山上的王冠”古城，以及活跃在这一片古老大地上的最年青、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人介绍给了美国人民。一个年轻的美国妇女成了延安故事的一部分。

尼姆的《续西行漫记》，第一次记述了朱德的自传和一大批红军将领的自传，在数量方面，超过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的历史学家们认为：“斯诺夫人的热情也胜过她丈夫。”有时，她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描写达到了抒情的程度，她把红军描绘成一支“令人难以置信的青年队伍，……最适的生存者，中国所曾产生的人物中最佳的典范”。“埃德加·斯诺基本上对中国共产党未加任何评论，而海伦·斯诺却尽情赞美她的共产党主人。”尼姆·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成为受美国和西方人民欢迎的又一本披露红军、苏区和毛泽东真相的畅销书，成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

几十年后，海伦·斯诺步入晚年，回忆起毛泽东在延安给她的深刻印象时，依然激动不已。她写道：毛泽东是一个有辩证头脑的复杂人物，他和他的事业是不能以西方的范畴来加以描述的，否则就不但不能说清，反而会搞得更加含糊不清，他是他同时代人中最乐观的人，但是他愤世嫉俗，不信任无能之辈。对于外界的影响，他比他同龄的中国人都更加开放——他以惊人的敏捷从谷物中挑出稗子，而又本能地识别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毛泽东是巨型化的普通人，是中国的缩影，他是占他的国家人口80%的农民的化身，其余20%害怕他，但最后还是承认了他的权威，而且在毛泽东在世时也带着或多或少的崇拜心情跟随着。毛更象亚伯拉罕·林肯而不象其他西方人，甚至连他的高大、魁梧、自然的纯朴而高贵都相似。他也同样孜孜不倦、渴望学习，甚至1970年他还学习英语，为人民树立了榜样。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作为个人，他决不是微不足道的，也决不是自私平庸的，更不是有报复心理的，他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他是一个胜利者，并把胜利的进程作为享受，他的大部分胜利是思想上战胜别人而取得的。尼姆以激动人心的

海伦·斯诺回忆录：《旅华岁月》第285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献与研究》第9期，1984年。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64页。

笔触回忆她在延安时，每次与毛泽东谈话后的心情时说：“我仿佛接受了阿波罗神谕”。

在与毛泽东的交往中，海伦·斯诺深深感到，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的感情，如同每个红军战士也对美国人民抱着美好感情一样。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美同人民的友谊，信任他们，喜欢他们，这是悠久持续的中美友好关系的一部分，这样深的友谊从未在其他任何一些民族中存在过。海伦·斯诺对毛泽东个人的总括性评价，当然是她个人观察后带有个人观感的色彩，完全准确与否另当别论。但是毛泽东通过海伦·斯诺这些美国朋友建立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生动而又感人的。诚如海伦·斯诺所说，这不是个人的友谊，而是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最好证明。由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中美人民的友谊，一定会世代继续下去。

美国《亚洲》杂志的编辑们眼中的延安和毛泽东 1937年夏，海伦·斯诺在延安期间，还有几个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中的A·比森、菲利普、J·贾菲和欧文·拉铁摩尔，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成员；其他两个是《亚洲》杂志总编辑的妻了艾格尼丝·贾菲夫人和那位帮助海伦·斯诺逃出西安的西尔。西尔受雇把这些美国人送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老式雪佛兰汽车。贾菲先生扮成身患肾病到山区求医的美国富人，会讲汉语的拉铁摩尔给他当翻译，比森的身份则是搭车出去逛一圈的朋友。他们骗过了西安边卡的中央军军官，在崎岖的山路上和泛滥的河水中苦熬了四天，于6月21日神奇般地到达了延安。

《亚洲》杂志的几位美国编辑，在延安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用了很多时间和他们交谈。他们采访了许多红军的重要领袖。共产党的领导人，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持久不忘的印象。差不多每一个较有声望的共产党官员，都成为这位或那位记者好奇心的对象，但朱德和毛泽东却是众目所视的中心。T·A·比森写道，毛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而朱给人的印象“几乎同样深刻”。毛举止随和，谈吐老练，肯花时间和外国人交往，很讨记者们喜欢。这位一支接一支吸烟的湖南人，把记者的会见安排在乡土气息浓厚的黄土窑里。从晚间开始进行，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昏昏欲睡的记者才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位精神抖擞的主人。《亚洲》杂志的编辑们，满怀激情，对延安拍了一系列照片，经过三天旋风式的活动，6月24日，这几个美国人怀着对延安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

这一次访问，是美国人士对中共、苏区和红军了解的又一次巨大成功。延安的精神感染了《亚洲》杂志总编辑贾菲，他认为延安是中国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特别使他感动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在最落后的地区之一的陕北，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进步。比森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上，这位对外政策协会的远东问题权威人士从延安返回后，确信共产党人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弥合南京与他们的裂痕。欧文·拉铁摩尔根据事实认定，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既不是“掠夺社会的土匪”，也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的军事冒险家”，他们是那个时代最富于吸引力的革命者。这次成功的访问加深了美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毛泽东稳步地推进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正义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77页。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284页。

而美好的事业不断展现给美国和世界人民，唤起了他们深刻的同情和支持。

“7·7”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成立，抗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为促进国际世界加深对中国抗战主张的了解，毛泽东和中共敞开延安的大门，欢迎美国和世界各国友人到延安访问，这便使更多的美国人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了解到毛泽东。

毛泽东给休斯留下的印象是一瞬间见到了永恒 武汉保卫战期间，在延安首先见到毛泽东的是美国一个宗教团体的人士。1938年2月，由美国驻汉口圣公会主教鲁茨的女儿弗朗西斯·鲁茨、女执事朱迪·克拉克，另外两位美国传教士约翰·福特斯和查尔斯·希金斯，瑞士作家伊洛娜·拉尔夫·休斯组成的西北游击队后援会友好代表团，从汉口出发，前往山西八路军总部。他们在那里受到了八路军空前热烈的欢迎。之后，希金斯和休斯小姐到达延安，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亲切地会见了她们，这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休斯在见到毛泽东时，感到自己“一瞬间见到了永恒”，她觉得毛泽东近乎神秘而难于理解，并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的化身”。此外，她还狂热地写道：毛泽东有一副“我所见过的最奇妙的面孔”。延安的短暂日子也使他难忘。休斯小姐在谈到她对这个共产党首都的最初印象时说：“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里看不到一个乞丐。”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 1938年3月，还有一位受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著名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他率领由加拿大和美国人组成的一个医疗队，经由武汉来到延安。毛泽东热情地欢迎了白求恩，在他离开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去时，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说：“中国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说，叫做《水浒传》。《水浒传》写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五台山就在晋察冀。”毛泽东还风趣地对他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毛泽东对白求恩的谈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白求恩到达晋察冀后，对聂荣臻谈起毛泽东的话，很认真地对聂荣臻说，你这个鲁智深，同那个鲁智深可不一样哟！鲁智深醉打山门，把寺庙破坏了，你却保护了五台山的寺庙。白求恩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内战中的西班牙保守党政治、军事领袖的渊博知识，令他惊讶无比。得知白求恩打算建立一个流动医院，毛泽东表示了极大的热情。白求恩觉得他坚信人民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无论打多久，他们都会最终取得胜利。“他是一位伟人”，会见后白求恩写道：“他是当代英豪”。白求恩为在延安和晋察冀看见的一切无比激动，惊喜若狂。他发现共产党根据地与国民党统治形成鲜明对照。“在汉口，我只看见困惑、犹豫等表现衙门气和无能的现象。而延安行政界则充满了信心，显得很有目的。在大城市，我一路上只看见半封建社会的景观——凋敝污陋的住宅、肮脏的街道、衣着褴褛的行人。在延安，整洁的街道分割古旧的建筑，行人似乎都清楚自己去向何方。”

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以不知疲倦和无私无畏的精神，战斗在山西、河

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士顿 1944）第 283—284 页。

伊洛娜·拉尔夫·休斯：《鲨鱼翅与小米饭》（波士顿 1944）第 283—284 页。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第 487 页。

〔美〕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 年，第 217—218 页。

北地区。他担任晋察冀边区的医疗顾问和八路军的战地医生，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大量抢救中国同志的生命，自己却在 1939 年 11 月 12 日，因抢救伤员而被感染中毒逝世。毛泽东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的逝世深感悲痛，他挥毫撰写了传之后世，并使广大革命群众深受教育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高度称赞白求恩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白求恩以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拓展了加拿大人民、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毛泽东号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学习他。

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美国人民的新英格兰人 “7·7”事变之后，有一个新英格兰人詹姆斯·贝特兰在延安会见了毛泽东。这个人虽然不是美国人，却有两方面的理由值得提到他。1937 年夏，当欧文·拉铁摩尔在延安时，毛泽东曾经向他表示，欢迎所有国家的人士前来考察中共的政策。詹姆斯·贝特兰便是籍着这个机会，第一个前来延安的非美籍记者。而他访问解放区和毛泽东之后，所写的一部著作《不可征服的人们——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抗战》，1939 年首先在美国纽约出版，这本书在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年美国旧金山的一位先生，为了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从万里重洋之外，寄送了一册给当时的燕京大学子民图书馆。詹姆斯·贝特兰虽然不是美国人，但是他在促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他用客观公允的笔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把中国人民英勇而艰苦的抗战情形，真实地介绍给了美国、英国和世界人民。

詹姆斯·贝特兰到达延安，也有一段有趣的经历。1937 年 9 月初，他同埃德加·斯诺和邓颖超一道，离开了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贝特兰和斯诺将邓颖超以保姆的名义偷偷带过日本人的封锁线，便向西安进发。9 月中旬，他们在西安会合。贝特兰为了躲过西安当局的检查，藏在八路军卡车后面的大米袋下离开了西安。十天后，他兴奋地到达了延安。

詹姆斯·贝特兰对毛泽东的印象又有一番不同。在他的笔下，一个栩栩如生、极具个性的毛泽东活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恰逢抗日军政大学举行毕业典礼和开学典礼。贝特兰接到正式邀请，并告知毛泽东将在典礼上讲话。当会议尚未开始时，贝特兰被带到前排坐到一个木板凳上。这时，在他的身旁，一个个子高高的、身体微微弯曲的人站起来，向他伸出了手。在褪了色的蓝军帽的帽沿下，他看到了一双眉头微微皱起而又敏锐的眼睛。

毛泽东给贝特兰的第一个印象是如此鲜明，在见面的瞬间，便把过去因受各种奇怪说法影响而造成的印象，从头脑中一扫而光。他写道：“过去，一些外国作家根据一些传闻，很不负责地把这位最出名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描写成一个头脑疯狂的理想主义者，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狂热病人等等，也许是由于听信了有关毛泽东的一些传闻的缘故，同他给我的这个初次印象相比，使我颇觉意外。毛那丰润、没有皱纹的脸庞，依然年轻的体态，象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尤其是他那孩子气的、顽皮而极富感染力的愉快心情，同我听得到的有关他是‘铁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坐在这位英国记者旁边的毛泽东，既不是一个狂人、也不是一个神，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个性、感情丰富的人。

在后来和毛泽东的谈话中，这位友好的英国记者，决心以公正的笔触向全世界公众还以毛泽东的真实形象。他写道：“只要同这个人有最简短的接触，他丰富的人情味和幽默感，便足以推翻人们种种奇怪的猜想。毛泽东是中国头脑最冷静、最有条不紊的人。与他谈话，你马上会意识到他头脑灵活、思路清晰，意识到一种巨大的知识和力量。除了渊博的知识外，他处理任何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对自己的同胞有深刻的了解。毛泽东的演说中并没有使用什么技巧，相反，他说话操着乡音，不断表现出农民那种生动的幽默，使用的是连12岁的“小鬼”都能听懂的直截了当的、实实在在的话语。他讲话中的“土话”和“习惯表达方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泽东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在生活中尽可能紧密地与人民打成一片，特别是与中国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对政治理论的掌握——无疑是要归功于大自然的恩赐——一个有过良好训练的大脑和惊人的记忆。他博览群书、兴趣广泛。他那种敏锐性、灵活性，代表了中国人智慧的精华。主宰和控制这个头脑的是经过锻炼的、雄心勃勃的人的意志。

与海伦·斯诺的印象不同的是，贝兰特不认为毛泽东只是抓大的方面，而把细节留给其他人的人。他认为，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中国人（或者至少不同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非常好地抓住细节，他是一个对细节并不放松的人。他既能集中从事眼前的工作，又不忘记最终的目标。这位英国记者肯定毛泽东就是“中国的列宁”，他是中国人中有着“无以伦比的冷静和稳定思想的人”。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具有巨大智慧力量和沿条理清晰的思路自由而准确运转的大脑。他由衷地赞美道：“中国革命没有列宁，但如果说有谁同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就象列宁一生同欧洲工人的关系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毛泽东”。10月25日，毛泽东对中国抗战的一系列问题和贝兰特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个对抗战初期情况和抗战发展前景作精辟分析的谈话，很快被贝兰特传到世界人民之中，以后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把毛泽东的游击战略运用到美军训练和实战中的美国军官——卡尔逊 如果说贝兰特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非美记者，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便是美国军方第一个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的现职人员。

埃文斯·卡尔逊是美国一个公理会教长的儿子，1912年加入美国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退伍，被授予上尉军衔。1922年他加入海军陆战队当志愿兵，从1927年到1929年，后来又从1933年到1935年，卡尔逊作为美国一名情报军官在中国供职。那时，他是一位对游击战争略有所知的职业军人。1937年6月15日，卡尔逊启程赴远东之前，应约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要求卡尔逊直接写信给他本人，向他通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总统提出，他们两人之间的通讯必须绝对保密。从1937年起，卡尔逊便定期向白宫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

早在1933年，卡尔逊与斯诺在上海期间就有很频繁的交往。1937年，他再次到中国后，就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到延安考察的申请。斯诺为他来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拍发一封电报给毛泽

东。接着，卡尔逊便到达西安。在那里，卡尔逊以美军观察员的身份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的身份，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次向毛泽东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

12月10日，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通知卡尔逊，毛泽东已批准他去山西的八路军前线部队，同时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到延安。卡尔逊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去山西的征途。卡尔逊在山西会见了彭德怀、朱德、任弼时、林彪、左权。接着又在前线会见了刘伯承、薄一波、徐向前、张浩、陈赓、陈锡联，在阜平会见了聂荣臻。最后，在会见了贺龙之后，他在山西临汾结束了这次印象深刻的旅行。其时间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历时51天，行程1000英里。这次旅行会见了八路军几乎全部的高级将领，亲自领略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他对红军总司令的喜爱竟达到“敬之如父”的程度。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几乎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表示他对这位红军总司令员的仰慕之情。卡尔逊认为，朱德具有罗伯特·E·李式的慈祥，亚伯拉罕·林肯式的谦恭，U·S·格兰特式的坚韧。朱德和红军的游击战术，对他一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八路军和他们的战术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

1938年5月，卡尔逊再次到达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他会见了林伯渠。林伯渠对这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事观察家访问延安的计划给予热心支持，亲自为他给毛泽东和延安其他中共领导人写了介绍信。同时，国民党方面蒋鼎文也给他写了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城，去内蒙古见马占山、傅作义、何柱国、门炳岳的介绍信。因此，可以说卡尔逊此行，既具有美国官方派遣的意义，又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

5月5日，卡尔逊到了延安。在延安逗留期间，卡尔逊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长谈。毛泽东和他的谈话，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向一个具有官方身份的美国人进行的谈话，而且这个人有定期向美国总统报告中国情况的任务。卡尔逊对毛泽东的印象，是美国官方人士对毛泽东形成的第一次直接的印象。

毛泽东与卡尔逊的第一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毛泽东的工作室里点着一支蜡烛，卡尔逊一进屋，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那狮子似的头主宰着很健美的体魄，又长又厚的黑发，从中间分开，随便地向后梳着，一双和藹的眼睛望着卡尔逊。这是卡尔逊形成的第一印象。毛泽东和他紧紧地握手，脸上满是热情的笑容。毛泽东以柔和的低声调向他表示欢迎：“我听说你跟我们的部队一起活动了，我很高兴在这里欢迎你。”

卡尔逊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追忆当时的情景说：“黯淡的烛光，极简陋的陈设——一铺炕，一张木桌，几架书籍，也许最主要的，毛本人高深莫测的气氛，使我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我面前就是这位伟人，他提供了中国现代的自由思想的基础，他非凡的组织能力建立了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机构的基础。同朱德一起，他领导了艰苦的六千英里的长征、到达了比较安全的黄土高原。他的卓越的洞察力，使山西、河北的抗战方式如此有效地抵销了日本现代武器的优势。”毛泽东和卡尔逊就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畅谈，内容涉及

迈克尔·布兰克福特：《受欢迎的美国佬：海军陆战队近战兵卡尔逊生平》，波击顿1947年版，第199页。

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南军总司令；U·S·格兰特：美国南北战争时的北军总司令。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战争、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以及一个成功的世界组织的成员们等等。毛泽东向卡尔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抗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未来的中国应当奉行的外交政策。卡尔逊惊奇地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具有很扎实的面向实际的一面。他把建立一个廉洁的、民主的政府作为中共近期的奋斗目标：“我们训练干部要生活简朴、秉公执政，诚心实意地帮助老百姓解除困难。我们相信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学会自己管理自己。我们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合作社为基础。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卡尔逊在毛泽东坚定的理想中看到了毛泽东脚踏实地、从容不迫的奋斗精神。

他们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一席谈话，毛泽东给这位美国军方观察家留下了这样难忘的印象：“这是一位谦虚的、和善的、寂寞的天才，在黑沉沉的夜里在这里奋斗着，为他的人民寻求和平的公正的生活。”毛泽东坚韧不拔，理想高远、脚踏实地、乐观自信以及艰苦朴素的品质感动了他。他看到这位红军战士拥戴的领袖，象农民一样，在他的旧烟斗里装上长长的、多筋的中国黄烟叶，以致心中为之难受。他默默记在心中，要送他一个新烟斗和一些美国烟草。

1938年8月7日，卡尔逊重返汉口时，他简直不能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藏默不语了。”他不顾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欣然与麇集汉口的美国及欧洲记者们进行广泛的交谈，他盛赞共产党的军事、政治机构和制度。他精神抖擞地把他在游击区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美国和欧洲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使记者们感到惊讶的是，他有问必答，并且毫不介意他们在电讯稿中提到他的名字。

卡尔逊的看法与美国海军部的看法大相径庭。特别是卡尔逊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这使华盛顿方面颇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在华盛顿方面看来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卡尔逊接到不准在公开场合下发表谈话的命令。1938年9月17日，卡尔逊的上级通报说，要严厉追究他对这些活动的责任。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人劝他谨慎从事，但是卡尔逊却坚持他看到的都是事实，他讲的也是事实，没有讳言的必要。接着卡尔逊采取了激烈的行动，他辞去了军职。他解释说：“我希望能够根据我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讲话和写作。”1938年12月末，卡尔逊回到美国，他被良心驱使着“象一个着了魔似的人”那样去说、去写。

卡尔逊不仅向公众发表演说，还为好几家杂志撰稿，并且出版了《中国军队》和《中国的双星》两本书，他的后一本书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由于他是当时目睹共产党军队以及游击战线的第一个美国军人和官方人士；他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以及一大批八路军高级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3页。

〔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19页。

将领进行过深入访谈；他的足迹遍布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因而他的《中国的双星》成为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美国军人之手，应时在美国出版，使抗战中的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为美国人民所了解，产生了重大影响。卡尔逊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达的深厚的友谊，也使美国人民深受感动。他对霍尔东·汉森介绍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他所遇到过的“最无私的人”，“一位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天才”。他介绍延安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每一个人都对你直视，不妄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平等，人们很快乐满意。”在以后的三年中，他在美国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和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的行动代表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以后，他又参加了美国的进步民间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担任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中人民的友谊发展。

在卡尔逊受美国海军部攻击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罗斯福阅读他从中国战区转来的一切报告，虽然这些报告并没有对罗斯福的政策发生什么重大影响，但罗斯福对卡尔逊是抱信任态度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突击队这样一种类似八路军游击队的一种特种部队。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曾是卡尔逊特种部队的主任参谋。他后来成为第二突击营营长。卡尔逊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同八路军中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进行训练，取得很大的成功，罗斯福将他提升为准将。之后，他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来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取得了出色战绩，以卓越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使他成为太平洋海战中的传奇英雄。

美联社记者汉森说，毛泽东是一位完全无私的人。值得一提的是，与卡尔逊同时深入山西前线的另一位美联社的年轻记者霍尔多·汉森。1937年7月，他骑自行车从北平来到河北农村，在共产党的游击区考察了两个月之后，返回北平。1938年夏，他又受美联社委派，对山西、陕西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访问。在延安，他以美联社记者的身份采访了毛泽东，这是第一个美联社记者与毛泽东发生的直接接触。汉森和卡尔逊的看法一样，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谦逊的、“完全无私的人”；毛泽东是继斯大林之后“国际政治中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领袖。”毛泽东告诉他：“我们要创造历史，而不是重复历史。”这种宏伟气魄使他惊叹不已，他从中认识到中共的长远目标和中共的奋斗精神。汉森撰写的《人道主义的努力》和卡尔逊所著《中国的双星》一样齐名。1939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书评，称这两本书为描写战火中的中国和敌后的中国的两本互相补充的新书。

美国教派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记者会见毛泽东 1939年共有9位外国人到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春，由一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的美国教授安德鲁·T·罗伊和罗伯特·布朗博士，以及从教派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47页。

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0—161页。

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0—161页。

联合中国救济委员会（ICG）新闻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乔伊·霍默小姐访问了延安。霍默小姐在重庆时曾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盛大欢迎，国民党铺开红地毯隆重地欢迎这位美国客人。佳肴之丰盛，使她“总是消化不良”。她在与共产党接触之前是亲国民党的，她对中国的政治态度与设想也是明确的、反共的。她满以为在延安会看到凶恶的俄国代理人 and 冷酷的中国布尔什维克。但是，当他们这个三人小组经过长途跋涉到延安时，竟然大失所望。他们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给她的印象，与她头脑中的印象一点也不不同。她描述说，这位共产党主席相当幽默，有着“一副男孩子般的相貌”。这位中国的列宁的头脑，却“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乔伊·霍默的结论是：毛泽东和中国的红军是“大量流传的谬论的受害者”，他们是年青的、有热情的、有能力的、爱国的，甚至是“可爱的”。她最后的评价是：他们确实是“好人”。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访问毛泽东 1939年夏，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一位在中国居留了30多年的美国人访问了延安，他就是乔治·A·菲奇，这位长老会牧师陕甘宁之行所抱的特殊目的，就是要用事实驳斥那种说中国红军对总司令（指蒋介石——引者。）不忠的“洪水般的恶意宣传”。经过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之后，菲奇毫无疑问地坚信，中共和红军具有“绝对的爱国主义”精神。

斯诺再次访问毛泽东 1939年9月，正当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再次实施严密封锁的时候，斯诺以一名得到政府承认的组织——中国工业合作社的代表的身份到西北旅行。他的官方任务是视察工业合作社在延安的仓库。他顺利地通过西安的关卡到达延安。

在延安，他看到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共产党的军队扩大了三、四倍，现在防守着几千英里的新地区。共产党在延安有了整块不大的根据地，在这里除了轰炸打扰以外，可以安稳地培训成千名新的军政干部，建立起自己的机构。物质条件改善了，农业生产也有了发展，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的机构设在窑洞里或隐蔽在山沟里的新建楼房里。毛泽东问斯诺：“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从1936年你访问我们以来，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进步。给我们一点时间，如果我们按目前的速度不断进步，到1945年我们就可给你看一点成绩了。”在斯诺眼里，整个延安都是新的，他在听了《黄河大合唱》演出后，与毛泽东一齐走出剧场。毛问他：“你觉得怎样？”“好极了，在燕京大学听唱《弥赛亚》以后，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毛泽东坚定地回答他：“是的，这跟我们在保安的演出大不相同了。”

9月23日和26日，斯诺对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访问。毛泽东给斯诺的印象是，这位中共领袖，在日寇占领中国半壁河山，蒋介石重新祭起反共法宝所造成的种种困难面前，没有一丝惊慌失措的表现。相反，他表现出不寻常的安详，好象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日见宽宏大量，与蒋介石的日益暴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他发现毛仍然住在窑洞里，不过陈设较保安时稍有改进。他住的是三间：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一间客房。墙上抹了白灰，

乔伊·霍默：《中国的曙光》，波士顿、1941年，第253页。

转见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61页。

埃德加·斯诺：《一九三九年重访陕甘宁边区印象》，《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00—101页。

铺了砖，略有一点装饰。但除此之外，还是很俭朴。毛仍然只有两套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他象以前那样深信他的共产党最终将在中国取胜，而且照常通夜为这个目的工作。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了解着世界大事，分析着政治形势，他在晚上处理工作之前，总要读完附近军用无线电台抄收的一大叠新闻，从山西前线来的，从全国来的，和从外国来的消息。

9月23日，毛泽东就各种问题同斯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意见交换。罗斯福的外交政策，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中国的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中的新问题，苏联对欧洲的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当天报纸上的新闻等等，都是他们谈话的内容。

在和斯诺深入探讨美国的国际政策时，毛泽东认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他指出，在苏联未参战的情况下，在张伯伦把英国拖入战争之前，这场战争或许还是“进步的”，现在它是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是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人就不会支持他了。

毛泽东认真地探讨了美国两党对待战争的态度。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支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斯诺回答毛泽东：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中，各类资本的势力都可以找到，“大金融集团”的魔手伸进了两党内部。公众舆论的变化（包括劳工界的意见），能够导致共和党改变原来的立场。例如，在废除美日通商条约时，舆论便对共和党人产生了影响。毛泽东接着指出美国政策的矛盾，他指出，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多。斯诺则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毫不例外，毛泽东笑着回答他：斯大林是从罗斯福那里学到这一些的。

斯诺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中国工业合作社（即“工合”）的原委，从上海的发初时期，经国际委员会确认，直到海外的基金筹备委员会，并强调了“工会”对游击区的价值。毛泽东声明，他非常支持美国友人及其他国际友人在中国搞“工合”运动，并发表了支持“工合”的声明，同意斯诺将他的声明在美国和海外华侨中广泛传播。之后，毛泽东和斯诺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了天南海北的闲谈。

斯诺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毛泽东谈话的特征。在谈话时，毛泽东善于把复杂的问题讲得连没文化的人也听得懂。他惯用俗语和家常作比喻；他不向听者说大话，而总是以平等的口气和人谈话。他和人民是交心的；他和群众的思想从来都是通的。毛说话一长，总要说些家常的俏皮话，或者简练的警句。他似乎是靠在所有辩论中取胜，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的。他有广博的学识，在辩论中熟练地运用辩证法。他的策略很有意思。他极少从正面攻击对手。他这里攻一下，那里攻一下，迂回包抄对方的立论，一个一个地驳倒对方的辩护词，直到把对方完全困住，最后用一句妙语或者有力的逻辑把对方打跨。他喜爱和人们接触，使人们欢笑，同各色各样的人在一起都很自在。

9月26日，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主要是对统一战线问题、国际问题作了回答，毛泽东允许斯诺将他的谈话内容向全

世界公布。1940年1月13日和20日，斯诺将毛泽东这个具有科学预见性的谈话，全文发表在《密勒氏评论报》上。

斯诺这次访问延安大约10天功夫，9月2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欢迎斯诺等人的大会，毛泽东以“欢迎久以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开始他的演说。他指出：“民国廿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通过对斯诺的欢迎和期望，表达了发展中美人民亲密友谊的愿望。

1941年斯诺在美国出版《为亚洲而战》一书，详细报道了他1939年重返西北抗日根据地和会见毛泽东的见闻。在这本书中，他把“大部分的篇幅和同情都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人”，而对国民党独裁的、半封建专制的统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酸洗”。这本书再次在美国人民中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T·A·比森称此书的部分章节为“必读之物”。《基督教世纪》周刊总编辑保尔·哈钦森认为，任何一个美国人，只有在读过斯诺这本杰作之后，才有权谈论美国的远东政策。

斯诺对毛泽东的访问，大概是至1944年前最后一位美国人对毛泽东和延安的访问。国民党对陕北边区的严密封锁，使延安几乎又回到1936年前的铁桶合围状态。与1936年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可以通过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向外发布一些消息。

1937年至1939年两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和中共大大拓展了与美国各界人士的关系，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友谊日益密切，并通过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而不断加深，美国各界人士对毛泽东和中共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把对他们的印象传遍全世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及红军的勇士们，以传奇英雄的形象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注意到毛泽东和红军的存在及影响。这一时期，毛泽东和美国的交往虽然总的还处在民间交往的阶段，但是它已为实现官方间的接触准备了条件。

《新中华报》1939年9月29日。

转见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02页。

四、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初步接触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达到了新的顶峰。它不顾外同新闻记者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再度把边区用厚重的黑幕围起来，连一丝光线都不准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重新打破封锁而斗争，他们热烈欢迎美国和欧洲记者到边区访问。这场打破新闻封锁的斗争，再次以中共的辉煌胜利载入史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拓展了他和美国人士的交往，推进了中美友谊的发展，和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建立了初步的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特别是为了最后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共、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很少能得到中共的真实情况。据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回忆说，个别穿越国民党封锁线的外国旅游者，“被视为从火星上来的人”；他们被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包围，问这问那，往往弄得精疲力尽。美国和英国官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1944年3月，向中共提出要求，拟派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高度重视，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到来，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3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电文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并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赴延记者团的成行受到国民党刁难，他们怕外国记者看到事实，揭穿他们对中共、八路军和边区的种种造谣诬蔑。但是，这一要求不仅出自美、英记者，而且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具有官方的性质，这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英美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下，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

这次赴延安的主要是英美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日报》、《同盟劳工新闻》和《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福尔曼，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到达西安，国民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工作。他们满耳灌入的是红军如何种植鸦片，如何打击、反对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又如何避免与日本作战，以及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等。他们竭力使这些外国记者相信，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

其实，国民党的洗脑工作做得越彻底，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无能。而回答他们的事实，将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外国记者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立即感到过去蒙受了国民党的谎言和欺骗。记者们首先在南泥湾看到了生机勃勃，一派动人的大生产景象。然后他们又在延安交际处的“足食园”商

店，看到了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的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商品，简直不胜惊讶。到哪里去找国民党所说的民不潦生、饿殍遍野？早餐时，英美记者见到的是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如此丰盛，使他们兴致勃勃，狼吞虎咽。国民党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原来英美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对牛奶已经“久违”了，偶尔有时能买到一个鸡蛋就心满意足了。

1944年，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蒋介石积极准备抗战胜利之后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推向更加专制和黑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强烈要求建设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借美国记者和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机，重申中共的一贯主张，鲜明地阐述中共的观点，以便争取国际舆论和友好力量的支持，同时唤起民众，共同制止国民党的阴谋。

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

毛泽东出现在记者们眼前。在记者们眼中，他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旧没有扣的，一如他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注意听取对方的姓名。他依然一口湖南口音，态度儒雅，词令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演说。他热烈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开辟，同时着重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一贯态度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

毛泽东说：“关于中国国内的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屡次文告及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肯定抗战胜利必须依赖于国共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而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就必须给予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利，不仅现在团结抗战需要民主，“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建设一个新国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人民享受国家各种权利，做国家的主人。而人民应当包括广大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拥护新国家的人们。我们要实现政治的民主，就是人民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自由，实现军事的民主，就是要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建立民主关系；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不要妨害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成其发展。党务民主，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以民主建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拥护、前途光明、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

赵超构：《延安一月》，重庆南宁新民报社，1944年11月。

《毛泽东谈中共的希望与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设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

毛泽东关于民主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根本主张，符合民心，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进步；反映中国共产党为着全体人民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使英美记者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他们强烈地感到，被蒋介石诬蔑为“专制”、“分裂”的中共党人，才是中国民主势力的真正代表，才是和世界民主势力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爱泼斯坦会见了一位伟大的历史性人物 12日毛泽东的会见，使英美记者兴奋不已。他们酝酿单独采访毛泽东，这个愿望得到中共中央允许。

一天，毛泽东决定个别接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适逢那天组织记者团集体参观，国民党方面记者团的领队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大发脾气质问中共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回答：斯坦因去不去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有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以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自知去请斯坦因，必然碰一鼻子灰，悻悻地只好作罢。斯坦因摆脱了国民党对外国记者的控制，单独见到毛泽东，使其他英美记者受到了鼓舞。所有英美记者都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总司令，他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和美国这批官方记者会见，再次证实了斯诺、卡尔逊的报告真实性。他们会见的不是一个尚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的领袖，而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美国记者们急不可待地在自己的通讯稿和著作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达他们对毛泽东的良好印象。

爱泼斯坦在《毛泽东印象》一书中，肯定了他在延安会见的是一位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人物。他写道：

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

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以及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读者相处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干脆不见你，要就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并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实事和见解为止。

他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风度是沉静的。而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有力。在1924—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和作出错误的决定，而且这些错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功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80%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和士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在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预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1935年，

参见爱泼斯坦：《毛泽东印象》，以沛等译，南通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5月。

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和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技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的兴趣。

斯坦因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与中国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伟人——斯坦因也毫不置疑地相信毛泽东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中，更详细地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各方面的印象。他写道：

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着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100万党员，以一种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少有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看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定的实质。

毛泽东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的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与他长谈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变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形，他以细腻的笔触写道：

毛泽东给我一段充分的提问题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的会面从下午3点到夜里3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象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摇动的小桌上，象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内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面前一会，他的眼睛有几分钟地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以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果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在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人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

能多谈一些呢？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吐谈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问题。他的信念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5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新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个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内容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征求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了。

以上是斯坦因笔下的毛泽东。他向美国人民所展示的中共领袖，是一个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尊重人民权利和智慧的、谦虚的、朴实的普通人。他充沛的精力、忘我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日益操劳等，令人感动。他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他常常要求所有的党员们在他们一切决议与行动里持有他说的“群众观点”。他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老师，他的脚稳稳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他以民主的作风与中共其他领袖结成磐石般的关系，带领着人民前进。斯坦因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这种真实的形象详尽地介绍给美国人民。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哈里森·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俱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他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象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

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儿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和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象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有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可以见到回转得象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

美、英记者历时五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

以上见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01—102页。197—200页。

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象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了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五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烈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

毛泽东欣慰地看到，由于来延美、英记者对中共、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相的深入了解，使他们积极建议美、英政府当局和中共结成盟友，共同消灭日寇。他向全党通报中外记者团在边区参观访问的情况说：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指蒋派来监视中外记者的特务——引者），但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6月10日，美国《星期六晚报》刊登斯诺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一致肯定中国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最后消灭日寇中具有战略意义。“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毛泽东决心以顽强的努力，争取盟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共和军队。

美军观察团对毛泽东和延安的印象 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官方接触的实质性阶段。毛泽东为美国官方人士所了解，而且使他能妥善处理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有关政策。

1944年，在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同时，重庆的美国驻外人员及史迪威总部一致认为，派一些了解情况的观察家到延安的共产党总部去是有益的。既可以搜集情报，还可以在共产党认可的情况下，组织一个地区性气象情报网，以帮助和拯救美国空军人员，史迪威坚持有必要向延安派一个观察组到那里去工作。但是，美国外交使团和史迪威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讨论了派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蒋介石再次拒绝美国的要求。蒋宣称，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人员到那里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6月23日，经华莱士与蒋介石再次交涉，蒋介石勉强同意派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

毛泽东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他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直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步骤。7月19日，他在党内的时局近况通报中通告全党：罗斯福三次致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要求，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久可到延安。7月22日，美军观察小组正式组织完毕。首批成员有七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再加上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谢伟思还同时担任史迪威的文职顾问，使团团团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使团归史迪威将军总部直接领导。费正清后来称该团到延安是“美国同

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中共和毛泽东以诚恳、热烈而又友好的态度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毛泽东肯定，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使国民党妄想“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观察团的到来，将有利于美国政府与中共双方“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热情洋溢的社论。社论的原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在改稿时亲自加上了“的战友们”四个字，强调在抗击日寇，消灭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上，中共和八路军与美国军队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毛泽东深信，美军观察组如果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便一定会如实地承认，中共和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正是这支抗日力量，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七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敌的最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后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而这种情形，一向是不为盟国朋友们所明了的。在过去，美国与盟国政府、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美国和盟国其他国家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到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仍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上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毛泽东讥讽道：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丑诋、恶骂、造谣、诬蔑，欺骗世界，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的目的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

伊·卡恩：《中国通》第14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来延，将为这一改变开一新阶段。

观察团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不仅在生活上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和日本俘虏。这些俘虏是他们了解日本情报很有用的对象。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中文教员、制服，以及休息娱乐条件。美军观察团到延安之前，头脑里也象记者们一样塞满了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传，尽管他们也见到过美国记者所写各种关于边区完美无缺的报道，他们还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支配而不由自主。

但是，有趣的是，观察组的全体美军军官对延安的印象是“极讨人喜欢的”。全体成员都有相同的感受。他们看到，在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都是如此。中共和人民以及观察组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群众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卑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在边区，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都很简朴，在生活 and 接待方面，没有炫耀虚饰的现象。妇女穿着简朴大方，举止平等友好，也受到平等友好的接待。大批的男女青年在这里学习，他们普遍有一种成熟感和严肃感。他们来自前线和农村，时刻准备着回到农村或前线去，继续干他们的工作。这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不种田的人，就干如纺线之类的活计。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音乐、舞蹈和戏剧都大量吸收了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里的人们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者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他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这里没有紧张和压抑感，不必担心有人借交朋友来探讯什么，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记者可以任意走动，发稿不受新闻检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给人以极好的个人印象，同毛泽东欠佳的照片上所能够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使美军观察组的全体人员都具有相同的感受：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相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

谢伟思认为，在延安，他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人们得到的对中共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素质。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七年里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319 页。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年，第 181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184 页。

象美国人，而不象东方人。

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在各种情况下频繁接触，双方广泛了解和交换意见。谢伟思回忆说，他在延安的四个多月当中，多次见到毛泽东，一星期内肯定有两三次：在各种正式的和不受拘束的场合，总共也许见过 50 次，其中有私下谈话，集体的讨论，一起吃饭，看戏和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听他发表公开讲话，甚至还在炎热夏日一个傍晚，在挤满了人群的果园场地上举行的星期六舞会上见过他。

几十年后，谢伟思在回忆他对毛泽东的亲切印象时，恍如昨日。他记忆犹新地写道：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严肃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神情间也许有一种腼腆含蓄，使人们感到，他是在打量你。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谈话，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都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是做得很巧妙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事实上，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毛往往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他的总结总是极其公正、全面和简洁的。

毛的时间和思考主要用在政策方面，制定最能赢得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农民支持的政策；在必将来临的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夺权斗争中，如何运用农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力量的政策；可能说服美国在中国这场内战中采取不偏不倚或中立态度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后果，都是毛喜欢谈论的。如同海伦·斯诺的看法一样，谢伟思也认为，毛泽东注意政策的大的方面，他愿意把具体细节、日常工作和一般政务留给别人处理，象周恩来或朱德那样能干的同事是不乏其人的。在第一次会议散会，毛可以和谢伟思私下交谈时，他微带笑容他说，他估计我希望同他谈一次，而他也希望同我谈一谈。然后，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有机会彼此熟悉一下，如果美国人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的谈话就会对彼此更加有益。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谢伟思才被请去同他单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交谈，一直谈了 8 个钟头，中间只在晚餐时停了一下。后来又谈过几次，但时间都没有长得那么吃力，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那次谈话给谢伟思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毛所特有的那种坚强镇定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而美国人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那种情况，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最后得出结论，毛的信心是正确的。

白修德说，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期间，美国另一著名记者白修德于 1944 年底来到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他把毛泽东放在中央领袖集团的整体中来认识。这使他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在这样的领袖群体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他写道：

中共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单从外表看去不可能了解他们。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团结意识。他们都共同作过 20 来年的斗争，对付国民党，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严刑拷打了，被暗杀了，以致失踪了。他们一直受到警察的一切检查和压迫。弱者已经倒下了，动摇的已经投降了，那些留下的就都是一个个韧如皮革，坚如钢铁。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这些领袖都有着中坚人物的性格。在他们肩上，没有压着使重庆官员们烦恼的勾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和他们谈话，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而且愉快地漫谈。他们不受那些纸上文章的无谓纠缠。他们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而由所信赖的干部去执行他们的决定。虽然这些领袖都被认为中坚人物，他们依然骄傲于他们的民主，他们并且为他们自己立下了一种模范的规则来配合他们的职位。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一个中共领导人都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他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苦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够党的总部的所有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又忠厚的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会对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并且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也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他们以农民为他们基本的力量；他们的理论能使最无知的农民都会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够顽强的。当 1941 年实行封锁时，重庆方面以为这下子他们可要完蛋了。然而他们却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和思想上都要坚强得多。他们个个都这样彻底地坚信他们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觉得很难说重庆方面的官员和军队有什么胆量和能力。

毛泽东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丝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他的脸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柔和。他不尚空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象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子轻轻变动，步态稳重。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听众。毛泽东在党内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有不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加密切，也更难以形容的。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诚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杰出。他的知识渊博，谈吐象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意义。又能对美国的历史任意谈论。因此，毛多少象一个传教士似的，党把他看做一个圣者。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他曾经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博览群书；但是他的个人意志，以及坚持使意志得以贯彻的那种决心，也许是除了列宁以外，在 20 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由于他的领导，中共从一个贫乏的地下状态变成了这次战争和国际事务

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实地工作里得到了成就。在延安，政策与行政之间的区分远比重庆来得显著。政治局制定重要的决策，支配着整个经济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对外政策等等；然后由与其配合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毫无问题地去加以执行。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延安又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精华。就在这些山区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白修德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和对蒋介石的印象进行了对比描写。他写道：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蒋介石在谈到中共时，常常不免咬牙切齿。而毛在谈到蒋介石时，却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灰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然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

白修德在延安看到一种钢铁般的力量实际存在，以及智慧、远见、民主、坚定信念的实际存在。这两种力量有机地汇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中国的明天。

从1936年到1944年，毛泽东在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中，与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了解，以及进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产生了两方面的实际效果：首先是建立和促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改变了国民党反动宣传在美国人民中造成的歪曲的中共和其军队的形象，扩大了中共和其军队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生动地证明了中共的正义事业是得道多助的。其次是这种由民间到官方的接触，也使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共和它的事业，不得不考虑和中共及其军队的关系。所有这些接触，对于中共与美国双方发生双边关系，都是有益和必要的。如果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能继续沿着这个方面发展，其后果也将是积极的。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尽管中共和毛泽东曾作了巨大的努力，但美国方面却未能起而呼应。相反，却把对华政策始终和蒋介石政权死死拴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曲折。

以上参见：白修德、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和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

第三章 在风云变幻的抗日战争中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关系和阶级关系，也打破了华盛顿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共同支配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头等战斗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调整自己的政策，投入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美之间成为盟国关系。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政治要求，在处理对日关系，对蒋关系和对中共的关系时，采取了既是一贯的、又是具体复杂多变的政策和策略，对中国抗战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如果说，在长征胜利之前，毛泽东还不是以中共最高领袖的身份分析中美关系，制定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和策略；那么，从抗日战争开始，他便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和机会，他进入了对中美关系发生实际影响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把中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进程，从国际关系变化大视野的角度，对抗战中的中美关系进行跟踪分析，并根据复杂多变的情况，及中共对待国内问题的立场和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调整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力图促使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并为建立中共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和分析，以及由此制定的中美关系政策，为中共后来的中美关系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政策（1935—1941年）

1935年至1941年，前后经历七年时间，包括了三个时期：一是华北事变到“7·7”芦沟桥事变前两年，这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奏时期；二是“7·7”芦沟桥事变到1938年12月武汉、广州失守，这是抗日战争开始，日寇处在战略进攻，我处在战略防御的时期；三是1939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是敌我进入战略相持的时期，这一时期相继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德战争。

虽然，这七年的时间并不算长，但中国的抗战却发生了阶段性的大变化。从国际关系方面看，它要求中美关系有一个大的调整，中美应当参加到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中，共同对付日本侵略。但是，从中美关系的实际情况看，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只进行了局部的调整。美国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采取漠视态度；加之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是西方第一、东方第二，“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第一位，东方的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同时美国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在太平洋上的野心和全球霸权的野心估计不足，以为不会危害其根本利益。凡此种种，使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采取了“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的利己主义政策，企图以牺牲中国的根本利益来谋求和日本取得某种妥协。在这种基本政策指引下，美国的对日和对华政策作了某些局部调整，虽然这些局部调整仍然服务于它的基本政策，不可能对中国的抗战和抑

制日本法西斯的气焰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是也表现出一定的可取之处。这是中国能够与美国在某种程度上结成反侵略的和平阵线的客观依据。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世界大视野的战略家。他观察问题善于从广阔的世界图景中，从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他善于根据不断变化了的情况，调整自己和中共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在对待美国政策上，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灵活多变的立场，一切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这一阶段对美国的政策分析和处理，充满了辩证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他肯定美国对华的帝国主义基本政策不可能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持在中国的权益，加强对中国政府的控制，而不可能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在帝国主义矛盾尖锐化、特别是日美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经营了近百年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威胁，因而美国局部的对华政策也必然发生改变；中美之间有部分“共同利益”，可以争取和美国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他强调，美国政策的两面性，决定我们也应当对美国采取两面政策和有区别的政策，把斗争和联合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这就是毛泽东为中共确定的对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1935年至1941年，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中美关系问题的政策上，着重在如下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努力：

深刻阐明和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必要性，力图促成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建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面临着担负抗日的严重任务。毛泽东指出，为完成民族解放战争的任务，在国内必须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际必须与一切对我表示同情和支持、甚至中立的国家结成世界和平阵线。国内统一战线与国际统一战线的结合，是毛泽东提出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和中共关于争取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过程。

1934年4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以武力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但是它们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的殖民地。”因此，毛泽东强调一切在华的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和英美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都在坚决反对之列。这时，他已经清楚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正在突出出来，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正在尖锐化。但是，这时他还没有产生抓住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矛盾，同时利用美英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思想。

6月19日，在以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中，他明确表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有同等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自然更促进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速度地来直接瓜分中国。因而，无论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如英美联盟）与冲突（如日美冲突）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正是为了更

快地瓜分中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是，不仅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且要驱逐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出中国，“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他提出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但是并不认为在国际上可以与美英等国建立反日、反侵略的和平阵线。“战胜一切帝国主义”的总目标，压倒了他利用矛盾的策略。当然，这并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主张，而是中共中央的共同主张。在这个阶段，中共中央的口号就是：“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坚决地依靠工人与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战胜一切帝国主义。

华北事变之后，中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成为决定中共方针政策的基本点，随着中共策略路线的转变，毛泽东从围绕解决中日矛盾这个中心出发，开始形成中国必须与美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思想。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红军举行直罗镇战役，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举行了奠基礼。11月28日，在毛泽东与朱德共同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明确表示：要与“对中国的抗日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与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这实际上暗含着对美、英策略的转变。中共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上。

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敏锐地注意到，由于中日矛盾上升，在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他指出，美国、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已经加剧了；另一方面，世界无产阶级及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形势也向前发展了。他特别提到美国工人空前的反战大罢工、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等。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方面，美国与日本帝国主义因中国问题而加剧的矛盾，可以成为中共对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有区别的政策依据；另一方面，中共必须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制造新的世界大战的阴谋。

本年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依据国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正式提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力争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国际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任务。

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突出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独吞中国的行动，已经造成美日关系的紧张化，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尽管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面前采取不干涉的中立政策，但我们仍要联合他们，和他们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的目的，和日本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因此，我们不仅必须联合朝鲜、日本国内的工农，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而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9、660页。

《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39、660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第72—73页。

且必须“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强调中国不仅应当与苏联保持良好合作，“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10月，他在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的谈话中，又着重强调：“决定着我们所有的对外政策，这就是促进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侵略。从道义上看，国际形势并非不利于中国。但和平战线的这种纲领不仅要体现在口头上，而且还要在活动上有所表现。”“我们提倡这种统一和平阵线，不仅对中国目前的斗争，而且对民主力量的安全与继续存在都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阐明和美国建立反法西斯和平阵线的可能性。他指出，必须把资本主义国家区分两类，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如德、意、日；一类是民主国家，如美、英、法。我们和民主国家在反法西斯方面，“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因而中国有可能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及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在1938年德国占领奥捷以前，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今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战争，并允许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日之间的矛盾，同时还是国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依据。他根据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精神，1935年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肯定指出，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应和英美结成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而且在国内还应当和由英美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结成抗日的统一战线。这是因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是遵照其主子英美帝国主义的眼色行事的。

他回顾历史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机会，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宣告落空。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1931年的“9·18”事变，又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就必然引起美国、英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新的矛盾，并使这种矛盾尖锐化。美、英等国与日本矛盾的尖锐化，不仅影响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影响到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

毛泽东从矛盾关联性的分析中，得出美英与日本的矛盾的变化，不仅将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依据，而且也将是建立国内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的结论。他明确地提出了在美、英与日本的关系上，要坚定不移地、全面地利用其矛盾的思想，较完整地表述了中共对美国政策的

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49、35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53页。

詹姆斯·贝兰特：《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

毛泽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15页，213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148页。

认识及其策略方针。

毛泽东深入地阐明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和平战线的关系。他指出，国际和国内形势都出现了两极分化，“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战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阵线。”这种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尖锐化，把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和平阵线紧紧联系起来。因此，中国的抗战必须要待两种联合战线都建立起来，才有可能胜利。

但是，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和美国建立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还只是一种可能。美国对华策略的最高出发点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日本灭亡中国的行动和计划，不仅指向中国，而且指向美、英、法、苏等国，日本的对华侵略，使美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的计划受到威胁，因此，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占领中国。但是，基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会为了中国轻易得罪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而且出于反共的目的，他们又希望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起到牵制苏联的作用。美国情愿对日本采取妥协，企图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停止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一些美国人士悲观地认为，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作战，中国离战败便不远了。毛泽东指出，这只是一种废话，即使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中国离战败还很远。中国仍然有很大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不得不在整个战争时期在其后方作防御战。日本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南部，它是无法封锁的。基于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和它从自己利益角度的考虑，毛泽东判断，中国和美国在实际上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盟还不是现实的可能，还有待于形势的继续发展才能判定。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美国的所谓中立政策，是中美共同携手参加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一个巨大障碍。毛泽东对美国的中立政策始终持批判的态度。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要求美国和西方国家应当援助中国，至少也要保持真正的中立立场。他说：“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立场。”这实际上是对美国中立政策的含蓄批评，因为美国的中立主义实际并非真正的“中立”。美国一直在“中立”的幌子下，扩大对日本的贸易，大做其军火生意，以大量的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供应日本。因而毛泽东提出“至少中立”即真正中立的问题，要求于美国。

之后，毛泽东指出，在世界形势和亚洲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美、英等国继续执行中立政策，实际上中立政策便成了一种放任政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利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带有一定的欺骗性，而且带着极大的危害性，不揭露这种中立政策的实质，必将危害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成立，必将危害世界各国人民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事业。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9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1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2页。

他说：“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即所谓中立政策，或不干涉政策。”在中日战争发展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放弃与美、英等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决揭露美国政府等一贯“爱玩‘中立’政策”的伎俩，努力排除世界反法西斯和平阵线成立的种种障碍。

毛泽东深刻洞察美国政治，肯定美国的所谓中立政策，乃是孤立主义的产物，既有历史的根源，又符合当前美国一部分大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9·18”事变发生后，不少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深表遗憾，但是由于孤立主义的思潮影响，使美国人感到并无干涉日本行为的必要。一些顽固的孤立主义者甚嚣尘上，他们高唱确保美国的利益和稳定是高于一切的原则，美国绝不应该去管亚洲和欧洲的事情。只要美国保持中立政策，法西斯就不会危害美国。他们从市侩的立场出发分析美国介入中日战争的得失，肯定援助中国抗战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1936年4月，美国防止战争委员会领导人弗雷德里克·利比对美联社记者说：美国为了保全在华的1.3亿美元的投资，便必须花费400亿美元打仗，这难道不是最无利可图吗？美国驻远东记者弗雷德里克·摩尔，更以锱铢必较的商人眼光看待美国对中日关系应选择的立场。他说：美国对华输出每年为4千万美元，以二分利润计算，可获800万美元，但维持在华驻军的费用就远不止此数。因此，美国没有必要为区区利益而去承担对日作战的风险。孤立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有必要对日本在华的侵略作出某些让步，使日本的“温和派”有理由能够牵制极端派，从而使日本的侵略得到遏制。美国政府内外孤立分子的强大势力和种种舆论宣传，使美国民众不辨真伪，纷纷反对参战。垄断资产阶级以此为他们经营的美国军火工业获得最大利润，及推行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作了掩护。

1936年7月初，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批评美国政府的孤立主义政策，希望美国政府认识孤立主义的危险性，认真考虑太平洋局势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对于中国的抗战，任何以短浅的目光、一己之私利出发看问题的方法，都将是有害无益的。中国人民的抗战，不仅关系太平洋地区的安危和前途，而且直接关系太平洋地区诸国、特别是美国的安危。“如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65页。

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3页。

《泛美和平会议与美国远东政策的动向》，《东方杂志》，1936年12月，第33卷，第24号。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1页。

果中国完全殖民化，太平洋未来就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和文化遭到毁灭和威胁，将是一场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他又指出：“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毛泽东希望西方政治家，包括美国的政治家们，不要从狭隘的私利出发看问题，要认清世界形势的走向，放弃孤立主义，同中华民族共同携手，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光明道路，而不要走上日本法西斯设计的黑暗道路。他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批评，着眼于促成包括与美国在内的各国建立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阵线的形成。

毛泽东对罗斯福及其政府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他肯定罗斯福及其政府也具有两面性，即不变与变的两面性。罗斯福政府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政府，只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在政策上必然与上届胡佛政府保持基本的连续性，这是不变的一面。但是，它又有变的一面，毕竟罗斯福政府面临的世界形势，与胡佛的时代已大不相同，罗斯福本人在若干方面也与胡佛不相同。这就决定罗斯福政府会表现出个性特征，这就是变的一面。这种不变的一面，使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国际政策有清醒认识和估计；而变的一面，又可以为我所用，促成中美共同反对日本侵略。毛泽东为此告诫全党：不应当把事物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注意把握事物的变化，并使我们的政策随之而变化。

毛泽东对罗斯福政府的看法，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罗斯福是在美国孤立主义强大努力包围之中上台的。孤立主义代表了美国大资产阶级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因而罗斯福上台，毫不犹豫地孤立主义采取了赞同的态度。他迎合孤立主义者的要求，采取孤立主义者提出的政策。在他任期的头五年，他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没有脱离孤立主义的一贯立场。因而在远东问题上，罗斯福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这是他的政策的主要方面。在罗斯福政府看来，东京的政策是万恶的，但不值得用战争解决问题。美国虽然同情中国的遭遇，并反对日本的军事扩张，但美国援助中国和在亚洲扮演圣诞老人没有好处。

但是，罗斯福毕竟与传统的孤立主义者不同。如果说孤立主义代表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那么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也代表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都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实现其利益的两种不断变换而实质一致的策略。罗斯福便是后一种策略的代表者。他代表了不甘心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于守势地位的经济和政治集团。他主张积极地扩大美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地位，对于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兴起，从而威胁美国利益的世界形势，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他对于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日美关系的紧张，也有所分析。他从美国的利益出发，认为美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时，就肯定美

《毛泽东一九二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135页。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05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第2版，第330页。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10页。

日之间迟早必将一战。 20 年代中期，他在为《亚洲》杂志所写的文章中，又主张对日本应多了解。在他就任美国总统后的第二次内阁会议上，他强调美日 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他反对共产主义，在他的眼里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法西斯的德国都是独裁国家，但是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在当前对美国有更大的威胁。在他的第一任期内，就中美关系而言，虽然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但是他的言论毕竟与正统的孤立主义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别。

基于上述事实，在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 1936 年 7 月，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中共对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期望。他相信随着形势的发展，罗斯福及其美国政府不可能将孤立主义贯彻到底，美国必然变换其策略，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他认为，罗斯福与张伯伦有一定的区别：“我们同意罗斯福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对于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 基于此，他预言，中国与美国结成反法西斯战线只是时间迟早问题。

毛泽东强调，中美是否建立反法西斯的战线，关键不在美国发表什么声明。如果在中国抗战实际开始时，美国能对日本进行封锁，这就是对中国抗战的有力援助。“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和美国、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毛泽东及中共注意到，“7·7”事变后，罗斯福的言论进一步发生了变化。由于美日矛盾的继续尖锐化，罗斯福政府为了维护美国在华利益，不能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进行一定抵制。10 月 5 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著名的“防疫”（“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谴责了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的侵略行动。他指出：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世界蔓延，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他强调：“不论宣布的或是不宣布的战争，都是一种传染病”，“它会把离开最初作战很远的国家和人民都给卷进去的。”他表示，对于这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他建议像隔离传染病一样，在侵略者周围建立一条“防疫带”。第二天，美国国务院也公开谴责日本在中国的行动违反了 1922 年 2 月 6 日的九国公约中，关于对华事件应遵守的政策和原则的规定，及 1928 年 8 月 27 日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规定。

毛泽东对罗斯福的“隔离”演说很感兴趣，他在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闲聊时，议论了罗斯福的演说，并对美、英的政策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尽管罗斯福的演说和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还十分空洞，还停留在口头上，但较之“9·18”事变以来的政策前进了一步。之后，1938 年 2 月，他在与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中，对罗斯福的态度公开表示欢迎。他说：“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蒂，霍华德系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67 页。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1939 年 1 月 20 日，《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 205 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 130 页。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 版，第 152—154 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年版，第 981 页。

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能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毛泽东呼吁，建立中美两国和其他各国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已迫在眉睫，美国必须由口头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转变为实际行动，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应有的制裁。

“7·7”芦沟桥事变，促使毛泽东及中共加速争取与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建立和平阵线的步伐。“7·7”事变发生后，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毛泽东和中共坚决主张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为此立即制定了中共的外交政策。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明确提出中共的外交路线是：“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战救国的协定。”力主国民政府在抗日方面，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侵略国家实行密切合作。

同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这条外交路线作了解释。他说：“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除其侦探。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其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

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纲领》进一步对中共的抗日外交政策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战线。”同日，在毛泽东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详细地解释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各项政策，提纲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并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交给当时在延安访问的海伦·斯诺，请她向美国 and 全世界广为宣传。中共希望中美两国采取实际步骤，迅速联合起来，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

1939年9月3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变化急转直下。毛泽东经过缜密分析，肯定这是世界帝国主义的战争，其性质是掠夺性、非正义性和帝国主义性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使世界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奉行掠夺战争了。因此，应当按各国在战争中的性质来划分它们的阵线。这种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基于这种划分，在这种新的情况下，

《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4月，《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46页。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1937年7月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7页。

争取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各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结成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性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成份：（1）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3）苏联。”

毛泽东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也改变了美国在世界新格局中的地位。他高度警惕美国的变化。大战的爆发，使他立即改变了9月1日在接见新华社记者谈话时对美国的估计。他说：“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谈话中，还以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至于在国内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经济生活，那知它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宣布了所谓‘局部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它已经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化和战争化了。”

毛泽东转而认为，在美国准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美国实际上已排除于世界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之外，罗斯福政府也正在走向法西斯化。虽然美国政府这时仍然宣布不放弃它的中立政策，但是这时的“中立”，乃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假中立”。这种中立是一个阴谋，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计划的一个部分。“日本希望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富强起来。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罗斯福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一个卫士。但是他对斯大林直摇头，说斯大林对他毫无用处。”因此，共产党人对于罗斯福政府所谓的“中立政策”现在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共产党必须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争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为，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地扩大。”“在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的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企图在战争中大发洋财的那种政策。”

毛泽东阐明，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共产党也主张中国应当严守中立。但是，中共主张的“中立政策”与美国的中立政策有本质不同。美国的中立，此时是彻头彻尾的假中立，实则是坐山观虎斗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中国应当采取中立政策，首先，是因为交战各方进行的都是帝国主义非正义的掠夺战争，“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一方，”就是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对。其次，严守中立，实质就是执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不要以为参加了帝国主义战争一方，就能争取到他们的援助，这是一种荒谬的见解。“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17—218页。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20页。

《一九三九年同毛泽东的谈话》，《斯诺在中国》第131页。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2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

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当根本拒绝的。”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已经不复可能参加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但是，毛泽东和中共并不把美国看死。毛泽东透彻地看到，“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美国在中日问题上与英法态度还不一致。”因而对于美国还不能看死，美日矛盾还应当利用，美国政府的某些政策对中国抗战还会有利。

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重申上述估计，指出：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美国暂时还无可能与日本妥协而出卖中国。因此，对美国还应当尽量争取。

对于美国是否参加世界大战，毛泽东估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39年9月23日，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对这种可能性作了预言。他指出，罗斯福将使美国参战，在欧洲，这场战争是纯粹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美国的共产党人过去支持罗斯福，但如果他决定美国参战，共产党就不会支持他了。

1940年，“7·7”抗战三周年，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从命，因而我们仍然可以利用美英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日益增长的矛盾，促进中国抗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苏德战争爆发。美国对德国对苏联的侵略表示了谴责。毛泽东综观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果断地认为，时局又出现了新的转机。由于美国表示愿意站在被侵略者一方，因而与美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又具有了现实的可能。6月23日，他在为中共中央所拟定的对党内指示中指出：现在，我们必须“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这样，中共根据形势的新变化，又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建立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的立场上来。7月18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的信中，肯定美德和美日冲突均不可避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7月30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和黄克诚的信中，再次分析美英苏合作的可能性完全存在（英苏已订盟，美苏日益接近），因此，我们的方针，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拥护国际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里，毛泽东在政策上表现出的高度灵活性，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63页、第671页、第702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02页。

《中共中央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1939年12月1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91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4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806页。

实际上是高度原则性的体现。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只要不是为着侵略的目的，而是为着反侵略的目的进行战争，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我们就应当联合他们。

毛泽东和中共指出：大西洋宪章的发表，是世界反法西斯主义和平阵线成立的标志。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邱吉尔发表共同宣言（大西洋宪章），表示了制止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蔓延的决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同宣言热烈欢迎。指出，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共同宣言“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反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

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指示应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抗法西斯统一战线。

12月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宣告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反战、反侵略、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阵线业已完成。“全世界一切民族划分为奉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奉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明朗化了。”侵略营垒与反侵略营垒最后分明。

毛泽东和中共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斗争策略，紧紧地把握时局的大方向。不放过任何机会，充分利用舆论向世界各国宣传，为促成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成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也为美国政府及全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共的原则立场，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分析中美关系和合作的可能性时，不是从僵死、凝固不变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把美国看死，而是从变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根据变化，随时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使美国在抗战中所表现出任何微小的进步，都得到肯定和利用，把中美关系始终纳入于共同有利的发展方针中。辩证法认识充分地指导了毛泽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立场。他批评那些持凝固观点看问题的同志说：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物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的阶段，用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错误的境地。他希望这些同志改变观察问题的错误方法，使思想更合乎实际。

正确认识和努力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但是中国的抗战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把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中国人民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在抗战中是依靠外援，还是主要地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个问题许多民众搞不清楚，蒋介石政府也作了错误的回答。

“7·7”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感到了形势严重，但他对国联还抱着很大的幻想。他幻想国联能够出面进行调停，便可以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把抗战的基点放在争取外国干涉和援助的希望上。但是，国联对中国问题采取推脱，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签字国身上，而美国却拒绝担任根据该条约第七条召开的会议的东道国，虽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仍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941年8月19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2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页。

深恐冒犯了日本。美国代表戴维斯表示：我们来此并未希望做出奇迹。他期望能与日本实现合作。英国外相艾登在会议召开前夕，在下议院宣布：英国将采取和美国完全一致的步调，走一样远，不冲在前，也不落在后面。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行为，使蒋介石依赖外援和外国干涉的幻想落了空。

中国抗战应当放在什么基点上？应当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但是并不拒绝国际援助，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之间的关系。早在 1935 年瓦窑堡会议之后，毛泽东便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毛泽东强调，争取抗战胜利，归根到底要依据于中国自己的力量，依赖于全民众的抗战。但是，中国抗战也必须争取国外援助，包括争取美国在内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这是因为，在当今时代，世界上的事情已经联成一气了，世界上任何正义的战争都是互相支援，休戚相关的。中国人民必须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抗战的基础上，不站稳这个立足点，就会迷失方向，陷入幻想。但是，我们要尽量争取外援。要毫不犹豫地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努力争取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结成广泛的和平阵线，这是完成抗日大业的必要条件，外部的援助必将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

1937 年，毛泽东把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上升到更高的理论高度。他指出：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即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即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样，毛泽东便从根本理论上给了中共全党一个指导：把抗战的基点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同时必须努力争取外援。1936 年，他对斯诺说，中国的抗战将在如下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战胜并消灭帝国主义：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这是内部根据；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的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二、第三是外部条件。有了内部根据和外部条件，中国抗战便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基于上述认识，毛泽东高度重视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的援助。1936 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反复阐述了美国对中国的抗战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援助中国抗战的道理。之后，他多次敦促罗斯福政府给中国抗战以实际的援助，强调这种援助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

他强调，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或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同时，美国可以在制止向日本投降妥协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美国可以借助对国民党政府的影响，维护中国内部团结，保障中国自身的抵抗能力。1938 年 10 月，他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必须争取美国及西方一切民主国家的援助。而且，在争取它们的援助时，要具有远大的眼光。“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 版，第 16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 版，第 301 页。

《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第 126 页。

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毛泽东向国民政府国民议会提出要求：一方面，“坚持外交独立自主方针”，另一方面，“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为求其对我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之援助。”

毛泽东要求，对待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应当有一定的原则。

首先，美国对于中国抗战的援助，必须以平等待我为前提。法西斯对各国的侵略，目的是要实行“法西斯控制”，就是践踏各国应当具备的平等关系。如果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援助，也以不平等关系为前提，那么这种援助其后果与法西斯侵略并没有两样，都是践踏别国的主权。因此这不是什么援助，实质是侵略的另一种形式。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之上。“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毛泽东指出，历史上美国也“援助”过中国，向中国借过款。但是，那种借款往往是“政治借款”，以损害中国主权为目的，或者是把钱和物资借给蒋介石政府打内战、打红军。中国共产党将不承认美国和西方国家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用于违背中国利益的借款。

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过去对蒋介石政府的借款，主要用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这些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他声明，这种情况，今后不能允许再出现。但是，遗憾的是，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实际上变成了对蒋介石的援助。这种援助，只有少部分用于抵抗日本，绝大部分成了蒋介石为巩固其对国内统治至上地位的资本，蒋宋孔陈集团从美援中发了大财，并且促成了他们重开内战的信心。正如迈克尔·沙勒指出那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蒋于1941年越发确信美国会支持他的时候，他越发表现出他情愿与日本人签订一项（休战协定），以腾出手来与共产党人再打长期内战。美援计划没有多久就不可避免地与国共内战纠缠在一起了。”看来，毛泽东对美援的错误用途的担心，绝非多余而是具有预见性的。

其次，毛泽东强调指出，在对待美国的援助时，要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分开来。毛泽东指出，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抗战的援助，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是要看到各国“人民助我”。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进步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以美国为例，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便给了无私的援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 174 页。

毛泽东：《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对时局的意见》，1939年9月8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2月，第1059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3页。

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4年，第75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第205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第205页。

助。美国人民发起“一碗饭援华运动”，美国数十名著名作家、编辑将版税500万美元捐赠中国。美国援华总会等组织，为援华抗日所募捐款达2500万美元。抗战刚爆发不久，7月29日，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社论，要求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给予大力支持。“停止给予日本之一切军械与战争供应品的运载……，同时中国人民应该得到美国人民之各种形式的可能帮助。”

毛泽东高度赞扬美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无私援助，肯定这是对中国抗战的巨大鼓舞。他指出：“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毛泽东同时希望美国人民积极起来，督促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美国人民自身的利益而奋斗。

1938年6月15日，他致信吴亮平说：“接了一位美国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谈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姐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这封信表达了毛泽东对美国人民的感谢和信赖之情。

第二，是要看到美、英等政府对中国抗战，“采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

毛泽东从国际援助的角度，对美国政府的中立政策进行尖锐批评。他要求把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援助区别开来。

他指出，美国政府为着它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但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实际的援助。他们无视中国的敌人，也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也是世界性的抗战，以为采取孤立主义的做法，可以自保，实则是目光短浅。从来的援助都是相互的，援助中国就是援助它们自己。毛泽东指出，最主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这两个国家尤其受到东西方法西斯侵略者的危害。但迄今为止，英美政府尽管发表了一些友好的言论，但他们的政策事实上援助了法西斯侵略者。这是因为他们只说不做，实际上就是让法西斯的国家为所欲为，因而在客观上帮助了法西斯。

毛泽东从阶级分析出发指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都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它们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是以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带有虚伪性、狭隘性和自私性。它们即使有一点援助，也是部分的和暂时的，不可以把争取外援的重点寄托在它们身上，决不可对它们过分依赖，不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可靠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问题的实质在于：美国和西方各民主国家，只在口头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而实际“不愿制裁侵略者”，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怎么靠得住呢！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告诫全党：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第三，要看到，美英等国“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把大量

转见：《解放》周刊，第23期，1937年11月13日。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0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8页。

军火与军火原料卖给日本。”实际上不是援助中国抗战，而是帮助日本侵略中国。

毛泽东尖锐指出，美国和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籍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大发战争横财，犹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大做其军火和战略物资的生意，大大地捞了一笔外快。事实正是如此。以美国为例，1937年，美国输日物资总额二亿八千五十五万八千美元。其中，军需物资值一亿六千七百九十六万二千美元，原棉值六千一百七十三万四千美元。1938年，美国输日物资二亿三千九百五十七万五千美元，原棉值五千二百六十四万四千美元（由于1938年美国国内数种军需品价格跌落，所以输日军需品的总值虽较1937年低，但实际数量上却增加许多）。1937年至1938年两年间，美国输日物资中，军需物资占61.2%，分别占日本当年所需军需物资的54.5%和56%。其中，原油、煤油、汽油、钢铁、橡胶、废铜、熟铜、锡、铅、机动金工作电机、皮革等战略物资，给了日本侵华战争以有力地支援。

毛泽东尖锐指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提供的战略物资，成为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重要手段。对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都是应当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对美国的行为不甚理解，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方面又要大量地将战略物资出卖给日本以助纣为虐呢？毛泽东指出，这个原因很简单，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垄断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性质，决定于它们必然要采取这样“许多矛盾政策”，这种矛盾政策正是它们的本质的反映。口头谴责日本侵略也好，出卖战略物资与日本也好，都服务于它们的根本利益，服务于它们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霸权野心。

基于上述分析，毛泽东认为，根据目前形势而言，在中日抗战中，我们对于美英等国家的援助暂时不应作过大的希望，就是将来，也不应把美英政府的援助作为主要的希望。必须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把自己的方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希望于外援上，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在对待外援的态度上，还必须区分苏联的援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的援助。毛泽东向全党指出，唯有“苏联是最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中苏两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十多年来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早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苏联及其红军就援助了中国的北伐战争，于今又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奋斗。”苏联一贯站在正义的革命战争方面，而不会站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它可能同交战双方有通常贸易关系。他呼吁必须立即和苏联结成巩固的军事同盟，依靠苏联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这是争取外援的关键方面。事实上，苏联于抗战一开始，便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给中国提供了军事物资方面的贷款，并派遣2000多人的航空志愿队到中国参加抗战。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舆论方面，苏联坚决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因而苏联一开始便最坚决地站在中国人民的抗战一边。毛泽东肯定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的重要性：“当日本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28页。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07页。

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苏联和中国历来是休戚相关的。中国战争的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国际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只要中国继续坚定地抗战，而且和苏联密切合作，苏联的援助便不仅会弥补英法援助的减少，而且会远远超过后者的重要性。

毛泽东通过对美、英等国家的外援的分析，不仅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而且阐述了外援与独立自主的关系。他肯定独立自主是接受外援的根本指导方针，离开了独立自主，任何外援不但于我无补，而且有害。独立自主既是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又是对国家间平等关系的维护，还是使外援真正对于中国抗战起促进作用的关键。对于美英等国的援助，关键在于有关国家的政策是真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革命解放战争。毛泽东从对待外援的关系中，进一步引伸出的独立自主的结论，大大地深化了对外部援助的本质认识。

基于独立自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要求全党、也要求国民政府不要等待外援具备了才进行抗战，而应当积极地推进抗战；抗战的深入进行，必将成为争取外援的最有力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鄙视中国的不抵抗，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不仅如此，他强调，即使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也要进行有力地抗战。中国要想成功地反对日本，必须争取别国援助，“但是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即使没有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战争了。”现在，日军的坦克、大炮和飞机比我们多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和他们作战。我们希望将来能有我们自己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但没有这些我们照样能战斗。即使我们连步枪也没有，但我们只要有中国群众的通力合作，我们用棍棒和石头同样也能够作战！每一个中国人，不分男女，都要学会“用牙齿，用手，用脚打仗”，使自己能够独立取胜。他坚信，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将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几属食毛践土之伦，黄炎华胄之族，一致奋起，团结为国，建义旗于国中，申大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灭，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

毛泽东关于对待美英西方国家援助的分析，及由此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具有原则性，坚定性和灵活性，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坚持抗战的根本方针，表明了中国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坚决揭露和抵制英国美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阴谋 日寇占领武汉、广州后，已无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随着相持局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557 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424 页。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 109 页、第 115 页。

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兰特的谈话，参见贝兰特：《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 年，第 105 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 年 3 月 10 日，《六大以来》（上），第 751 页。

面的出现，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策略方针，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引诱国民党走妥协投降之路。1938年12月17日，汪精卫叛变投日，投降空气一时甚嚣尘上。

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欧洲，德国法西斯加紧扩大战争。德国与英、法、美的矛盾进一步尖锐。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国，控制了进攻东欧和巴尔干的战略要地。9月29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同德国法西斯元首希特勒、意大利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在德国慕尼黑达成协定，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促使德国法西斯侵略苏联，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

1939年9月1日，德国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之后，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被迫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为了扩大侵略，加强互相配合，在柏林签订了法西斯军事同盟。在德、意法西斯的压力下，在远东，英、美为对付欧洲的紧张局势，防止日本在远东配合德国向它们的势力范围进攻，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得与日寇的妥协，并诱使日寇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它们采取反动的绥靖政策，数次酝酿召开太平洋会议，推行远东慕尼黑阴谋。

毛泽东和中共执行坚定而又灵活的对美政策，一方面继续寻求和推进与美国在抗战方面进行合作；另一方面，对于英国与美国采取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政策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揭露。早在1936年，毛泽东对英国政府的妥协政策便表示了强烈反对的态度。他批评说：“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如果继续动摇并象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1938年，他在与卡尔逊谈话时，继续严厉批评英国与德国法西斯的妥协政策。他预言，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如果德国插入西南，英国便会参战，但它不准备为捷克而战。1939年的慕尼黑出卖，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

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毛泽东对张伯伦的反动政策立即予以尖锐批评，并对美国的动向予以分析。他指出，慕尼黑协定使“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的妥协政策助长了法西斯，“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毛泽东分析，英国继其在西方向法西斯妥协之后，出自其损人利己的目的，其妥协政策还可能搬到东方。为了保存其在日本占领区的商业，为了减轻日本对南洋英属殖民地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和日本在东方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当然要达成根本性的妥协还有困难。至于美国，它的情况又稍有不同。由于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这就使美国暂时还不会参加到妥协行动中去，“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因此，还应当进一步做好和美国建立反侵略的和平战线的工作。

1939年，欧战迫在眉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种形势，压迫英国在东方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与斯诺的谈话》第131页。

《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

《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

《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193、195页。

让步，要求英国对建设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予以合作。这种合作包括：英国放弃援蒋政策；放弃保护反日分子及共产分子；放弃支持法币等。英国张伯伦政府出于一己之私利，竟然对日本实行妥协，并企图将其在西方推行的慕尼黑政策推广到东方。6月20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向日本外相有田八郎提议举行会谈。7月15日，英日东京会谈正式开始。7月22日，英日双方达成协定，即“有田——克莱琪协定”。协定宣称：英国政府完全承认正在大规模战争状态下的中国实际局势，知悉日军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与维护其占领区秩序应有特殊之要求；英国政府无意赞许有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和措施，并通告在华英当局及英国侨民切勿采取此项行动与措施。与此同时，蒋介石亲自致电罗斯福，要求召开太平洋会议解决远东问题。

英国张伯伦政府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使中国抗战面临重大危机，如不予以坚决揭露和反对，势必造成严重后果。“有田——克莱琪协定”签署之前，6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指出：目前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和新的慕尼黑的可能。全党必须给予国内国际一切投降阴谋和叛变行为以适时的、坚决的打击。

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投降的报告。他分析国际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日本帝国主义者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把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压到了中国人民头上。“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6月30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投降活动》的文章，集中揭露英国政府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他要求人们注意到：英国的妥协政策和蒋介石所谓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的要求，完全是一整套观点，一整套做法，一整套的阴谋。在蒋介石就是投降的阴谋，在国际投降主义者就是“东方慕尼黑”的阴谋，对于这些极其阴险的阴谋，不可不予以坚决揭露。

毛泽东还把英国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和“远东慕尼黑”的阴谋联系起来分析。6月26日，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按蒋介石的指示，往访英外相哈里法克斯，提出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建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太平洋会议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适当机构”。7月17日，英外相哈里法克斯致电英驻华大使卡尔，希望英日在东京谈判的某一阶段上邀请美国和法国参加讨论，把英日谈判变成一个太平洋国际会议，以便处理远东问题。太平洋国际会议，实际是英日东京谈判会议的扩大，必然成为断送中国抗战和根本利益的一次会议。毛泽东看透了 this 阴谋。他愤然地向全国人民指出：“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英国帝国主义策动太平洋会议，就是要藉收渔人之利。对于这些阴谋家的阴谋必须揭穿，并且应当使他们受到制裁。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便将上其大当。

在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斗争中，毛泽东把美国 and 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区

《反投降提纲》：《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70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72页。

别开来。在策动太平洋会议的过程中，美国出于自己的利益，没有附和英国进行“斡旋”的要求。美国国务院负责远东事务的霍恩贝克复函英国外交副大臣贾德于称：中国目前绝不会同意有利于日本的任何安排，美国或英国，或者英美联合进行干涉，将冒对日作战风险的可能性。1938年10月24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再度拒绝和英国一道对中日问题进行“斡旋”。与此同时，鉴于日本一再公开声明不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因而美国决定于1940年1月26日终止1911年缔结的美日通商和商运条约，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美国对日本贸易提供的最惠国待遇。

鉴于美国上述不同于英国的态度，7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把美国和英国明确区别开来，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张伯伦投降政策”的策略。9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新华日报记者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谈话时，他着重对在“远东慕尼黑阴谋”中发挥突出作用的英法政府进行严厉谴责。他强调：“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他们“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毛泽东深刻分析，英法帝国主义迟早是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坐收渔人之利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在参战后保持优势。目前，日本与英国的妥协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运动，牵制苏联，日本则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英国的远东慕尼黑政策，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为此，中共反对任何妥协运动，中国决不参加东方慕尼黑会议。

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法西斯集团和英法集团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

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因此，在政策上要区别美国 and 英国，肯定美国 and 英国还是有区别的。当然，也不排斥美国将来会出来搞“远东慕尼黑的阴谋”，如果美国要那样做，中国也会坚决反对它。

9月1日，德国发动了向波兰的进攻。9月3日，英法与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时，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暂时缓和。毛泽东分析远东形势，认为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而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尤召集的可能。到了1940年“7·7”抗战三周年时，毛泽东与中共进一步估计到，由于美日矛盾的尖锐化，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的轨道，英法已经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是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83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583页。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第116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44页。

的矛盾。毛泽东和中共估计，远东慕尼黑的高潮已经过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的政策“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主义的危险性。”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1940年下半年，国际和国内形势出现了急剧变化。帝国主义战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使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一方面，美国日益积极地援助英国并准备参战；英国则日益依赖于美国。在美国的援助下加强自己的陆军装备与海军空军，准备抗击德国进攻英伦本岛的企图。另一方面，德、意与日本法西斯勾结的结果，已使日本内部出现了变换领导人物与转换政策的变化，日本参加德、意阵线与南进的方针已日益明朗化。日本为了放手南进与准备对美战争，正在采取各种方法（交通封锁、军事进攻、政治引诱），以求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英美为了对抗日本南进，便由劝和中口的远东慕尼黑政策，转到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的政策。美英两国本来是不赞成中国以真正独立的抗战来争取民族解放的，现在，它们却要中国服从它们的帝国主义的利益，抱住日本脚，因此它们以种种办法（借款、开放滇缅公路等等），来诱使中国参加英美集团。”

这样，新的投降危机，主要不是来自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参加美英集团的要求，而是来自亲日派响应日本的诱降，以及德国的劝降而挑拨起来的新的准备投降的罪恶活动。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指出，我们的政策必须坚决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上。没有区别便没有政策。对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于美国、英国也应实行有区别的政策。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国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美英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战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美英，加以区别。只有在这些区别之上，才能建立我们的政策。因而，在英美放弃慕尼黑政策，赞助中国抗日时，不应走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

抗战进入1941年，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针对新的情况，再次提出反对“远东慕尼黑”的要求。这一次，主要是揭露美国的妥协政策。1940年8月，日本正式抛出“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公开叫嚷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9月23日，日军突然袭击驻越南的法军，迅速占领越南南部。日本侵入印度支那，是它抢占西太平洋的南进战略的重要步骤，直接威胁到美、英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和战略地位。9月27日，日、德、意三国结成法西斯的军事同盟，使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更进一步尖锐化。此时，日本的南进政策已经具体化。以偷袭珍珠港为突破口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美日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开战。但美国和日本都感到准备不足，而且美国正日益卷入对希特勒的行动，还不具备两洋作战的军事实力和心理准备。因而力图避免与日本尽早开战。美国有关人士认为，只要美国能在中国问题上满足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52页。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355页。

《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1940年11月11日，《解放》周刊社论。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764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日本的一部分要求，日美战争便可以避免。他们幻想通过牺牲中国的办法，阻止日本“南进”，引导祸水北流，尽可能地推迟日美战争。或者使日本脱离三国同盟，不再对美作战。

1941年2月，罗斯福建议与日本进行谈判，日本接受建议。3月，日美之间开始秘密谈判。这个时断时续、带有严重绥靖气息的谈判，关键是中国问题。4月9日，赫尔收到日美谅解方案，5月12日，美国国务院收到日本政府正式建议，要求美国应承认满洲国，给予日本取得西南各地的经济资源，日本和美国共同制定反共政策等。6月21日，赫尔在向日本政府提出的美国方面的第二次修正案及在后来的谈判中，美国明确承认近卫三原则，表示愿意出任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使日蒋达成于日本有利的条约，同意日本政府在东南亚建立“新秩序”的原则和“共同防御共产主义”的建议。

11月22日，美国提出临时协定草案，进一步规定：日美两国将采取永久和平政策；两国不在太平洋地区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日本撤退在越南南部驻军，并将北部驻军减少至2.5万人；有限制地恢复日、美通商，包括对日输出民用石油，放松对日禁运；中日间任何解决办法应基于和平、法律、秩序、公正原则等等。这个协定草案，在“和平、法律、秩序、公正原则”的幌子下对中国实行大拍卖，把中国的主权和抗战置于不顾，这就把“远东慕尼黑”阴谋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对美国新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密切注视，肯定其阴谋如果实现，必将大大地危害中国。他在为中共中央拟定的党内通知中，一针见血地向全党指出：“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毛泽东和中共要求中国人民高度警惕美国的绥靖政策，要认真考虑：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最后放弃了么？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新的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中，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绥靖”乐曲正在旧调重弹呢？不估计到这些问题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

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动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德、意、日法西斯更加甚嚣尘上。美日谈判继续进行，不管美国与日本欲达成何种妥协，对中国抗战都将十分不利。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发布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中，正告美国：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张伯伦复辙重寻，汪精卫后尘学步，所谓绥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和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持反对的。”11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演，诚恳敦促美英放弃绥靖政策，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拿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日三国法西斯蹂躏下的各国人民，12月7日，日本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12月8日，罗斯福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了战争咨文，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绥靖和安抚政策宣告破产。

在揭露、抵制英、美帝国主义“远东慕尼黑”的阴谋中，毛泽东显示了高超的斗争艺术。他根据中国抗战的实际需要，肯定联合英、美的重要性和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2页。

《解放日报》1941年5月23日社论：《谨防扒手》。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7页。

必要性，但是反对联合压倒一切的观念，主张通过斗争去求联合。这就是必须与英、美一切不利于中国抗战的行为作斗争，特别是和它们妥协出卖中国利益的行为作斗争。愈是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反对态度，揭露它们的阴谋，便愈是能减少它们妥协合流的可能，也就愈有利于实现中美反侵略的联合。当然斗争只是手段，必须服从联合抗日的目的。因此，在进行斗争时必须有所区别，既有对象的区别，又有阶段的区别，还要有分寸上的区别。把斗争建立在区别的基础上，便能有力地促进联合。毛泽东和中共在反对和揭露英美远东慕尼黑阴谋中，进一步显示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性，使中共在国际统一战线中更趋于成熟。

二、1942—1944年：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和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盟国关系建立，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抗战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美盟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加速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根据中美关系变化的新特征，制定了中共的对美政策，概括起来就是：维护与美国作为盟国的友好关系，肯定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争取美国对中国和中共的抗战给予实际的援助，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制止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活动，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分裂活动，要求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毛泽东确定的上述中共对美政策，成为指导1942—1944年中美关系的基本方针。

毛泽东和中共肯定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支持其正确做法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推上了抗击日本的前台；罗斯福采取“以华治日”的政策，把中国作为盟国，他希望中国拖住日本，消耗其国力；并把中国当作未来盟军对付日本本土发起攻击的基地。虽然他的政策并没有离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半步，但毕竟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胜利。毛泽东对于美国凡是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同抗日战争的所作所为，都鲜明地予以肯定，表现了中共对美国的友好立场和合作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使中美的关系密切起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和《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明确肯定美国、英国进行的战争，是保卫自由与民主的正义的解放战争。美国、英国对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实现和发展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宣言》和《指示》特别肯定，“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意义”；中国的抗战，和美国、英国与日本的战争，具有互相支持的作用。“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进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将对美国进行的对日作战坚决支持和有力配合，以争取反法西斯的共同胜利。

为了和法西斯全面抗衡，从战略上协调人力、物力的使用和动员，协调美、英的利益，1941年12月，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华盛顿召开阿卡迪亚会议，着重研究盟国全球作战的总战略规划。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先欧后亚”的方针，欧洲是最重要的战场，德寇是主要的敌人，盟军首先把主力投入欧洲战争，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在远东暂时采取战略防御。美国并建议成立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战区最高司令，在重庆设立盟军参谋部。从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根本利益出发，美国邀请中国作为《联合国宣言》的发起国之一，与英、美、苏二同共同领衔。

阿卡迪亚会议体现了罗斯福长远的战略方针。罗斯福认为，这样一来，在中国就可以把美国的力量和国民党的力量合并在一起，在亚洲造成一个战时和战后的可靠盟友，并促使中国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亲美国的政府；既可以取代列强在亚洲的地位，又能抵消革命学说在中国的影响，改善蒋介石

对付国内主要敌手中国共产党人的地位。邱吉尔对美国的意图甚为不满，“认为罗斯福的把戏是一方面要使中国仍然基本从属于美国，另一方面要使它强大起来，足以‘控制，亚洲。”仍尽管邱吉尔十分不满，但经罗斯福的解说，有 26 个国家签字参加的“宣言”，还是于 1942 年 1 月 1 日发表。

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有积极因素的做法，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认为，尽管美国有它的打算，“先欧后亚”的方针，将使日寇的气焰更加猖獗，使八路军、新四军承受更大的压力，在残酷的条件下作战，而且将使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更加肆无忌惮。但宣言对于消灭德国法西斯和日寇有利，对战后世界形势稳定有利，从长远的目标着想，中共不惜承担困难，对宣言表示支持。7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肯定 26 国宣言的精神是可取的。宣言指出：去年八月大西洋宪章的宣布，今年 1 月二十六国的宣言，最近苏英同盟条约及苏美协定的签订，都规定战后的世界是自由的、民主的、和平的世界。不扩张领土，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人民有选择政治制度的自由，不让法西斯侵略主义再有抬头的可能。凡此一切，都被中苏英美及一切反侵略国所共同承认，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希望，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希望。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郑重声明：我们拥护这些宣言。中共旗帜鲜明地支持二十六国宣言的立场，并且肯定，只要中英美携手协作，采取积极行动，苏英美如果 1943 年有打败希特勒的把握，那么，中国配合盟军在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在 1943 年也有打败日寇的把握。

1942 年 5 月 26 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英同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同盟者作战及战后合作互助的条约。6 月 10 日，美苏又签订合作协定，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外相艾登同时宣布：1942 年将在欧洲开辟同希特勒作战的第二战场。为了迅速取得对希特勒的胜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是一个重要战略步骤。但是美英口头宣布是一回事，实际行动又是一回事。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英国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利己主义作法，给予实质性的批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5 天，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估计国际形势时便指出：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决定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情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之后，毛泽东又指出，美英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致使苏联承受巨大压力，延缓了战胜法西斯的时间，既适合了希特勒的需要，也增加了英美自己的压力。因为“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以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毛泽东分析，无论从英美自身利益计，还是从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计，英美都无可避免地应当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他敦促英美不要从狭隘的利己主义出发拖延时间，“只打死老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第 93 页。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9 册，第 2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86、888、944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886、888、944 页。

虎”，那就使世人对英美太失望了。英美应当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夹击希特勒”，迅速取得欧洲战事的胜利，这才和英美的言论相称。

1943年，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形势进一步改观。毛泽东指出：“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肯定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一个方面的作用。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在太平洋上对日寇的打击，都为战争形势的转变作出了贡献。现在，“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苏英美三国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在太平洋上，“美国的力量还在猛烈的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的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及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和中国战场上对日寇的打击和合围，使法西斯感到了死亡的威胁。因此，再有一、二个斯大林格勒和北非那样的打击，以及欧洲第二战场开辟，那么给予法西斯以致命的打击，时机便成熟了。

7月3日，延安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抗战6周年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高度赞扬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伟大功绩和中国军民的功绩，肯定英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造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他指出：这个变化是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坚持六年，这就造成了这个根本的变化。其中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起了转变形势的主要作用。这样，就使法西斯侵略者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到了同盟国手里。毛泽东批评英美：1942年曾出现大好时机，欧洲在1942年便可以决战，但是因为欧洲第二战场没有开辟，因此没有实现。今年的关键还是英美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如果愈早建立第二战线，胜利便能愈早到来，他要求，英美应当正确运用今日的主动权，审时度势，不要再拖延时间，把第二战场的开辟由可能变成事实。

从反法西斯的大局出发，毛泽东始终把英美开辟第二战场放在国际形势的中心关注点上。他一再敦促英美不要在开辟第二战场上一拖再拖下去。他肯定英美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坐山观虎斗”的利己主义心理，“罗斯福、邱吉尔正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英美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对英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讨论，英美已无理由再拖延第二战场的开辟。毛泽东再次强烈要求英美应从世界大局出发，从速开辟第二战场，把自己的允诺落到实处。他说：一星期前，英美苏三国在莫斯科所开的会议，胜利的完成了任务，这也是值得大大庆祝的。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军事政治问题，于十一月一日发表了三国联合公报，签订了几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宣言。这次会议所讨论与解决的问题中，据联合公报所说，首先最重要的，是为着缩短战争时间，决定了确切的军事行动计划，关于此种行动，已经有所准备。“我们可以想到，不久的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886、888、944页。

《总结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1943年7月3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二版，第914页。

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际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它，决定地解决欧洲问题。”

毛泽东向英美指出，第二战场的开辟，既关系决定性地结束德国法西斯的命运，又关系中国战场决定性地结束日本法西斯的命运。欧洲问题的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11月28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对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达成协议。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战场的开辟，使德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第二战场开辟了，中国的抗战是否就稳操胜券于手？毛泽东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此时有必要向全国人民强调，第二战场的开辟，并非就实际地改变了中国战场上中日力量对比的形势，它只是作为有利的外部因素，促使形势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而要实际造成消灭日寇的形势，还必须依靠中国军民的艰苦努力。6月13日，他在延安接见中外记者，评价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意义时指出，第二战场的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因而现在欧洲已进入了决战阶段。第二战场的开辟在欧洲影响是广泛的，在将来也会影响到太平洋和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中国问题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单有外国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肯定英美开辟第二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但又肯定它代替不了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在太平洋战争的决战中，最后的战场在中国大陆，最后决胜的力量是陆军，而决定最后决战胜利的，是强有力的中国人民和军队。因此，要打败日本，依然要坚持把我们的方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

毛泽东和中共采取实际步骤，配合美军行动，担负起牵制日本法西斯的重任。1944年，美军实施跳岛作战，不断取得进展时，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抗日力量，在中国大陆展开局部反攻，到处打击日寇，有力地拖住了日军有生力量，减轻美国在太平洋上作战的压力，减少了美国的牺牲。在战争发展的关键时刻，中共和毛泽东，总是及时而又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美国在最后夺取对法西斯胜利中的努力和所作所为。7月7日，《解放日报》为纪念抗战七周年发表社论，介绍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进行的艰苦战斗；太平洋上美国对日本的反攻态势；中美英三国合作在印缅前线取得的重大胜利等。社论指出，希特勒的灭亡已经不远了。希特勒灭亡之后，日本法西斯苟延残喘的日子也不多了。决战形势的出现，不是轻减了我们的负担，而是“加重了我们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要领导抗日军民，坚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从各方面加速作好准备，配合盟军的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和中共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原则、立场，他们始终坚定地担负着历史的重任，从来不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推给别人。

随着抗战决战阶段的到来，中美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毛泽东指出，目前时局的特点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这个变化“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为了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与美国官方实现直接交流与合作，并把这种交流与合作看作有利于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常关系，有利于争取中国和平民主的前途

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943年11月7日：《解放日报》。

《毛主席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谈国内形势》：《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348页。

的重要工作。

继 1944 年 5 月底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之后，接着美军观察组 18 人奉史迪威的命令到达延安，同时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亦派欧高士少校及一上士，经五战区前往鄂中新四军五师地区，担任前线侦察。这是中共有力配合盟军共同行动的证明。中共中央为此向党内发布外交工作指示，毛泽东并亲自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要求对来延工作的美军观察组人员和在抗日根据地的美军人员，给予大力协助和合作，欢迎美英等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抗日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外交机关，发展中共与美国和其他盟国在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诚恳地表示：如果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作战，共产党地区动员起来的民众，能够给美军提供情报侦察以及对敌进行破坏。这种人民群众的支援，对盟军的胜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表示，希望美国国务院有一位代表常驻延安，甚至在美国军事观察组撤走之后也常驻在那里。他并探讨了美国国务院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的可能性。

毛泽东和中共诚挚而高度评价“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肯定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7 月 6 日，中共中央在发布的抗战七周年纪念口号中，再次表达对美国的友好感情，口号要求“坚持与美苏英合作”；“加强中国同美苏英及一切联合国的团结”；“中国军民要与美英盟邦共同动作，积极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给来华作战的盟军以一切帮助，援助和救护盟邦人员！”

毛泽东和中共希望：借此合作，可以帮助美国政府了解中共和解放区，加强双方的理解和交流，并为建立正常的、友好的关系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4 年底，毛泽东预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在明年将取得彻底胜利。他提出，在太平洋上，美军已经打到了雷伊泰岛；并可能在大陆登陆，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盟军，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12 月底，驻重庆的魏德迈将军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派到延安去的伯德中校，奉命向中共提出：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几千人的部队，可望中共能提供什么援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包瑞德、伯德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之后，伯德回到重庆与麦克卢尔将军进一步商谈，又带着一个扩大的建议再去延安，建议涉及二万五千多名美国伞兵。毛泽东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去华盛顿和罗斯福总统面谈。从这一件事中，表明了中共协同美军配合作战，最后消灭日寇的真诚态度。

毛泽东在接见中外记者时，肯定有美国参与的各种国际会议的精神。他指出：“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因为这些会议主张民主与统一，而“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再次鲜明地表示，中共同意反法西斯战争以来所制定的大西洋宪章，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共将尽最大努力，动员一切力量，准备直接配合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38、242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 年），第 539 页。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9 册，第 423 页。

参见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 年版，第 137、138 页。

上述材料证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 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整个期间，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政府凡属有积极意义的行动，都采取了坚决支持和肯定的态度。毛泽东和中共高度肯定美军的每一个胜利，并为之欢呼；真诚而坦荡地看待美英苏中的每一次会议及决议，拥护其正确决定，并以实际行动猛烈地打击日寇，不断扩大战果，有力地支援了盟军的行动。

毛泽东要求美国给中共军队的抗战以实际援助 中国人民的抗战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是国际的援助仍然是不可少的。在战争中，各盟国曾给了中国大量的军事援助，到 1943 年夏天为止，国民党政府从苏联得到 3 亿美元，从美国得到 7.478 亿美元，从英国得到 1.185 亿英镑。这些大量援助，本应大大地增强中国抗战的实力，但是国民党政府自武汉、广州失守之后，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大量军事物资用于反共军事活动，或者武装其军队，积极准备内战；还有一部分外国援助，成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贪污腐化、走私倒卖、中饱私囊之用。因此，外国的军事援助，并没有达到支持抗战的应有目的。

罗斯福从美国战后的全球战略出发，对中国抗战寄托很大希望。他认为蒋介石是能够领导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是未来中国的代表，因而把美援全部供给蒋介石政府。但是，在华的美国外交官、军人、新闻记者都随处看到，蒋介石并不是美国人心目中那样的抗日领袖，国民党腐败、独裁、专制、黑暗、顽忽、混乱、言行不一，屯积居奇、做黑市，与日伪大做生意。蒋介石对打日本没有多大兴趣，而对消灭共产党很有兴趣，这样的政权即使是有再多的外国援助，也是很难有效的。他们对蒋介石普遍抱着失望的情绪，费正清指出：“大批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适合官场豪华生活需要的商业中发财致富”，且不要说中国的贫民生活如何困苦，就是“昆明高校教师待遇如此菲薄的境遇使我感到毛骨悚然。”，虽然罗斯福对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并不是不知道，但是，“总统仍然基本相信，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及其政权莫属。既然如此，从未来的合作着眼，就应当支持和迁就蒋介石。”

美国在华的许多人士，对罗斯福的战略能否实现，抱深深的怀疑。他们认为，蒋介石这样黑暗腐败的政权、如此自私和目光短浅的政策，既不能保证对抗战作出应有的贡献，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美军作战；在未来国家中又不可能受到人民拥护，其政治统治很难维持，因而支持蒋介石政权应当是有条件的。美国在华人士普遍认为，要支持蒋介石政权，蒋介石就必须对他的政府进行改革。史迪威和美国驻华大使高斯都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危机，只是它的政治、行政和财政危机的集中反映，这种危机根本不是美国援助可以解决的。蒋介石不断抱怨说：“他们得到的物资援助与其他主要盟国相比太少，而忘记了他们打的仗也少，给予他们的物资没有派上用场，而且他们没有能力使用他们所要求的物资。”因此，要使美国的援助真正发挥作用，国民党政府便必须实行改革，使之成为一个有最低限度的效率和廉洁的政府。

但是，这种主张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因为哪怕稍微一点改革都会象揭开疮疤一样，暴露蒋介石政权充满脓血的腐败内幕，蒋介石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 年，第 222 页。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00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149 页。

所以，史迪威和美国驻华使馆的态度往往使蒋介石感到恼火。而蒋介石的军队腐败、不堪一击也使史迪威感到恼火，中国的政治军事一片混乱使史迪威的战略无法实现。他希望美国的军援能用到打日本人上去，但这一点几乎不能做到。这样，便产生了史迪威要求把美国军事援助物资的一部分分给中共的想法。

美国在援助中国时，不能只援助国民党，同时应给真正进行抗日的共产党以援助，这个主张并不是史迪威首先提出来的。早在 1937—1938 年期间，埃文斯·卡尔逊通过对中共地区的考察，便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概念：必须援助中共。他告诉罗斯福，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并获得中国最生气蓬勃和最进步的政治组织的友谊。他在同罗斯福讨论问题时指出，美国一定要有选择地卷入中国事务。单方面地援助国民党政权可能不尽恰当，也会事与愿违。共产党人也要求美国援助，因为他们已经动员了千百万中国人去打击敌人。仍最先进入中共地区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公开主张中共军队应公平地享受到美国的援助。他在美国礼拜六晚周刊上发表文章指出：中共军队在极简陋的装备下进行英勇抗战，使人“深深感动”，“如果十八集团军不被重庆剥夺一切援助的话，他们能完成更多的战绩，且全华北的敌人将更陷于被包围的状态中”。

在与罗斯福总统谈话时，斯诺主张把美国援助直接拨给在中国战场的军队，不管这些军队属于什么党派，这就意味着中共军队也可能得到美国援助。但是，罗斯福对卡尔逊和斯诺的意见只是听听而已，并不真正作为他考虑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当时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詹森坚决反对给中共任何援助的建议，他认为国民党人代表着中国的未来，象卡尔逊和斯诺那样的美国人，实际上是破坏美国政策的亲共的代理人。

继卡尔逊和斯诺之后，史迪威是提出要对中共军队实行援助的第一个美国军界人士。他代表了美国官方人士中的一种看法：必须把援助中共作为一种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砝码，使蒋介石按美国的战略就范。史迪威并不是一个亲共分子，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军队的纲领并不赞成。相反，他坚决主张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美国抗击日本战略计划及美国未来控制亚洲的计划，都是必须优先考虑的，这是他行事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严重地妨碍了抗战；在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的军队致力于包围和消灭共军而不去打日本人；蒋介石把美国人为他训练的精锐部队留在大后方，不愿投入抵抗日本人的战斗中，一切都在为未来的内战做着准备，所有这些不能不引起许多在华美国人士和史迪威的注意。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美国说来，给国民党大量军援，是否对中国有利，或者对美国自己有利。

1943 年 9 月 6 日，史迪威第一次建议装备和使用中共军队，以减轻日本人在平汉路的压力。开罗会议之后，重庆美军司令部经常传出要武装中共军队的说法。1944 年，日寇进行打通大陆作战时，史迪威与何应钦举行了一次会议。史在会上指责蒋介石保存实力，以胡宗南部队 40 万人围困中共于陕北，不参加对日作战，这是不忠于盟国共同作战的行为。他要求撤出封锁陕北的部队，并邀请第十八集团军出来抗战，美国愿意与中共合作，愿将租借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24 页。

见 1944 年 8 月 7 日《解放日报》。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175 页。

物资武装中共。当然，史迪威并不是真心想要武装中共军队，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他给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斗争手段。不仅史迪威运用援助中共这张王牌威胁蒋介石，连罗斯福也使用这张工牌。斯诺回忆 1945 年 3 月他与罗斯福谈话说：“罗斯福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那一年他告诉我，他准备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共以援助。他显然无意抛弃蒋介石政权；他可能把同中共合作只看作是一个军事上有用的权宜之计。我还得到这样的印象，罗斯福可能想把中共当作对蒋介石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促使他走向革新他的政府，成为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核心。”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和有关人士并没有真正援助中共军队的意思，他们宣称援助中共，有他们的意图和目的。

毛泽东和中共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援助国民党军队，以及蒋介石把美援用作内战准备的作法。自广州、武汉失守之后，中共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抗击日寇和伪军的主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支撑抗日大业，理应得到国际援助。但蒋介石政府把一切国际援助攫为己有，准备铲除异己，这种情况对同盟国不利，对抗战也非常不利，必须坚决改变。

毛泽东和中共明确提出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国共两党军队必须共享的主张。1942 年，周恩来、林彪在与范宣德谈话中，以及 1942 年 11 月 20 日签署的文件中，中共向美国提出建议：对作为反法西斯战争参加者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要给予某种承认。美国可干预到底，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终止，中央政府给予十八集团军以供应。共产党人希望，能够明确规定，在美国的对华援助中，共产党军队能够得到恰当的份额。

1944 年 6 月 22 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参观团介绍中共抗战的战绩，他指出我军“装备低劣，接济毫无”，但却抗击了日寇的 64.5%，伪军的 84%；而“拥有三百万大军，”又得到盟邦大量金钱武器接济的友党，“其战绩却十分可怜”。他以事实对比说明，美国等盟国的援助并没有发生实际的作用。

朱德在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中，再次明确表示可以接受美国等盟国的军事援助。他在对比美国独立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时指出：华盛顿将军开始革命，反抗英人，用着手头能有的任何种类的枪炮。当战事进展的时候，他们的军队自己给养自己，一部分武器则夺自敌人。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同样情形，他们在军事进展的时期内，从敌人方面夺取武器。在美国革命战争的最后阶段，华盛顿从法国人方面得到援助，这一援助是通过英国封锁线到来的。“如果中国同样从她的同盟国得到援助与接济——尤其是把武器送给那些愿意用它们来抵抗敌人的人们——打败日本是不会长期延迟下去的。”朱德很实际地指出，我们需要得到盟国的军事援助，但我们并不要求得到重炮、坦克和军用飞机。我们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供给步兵的武器，如轻重机关枪、反坦克炮、野炮、炸药等。这样，八路军、新四军在任何地方运动中都能战胜敌人，应付他们。朱德指出，要做到这一点，最大困难之处是，美

杜建时：《抗日战争时期蒋美勾结与矛盾》：《文史资料选辑》第 57 辑，第 206、210 页。

《斯诺在中国》，第 171—172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176 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 年），第 522 页。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189 页。

国与英国的官方，只与国民党官方政府发生直接联系，给中国的战争接济物品，都给了国民党政府，而国民党政府总是拒绝把这些战略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军队，因此使这些援助不能用在最得力的地方。朱德直率地回答美国记者：如果美国、英国愿意直接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共愿意和美英军事最高当局直接谈判，欢迎这种机会。

能够从美国等盟国得到军事援助，当然对于中共军队战斗力的进一步提高将发生重要作用。但是，毛泽东和中共始终清醒地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决不依赖于外援。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指示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认识执行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的需要，准此可以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政治、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中共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欢迎盟国在外交、经济、国际投资与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这是我们目前外交政策的具体步骤。但是，对于美国和其他盟国的援助，“目前不应希望过高”；对于军事援助，我们不可象国民党那样天天向人家鼓噪，要他们“向我们先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自主的立场，根据自己的力量自主决定自己的方针，并受到人家的尊敬。

我们决不能象国民党一样向美国伸手要援助，但是，在对待美国及盟国军事援助问题上，我们却必须和国民党政府针锋相对。这是因为，首先，中共能否合理地得到军事援助的相应部分，直接关系到抗战的胜利；其次，这是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独裁专制、实行民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它还是制止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重开内战的一个有力措施。因此，毛泽东主张，军援分配的原则，决不能以国共两党所拥有的军队数量作标准，而应以抗战战绩和抗战能力作标准。国民党军队虽多，但仅仅抵抗了六分之一的敌伪军；共产党的军队则打击了六分之五的敌伪军。按照这个标准公平地分配盟国援助中国的物资，才是合理的。1944年6月5日，由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面交的《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提出之意见书》，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同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9月12日，毛泽东明确指示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在与纳尔逊、赫尔利面谈时，应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国共平分”。

毛泽东提出美国援华军火“国共平分”的要求，既是从中共军队在抗日中实际承担的战斗任务出发的，又是从未来制止内战爆发的实际要求出发的。“虽然目前因国民党反对事实上还难办到”，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在策略上我们是主动的。在事实上也表明了中共与美国合作的真诚态度。中共表示，如果能得到美国的直接军事援助，并能建立一个事实上的盟军联合指挥部，那么中共的武装部队便将与美国军队亲密合作。“史迪威也发现他自己受共产党建议的吸引。1944年9月13日，他在重庆会见了共产党的两位代表，对方表示愿意把延安的部队交给他指挥。史迪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574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第242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376页。

威显然为这个建议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必须想法把武器交给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向美方指出，中共并不反对美国给蒋介石军队以军事援助，只要这种援助确实不是用于打内战。同时，如果美国坚持把武器给予中国一切抗日部队，包括共产党的军队在内，这样做也并不是干涉中国内政，而是反法西斯世界战争的要求。相反，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予国民党，其后果将是对中国内政的直接干涉。毛泽东的这个看法包含了根深的道理。因为中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如果应用于抗日，那么就有利于抗日胜利和确立中国的主权。但是，如果美国的援助是用于蒋介石打内战，那么这种援助只能使中国更加分裂，更加落后、黑暗，只能使中国更进一步地丧失主权。这样的援助妨碍中国走向统一、独立和光明，当然便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一再向美国强调，要做到确实不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便必须考虑单方面援助蒋介石的严重后果。

毛泽东警告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在对蒋介石的援助方面应当有清醒的头脑。“美国在对付蒋方面作得非常糟”。蒋介石利用了美国人要他抗战的心理，“无限度地敲诈勒索”。诸如孔祥熙代表团赴美恳求棉花援助，口口声声说什么，如果没有这笔援助，便“无力继续抗战”，便“需要讲和”等等。

毛泽东对国民党政府的这种没有民族气节和自尊心的骗子行为和奴颜婢膝行为，气愤已极。他向美国人士问道：我们在对日作战中，难道棉花比子弹更重要吗？如果我们没有棉花，是低三下四地向别人乞求，或者去诈骗，还是依靠自己去创造呢？“我们边区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也使我们不能从中国有棉花的地区得到棉花。但是我们经过努力，很快就能够自给了”。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以吹嘘和欺骗作为手段，他们在编造什么战果之后，跟着而来的就是：“中国不能赤手空拳作战……中国需要更多的武器和军火”，“中国既为联合国之一员，自有权利期待美国供应军人”。“飞机，飞机，更多的飞机！”（宋美龄在美国的演说语）。他们这样的厚颜无耻，难道不应当坚决揭露么？

周恩来也指出，国民党借口美援不足而打败仗，真是可笑之至。汤恩伯、薛岳的部队，不都是装备了美国的枪炮么？何以败得那样快，那样惨？胡宗南的部队，不是装备了更多的美国枪炮，还带坦克么？何以潼关以东的一仗，打得那么坏，何以胡宗南现在还保存着那么多的用美国枪炮武装起来的部队，不开放抗战紧急的前线，而专门用来封锁抗日的陕甘宁边区呢？毛泽东和中共要求坚决戳穿美援决定战争胜负论的谎言和唯心史观。

在延安工作的美国国务院政治报道员和史迪威的顾问谢伟思，经过与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以及他对中共政策的亲身观察和思考，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外交建议：美国的军事援助不能只给国民党，也要给中国共产党。他认为，基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考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从政治上看，（1）把支持和供应限定在只给国民党，不可能为美国赢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63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5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9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618页。

得一个能起作用的、全心全意的同盟者；(2)把支持和供应限定只给国民党，只能鼓励国民党现行的反民主的倾向，帮助其拖延风雨飘摇的政权，怂恿满脑袋法西斯思想的头头们打内战，这场内战只能给中国、给世界这个地区的战后和平和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带来灾难。(3)给中共以军事援助，使真心实意要抗战的共产党部队具有战斗力。(4)不偏不倚的援助可以促使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走向改革。(5)美国给予共产党军队的援助，可以使国民党发动一场内战成为不可能。

从军事上看：(1)共产党部队，在长江以北所有的日军交通线沿线，及紧靠交通线的地区都扼守着战略阵地据点。从这些据点出发，中共军队可以进入主要城市并切断铁路线，因而能够成为对日军进击极其重要的力量。(2)共产党部队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3)共产党部队在有关地区内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这是大规模和持久地进行运动战和游击战所必需的。这种支持使他们得到了一支有用的巨大的后备力量。(4)共产党部队所需的军事物资，都是简单轻便的，凭着这些物资可以长途行军和作战。(5)向共产党部队提供适量的供应，不仅会提高他们的作战效能，而且还会使他们象过去他们所做那样，夺取大量日军装备来补充他们的供应。(6)给共产党部队的供应数量，即使不多，但在阻断交通、破坏工业和供应，以及击毙日军方面，比为了同样的目的而给予空军的同等数量的供应，将会有效得多。(7)利用共产党的部队去打这种游击战和破坏日军大后方的交通线，就会使空军能够集中力量去从事其他重要任务，从而减轻空军进攻和破坏从满洲到长江的交通线的任务。

谢伟思的建议，是一位美国官员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中共军队援助最详尽的一份建议。它是客观的、公正的，也是实用主义的，站在美国根本立场上说话的。他希望美国的每一分钱，都能对美国的利益产生应有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胜利，也有助于美国未来的太平洋战略的实现。他显然并不是从中共立场出发的，只不过他的主张客观上和中共的要求一致。所以，谢伟思越是真切地要为美国的利益着想，反共分子们便越是怀疑他是一个亲共分子。

谢伟思主张，可以采取如下方式实现对中共的援助：第一，沉着而坚定地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接受美国援共的政策；第二，在政治上要求国民党实行改革，组织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全国政府分享权力，这个政府必须包括共产党在内，使政府把美国的援助分配给构成国家军队一部分的中共军队。第三，在上述两种方针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把军事援助物资直接分配给中共军队。

谢伟思的这个主张表面看来十分周全，实际上却完全行不通。可以说，他只是从局部上去体现美国的战略，而没有从整体上去体现美国的战略。从整体上说，如果中国存在一个反共政权，比存在一个民主政权对美国更为有利。共产党在中国的崛起，美国是不能放心的。蒋介石虽然腐败，但在反共上与美国一致，这就使美国在总体上感到放心。谢伟思站在美国的局部利益上看问题，因而他的建议不可能引起华盛顿的积极反映，便是必然的了。而关于美国对中共的援助，在随后赫尔利对延安的访问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他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76—279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72页。

迫使中共就范的一张王牌，这就难怪赫尔利毫不介意地把他说过的话又否定掉的时候，毛泽东要大发雷霆了。

综观历史，毛泽东和中共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方面，并不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完全以高度清醒的头脑对待它。

首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不把中共获得美援看成现实的可能，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在蒋介石顽固反共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道理上则必须去争取。因为既然美国的军事物资宣称是援助中国抗日的，那么作为真正抗日的中共军队理应得到它的应有部分。况且这支受到人民拥护、具有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中共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因此，对美国援助作这样的争取，那怕只有一线的希望，为着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也是值得的。

其次，毛泽东把争取美国援助，看做是揭露蒋介石专制独裁，争取国内民主、制止内战的必要措施。蒋介石把美援垄断为己有，不仅共产党的军队得不到，而且连他的部队中的非嫡系也得不到。他用美援武装他的嫡系部队，使其对日本避而不战，却加紧为着将来打内战作准备。美援成为蒋介石实行独裁专制的支柱，实行内战的依赖。“如果美国的飞机不用来轰炸东京、大阪、平、津、沪、汉的日寇，却用来屠杀甘肃、伊盟、贵州、渭南的人民，如果苏联的军火不用来杀敌，却用来武装包围边区的部队，那么，怎能怪盟邦要求中国提出不作内战之用的保证呢？六年来，盟邦将近十六万万美元的借款援助，只不过牵制了敌人十五个师团，并且还天天喊要援助，要军火，要飞机，这不是所谓‘三诀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么？”

毛泽东指出：“问题的中心不在盟国供给不供给军火，而在供给的军火用在什么地方去。”他向美国记者白修德指出，中共并不反对美国向蒋介石的军队提供数量有限的军用物资，但是，假如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二十个师的蒋军，那么蒋介石就会调动这些军队来对付中共。因此，要么美国对国共双方都不供应军需物资，如果美国一定要那样做，那么美国便应以双方对日作战的贡献的比例，把军需物资分配给两方。否则就是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毛泽东强调，在美援问题上存在着必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在美援问题上如果不表明自己的鲜明态度，便不能有力地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内战阴谋，不利于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因此，在美援问题上，我们能不能得到是一回事，要不要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又是一回事。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中国的光明前途而奋斗，不能不警惕和揭露一切危害新中国的危险和阴谋。

再次，毛泽东高度清醒地意识到，争取美援具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不允许中共进行单独的外交活动，它把这看做是危险的事情。中共必须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和美国等盟国建立直接的关系，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外交往来和取得国际的直接援助。而且，外交工作对于中共尚是最不熟悉的工作，但又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争取美国援助的外交工作，有利于锻炼我们外交工作的能力，促使国际统一战线的成功。因此争取美援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最后，在美援问题上，中共提出共产党军队也应当得到援助的合理要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1041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347页。

求，对于美国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检验。美国究竟希望将来中国的前途如何，可以从美援中看到它的立场和态度。美国最终拒绝了给中共抗日军队以援助，实际上帮助国民党进行了内战准备。由于日本战败已近在眼前，美援的反共、反中国人民和反对中国有一个光明前途的性质暴露无遗。毛泽东和中共党人从美国拒绝援助中共的行为中，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这更增强了中共自力更生，坚决依靠自己力量的信心。

三、美国应当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美国在各种国际会议上，把民主政治宣传为战后政治的主流，声称要为战后民主繁荣的世界而奋斗。的确，中国必须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为了明天，它今天就需要民主。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党专制的政府，是中国腐败、黑暗、倒退、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的根源。对于这个独裁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以各抗日阶级的联合政府取代它，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民主。既然美国是中国的盟国，它坚持一贯支持蒋介石的态度，它就应当影响蒋介石的政策，赞助中国实现民主改革。

毛泽东要求美国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促进中国的民主改革。中国要战胜日本，必须集中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动员一切可能动员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和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因此，要实行坚决而广泛的抗战，就必须实现内部团结。而要真正实现全国一致的内部团结，便必须改革政治，实行民主自由。为此，毛泽东向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的根本主张：“我们有三个不能改变的要求：抗日、民主和民族团结。”

早在 1936 年，毛泽东在向斯诺论及中国统一战线时便指出：我们的主张是实现“全中国各党派的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抗战爆发前夕，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

实现国内的团结，实现政治的民主，归根到底必须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但是，在中美结成盟国，美国事实上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发生巨大影响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应当赞助中国的内部团结，运用它对国民党的影响，协助中国人民制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这样做，于共同的反法西斯事业有利，于中国的未来有利，也于未来亚洲的稳定和平有利。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人士宣传中共维护团结和主张实行民主制度的立场。

1936 年，他最早向斯诺提出这个问题。1937 年“7·7”事变之后，他在与海伦·斯诺讨论中国出路问题后，再次得出结论：“全民必须以各种可能的方式组织起来采取行动——其中的一条办法就是讲‘民主’。”毛泽东向美国人民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和民主制度的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便不可能有全民族的抗日热情和要求，也就没有抗日的胜利。

他向贝兰特指出，中国的抗战，还不是“群众战”，这里有一个“团结”的问题，也有一个民主的问题，国民党必须开放党禁，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只有这样抗战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1938 年，他向卡尔逊说，中国应当有“强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118 页。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二版、第 256 页。

大的民主”。1939年，他再次向斯诺提起，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它前进的道路上，第一步就是清除封建主义的残余而实现社会的民主。1944年，他向中外记者团详细谈论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他强调：“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才能走上正轨，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能前进一步。

他希望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之后，他向访问延安的爱泼斯坦具体指出，中共主张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召集国民大会，以成立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人士代表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在会见斯坦因时，他强调，目前中国需要民主，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中国需要内部的和平与民主。在与白修德谈话时，他再次谈到中国的民主问题。毛泽东主张，人民必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他们应当有言论自由、权力自由和出版自由。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反共、反民主的；中国人民理解民主并且要求民主，决心为民主制度而奋斗。

毛泽东向一切美国客人介绍中共关于民主的要求，这是因为他认为民主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没有人民的权力，捆起他们的手足，人民便不可能真正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没有民主，便没有国民党以外的各党各派的发言权，实行一党专政，政治黑暗，中国四分五裂，便不能形成真正的抗日力量；没有民主，便不能清除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中国没有一个完满的民主制度，便不能走上独立富强之路；没有民主，中国的未来将没有希望，即使抗战胜利，人民仍将陷于专制统治之中，中国便依然没有光明的前途。民主与专制是两个对立物，专制是黑暗之母、倒退之母、分裂之母、落后愚昧之母。在人类社会已进人民主时代的今天，中国仍然实行专制制度，这是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不独立的原因、任人宰割和蹂躏的原因。毛泽东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

因此，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

毛泽东向美国客人和官方记者及人士鲜明表示，我们所要求的民主，在现阶段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中共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阶段论者。中共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共认为现阶段既不能实行共产主义，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行民主主义。这是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实际要求。实行民主主义，首先是一个国家制度问题，就是要有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

他向贝兰特指出，这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应具备如下特点：（1）它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小资产阶级在内。（2）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3）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

1944年6月13日《解放日报》。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58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31页。

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毛泽东解释说：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有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

毛泽东强调，建立这样一个体现民主制度的政府，无疑就必须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民主的施政纲领，满足人民的民主要求。在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

这个政府必须给人民群众以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中国必须实行统一，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这个政府必须拥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真正做到“耕者有其田”。

这个政府必须在争取独立的基础上发展工业，要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这个政府必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立自己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争取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与发展，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应得到尊重。

这个政府必须实行独立和平等的外交政策，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

总之，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代表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保证中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解释说，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制度；同时，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制度。它是几个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和孙中山主张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共产党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愿意为之实现而奋斗。国民党口口声声声称他们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但却天天干着反对三民主义的事情，他们是民主的破坏者，是顽固分子。

因此，要实行民主政治，首先必须实行政治改革。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就必须支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只有实行政治改革，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因此，美国应当运用它的政治影响，推动蒋介石放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382—383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二版、第1070页。

弃独裁、反共、内战政策，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对中国内战的政策等等问题。”他认为，如果在战争时期不能实行民主，内战将不可避免。毛泽东要求美国支持一个建议，就是通过召开一次中国所有主要政治集团参加的会议，建立起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认为，美国可以在民主政治方面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行事。毛泽东指出，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所以还能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这样腐败、这样专制和反人民的政府，早就被人民推翻了。美国也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虽然我们要求实行的民主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但是，美国的民主毕竟曾经为我们所借鉴。“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自己的民主传统”。“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的形式极其重要”。蒋介石政府实行的独裁专制是封建性的，朝法西斯发展的，他连美国式的民主都不懂，因而用美国的民主对蒋介石进行启蒙，也具有起码的意义。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已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美国人的问题，它也是对民主的中国人民有最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美国在许多会议和许多国际性的决议中都声称，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和平的国际社会，那么美国就必须认真地考虑：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关心民主在世界上的前途？举例说，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想要使中国政府成为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它是否关心，它所承认的中国现政府没有以任何法律为依据的合法地位，因而，决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美国是否认识到目前国民党已经失掉了中国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一明显的事实？毛泽东要求美国政府认真考虑上述问题，他真诚地希望美国站在真正民主的立场认识它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告诫和提醒美国政府，它们不是在支持民主，而是在支持独裁；美国不是在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发生积极促进作用，而是在阻碍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如果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政府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那么中国的内战将不可避免，中国的民主事业就可能断送。他希望美国不要口头说一套，行动上做一套，切实地赞助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

当然，毛泽东并不对美国于中国民主政治的赞助，抱多大的希望。他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民主改革的赞助必须拿出事实来。更何况民主不是写在协议上就算有了的东西，它必须实际地实行。而实际实行中的民主，不是靠协议规定的，它是靠斗争争取来的。“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共产党人在民主问题是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让美国人士和一切外国人士尽量在解放区了解中共实行民主制度的情况，欢迎他们提出批评和意见。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士一致认为，他们在延安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海伦·斯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46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9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51—25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25页。

诺在延安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平等和男女平等，她骄傲地把妇女称之为“中国革命的半边天”。1939年斯诺再次访问西北边区时，边区的所见所闻，使他深感中共始终坚持一方面力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为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实现社会民主而奋斗。卡尔逊在解放区的亲自观察，使他坚信共产党确实在履行他们的主张：好一点的生活来自发展民主；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的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班威廉、克兰尔在亲自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民众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坚信“该大会是颇足以代表社会的各阶层的”，是“完全民主化的代表大会。”哈里森·福尔曼为了观察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活动，亲自参加了一次边区政府与边区参政会常务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李鼎铭先生主持会议。代表们讨论了形势、造林、计划、教育、帮助军人家属、推行卫生计划以及如何改进司法诉讼等问题。人们坦率诚恳，平等自由，畅所欲言。这使福尔曼感到，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已深深在各阶层中扎下了根。他对边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极为称道。

美联社记者白修德用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指出，在边区人民都有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从选举直到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为止的整个制度，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在这里，过去最没有地位、最受人瞧不起的人，也有权参与政治。“我们发现，替我们记者用本地的毛皮缝一些大衣和上衣的一个熟练裁缝，竟是参议会的议员”。延安抗日会主席过去是汉口的纺织工人。“他还可以请一个曾经被踢、被打、被欺负、而其父亲传给他过去受压迫记忆的农民来，然后，你拿他当人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去选举他当地的政府和治安机关，让他自己去表决减租，让他自己去选择军队和民军”！

连初到延安时对中共抱着很大怀疑的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武道从陕北归来后也肯定地写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种机构，都是由人民选举的。边区政府的主席和其他高级人员都是边区参议员，由参议会选举出来担任他们的职务。共产党员只占政府人员三分之一的原则，看来是严格遵守着的”。

美国人士和外国记者广泛地参观延安和边区之后，他们一致表示：“他们相信延安作战的努力，延安实行民主与全国团结的愿望”。的确，美国和其他外国人士看到了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雏型，他们对中共争取民主的愿望深信不疑。他们都希望美国和盟国政府能够帮助中国，促使蒋介石接受民主改革。

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与美国政策的斗争 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以铁的事实再次暴露了他反共、独裁、摧残民主和进步力量的面目，他一刻也没有放弃把中国死死地笼罩在黑暗政治统治中的企图。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团体实现民主政治改革更强烈的要求。为着抗战的最后胜利，为着战后中国的光明前途，中国必须实行政治的民主改革，蒋介石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必须结束。为此，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73、171页。

白修德：《延安印象记》，1945年5月14日《新华日报》。

武道：《我从陕北回来》，1944年11月1日《新华日报》。

斯坦因：《毛泽东会见记》，1945年9月4日《新华日报》。

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地为争取中国政治的民主改革而斗争。

美国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口头上持赞助的态度。但这种赞助是从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要求出发的。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在欧洲消灭希特勒法西斯只是朝夕问题，在中国和亚洲，日本法西斯的灭亡已无可挽回。在这个转折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美国认为必须积极主动地按它的全球战略安排战后的世界政治。罗斯福预测，战后美英与苏联的对峙无可避免。在亚洲，日本战败之后，中国如果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那将是最危险的事情。但如果中国成为美国可靠而顺从的盟友，那么，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美国便将以极大的优势压倒苏联，从而确保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地位。因此，罗斯福主张，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中美两国政策的紧密合作为基础。罗斯福坚信不疑，只有蒋介石才能充当战后中国的领袖，只有蒋介石政府才能在战后追随美国的政策，成为美国在亚洲可靠的支柱和合作者。因此，援助和扶持蒋介石是罗斯福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但是，罗斯福对蒋介石政府也有种种不满的地方。蒋介石军队在中国大陆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不能为美国在太平洋上的行动减轻压力；蒋介石的军队忙于包围和消灭共产党军队，政治上黑暗腐败，遭到了全中国各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很担心蒋介石的统治摇摇欲坠，不能继续下去，使美国的战略计划落空。罗斯福从美国眼前的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积极抗战；从战后美国的长远利益出发，要求蒋介石政府实行改组，使之具有一些“民主”的色彩，以便在战后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

基于军事和政治的原因，罗斯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谈判，并作出一定的政治改革。毛泽东密切注视美国对国共关系的态度。1942年7月31日，他在与刘少奇的信中，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了如下分析：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邱吉尔“7·7”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毛泽东的估计完全正确，美、英的态度对蒋介石形成了一定压力。

蒋介石深知他和他的政府不能没有美国的支持。美国的要求与他所代表的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本质一致，即使有些差异，也只是策略上的差异。因此，如果需要，在策略上也可以和美国保持一致。基于这种考虑，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表示要在抗战一年后实行“宪政”。蒋介石在演说中宣称：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

对于蒋介石的“宪政”许诺，中共虽然不抱任何幻想，但是中共坚持争取民主的任何机会都不应当放弃。10月5日，毛泽东撰文指出：蒋介石其实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但是，中共却是有诚意的。“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他强调，要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那就必须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会。毛泽东向全党说明，尽管蒋介石方面所谓民主改革，所谓宪政很大程度上只是骗局，只是口头说得好听，但是哪怕其中有一点点可以用于争取人民真正民主

的地方，我们便要抓住它，为民主的实现不懈努力下去。

在中共的主动促成下，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重新开始谈判。毛泽东指示，对于谈判，总的态度是不亢不卑，表示我们是想求和，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对英美派要宣传抗战。

林伯渠等到达重庆后，与王世杰、张治中等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进展。6月5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毛泽东，报告蒋介石绝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今天只是作出谈判姿态给中外看。苏美英人士同我们的看法一致。同时并报告与美国武官详谈两次的情形，指出美国武官目前最关心的是华北、华中敌军的行动。

6月30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董必武，要求将我方谈判中提出的十二条及国府“提示案”，经美国友人密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华于6月20日抵重庆访问），以求其了解中共立场。

7月4日，林伯渠、董必武再次致电毛泽东，报告在目前时局下，谈判绝无解决希望。蒋介石要谈判，不敢公开和我破裂，是故作姿态欺骗舆论，即令谈判破裂，好把责任尽量推在我方。因此对谈判仍不抱任何幻想，而把主要精力用在向各方宣传和推进大后方争取民主运动及调查研究上。毛泽东同意此意见。

当国共谈判处于僵局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向国民党转告了美国总统罗斯福，愿意充当国共谈判的调解人的意向。华莱士向蒋介石说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兴趣，美国的兴趣是进行战争。但是基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达成最低限度的谅解，哪怕国共两党之间的协议“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很差，将很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源。共产党今天所以有权有势，就是他们利用了今天的经济原因。“如果要躲开共产主义，统一必须通过全国人民的福利来表现。”华莱士指出：基于此，美国政府认为，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腾出手来整顿经济，对于美国和蒋介石都有战略意义。同时，华莱士强调，在目前，如果国共两党即使实现“较低水平”的谅解，也有利于北方的力量发挥充分用途。

蒋介石向华莱士表示，他完全领会罗斯福的政策之深远意图，深信罗斯福总统的立场对于中国并且对于推进战争都是有利的，他要求罗斯福知道他也是希望这一问题获得政治解决的。但是，他担心罗斯福听信了中共的“宣传”。他说：中国共产党人“确实在企图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人比俄国共产党人还更加共产主义化”；“罗斯福总统应该记住，共产党人是不能公开使用苏联来为自己撑腰的，他们能够而且的确做了的是利用美国（的意见）来强迫国民党答应他们的要求。”如果美国政府能对中共保持这样的警惕，他便答应罗斯福在国共之间扮演一个调解人的角色。

从内心说，蒋介石是欢迎美国进行调解的。他深知美国在反共问题上与他完全一致，不会出卖他。他可以借此捞取一笔政治资本，把美国调解的一

转见《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66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30页。

《华莱士副总统与蒋介石主席谈话记录摘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578—579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76—578页。

切不利后果统统推到中共身上。为此，蒋介石请华莱士向罗斯福口头转告他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中国共产党问题是国内政治问题，不过他还是愿意取得总统的帮助。他不会认为总统的协助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但是，他事先警告说，谈判总是由共产党人来破坏的，这样总统会由于共产党不遵守委托而受到责备，总统的威信会受到极大的损失。蒋介石欲盖弥彰地表明了他不会使调停成功的企图。

9月14日，罗斯福电复蒋介石，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与中共之间预先取得协议，具体布置如何在华北有效地对日作战，这将是他希望看到的。8月10日，罗斯福写信给蒋介石，提出派赫尔利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到蒋介石处，以调整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关系；派纳尔逊偕赫尔利到中国，以处理租借物资与其他经济事务。

赫尔利、纳尔逊来华途中绕道莫斯科。赫尔利在那里拜访了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得到了苏联决定支持蒋介石的保证。9月6日，赫尔利、纳尔逊在史迪威陪同下，由印度飞往重庆。

赫尔利此行要实现罗斯福的战略，他要使中国共产党由于得不到莫斯科的支持和看到美国的友好表示，不得不与国民党实行妥协。他一开始便形成了两个看法：一是蒋介石比实际更有力量，二是由于俄国共产党站在蒋介石一边，中共迟早要向他磕头。赫尔利在一份电报中概括他的来华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很显然，赫尔利的这五项使命，体现了罗斯福政策的基本要点：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政府，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解决国共关系问题。

毛泽东对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来华调解国共谈判的用意，有透彻的了解。他在一年以后曾指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毛泽东看到，美国的利益仍然需要中国暂时保持国内和平，这对减轻美国的压力将会很有益处。但是毛泽东仍然欢迎美国的调停。他希望美国在制止国民党内战企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希望美国在促使国民党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客观上促进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因此他对赫尔利使华的基本态度是：

第一，欢迎赫尔利对国共谈判进行调停。他把赫尔利作为反法西斯盟国的使节来欢迎的。虽然对于赫尔利其人的情况毛泽东并不了解，但是他希望赫尔利能在促进蒋介石政权进行改革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鉴于此，9月10日，赫尔利刚到达重庆，朱德便写了一封信给赫尔利，邀请他到延安访问。这封信由迪克西使团团团长巴雷特带回重庆。这个邀请，显然包含了毛泽东的最后决策。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决定和赫尔利谈判的。9月12日，毛泽东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与赫尔利、纳尔逊进行面谈，并提出中共的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2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3页。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

《抗战后期国共谈判资料（上）——赫尔利使华报告选译》，《党史通讯》，1984年第7期，第4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14页。

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25日时评：《从六人被捕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

要求。10月17日，林伯渠、董必武按毛泽东的指示，与赫尔利就解决国共两党关系，立即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谈，到23日已举行了三次会谈。上述事实表明，毛泽东欢迎赫尔利在国共谈判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毛泽东决不因为美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或利用苏联施加压力便放弃原则立场。他提请赫尔利看到，中共对于谈判是有诚意的，但绝不是无原则的、可以利用的。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10月23日，谢伟思向赫尔利报告他在延安了解到的情形：共产党人正在变得很强硬和坚决，并且对他们认为是本质的东西不会作出让步。谢伟思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准备在和赫尔利谈判中的原则立场。这种原则立场坚定而不可动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毛泽东都会坚持到底。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调停的态度便是如此。但赫尔利从实用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对他人颐指气使的惯例出发，认为只要给毛泽东一点甜头，例如答应给中共军队以美援，毛泽东便会采纳他的条件。他很自信地向谢伟思说：“不用发愁，我会把双方撮合到一起。他们（共产党人）将会得到美国武器。那正是我在这里所致力。……我对这种事情是有经验的。我知道事情会变得棘手，但是我过去做过这种事情。”

赫尔利在调停国共和谈时，一开始便打错了算盘，他不了解毛泽东，甚至轻视毛泽东。他把毛泽东看作一个无原则的人，一个能够屈从于邪恶意志的人，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说到毛泽东时，他把他读为“摩斯东”。他的狂妄和轻率，使在重庆的美国人送了他一个“纸老虎”的绰号。

赫尔利信心十足地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奇迹，完成罗斯福给他的重托，使中共屈从于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因为赫尔利对他的全力支持，赞扬赫尔利是调解国共关系最合适的人选。他电告罗斯福，要求给赫尔利较长时期的使命和更广泛的权力。罗斯福出于对赫尔利的信任，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11月27日，罗斯福向参议院提请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12月15日，国书还未到达，赫尔利便在重庆宣布执行大使职务。他急不可耐地要在国共调停中露一手。“他的想法是：如果双方举行一次会谈，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既能阐明他自己的观点，又能创造一种使与会双方互相让步的友好气氛。

此时，美国正在大选，赫尔利访问延安的计划一直不能执行。但他派助手麦克纳利去了延安做准备工作，在重庆他也做了协议起草的准备工作。他告诉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他已为中国解决了中美邦交中很困难的问题，现正试图解决国共关系。他还说，21日蒋介石送给了他一个方案，他考虑中共不能接受，已当场退回，蒋现在正起草新方案，待他看后带去延安。他竭力要使毛泽东和中共相信，他赫尔利是公正的、不偏不倚的。

10月28日，赫尔利和蒋介石完成了协议草案。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罗斯福连任总统。赫尔利去延安的国内顾忌已经消除，加之赫尔利得知苏驻重庆代办已同蒋经国接触，谈及斯大林有可能同蒋介石会谈。赫尔利认为，这似乎表明苏联将不会支持延安。在这样的压力下，他访问延安将会使形势非常有利。在取得罗斯福同意后，赫尔利带着由他起草的协议草案，

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第178—179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第249—250页。

偕同林伯渠飞往延安。

赫尔利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此行他并未事先通知延安。客机到达延安机场时，照例由周恩来和美军迪克西使团的包瑞德上校前来迎接。当赫尔利身着考究的军服，胸前挂着缀满勋章的缎带出现在舱门口时，周恩来问这个人是谁？包瑞德回答：这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少将。这个意外，使周恩来急忙向城里赶去。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集合起来坐进毛泽东惯用的那辆为战争毁伤了的救护车，在乱石路上向机场急驰而去。在机场跑道上，中共领袖热情诚挚地欢迎了这位美国的大使。

毛泽东和赫尔利的生活经历似乎有相同的地方。当他们的救护车在滚滚泥尘中颠簸前进时，他们遇到一个牧童赶着一群牛羊路过。赫尔利说，他少年时也是一个牧童，懂得牲畜的习性。毛泽东回答说，他年轻时也放过羊。他们的车经过浅浅的延河，河水浅得可以涉水而过。毛泽东说，这条河夏天水涨，冬天水涸。赫尔利便回忆起俄克拉马州及其干涸的小河来。他说，在夏天河流是那样的干枯，简直可以根据河里激起的飞扬的泥尘就能判断鱼群什么时候在向上游动，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轰笑。

毛泽东给了赫尔利很高的礼遇，当天晚上延安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赫尔利成为宴会的上宾。但是，他情绪激动，张牙舞爪，不时发出“耶呼”的印第安人的吼叫声，这个不合时宜的吼叫，使毛泽东对他产生了轻蔑之意。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开始与赫尔利进行会谈，双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赫尔利一开始就提出了他和蒋介石事先共同拟定的五点方案。赫尔利对毛泽东说：他作为总统的个人代表到延安来，是要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他声称：蒋介石同意派一个美国调解代表团来促进民主，并“通过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来加速打败日本的步伐。他宣布，他带来了蒋介石的建议，就是给予中共合法政党的地位，共享由租借法案而得来的美国物资，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之地；条件是中共将其军队及其全部地区交由蒋介石指挥和支配。

毛泽东问赫尔利，这五条代表了什么人的思想？赫尔利说：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的思想，不过是我们大家制订出来的。包瑞德告诉他：毛主席是想知道委员长本人是否同意所提出的观点，赫尔利说，已经同意了。毛泽东声明，蒋介石的主意便是要中共把军队和人民交给蒋介石这样腐败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中共将是向蒋介石和国民党分食的客人。毛泽东便对国民党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和指责。

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正是国民党顽固地拒绝与中共妥协，因此阻挠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为了实现民主与团结，中国必须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为此目的，现政府必须改组。毛泽东强调，蒋介石决意拖延政府改组，直至击败日本之后，如果情形如此，结果会造成政府崩溃。毛泽东进而指出，国军已经失去战斗力。在195万大军之中，77万9千人用来监视共产党。而在最近所有对敌战役中，士兵都溃不成军。赫尔利为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作辩护，并对毛泽东进行指责。毛泽东有力地回击说：“将军，我所说的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话，罗斯福总统、邱吉尔先生、孙科博士和孙中山夫人都说过的。你认为这些人士是中国的敌人吗？”赫尔利转换话题，宣称蒋委员长愿意在中国军队的最高管制机构——国民军事委员会中让中共占有一个席位，这是他有意与中共达成协议的明证。

毛泽东指出，全国军事委员会很少开会，只不过是一个由失意军阀和各省将领组成的、用以装点门面的机构。中共绝不会为了在该委员会中取得一个席位，而解散中国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和撤销最有效率的政府。赫尔利说，这个协议将使你在大门里有一个立脚之地。毛说，假如你被反绑着双手，即使走进了大门，又有什么用处呢？毛泽东的话使赫尔利不禁大怒，他说毛氏是在重复中国的敌人的宣传。毛泽东毫不让步地指出，他能说的只是大多数有见识的中国之友所早已知道了的。赫尔利则竭力为蒋介石辩护。

在会议中，赫尔利灵机一动，提出一项解决难题的建议，他说他乐于考虑共产党认为合适的解决问题的条件，欢迎中共提出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草案。第一天讨论便这样毫无结果，宣告结束。

在当天的会谈中，赫尔利拿出的在重庆拟就好的协议草案，其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守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

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官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

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赫尔利带来的这个协议草案，侈谈什么“民有、民治、民享”，中共军队将得到“平等待遇”，中国共产党将得到“合法地位”，中国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等等，但它的要害却是中共和中共军队将完全置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首先，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国政府，把国民党与中共的合作，等同于政府与中共的合作，这就在实际上肯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取消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平等地位。其次，由于赫尔利把国民党等同于中央政府，他提出中共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便变成了遵守和执行国民党的命令。这样便把中共军队置于蒋介石国民党控制之下，这便是他强调的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的实质。这是蒋介石用武力一直办不到的事情，赫尔利企图用一纸协议办到它。最后，协议草案宣称“中国政府”将承认中共和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而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这句话实质就是说，中共和其他政党承认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国民党便承认中共和其他政党合法。赫尔利和蒋介石绕了几个大弯子，说出了他们想要说出的话。

毛泽东针对赫尔利五条的要害提出批评，双方再次进行了长达两天的讨论。9日，毛泽东和中共提出建议草案。毛泽东提出：国共两党必须通力合作，打败日本，复兴中国；建立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联合政府，建立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联合政府应成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提倡进步，民主与自由；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应承认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公平合理分配军援装备；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赫尔利认为他需要一天的时间把协议措辞进行修改。

从 9 日晚上到次日凌晨，赫尔利对共产党的建议在措辞上再三进行修改。在 9 日下午第三次会谈中，赫尔利专门问了毛泽东：国民党是否还留在新的联合政府里？是不是还让蒋介石当领袖？当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表示满意和欣慰。他认为，只要蒋介石还保持原来地位，把共产党军队控制起来就有绝对的把握。这个草案对蒋介石是有利的，它是“使共产党签订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

双方经过反复讨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判是艰难的，但双方的态度都是友好的。赫尔利在谈判中将双方的分歧，电告罗斯福，得到了罗斯福的指示。经过反复讨论，双方共同达成如下五条：

一、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此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毛泽东与赫尔利新达成的协议，其根本要点是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区别开来，把国民党与共产党及其军队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处理问题。赫尔利主张毛泽东立即赴重庆和蒋介石会见。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后能安全地回到延安。”“不管毛主席、朱总司令或周副主席，无论哪一位到重庆去，都将成为我的上宾，由我们供给运输，并住在我的房子里。”接着他建议毛泽东在协议上签字，并表示他也要签字，题目定为《中共与中国政府的基本协议》。

当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当天讨论的文件，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文件上签字。11月10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毛泽东与赫尔利在王家坪对协议进行了草签，赫尔利签了字，然后毛泽东签上了个人名字，赫尔利将把草签协议带回重庆交蒋介石签字。

赫尔利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并非他个人的行动，是得到罗斯福同意的。美国方面不是不懂得延安草案和重庆草案的原则区别，但认为暂时消弥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共的分歧，签署这个协议还是值得的。特别是赫尔利更是如此。

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转见马芷荪：《赫尔利的来华与一九四四年国共谈判》，《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1期。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638页。

他相信蒋介石在未来不会吃亏，总会有办法迫使中共按美国的意志就范。正如马歇尔指出那样：“赫尔利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但他相信，一旦共产党确知苏联不支持他们，而且两党都签字承认他坚持写进他大部分建议草案中的“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原则，那么共产党是会屈服的。”正是基于上述想法，赫尔利和毛泽东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托赫尔利把协议转交罗斯福，并致信罗斯福，肯定赫尔利在延安的工作，指出协议的精神和方向，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他感谢罗斯福总统“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中国成为可能”所作的巨大努力，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着历史传统深厚的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在重建世界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11月10日协议签订之后，赫尔利也致函毛泽东，对毛泽东和中共的诚挚合作表示感谢。信中说：我感谢你的光辉合作与领导。这种合作与领导表现在你率领你的政党提出的协定上，这一协定你已授权于我带给蒋介石主席。我同样感谢你让我转交美国总统卓绝的信件。赫尔利接着写道：阁下，请信赖我对于你用以解决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的智慧和热忱的品质，深感愉快。你的工作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的胜利的贡献。这一光辉的合作精神，不仅将继续于战争的胜利中，而且将继续于建立持久和平与重建中国的民主时期中，这是我们的恳切愿望。

赫尔利满怀信心回到重庆。他得意地把五点协议草案交给宋子文。宋子文和蒋介石研究后，断然拒绝了草案的内容。赫尔利为了说服蒋介石接受协议，和蒋介石举行了三天会谈。他要蒋介石相信，协议虽然强调了中共与国民党将建立联合政府，但中共由此将交出军队，以“政治让步”来换取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这样的交换条件是值得的。而且在协议中作出一些“民主”之类的承诺，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蒋介石却不这样认为，他不能给中共任何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实。

11月17日，蒋介石提出了三点反建议，这三点建议实质是：第一，取消中共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党指挥控制的军队。建议说：应“将中国共产党之武力，于改编后收为国军之一部分，此后该共产党在武力，在薪饷、津贴、军火及其他配备方面，即取得与其他部队之同样待遇。”第二，中共交出部队后，可以有少数人到国民党组成的军委会中去做官。建议说：中共将所有军队“交由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国民政府愿就中国共产党之高级军官中，遴选参加军事委员会。”第三，中共必须拥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建议说：“国民政府愿遵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并经中共共产党表示拥护之三民主义，创设一民治、民享、民有之中国政府。”这三条反建议，老调重弹，与延安协议草案针锋相对，表明了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溶共立场。

赫尔利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11月22日，国民党的三点反建议交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毛泽东在周恩来的电报上点穿了此案的要害：“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周恩来在彻底了解

《马歇尔使华》中华书局，1981年，第6页。

1944年11月10日毛泽东主席致罗斯福总统函。

了国民党毫无诚意之后，决定返回延安。

12月2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来电的三点意见转告了赫尔利：第一，政府三项与延安五条距离太远，我们认为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是解决目前时局问题的关键。这既不能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因此无法挽救危局。第二，国民党的态度至今不变，梁寒操三天前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中国目前所需只是军令统一，党派合法问题须留待战后一年再讲。第三，根据目前形势，我党中央必须召开会议，再行讨论，因此他将留在延安，不再来重庆。

12月7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巴雷特同机返回。12月8日，周恩来给赫尔利一个电报，表示坚决反对三点建议，并指出，为了促使蒋介石改变态度，有必要公布五点协议的内容。

毛泽东对赫尔利的背信弃义表示愤怒。巴雷特向赫尔利报告说：毛泽东质问为什么美国人在五点建议中提出了希望真正联合的问题，然后又要求延安接受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来“捆住自己的手脚”？美国人是否把共产党人当作傻瓜？延安不是一只篮子，要靠别人发善心给予施舍。如果不可能实行联合，那么共产党人就要采取行动，另外建立一个中国政府。毛泽东并且对巴雷特说，如果美援到不了手，延安还可以向英国或俄国要嘛。

毛泽东的愤怒，是对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的一个抗议。他决心使中共不受任何外来力量摆布，坚决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但是，中共和毛泽东具有远大的眼光，毛泽东并不因赫尔利背信食言的行为便把中美关系看死。他指出，不管同国民党人的政治决斗结果如何，共产党人和美国政府也许仍旧能够通过军事合作来挽救他们的关系。共产党人愿意在联合军事行动中进行合作，而且愿意与美军并肩战斗。因此，毛泽东和中共并没有把国共谈判的大门关上。

11月21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赫尔利和包瑞德对国共谈判的意见。12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给王若飞一指示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谈判代表对于赫尔利的面子要给予应有的照顾，中共对谈判是有极大诚意的，但决不丧失原则立场和要求。

毛泽东说：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议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尔利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上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至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毛泽东指出，中共对美国的调解抱诚挚合作的态度。但是，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买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12月16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复电赫尔利，表示中共为了照顾赫尔利的处境，可以同意不公布五点协议，但在适当时机还是应当公布的。就是说，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周恩来明确指出，谈判的基本困难

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77页。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97页。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年），第641页。

就是国民党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和接受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

12月21日，赫尔利再次致电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去重庆谈判。他说：他相信循着共产党建议的一般原则的成功机会，将“较以前任何时候光明，设若他再来重庆”。赫尔利认为，他有可能说服中共和蒋介石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协议，例如，让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有充分的代表，实现军队统一等等。

但是，毛泽东头脑清醒地看到，中共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席位那怕增加几个，也不能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性质。联合政府不成立，一切统一军队的做法无异乎就是取消中共的军队，将其统编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因此，他对赫尔利的建议断然拒绝。12月24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指出：周恩来在从事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使他很难离开延安。毛泽东强调：国民政府并未表示充分诚意，以保证在五点协议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为此，他提议在延安举行一次会议。

12月28日，周恩来也致电赫尔利指出，共产党不愿在接受他们提议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讨论。因此，中共提出如下四条作为代替，以检验国民党“是否决心实行民主与团结”。这四点是：（一）释放一切政治犯；（二）撤退包围边区及袭击新四军之国民党军队和华南反共纵队；（三）废止一切限制人民自由之压迫性法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

赫尔利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电报后，与蒋介石和宋子文等进行了磋商，蒋介石方面断然拒绝了中共新的建议。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函复毛泽东和周恩来，声称中共的四点建议，“与我们原来同意在一般原则上获致协议后才谈及特殊细目之程度”相左，因此不应予以讨论。赫尔利企图利用程序问题来否定中共的四点建议，再次表明他的立场，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立场。赫尔利并建议，在得到蒋介石认可后，可以由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赴延安作一短期访问，当面讨论问题。如果在延安期间能达成原则上的协议，毛泽东、周恩来可以和上述代表团一起返回重庆。

1月11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答复他的建议说：他对于在延安举行两党会议的提议深为重视。但他觉得在那里不能获得什么成就。为此，毛泽东提议，在重庆召集一个筹备会议，以筹备“国是会议”之召开。该筹备会议要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会议的议事录要公布；代表们要有平等的地位和行动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设若国民政府认为这些建议可以接受，周恩来便可来重庆谈判。

1月20日，赫尔利在得到蒋介石认可的情况下，致函毛泽东，概述在国民政府计划中的某些变更。赫尔利说：此项办法和国民政府已经提出的其他办法，可能都不足以使中国共产党满意，但是我认为，设若对这样影响巨大的政府建议，不经适当考虑便予以拒绝，将为一憾事。作为一个中国的朋友，我建议你派遣周恩来将军或任何其他你可以选择的代表，赴重庆作一短期访问，俾与政府商谈问题。商谈需时不长，设若他忙的话，两三天就已足够。1月23日，毛泽东致电赫尔利说：周恩来正被派往重庆谈判。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4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45页。

1月24日,周恩来到达重庆后,与赫尔利和蒋介石政府谈判代表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举行了一系列会谈。25日,赫尔利告诉周恩来:昨晚他和政府方面商谈,除去去年11月21日提出的三点建议外,准备再加上:“行政院之下,设立新机构,等于外国所说的战时内阁”;“成立由美国军官一人,国民党一人,共产党一人组织之整编委员会”;“为共产党军队设一美国军官作总司令,又设副总司令一人,由共产党员任之”;“整编委员会成立国民政府即应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周恩来对赫尔利的四点当即拒绝。

赫尔利和国民党的上述所谓“四项建议”,是在用军事委员会委员的空头席位引诱中共放弃军队失败之后提出来的。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再用所谓“战时内阁”的席位,来引诱中共放弃军队。蒋介石和赫尔利懂得,抓住了中共的军队,就赢得了一切。

毛泽东和中共再次看透了所谓“四项建议”的用心。周恩来重申,当初在延安议定最初的五项协议时,他与毛泽东就已经向赫尔利表明了立场:虽然共产党准备在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废止,和政府已经改组为代表所有党派的联合政府机构时,将它的军队指挥权转交国民政府,但中共军队指挥权绝不能交给国民党。而且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改编军队,绝不能只改编中共军队,全中国的军事部队均应改编。因此,首先必须解决一党包办的问题。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答复表示满意。28日,他函电周恩来说: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我们不赞成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还不可能,对于国民党、赫尔利的错误主张和无理要求应进一步驳斥,并应将其意见转告民主党派以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同时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四个补充的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的军队,尤其是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赫尔利在中共拒绝了所谓“三点措施”之后,继续与蒋介石商量诱使中共就范的办法,蒋介石则恼羞成怒,大肆攻击中共。在一次蒋介石、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参加的会议上,蒋介石攻击共产党事实上不是一个民主政党,而它之所以自称民主,仅在于获取国民政府之行政权。赫尔利向蒋介石献策说,蒋介石应当用一点“政治让步”,来“获得共产党军队的控制权”,这是中心的目标,为此必须继续谈判,不要“丧失宝贵的时间”。蒋介石接受了赫尔利的劝告,指示王世杰与周恩来草拟一项“能够行得通”的建议。

2月2日,周恩来把他起草的一个关于党派会议的协议草案交给王世杰,草案提出:党派会议应包含国、共和民盟三方代表;有权讨论和解决结束党治,改组政府,起草施政纲领;保证各代表有平等的地位和来往自由等。王世杰也提出他所草拟的关于政治咨询会议的方案,竭力回避改组国民党政府的问题。双方再次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2月13日,周恩来由赫尔利陪同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然明目张胆攻击中共主张的联合政府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这就彻底否定了中共的合理建议。赫尔利也明确表示美国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立场。2月15日,赫尔利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命令支持中央政府,并且我将尽我最大的可能这样做。”至此,赫尔利撕下了调停国共谈

转见金冲及:《周恩来传》第582页。

《中美关系文件汇编》(一),第147页。

判中间人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暴露了他支持蒋介石反共和反中国人民的立场。毛泽东肯定赫尔利已经走到尽头。他指出：断然拒绝赫尔利，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鉴于此，2月16日，周恩来飞返延安。

2月中旬，赫尔利就他调解国共关系的过程，向美国政府作了总结性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诬蔑中共“与其说在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不如说要推翻国民党之统治，获取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一党统治。”他美化国民党是一个极重视民主的党，“国民党亟欲产生一部制订的民主宪法，还政于民”。他认为，美国坚持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我深信我们的政府，在决定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领袖地位方面是对的。我没有同意过或支持过我认为将削弱国民党政府或蒋介石的领袖地位的任何原则或任何办法。”

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共掀起了一场舆论攻击。他向记者宣称，中共从未要求军事援助和政治承认。他暗示，国民党拒绝中共参加联合政府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接着把中国共产党人和各式各样的分裂主义运动以及颓废的军阀派系混为一谈。

毛泽东对赫尔利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中共的造谣中伤感到无比愤怒。他在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指出：“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卑鄙行径进行了尖锐指责。他说：赫尔利四日宣告不承认我们，他说共产党向他要武器，这个帐要清算，看谁讲的。他要送，我还不一定要哩！毛泽东回顾赫尔利在国共和谈中的种种表演，指出赫尔利始终以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派头在中国颐指气使，给蒋介石撑腰打气，企图做中共的太上皇。在他的支持下，“在蒋介石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的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一贯处心积虑企图消灭中共军队。1944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在最近一次谈判中，在赫尔利的支持下，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驳斥蒋介石和赫尔利说：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一），第14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版，第1111页、第111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10—1111页。

你们叫共产党交出军队，就给共产党以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 1924 年至 1927 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民主党派也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蒋介石和赫尔利说“军队是国家的”。但是，是什么样的国家呢？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就将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毛泽东强调，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空发议论。

赫尔利在重庆时，曾向周恩来表示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周恩来回到延安后，2 月 18 日，致电赫尔利表明中共的严正立场。他指出：“当我在重庆时，你曾告诉我，派赴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中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代表，我党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作了更进一步的考虑，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应限于代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代表团的人数中其余三分之二应由共产党和民主同盟选派。只有这样才能公正地代表中国人民的公意；不然该代表团便不能处于代表中国的地位，解决任何问题。”

赫尔利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背义食言。在离开重庆后的第二天，2 月 20 日，他电复周恩来，声称只有蒋介石才被承认为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的合法代表，中国代表团的其它人员，只能由蒋介石选定。他并且以轻蔑的教训的口吻要中共认识到：“在旧金山举行的会议是一个国际间的会议，而不是各个国家国内的政党间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并非一个国家，并且如我所知，没有国家承认它是一个国家。”“会议上承认国民政府以外的中国武装政党将毁坏中国统一的可能。”赫尔利在中国共产党参加联合国会议问题上横蛮干涉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府决心扶持蒋介石到底的立场。

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企图由它们来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帝国主义政策，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尖锐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抗战还没有最后胜利，但中国的政治形势已被赫尔利——蒋介石推到了内战的边缘。赫尔利——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如不被制止，中国便要陷入内战的深渊。为此，他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指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他警告美国政府中那些决定政策的人们，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

6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对美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600—601 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600—601 页。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2 版，第 1085 页。

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激烈批评。他说：“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7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访问延安的美国民主联盟的两位代表时，他再次表示了同赫尔利代表的反动政策作斗争的决心。他说：我这几条烂枪，既可同日本人打，也就可以同美国人打，第一步我要把赫尔利赶走了再说！毛泽东庄严地声明：“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赫尔利的所作所为，“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了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相处的共同利益。”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告诫全党，在美国问题上要奉行有区别的政策。“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他要求全党看到，即使是美国政府明显地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人民仍然是要求和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

赫尔利使华，始终肩负着确保蒋介石国民党在中国的反动统治的地位的使命，他的全部活动围绕这个中心展开。无论他作何种表现，始终反映了美国政府的基本立场，他总是坚持把美国政府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这就不能不激起毛泽东对美国这一政策的坚决抵制，对赫尔利出尔反尔的行动进行坚决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在与美国政府的这一斗争中，不仅捍卫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也发展了由他和中共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他更加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那就不怕中外反动派的阻挠，一定能够最终搬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

“七大”之后，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再次总结和赫尔利谈判的斗争经验。他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会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的！”毛泽东对赫尔利和美国人士的威胁表示极大的蔑视，肯定中国人民不但不怕这种威胁，而且必须把这种威胁坚决顶回去。

毛泽东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2页。

〔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00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3页。

战争的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迫在眉睫，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未来怎么办的问题。蒋介石从各方面策划着内战的准备，企图在抗战胜利之后，把内战的灾难重新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不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决不罢休。毛泽东和中共却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大业着想，力争在战后能与国民党合作，建立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着眼于未来中国的建设，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战后与美国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合作的设想。

战后中国的建设问题，是经常萦绕在毛泽东头脑里的大问题。近代中国在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蹂躏下，破败不堪，国家极其落后，国力极其衰竭。落后就要挨打，国家的落后现状，又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陷入社会沉沦的恶性循环之中。它要强大起来，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必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制度外，还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振兴。只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才能保证政治上的自强自立。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基于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必须结束几十年的战争动乱，迅速走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和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阐明中共对战后中国的看法，指出战后中国必须在民主政府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走工业化的道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为根本目标，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行建设，这是中国民众盼望已久的事情。这就是说，中国一切进步的政党、团体都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中心。在这个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将从根本上代表民众的利益说话办事，将致力于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工业化，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工业化问题上也有两条路线。国民党也主张实现工业化，但是它所说的工业化，完全以建立国防工业为主要目标，目的在于用枪杆子巩固它的反动政权。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业化，一个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一个代表了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个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一个要发展反动势力的力量，进一步把中国引向黑暗。中国人民必须争取前一种工业化，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

搞工业化建设，也必须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去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既包括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又包括坚持走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并不盲从苏联的或美国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希望谢伟思向美国政府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清醒的党，决不会盲从行事。他说：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针。我们接受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它的思想方法，它为我们提供结论和奋斗目标。但因此而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

的那个社会（19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全部移置于中国，这不仅是滑稽可笑的，而且也违背我们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立场，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又将不同于美国的道路。

毛泽东向美国人士介绍了中国工业化的设想。中国的工业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特色。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它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政治经济独立。中国在独立之后，其经济基础是很薄弱的，因而它不可能马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只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我们自己必须首先摆脱半封建主义。然后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政治阶段和自由企业来提高我们的经济水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搞一段资本主义经济，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发展，有利于建设国家较牢固的经济基础，既符合人民利益要求，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将恰当地对待资本。恰当地对待资本是一件互利的东西。这不但适用中国资本，而且也适用于外国资本。私人资本必须得到广泛、自由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发展工业，我们要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去取代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原则。我们应该用发展现代工业，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的政策，去代替限制工业发展、恶化农民生活条件，以致导致他们对生产失掉兴趣的政策。我们预期，取得土地以后的农民，对提高生产会更加关心。毛泽东说明，正因为中国的经济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因而中国不会也不可能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当前是不适合中国的。

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又必然不同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中国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也能获得发展的便利，这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但和美国和西方那种垄断资本主义操纵国计民生的模式，又是完全不同的。毛泽东说：“我们不会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因此，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又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决定我们不但需要自力更生，而且需要外援和对外的经济交流。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十分必要的，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也是互利的，它将有助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

毛泽东分析，战后在和平民主与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将大规模地争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4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5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060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第327页。

取外援，发展与外资的合作，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到来。他认为在所有这些合作中，中国与美国的合作将占首要的地位。“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这是由于：

第一，中国虽然和苏联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是在战后苏联要在经济上大规模援助中国却很困难。这是因为：首先，苏联不论参加远东战争或者中国战后建设，都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俄国人在战争期间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不指望能得到俄国的援助。其次，国民党由于其反共顽症，是反对俄国人的。因此，国民党——苏联合作是不可能的。不管怎样，即使国民党要求，苏联的援助也是不大可能的。而对于共产党来说，寻求苏联的援助，只会使中国的局势更糟。更会激起国民党的反共情绪。因此，中国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不会把眼光主要地集注在苏联上。

第二，中国和美国却能够在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经济合作。这是因为：首先，这种合作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中国，是一件互利的大事。中国的统一和发展，将对远东的稳定起作用，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所有在远东有利害关系的国家，都将发生重大影响，中国问题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有重大的关系。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同情、理解和互相关切的纽带。两国人民都热爱和平，这是合作的强大基础。其次，中国战后最急需的是发展经济。它缺乏独自发展经济所必须的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自己的生活水平是如此之低，不能再进一步压低来提供所需的资本。因此，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因其特殊性，在发展经济中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利益，是互相关联和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交织在一起。因此，美国无须害怕我们不愿意合作，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再次，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合作，不会造成剧烈的竞争。美国不必担心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对它造成威胁。相反，美国和中国将在经济上造成彼此互为补充。这是因为中国不具备大规模重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它不可能期待与有高度专业化制造业的美国相竞争。美国的重工业和这些专业化的制造业，需要有一个出口市场，它也需要为它的资本投资寻找出路，在这方面中国能够满足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建设的重点还不在于重工业而在于轻工业。中共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必须建立起轻工业以供应市场。中国首先应该大大发展轻工业，消费品工业和交通通讯系统。再渐进地、慢慢地建立起一个重工业基础。按照这样的计划，它将能够向其他远东国家供应这类货物。它可以用原料和农产品帮助偿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贸和投资。美国将在这种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最后，中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不会伤害别的国家，例如不会引起苏联的不满。中国同苏联保持亲密友好关系是必需的，但这种关系不牵涉美苏利害关系问题。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也不是针对苏联。苏联欢迎看到有一个独立、民主的中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0 页、第 327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59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50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0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327 页。

国出现。基于以上理由，毛泽东认为，战后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实行亲密合作将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强调，中美在经济上的合作，将有利于中国完成民主革命的根本目标，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毛泽东说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扫除封建剥削制度，实现彻底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的完成，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指出，“耕者有其田”，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中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转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不仅如此，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根本措施。日本走上法西斯道路，就是“因为它寻求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工业化，所以它被迫奉行帝国主义和侵略政策。它没有从解决国内农业问题入手”。国民党也根本不愿意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还企图“全力贯注于建立‘国防工业’”。结果“今天就有了这个奇特的封建法西斯联合体——国民党。这是国民党无力摆脱的背景和特征。”

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曾公开表示，中国应当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的助手曾当面建议蒋介石进行土改。毛泽东为此向谢伟思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因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得到土地的农民将为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市场。华莱士以及其他政治家和作家（例如《纽约时报》的艾金森——最近发表的《论中国农民》的文章），表明清楚了解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在土地问题上，中共和美国有可能取得某种合作。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只是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可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

毛泽东认为在社会变革中，如果能实现和平过渡，那当然是十分理想的。在民主革命阶段，许多改革，都要争取和平转变。1938年他在致范长江的信中说：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中国的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在战胜外敌与建设民中国的阶段之内？1944年，他在会见斯坦因时，曾设想采用和平过渡的方法来实现土地革命。他说，在民主制度下，会有办法去考虑所有制的和平、逐步转变的。譬如说，地主也许能够把资金转移到发展工业上去。重要的是，我们能够设想出种种对双方都有利的办法。当然，没收土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为它取决于国内和平。毛泽东认为，如果蒋介石发动内战，那么，伴随内战而来的，便是群众自己起来彻底没收土地。因此，实现国内和平，乃是有可能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和平过渡的前提。毛泽东实际上认为，美国从经济合作和远东局势稳定发展的角度考虑，应当和能够支持中国国内和平以及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这对于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会是有益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设想，完全不受苏联经验的限制，也不受现成理论的限制。但是，又坚定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8页。

伊·卡恩：《中国通》第140页。

不移地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方向，充分表明了他在理论上的创造性、灵活性和坚定性。

毛泽东发挥 1936 年他在与斯诺谈话中表明的中共对外经济政策，突出强调中美在战后的经济合作，将会为两国的合作开辟美好的前景，中国将把利用外资作为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一条正确道路；中美在经济上的取长补短将会给各自带来巨大的利益，它对于远东的安全与稳定，世界的和平和发展都有好处。毛泽东向谢伟思表示中共与美国真诚合作的立场说：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并且将来仍然是扩大合作的政策。它必须是这种政策，这是因为，共产党做的任何援助美国军队的事情，都将有助于赢得战争；战后中国需要美国的援助。当然，美国是否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友谊。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战后中国与美国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很快因美国采取完全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而丧失了实现的可能，但是，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设想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首先，它表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考虑未来新中国如何处理对外国家关系，包括和美国的关系时，已经有了坚定不移的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坚持独立自主的根本前提下，必须而且应该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和其他一切国家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包括和美国那样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既是对近百年来中国人民蒙受外来侵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又是国家实现独立富强的实际要求的概括总结。中国绝不会承认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但是中国也决不能再走闭关自守的老路。国家制度的不同，只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依然有许多可以合作的方面。实行国家间的友好合作，有利于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发展。

其次，中国要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但是它同时要实行高度开放的经济政策。自由贸易和外国资本投资都是发展经济的必要措施。毛泽东关于中美的经济合作将给双方带来利益的预言，已被今天的实践证明。事实证明，毛泽东在经济上绝不是一个奉行闭关自守狭隘政策的人。他早在 40 年代所作的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虽然在那个时代不能实现，但在今天却变成了现实。这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成熟性，博大和深远的特征。

最后，毛泽东选择美国作为战后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并不是如西方有的学者分析那样，它具有“亲美”的性质，而是完全从实际出发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损失最小的国家，战争在远离它的本土进行。相反欧洲和亚洲几乎所有国家都遭到战争的严重蹂躏，在战后都有一个重建家园的问题。美国在战争中大大地发展了它的工业，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使它在战后成为最有资格在世界各地大量投资的唯一国家。正是基于这一事实，毛泽东才提出战后与美国进行经济合作的设想。这种现实的考虑，根本不存在“亲美”的问题。正如博古补充毛泽东的意见指出那样：即使俄国有能力（它不会有能力）帮助中国，美国也会是承担最大份额的、理所当然的国家。美国资源是巨大的。资源在战时有大量的输出。美国将会有不再需要的工业工

厂，可以整个输出。她将拥有投资资金和必需的技术人员。另外它和中国的海上交通远比欧洲的俄国方便。美国面向太平洋。西伯利亚仍处于不发达状态。其他欧洲国家都从事于重建他们自己的家园。他们没有资金来投资。对英国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样的，它在中国大规模地参与无论如何不会象美国那样受欢迎。

事实说明，毛泽东和中共并非“亲美”或倒向美国，而是奉行一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谢伟思认为，毛泽东和中央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具有坚定原则性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

谢伟思在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设想的感受时说，中共强调战后和美国的经济合作，除了认为美国将会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强国，并且美国是最有能力给予中国以经济援助的国家，这些可以被称之为实际考虑的东西之外，这也是基于共产党人的强烈信念：中国再也不能处于分裂状态。毫无疑问，毛泽东提出的战后与美国在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实行密切的经济合作的设想，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政策，更不是一种所谓的“亲密”政策，它是一种远大的战略考虑。这种战略考虑，他一直没有放弃过，一直到 26 年后，他终于实现了和美国在平等基础上的沟通。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8—269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21 页。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2 页。

第四章 走向全面斗争与对抗

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政策已经彻底明朗化，美国政府成为蒋介石政权在中国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支持者和后台。在中国走向新生和光明的关键时刻，美国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再一次扮演了与中国人民为敌的角色。毛泽东针对美蒋合流反对中国人民的情况，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立场出发，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到底，毅然选择了与美蒋进行坚决斗争和对抗的道路。他对美国政府何以坚决支持蒋介石政权发动内战的战略意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和辩证法大师的深邃眼光，说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必须打败和能够打败的道理；他号召全国人民丢掉幻想，在斗争中去赢得对美蒋反动派的胜利。在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升起时，他系统回溯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历史，对其作了规律性的说明。这既是他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又是他对美国的对华关系的系统回顾和总结。

一、毛泽东弥合中美关系的努力

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应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罗斯福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毛泽东与朱德立即向罗斯福家属和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发去唁电：“举世均深痛此种损失。”《解放日报》14日发表社论指出，罗斯福的去世，对于整个美国人民，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社论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有了长足的进展，美国成为我国反法西斯的战友。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美英中三大国团结在反对日本侵略的事业上。

毛泽东高度评价罗斯福，是因为罗斯福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同的抗日战争，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但是，毛泽东也看到罗斯福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坚持反苏反共。罗斯福对于中共所不同者，在于希望能用“和平统一”的形式，把中共纳入蒋介石的政权体系中去。他反对支持蒋介石用武力压倒中共的主张，这个主张对中共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希望罗斯福能从积极的立场出发处理中美关系。

3月初，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时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虽然近来在中国显示出来的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但是他不能相信它是固定不可改变的。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又会摇摆呢？

毛泽东分析，罗斯福这时在中国问题上，虽然对蒋介石政权采取一边倒的政策，但态度还“暧昧不明”，对于中共表示了一些良好态度，因而即使他还“只支持中央政府”，但美国的政策还有争取的余地，还没有到绝对不可改变的程度。伊·卡恩写道：“3月13日，毛泽东邀谢伟思作了一次长谈。

《解放日报》1945年4月13日。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1页。

这位主席表示，美国政策的一贯举旗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最初几个星期的忙乱过去之后，立即明确了对蒋介石政策彻底实行一边倒的态度。杜鲁门对赫尔利作了明确指示：“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他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于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政府。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但是，鉴于美国国内情况，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从东北撤退，采取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到中国去，“美国人民是永远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因此，杜鲁门决定，首先用物质力量维持已处于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等日本被彻底打败后，再根据形势决定美国对华的行动方针。

根据杜鲁门政策的决定，赫尔利在重庆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党，竭力阻止帮助共产党。当时，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和陆军军官中同情中共的人，在赫尔利的请求下，都已由罗斯福调走，赫尔利唯一担心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人员。5月，他在给战略情报局在华的昆廷·罗斯福少校和威利斯·伯德少校的电报中命令，美国特工人员只能支持蒋介石政权，他决不容忍任何与这一命令相抵触的言行。

6月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罪名逮捕了谢伟思等六名同情中国抗战及和平民主事业的美国人士，这是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公开实行彻底的“一边倒”政策的一个信号。美国右翼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斯克里斯普——霍华德报系的首席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沃尔特曼6月8日断言，谢伟思等人亲共产党人的间谍活动，使美国政策转向“亲蒋反毛”。右派的叫嚣反映杜鲁门反共政策的动向。

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对谢伟思六人的被捕拍手称快。在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无比愤怒。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作法大为不满。

毛泽东回忆起4月13日他和谢伟思所作的最后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他诚挚地向谢伟思表示中共对美国的友好合作态度。他指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那怕一门炮或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求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合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的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友谊。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5页。

此时，毛泽东较乐观地认为，有可能争取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共明智的政策，从而使战后中国的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

现在，杜鲁门政府以共产党间谍罪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直截了当地挑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美国与中共方面的合作可能似乎已变得微乎其微了。而美国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便意味着蒋介石必然奉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方针。因此，必须现实地看待美国政府的政策，强化其对反共政策的斗争。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的反共事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11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指出这个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他肯定，“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他对于杜鲁门政府的作为，给予了个点名而猛烈的抨击。

6月17日，中共中央为对付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企图发动内战的方针，给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确定的。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是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但又不怕内战，以此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之信心。

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对美国政府制造的谢伟思等六人的共产党间谍罪事件表明公开态度。这篇评论措辞尖锐、态度强硬。美国有关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时评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虽然这种看法并无直接根据，但是这样重大的时评，不经毛泽东过目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如何它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

时评尖锐地指出，逮捕谢伟思等人的案件，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它表明美国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坚决主张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他们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时评正告美国的反动分子，如果他们一定要和中国的独夫民贼面目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取鲜血，如果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趁早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将从中国获得其应有的教训。这篇评论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强硬的态度和对美国反共政策的高度警惕及原则立场。中共虽然一贯追求和美国的友好合作，但是它对美国的任何反共政策利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决不会退让半步；中共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绝不会为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国帝国主义炫耀实力的政策所吓倒。

时评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共高超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必须始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评论明确地把“富有民主传统的美国广大人民，美国朝野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和“美国的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区别开来，把斗争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中少数决定政策的反动分子。

美国的研究者们把谢伟思事件称之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把时评的调子说成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这个说法虽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他们对毛泽东的耐心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愿意作最后的努力。他愿意通过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和适当斗争的政策，即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2、1103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一）第285页。

使是只有微小的希望，也要争取美国改弦更张，奉行明智的对华政策。

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些区别是：“第一个，美英政府与美英广大人民的区别，其政府对华政策包含着很错误的部分，这部分政策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性的，但其最大的人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与其他广大工作人员的区别，前者包含有帝国主义成分，后者很多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毛泽东和中共采取这种实事求是而有区别的政策，保证了对美方针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了主动地位。

从区别政策出发，毛泽东和中共的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杜鲁门为代表的整个美国政府，而是集中于揭露赫尔利等反动分子。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指出“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不变，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他要求美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被赫尔利之流重新拖入不义战争之中。

7月29日，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福斯特发去贺电，热烈祝贺美国共产党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白劳德站在美国政府反动政策的立场上，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调停，把中共纳入美国规定的轨道中。他美化美国政府的政策，竟然说：“美国官方政策，不管它有怎样暂时动摇的表现，却正在促进中国的统一和民主。”毛泽东强调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实行阶级投降，葬送美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反动资本集团从白劳德投降主义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肯定美共反白劳德投降主义的胜利，将有利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的斗争。他通过给福斯特的电报，再次向美国当局表明了中共坚决斗争的立场和决心。8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坚定地表明了中共决不会在美国高压政策下屈服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映。

赫尔利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杜鲁门政府的反共扶蒋政策既定。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只有国民党的力量才能保证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为了支持蒋介石，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保证蒋介石在未来的内战中占据优势。首先必须保证在中国的200万日军和100万伪军，向蒋介石军队交出武器和阵地；同时必须千方百计遏制中共，使中共处于不利地位。

7月下旬，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曼向延安建议，让美军观察组附属共产党部队，以检核他们的行为。叶剑英断然拒绝了 this 个居心叵测的无理要求。接着魏德曼与宋子文达成协议：美军将帮助蒋介石军队占领华北的重要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扼守战略要地，直到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能够加以控制为止。“当魏德曼问委员长，他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三百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在纸面上全部部队的四

分之三。”

魏德曼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把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提供给国民党重新占领地盘的努力。他请求蒋介石务必要占领华北和满州的关键性据点，以阻止共产党军队的行动。魏德曼和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了一项计划，争取日本一旦投降和“租借法案”条款失效时，仍有源源不断的军援流入中国。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曼：必须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努力取得所有被解放的地区和装备；拒绝共产党参加接受日军的投降并防止他们占领日军撤出的地区；大力帮助蒋介石把军队向北运送到蒋和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的地区。魏德曼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制定了一项接受日军投降的计划。在150天内，美国海空军将把国民党部队运往战略地区。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由南方沿海运送到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以上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其数字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8月15日，杜鲁门发布第一号通令，这道命令指定蒋介石是中国战区唯一享有受降权力的人。这样，美国政府便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钦定给了蒋介石，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共及其军队排斥在享受胜利果实之外。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峨眉山上下来抢夺胜利果实了。

美国政府的这种片面的“扶蒋反共”政策，并没有吓倒毛泽东。就在杜鲁门发出第一号通令的前两天，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这个讲演是一个对美国反动政策的应战书，它有力地回答了美国政府向中共和中国人民发起的挑战。毛泽东极清醒而透辟地分析了美国政府对华方针的反动实质，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预示了中国人民必然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胜利前途。他关于如何认识美国政策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斗争，将表现为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及我们反对他们篡夺抗战果实的斗争。他指出，八年抗战，我们在敌后，蒋介石在山上，现在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嘲笑而轻蔑地指出，蒋介石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要想抢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第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华立场不能抱什么幻想。他指出，在许多善良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以为他们是不会独享胜利果实的，是不会打内战的。毛泽东大声疾呼，要求这部分群众迅速清醒。他告诫说：蒋介石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靠山，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这个方针是老早就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一切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有害的。从来的反动派绝不会让人民自动获得权利，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战胜中外一

切反动派。

第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不仅不应存在任何幻想，而且还要看透它的虚弱本质。毛泽东以辩证法大师的无畏精神和若干历史经验为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的恐吓，无非是要从精神上解除我们的武装，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老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就是怕吓。他们也以为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吃那一套的，这些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就敢于信心十足地和他们斗争下去。

第四，不仅美帝国主义不可怕，美国手中的原子弹也不可怕。毛泽东针对美国政府把原子弹吹得神乎其神，一些同志和群众心中也存在恐惧心理的情况，对美国的宣传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很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是想要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毛泽东批评革命队伍中那些把原子弹看得很了不起的人，指出他们的看法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做蒙巴顿，他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归根到底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和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

毛泽东的讲演，集中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一贯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党内外同志对与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斗争的信心。他是一个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暴敢于硬碰硬的人，是一个敢于戳穿一切反动的庞然大物并与之斗争的人，是一个不怕反动派恐吓、威胁而威武不屈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当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它的辉煌顶点时，敢于直面其本质并嘲笑其虚弱的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美国的原子弹能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多大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作出最清醒的判断和敢于藐视它的人。历史证明，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敢不敢于斗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核讹诈是否敢于斗争，这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模糊或后退，便必然导致投降，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延安沉着地迎接新的考验时，于8月15日夜传来了抗战彻底胜利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使整个延安顿时沸腾起来，古城延安沉浸在狂欢之中。诗人肖三在狂欢中抽身回到窑洞，用诗歌记下群众狂欢的场面：“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延安今夜谁还会睡觉？/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霄。/朴素的鼓点也不显得单调了，/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都笑了。/全世界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

的确，延安和全国人民都在欢笑，这是用二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悲壮的笑，是正义之声气贯山河的笑，是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大声嘲笑。当人民沉浸在欢笑、兴奋之中时，毛泽东思绪万千。他想得很深、很远、很沉。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欢畅，但更感到担子沉重。他看到，美国伸出了帝国主义的手正在把新的黑色幕布罩在中国人民头上；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又要屠杀中国人民了。在人民欢庆和平的笑声后面，隆隆的炮声犹如远方的闷雷正在滚滚而来。毛泽东顶天立地地站起来，历史的千钧重担再次落在他和他的党的身上。他感受到了重大的历史责任，又具有无比的信心。

在重庆方面，内战的准备正如毛泽东预料那样发展。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以蒋介石政权为基础统一中国，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使蒋介石和赫尔利都认为，他们利用条约束缚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其屈服的大好时机又到了。赫尔利幻想：“如果苏联指示中共屈服，并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中共就会照办；如果中共不接受蒋的条件，只要我们支持蒋并给予援助，那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人。”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还具有极大的困难。当前最急迫的是他需要准备内战的时间。杜鲁门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基于种种考虑，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这样，赫尔利便以“盟国”调停者的身分，再次向中共提出“和谈”的建议。蒋介石也认为，“和谈”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他可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如果毛泽东不来，便可以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在毛泽东和中共身上；如果毛泽东同意来谈，便可以向他施加压力，诱骗、逼迫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而且还可以利用和谈拖住毛泽东，以便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军队，为内战作好准备。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策划下，8月14日、22日和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认定，无论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他们极为有利，对中共极为不利。

但是，赫尔利和蒋介石都打错了算盘。毛泽东对于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抱着真诚努力的愿望，但对局势又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估计。

8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对中共的对美国政策作出了原则的指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缓和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他指示，对美国被困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 —

《美国对大陆中国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2月。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

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情况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美苏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

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在会上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向全党通告了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和我们谈判的方针。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立即轰动了国内外。

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赫尔利离渝赴延时发表声明说：“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他满怀信心，希望在国共最高级的谈判中再次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调解人的角色。

28日，赫尔利陪同毛泽东一行飞往重庆。国共之间开始了新的一次谈判。在重庆机场上，毛泽东同赫尔利一同照了相，并由赫尔利陪同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至曾家岩张治中公馆小憩之后，回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休息。关于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毛泽东一下飞机，重庆警备区司令周至柔便对毛泽东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便将他在上清寺桂园的官邸让给毛泽东居住。那里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晚上回红岩睡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了和蒋介石会谈及频繁会见各方面的要人、朋友等外，还和赫尔利等美国有关人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当晚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出席作陪的赫尔利和魏德曼。30日，毛泽东、周恩来往访美国大使赫尔利。9月2日，赫尔利、魏德曼往访毛泽东，不遇。4日中午，赫尔利在美国大使馆宴请毛泽东，美国国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史奈德等在座。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其中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公谊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席间，毛泽东致辞，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帮助。美联合援华会艾德敷等人致答辞，表示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12日，毛泽东收到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的电报，电报对国共谈判表示关切，热望中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红岩嘴住地接见了在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服役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等美国三名士兵，并设宴招待了他们。17日，蒋介石在林园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591页。

《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2页。

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宴后，毛泽东和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19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22日，美国大使赫尔利返美述职，毛泽东亲到机场送行话别，赫尔利向毛泽东建议，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30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在塘沽登陆，并率领和掩护国民党军队侵占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海镇、得海镇等地，进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静海等地区，为国民党固守内战战略据点，运输兵员、物资。10月9日，毛泽东回答了英国记者甘贝尔所提12个问题，指出，中共将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目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们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在与蒋、美会谈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共一贯的原则，作了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关系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则寸步不让。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使赫尔利和魏德曼感到十分恼火。在争论中共军队杀死一名美国军官以及扣押几名作为间谍的美军军官问题时，魏德曼的横蛮和盛气凌人，使毛泽东怒不可遏。魏德曼不接受毛泽东的任何解释，他狂妄地警告毛泽东，中共军队不得再袭击美方工作人员。赫尔利和魏德曼希望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在所谓强大压力下被迫就范的情形，根本没有出现。他们也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原则的坚定性和捍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意志。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荒谬地断言，延安一定与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定，莫斯科一定私下里向中共允诺了什么，不然中共是不可能强硬起来的。“魏德曼告诫马歇尔说，欧洲的‘共产党胜利’几乎已经完全实现，俄国人现在一定在企图通过延安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轨道。”而赫尔利则认为，“发生在亚洲的斗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自由经营与垄断企业’之间的一场会战。法英帝国主义分子象苏联帝国主义分子一样，希望通过怂恿内战来破坏亲美民族主义。”他们一方面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名推在别人头上，另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共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和不信邪、不怕威胁恐吓的斗争精神而气急败坏。赫尔利报告美国国务院：“他和魏德曼必须返回华盛顿，向别人大声疾呼地陈述这种危险，为他们努力拯救中国的壮举赢得支持。”

很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再次挫败了赫尔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马歇尔认为，赫尔利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中国的现实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性质之中。”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许涤新回忆说：谈判进行三周之后，当蒋介石陷入被动的时候，赫尔利拉下“居中调停”的面具，指责中共提出“具体问题太多”，把谈判进展不前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赫尔利要

《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9页。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0页。

许涤新：《谈笑凯歌旋》，《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马歇尔使华》第7页。

求毛泽东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当几个部长、省主席，把中共的武装交出来。他还放出要“回国”的空气，给中共施加压力，给蒋介石撑腰。对于赫尔利的恫吓，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

努力架设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 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不仅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会谈，而且注意利用一切机会，和普通美国人士进行接触，以增进中美人民的了解、信任和友谊，他努力架设与美国人民直接交流的桥梁。

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13号，会见了美国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曼，这是一次体现中美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会见。

霍华德·海曼等三位美国士兵，从1944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他们先后到过上海、昆明，对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亲眼所见、深有感触。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只是从他们结交的中国朋友那里有所耳闻。他们了解到，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他们向往亲见延安的窑洞；亲听著名的长征、毛泽东和他的传奇。他们深信共产党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中共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奋斗。他们确信，中国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

抗战胜利前夕，三位美国士兵奉命调重庆工作，他们很想到重庆的“小解放区”红岩村13号和曾家岩50号看看。通过他们认识的中共地下党朋友的介绍，他们访问了曾家岩，受到了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同志的热情接待，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三位美国朋友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并同他们交谈而感到特别兴奋。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三位美国士兵从每周一次前往延安为美军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空军机组人员那里听说，毛泽东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还自己种烟草。他们便从自己的配给中拿出六、七包装成一盒的美国香烟，再次访问曾家岩，并在香烟盒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毛先生好！”“祝国共会谈圆满成功！”“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前途！”等祝词，送给毛泽东。在曾家岩，他们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几天后，龚澎同志转告三位美国士兵：毛主席很愿意会见他们，约定9月16日请他们在红岩村13号吃晚饭。

9月16日，三位美国士兵假借过犹太人的信仰节，请假外出。为了安全起见，先搭上美军交通车到达市郊白市驿，然后步行五十余华里，于下午三点过抵达曾家岩。等候他们的中共同志，立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毛泽东正等候着三位美国士兵的到来。他身着白色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健步地来到三位客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见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看见他们胸前挂着照相机，便诙谐地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利用太阳未下山以前，赶快拍照！”三位美国士兵喜出望外，立即和毛泽东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先彩等同志来到院子中一丛香蕉树前，摄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照相之后，毛泽东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同三位美国士兵进行了亲切交谈，由龚澎作翻译。毛泽东对三位美国士兵表现出莫大兴趣，专心致志地倾

听他们所说的一切。

他问到客人们在美国的生活情况，问到了他们的家属情况以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毛泽东通过龚澎的翻译，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十分乐观地谈起几位美国年轻朋友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坦率而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了中共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继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向三位美国朋友询问了美国国内的许多情况，关于美国的许多根深入的情况。三位年青的美国朋友有的竟答不上来。他们为毛泽东对美国了解的深入细致而感动，他们把一些旧日的剪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不时翻阅，并说，世界正在变化，而且发展很快。

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许多美国朋友的友谊，高度赞扬了许多为中国人民熟知的美国朋友。他对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美国进步作家表示问候，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特别赞扬史沫特莱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指出：“具有这种品质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就是以此战胜敌人的。”

在谈话中，霍德华·海曼发现，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入了海曼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美国客人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它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三位美国朋友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发展，请他们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指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一定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三位美国朋友将他们积存的 115 美元赠送给毛泽东，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毛泽东回赠了他们一套（12 幅）版画，作为留念。三位美国朋友在与毛泽东告别时，他们问：“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泽东简洁地回答：“你们将自己在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毛泽东和三位美国士兵的亲切会见，再次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极大地加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的热情、质朴、智慧、坚毅、乐观和奋斗精神，给美国朋友留下了深刻和难忘的印象。30 多年后，当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两位美国朋友，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时，他们看见了 30 多年前他们与毛泽东主席及办事处部分同志的合影照片高挂在墙上，这个情景使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忘记几位朴实的美国士兵，他们始终珍惜中美人民的友谊。望着照片，由毛泽东缔造的这一段中美友好的珍贵历史，清晰地再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仿佛又看见毛泽东快步向他们走来，微笑着说：“欢迎你们！”

毛泽东与普通美国士兵建立的这种朴实无华的友谊，直接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促进了相互交流和信任。当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和美国士兵建立

以上材料见：定 《毛主席会见三位美国士兵》，〔美〕霍华德·海曼《一等兵海曼会见毛主席》，〔美〕爱德华·贝尔《一张表现友谊的照片》。三篇文章均见《重庆谈判记实》，重庆出版社，1983 年。

这样亲密的友谊。7 月间时，他在延安还和另一名美国士兵威廉·泰勒有过亲密的友谊。这个故事谈起来还具有一定传奇性。

1945 年 7 月，美国士兵泰勒经八路军的救援，奇迹般地到达了延安。

泰勒原是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士兵。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 16 天，他成了日军的俘虏，被日军辗转送到上海关押。1945 年 5 月，日军将 1000 名俘虏运到北方，泰勒在津浦线上跳火车逃走。以后他在华北敌占区到处流浪，多次遭到日军和伪军的追捕。后来，他侥幸遇到八路军的部队，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和八路军同甘共苦，从山东经河北，到达河南，最后来到太行山区。同年 7 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得到八路军的通报，派飞机将他接到了延安。

威廉·泰勒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等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对这位具传奇经历的美国士兵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难忘的友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和他干了杯。毛泽东说，他是战争中唯一从华北逃出的美国战俘，真是难得！并赠送了他美丽的中国挂毯。泰勒对毛泽东的友谊感动至深。由于美国五角大楼急于要从他那里了解美国战俘的情况，他只在延安逗留了几天，便于 7 月下旬启程回国。毛泽东、朱德等去机场为他送行，并一起合影留念。

45 年后，这位战后成为一位实业家、又连任北拉斯维加市市长八年的当年美国士兵，现在已步入老年的老人，满怀对毛泽东的友情来到中国，他感情激动地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面对当时他和毛泽东的合影，难忘的往事又历历浮现在他的眼前。当然，对于当时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这已是后话了。但毛泽东与普通美国朋友的感人友谊，从此可见一斑。

在重庆，毛泽东还会见了美国朋友韩丁和坦纳鲍姆。毛泽东与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的谈话，是在周恩来和担任翻译的助手龚澎的陪同下进行的。

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蒋介石的谈判上，但他始终不忘利用一切机会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在繁忙中，他抽空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两位年轻记者。

会见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毛泽东态度友好，精神严肃而安详。他有十足的信心，但又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任、从容自若、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同时又专心致志地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对美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两位在重庆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美国青年，感到惊奇和由衷的敬佩。

韩丁写道：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规划战后中国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设法通过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

这两位美国年轻记者本来准备了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未来等问题要问毛泽东，毛泽东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过来问了他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情况。他心上记挂着美国，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问题中，客人们明显看出，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

题进行过很多探讨。有时候，两位年轻的美国记者觉得，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但是他希望听听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得到的答案的逻辑性和内容。

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韩丁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泽东便问他们两人有关美国工人和农人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毛泽东问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对农民和工会采取什么政策？”他很关心罗斯福死后刚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的情况。由于同蒋介石打交道也就是同杜鲁门打交道，因此毛想了解杜鲁门及其思想。毛泽东的提问，表明他在许多问题上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情况。尽管两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仍听得很专心。他轻松自如，平易近人，专心致志，使美国记者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当毛泽东离开他们时，这两位美国记者留下了一个深刻难忘的印象：毛泽东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

在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韩丁和格里再次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见面。美国政府虽然站在扶蒋反共的一面，但毛泽东始终记得，美国还有另一个方面，美国人民是支持正义和民主事业的。

毛泽东和韩丁的会见，使他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他后来到了解放区，1948年春天，他以观察员的身分来到山西长治张庄参加了农民的土改。在那里，他学习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讲话纠正了土改中的偏差。同所有土改工作人员一样，“我有同样的感觉，好似毛从我们背上搬走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我们能够直立起来了，远望整个地平线，追溯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接着的是我们现在必须大踏步走的笔直的康庄大道。”他根据毛泽东关于搞调查研究要做小学生的要求，竭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农民。他在那里搜集了二十多斤重的山西农村土改的文字材料，徒步翻过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历尽千难万险，将这些材料带到美国，但被美国官方扣压，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这些材料才回到了他的手中。

1948年10月，韩丁在晋冀鲁豫边区办的北方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英文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使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接着，毛泽东大摆空城计，使傅作义奔袭石家庄的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杜长城等部二万余人不战而撤。这使他亲身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超。韩丁深有感触他说：这是一种令人深受感动的体会，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无法忘怀。

毛泽东以他高尚的人格和卓越思想影响了正直而追求真理的美国朋友，他们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深切地理解。

重庆谈判的42天过去了，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他对中外记者发表的简短谈话强调：对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0月17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对重庆谈判问题作了报告。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参加重庆谈判的感想时，提到了他

对重庆的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当然，他也很清楚，还有一部分美国人，如赫尔利、魏德曼则持反共态度。赫尔利虽然已经辞职，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并没何变化，摆在中共面前的困难还会很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他要求全体同志作好斗争的准备，增强信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马歇尔的调停和毛泽东弥合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最后努力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预料中共将和美国发生更多的关系，必须采取慎重而主动的政策。10月29日，中共中央鉴于今后半年内将有六万美军海军陆战队及六、七千陆空人员留置华北的情况，作出了对待华北美军活动的指示。

指示指出，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于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下，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说明我军在各解放区的战绩，及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及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中央的指示深刻地表明，毛泽东已清楚地看到，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未来形势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共愿意美国成为中国和平的助力，而不希望美国成为中国走向光明的阻力。

从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看，当赫尔利于1945年11月27日，以他在中国的失败和呕气中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时，杜鲁门任命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派往中国。此时蒋介石虽然与共产党在举行和平谈判，但其主要打算还是用军事手段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调遣军队大举进攻人民军队。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八十万军队，向各解放区进攻。仅平汉、道清一线，国民党军队就集结了二十几万兵力，在胡宗南、孙连仲指挥之下，配合敌伪，汹汹北上，连续夺去汤阴、获嘉、辉县、磁县等重要的解放区县城。傅作义部十万人进攻张垣；李延年、陈大庆部数万之众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李品仙部进犯两淮；阎锡山、胡宗南部，进攻太行及正大沿线解放区。豫西、鄂东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抗日纵队，都被大举围攻，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要马歇尔使华继续完成赫尔利未竟的任务，就是停止中国的内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这个统一的中国，则是要使一切政党、军队统一于国民党政府，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

在马歇尔离美赴华前夕，12月15日白宫发表了杜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府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声明声称，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声明表示，美国将不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采取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自行

决定。杜鲁门的上述声明，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既定的扶持蒋介石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从表面文字上看，杜鲁门提出的和平谈判的一些要求，与中共也具有相似之处。因而杜鲁门的声明存在着中共与国民党开展谈判的有利因素。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关于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谈话》，表示欢迎杜鲁门的声明。支持美国对华政策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的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与统一等建议。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谈判的前提，为了实现杜鲁门总统的建议，希望在华的美国官员具有与这个建议相称的“公正”。

19日，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要求全党认识扶助蒋介石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我们不应抱有幻想；但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愿意中国实现和平统一，这种政策变动有利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共中央把杜鲁门的声明看作美国赞助中国国内和平的表示，毛泽东决定响应杜鲁门的声明，并以此作为改善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的又一次努力。为此，中共再次要求，对于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以免反动派作为挑拨的借口。

22日，马歇尔抵达重庆后，23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马歇尔的住处拜访了他，欢迎马歇尔到中国，并对他出使任务表示重视和赞许。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了中共和平的诚意，及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良好愿望。只要美国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中共愿意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已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

毛泽东对马歇尔使华斡旋国共谈判高度重视，采取积极行动，予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和马歇尔代表的美国三方，在停战问题上，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提出的无条件立即停战并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原则，及马歇尔提出的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在关于停战令一般条款的讨论中，国共双方各自作了某种让步，三方一致同意，国民党军为接收主权开入东北可不受停战令中关于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条款的约束。国民党方面，放弃了对赤峰和多伦的要求，这两处仍由先期到达的中共部队占领。1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发布了停战令，毛泽东亲自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通告既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对实现国内和平的诚意，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所做斡旋工作的有力支持。

为了监督国共双方履行停战令，决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关于军调部活动情况的每日报告，经国、共、美三委员一致同意，以电报送交蒋介石、毛泽东和马歇尔。毛泽东指派叶剑英为中共方面的执行部委员。

同日，在国、共、美三人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根据张治中的提议，国、共、美三方提出建立三人军事小组的紧急建议，以着手讨论整编中国军队的问题。1月14日，类似内容的备忘录由三人小组诸委员签字，递交蒋介石和

毛泽东。1月23日，周恩来去信告知马歇尔，毛泽东主席赞成建立三人军事小组，以讨论整编中国军队问题，并赞成马歇尔作为顾问参加该小组。

马歇尔关心的是如何把共产党军队整编为统一的国军，但是，他对中国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情况一无所知。

整军会议开会前夕，马歇尔以顾问的身分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中共领导；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马歇尔的这个方案，在陆、海、空军中，中共军队与国军均为1与3之比，而且海空军是当时中共没有的，中共也从未提出过此种要求。马歇尔以为蒋介石成为了三军统帅，其他事情便好办了，足见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

这个整军草案送蒋介石看后，蒋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但碍于他要借重美国，不得不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蒋的意见，修正后的方案，中共与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1比5，海空两项全删去。整军谈判进行了11天，双方针锋相对，舌敝唇焦，精疲力尽。

2月25日，国、共、美三方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全国军队整编划分为分编和统编两个阶段。在实行全部统编之前尚须经过试点。统编方案规定，国共两党军队将按照双方协议的5:1的比例配置，即国民党军队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为10个师。两党军队地位平等，统编结束以前，中共军队仍属中共领导。据此，马歇尔建议，中共的10个师编制在统编前的训练，可由美国军官从共军中挑选人员进行此种指导。马歇尔承认，对此中共采取了诚恳合作的态度。“周将军欢迎此项建议，其后并告诉我，毛泽东主席热情接受我所建议的分两阶段统编，以及为共军官兵建立过渡训练学校的计划。”

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工作中的问题，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于2月25日由重庆飞往北平，先后到张家日、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平、归绥、延安、汉口等处视察停战情况。

—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了自重庆谈判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话，他充分肯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马歇尔调停的成果。他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他对于马歇尔调停第一阶段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3月4日，马歇尔一行到达延安视察，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组织的盛大而热情的欢迎。在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搭起了欢迎马张周三将军的红布牌楼，上面插着中美国旗，色彩鲜明地飘扬在黄土高原上，上万群众迎接马张周三将军的到来。当马歇尔的银色四引擎专机降落在延安河边的机场上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中共领导人上前欢

《马歇尔使华》第57页。

《马歇尔使华》第65页。

迎，并随同马张周三将军检阅了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

马张周三将军下榻后，应毛泽东邀请，在朱德将军官邸举行茶话会，之后马歇尔去看望了美军驻延观察组。稍事休息后，马歇尔往访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毛泽东向马歇尔表示，他希望停战令适用于满州，军调小组应派往该地。毛泽东又向马歇尔保证，中共将用一切力量加速各地恢复常态。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室举行宴会欢迎马张周三将军。宴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欢迎马张周三将军来延视察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首先对马张周三将军及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到来，表示欢迎。人家知道，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祝杜鲁门总统健康，蒋主席健康，祝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及各位朋友健康。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马歇尔代表美国的调停，能够取得成效，内战能够制止，国共之间能够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促进和平、民主、光明的新中国早日到来，也促进中美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得以实现。马歇尔在致答辞中对毛泽东的讲话深感满意，表示美国和他在国共双方一定保持中立地位。

讲话之后，晚会节目开始。奏中美国歌，演唱了欢迎马歇尔将军歌和欢迎张治中将军歌。三月的延安天气还很冷，马歇尔穿着棉大衣斜躺在靠椅上，腿上盖着一床毛毯，饶有兴趣地观看演出。

第二大早晨，欢送马张周三将军离延时，毛泽东和马歇尔及记者们分别合了影。记者问毛泽东：“毛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上？”毛泽东说：“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马歇尔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对他说：“再说一句，一切协议，一定保证彻底实行。”毛泽东代表中共向盟国代表再次表示了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诚意。他对于能与马歇尔直接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感到高兴。马歇尔也感到延安之行收获很大，他深感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又是诚恳而讲信义的。

3月11日，马歇尔奉召返美述职。4月18日，马歇尔经短期回国再次返华时，局势已经全面恶化，特别是东北的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企图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人民军队从敌人手中解放的鞍山、辽阳、法库、抚顺、营口等城市。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

中共在四、五月间，一直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周恩来三次口头表示愿意接受民盟和马歇尔关于长春中立的折衷方案。但蒋介石武力解决东北的方针既定，非要打下长春才能考虑停战。

4月29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已将民盟的建议和蒋介石的态度通报了延安。

5月1日，毛泽东给林彪一封电报，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决要打到长春。毛泽东要求林彪，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原则，为了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气焰，必

《马歇尔使华》第71页。

转见周尔复：《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华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页。

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决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春）、哈（尔滨），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以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毛泽东这时对马歇尔还抱着一定的信任，希望他在调解国共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解放区，在平等互利和不损害主权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和美国、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

5月下旬，四平、长春失守。在这前后，马歇尔开始背离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公开袒护蒋介石。马歇尔向中共提出，他赞成蒋介石提出的在军调部或执行小组里，美国军官必须具有决定权、执行权和解释权的建议。他要求中共接受这个建议，这就意味着国、美两方将一致压迫中共就范。马歇尔的这个立场，明显暴露了以掌握谈判上的主动权，来配合蒋介石在军事上对中共进攻的意图，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即使如此，毛泽东仍对美国的政策尽量争取。他要求，对于马歇尔的公开批评，尽量谨慎。他同时决定，中共响应马歇尔5月20日的声明，在舆论上暂时取缓和的态度。他在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信中指示：“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时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的声明如何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的立场采取了极大耐心和克制的态度，要求进一步改善和美国人员的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们就要尽量争取美国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注意到，马歇尔一边在调停，美国却一边在加紧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6月1日，他在修改新华社一则关于“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的消息中指出：当马歇尔氏好象在努力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住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已十分扩大的内战。此处第五军亦有将由美舰运往东北之说。按马歇尔氏对于使用美舰运输国民党军握有权力，以前曾约定只为国民党运送五个军去东北，后违约增运两个军；四月间又曾约许美舰在运过第九十三军以后不再为国民党运兵。但在中国内战首领蒋介石好象遵守指令一样地拒绝东北和平与全国和平之后，美国方面就又继续使用自己的海军运输工具及大量军械军火，积极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而其结果使中国内战空前地扩大了。此种美蒋双方密切合作屠杀中国人民的形势，深堪注意。他深切而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6月6日，蒋介石宣布从第二天起东北休战15天，马歇尔出面斡旋国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中共中央估计，在东北问题上，国、美双方的立场已趋于一致，但蒋介石想要发动全面内战，美国尚不愿直接支持，因而可以利用其矛盾，积极争取美国。

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指出，中共是希望马歇尔完成其使华使命的，而国民党一开始就不愿使其成功。美国对于中国出现的内战应负责任，对于内战美国应当加以制止，而且能够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却在援蒋方面采取积极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76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3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54页。

措施，这就促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

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加紧了援助蒋介石的步伐。6月14日，美蒋签订了5170万美元信贷协定，并从五、六月间起，将在中国、印度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价值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转移给国民党。6月13日，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军事援华法案。同月，美国国会授权在中国成立海军顾问团，并赠送国民党海军271艘军舰。陆军方面，6月成立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并为国民党空军提供了939架飞机。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的步骤，进一步把中国推到了内战边缘，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6月16日，延安权威人士发表谈话，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鼓励中国内战的法案，指出美国对好战的中国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事援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6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助长蒋介石内战的反华政策。声明指出：

“美国国务院于本月十四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晌，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项法案。中共此种意见，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并派遣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协同作战，其目的是击败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是在那时，由于美国错误地仅仅援助国民党军阀，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地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军阀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锁。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约束，与中国国民党宣布停止内战，并宣布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议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经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这些前提都已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大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美国政府抗战以来的对华政策的第一次公开的正式评论。毛泽东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和扶蒋压共的一贯性，使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援华政策变成了国民党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依恃。这种政策的继续，发展成为今天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是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的根本原因。他尖锐批评美国

的政策不是在援助中国，而是在于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完整，破坏中美人民的友谊和关系。声明强烈抗议和揭露了美国援华政策的虚伪性、危害性，它标志着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进入了对抗阶段。

毛泽东从来看问题都是从事实出发的。美国政府无数扶蒋反共的事实，使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调停不再抱任何希望。他认定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所进行的第二次国共谈判调停，只是美国为国民党掩护内战作准备和拖延时间的工具。马歇尔的所谓公正，只是美国政府反共反华政策的一种掩护。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在华东、华北对人民军队进行大举进攻。毛泽东再次公开谴责美国政府当局支持和纵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日他在给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工友的复电中，号召他们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驻华美国海陆空军，并撤消已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使中同和平民主得到早日实现。同时，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美蒋进攻。30日，他指示新华社、解放日报，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的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对于蒋介石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了评阿泽逊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援华政策。指出美国的援华仅仅支持着中国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军阀集团，援助他们公开拒绝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要求废弃整军方案，坚持以汽油来浇泼中国的火灾，以枪炮和军事顾问来制造中国的和平，以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独裁内战来实现中国的团结民主，以强迫中国人民在战争恐怖和饥饿中大量死亡来寻求中国的友谊。因此，美国政府的援华“仅仅是反华或侵华而已。”

美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这一篇声明，表明毛泽东已彻底识透了马歇尔调处的欺骗性质。美国学者认为：“七月一日，毛泽东命令开展一场反美运动，毛这样做是由于他已认识到，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明白他自己的使命，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国都不会抛弃国民党政府；即使内战的责任在于蒋介石，美国也会继续支持国民党。”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未免言过其实，说毛泽东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的调停的真实性，已个抱任何希望比较符合事实。调处还可以进行，究竟有什么积极成效，毛泽东已不抱幻想。

从1946年6月底到1947年1月，马歇尔虽然继续对国、共双方进行“调处”。但表面是谈判，实际是大打，就是在拖延中大打。马歇尔的调处已成为对国民党军事进攻进行掩护的烟幕。

9月29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调解活动的目的和实质，发表了公开的评论。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的所谓调解，现在看来只是它扶蒋反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策略手段，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它的殖民政策的。他对斯蒂尔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

国的殖民地，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马歇尔和蒋介石“经过政治协商和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毛泽东对马歇尔使华调解的目的和作用的评论，一针见血。马歇尔使华，表面看来出自公正的目的，实则是为美国政府总体战略服务的一个步骤。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方针既定，从这个方针出发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扶蒋反共更为有利的问题。在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大量兵员还在西南内地，内战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都反对非正义战争，蒋介石的内战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以调处为名掩护蒋介石进行内战准备，同时争取时间在军事和物资上武装蒋介石，这一手很狡猾，同时也很具有欺骗性。事实是，在马歇尔未进行调处之前，蒋介石用来打内战的兵力是一百万人，约占其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五。马歇尔调处7个半月后（到1946年8月），蒋介石用于打内战的兵力增到差不多二百个师，约二百万人，约占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在马歇尔调处之前，蒋介石军队用美械装备的约39个师，现在却为57个师，而巨全部用于前线。此外还有由美机编成的空军，美舰编成的海军。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对于美国的“调处”和“援华”简直成为残酷的讽刺。

毛泽东深切感到，时至今日，如果不揭穿美国“调处”这一手，便会对美国政策产生有害的幻想，束缚我们的手脚。适时地指出美国调处的实质，在内战爆发的关键时刻，有利于深刻地教育党内同志和群众。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对党内外群众对马歇尔“调处”的实质的认识情况作了估计。他指出：“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 and 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指示，中共高级干部和党员要认真研究美共的经验，要求全党从白劳德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党的政策错误将导致的危险后果，正如薄一波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指出那样：我们从白劳德修正主义中，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个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194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撤出执行部的决定。马歇尔的调处，以国共谈判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始终把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马歇尔确信，只有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他的使命才有可能完成。”这是马歇尔调处的核心目标，是调处无法成功的原因。正如美国作家格兰姆·贝克所指出：那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使得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2、1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2、122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9页。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80页。

〔英〕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

判的方式来结束。”因此，尽管马歇尔开始有一副公正的面目，但为时不久，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便原形毕露，蒋介石的卖国外交政策也暴露无遗。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方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应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

马歇尔的调处再一次教育了中国人民，对于反动派绝不能希望他们会把和平的橄榄枝双手交给人民。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调处”抱着清醒的认识，他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的要求出发，诚恳地希望马歇尔的调处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有助于内战的制止和和平民主的到来。但是他清楚地看到，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扶蒋反共的一贯性质，因此，并不把和平民主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调处”之上。他肯定反动派用反革命的两手对付我们，我们便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就是在“调处”中，要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也必须用斗争才能获得。接受“调处”一手所以必要，在于它有利于我们对和平作最后的争取，有利于揭露反动派，有利于教育群众，也有利于坚定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基于此，1946年6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毛泽东便义无反顾高举起斗争的旗帜。他愤怒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毛泽东指示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平是必须取得和能够取得的，但主要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的取得和平。他提出的“四自”，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与赫尔利、马歇尔两次“调停”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和中共在与赫尔利、马歇尔的谈判中，不仅锻炼和发展了自己的外交艺术和斗争策略，而且大大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使毛泽东和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更加成熟起来。

1945年到1946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那样：“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实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的违背罗斯福政策，及其象背弃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诸协定的精神那样，同样的背弃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告，也是毫无怀疑的了。”美国政府的信誉在毛泽东心目中降到了低点。毛泽东对美国欺骗一手

《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第64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9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8页。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

深感愤怒。他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告他的调处失败。费正清认为，在此时美国的明智之举应当是：“当马歇尔的调停已开始宣告失败时，刻不容缓的是应及时提醒美国公众不要再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当时正在自掘坟墓，并且打算把我们也拖进去。”但是，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同时使毛泽东通过马歇尔的“调处”弥合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真诚努力，也因此而不能奏效。

由于美国的反动的对华政策，中共与美国政府开始了对抗的时代。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凛然正气，迎接着这个斗争时代的到来。

二、毛泽东针对美国所形成的三个理论

毛泽东针对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它的全球战略，形成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三个基本理论，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两个阵营”的理论；“中间地带”的理论。这三个理论成为毛泽东观察美国政策，处理中美关系中，较长时期的指导思想。

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始末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集中关注的一个大问题，是如何认识国际国内形势？如何认识可能爆发的内战。这个问题不仅他关心，美国的许多人士也十分关心。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战争发展的趋势将会怎样？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发现，在华的美国观察家对蒋介石与他二十多年的仇敌共产党打仗的结局大致有三种估计：少数美国和西方军界人士认为，蒋介石不出一年就会击败共产党，迫使他们投降，或者把他们消灭。更少的人（被认为思想非常激进和左倾）认为，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共产党不是那么容易打败的，内战将持续二、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即使不能完全消灭共产党，也能把他们赶入山中，打通铁路线，重新统一中国，谁也不能与他争雄。贝尔登深入中共解放区访问后发现，以上三种看法都是缺乏常识的见解。从根本上说，这些预言必然落空，其所以落空，就在于他们只看到蒋介石武器精良、人数众多，他们没有掌握极普通的中国人的心理。“中国农民投入战争与革命中的热切希望和刻骨的仇恨，化成巨大的激情的能量，象在中国社会中爆炸一颗原子弹似的，几乎把中国社会炸得粉碎。”因此，贝尔登认为，中国内战绝不会象美国观察家们分析那样发展，形势将会变得有利于中共。

杰克·贝尔登有一副较实际的眼光，他只是从他看到的事实出发来作结论，因而他能够比美国和西方在华的许多观察家们看得正确一些，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要看得清楚一些。的确，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的。即使是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许多人也还看不清楚战争未来的前途。他们为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强大支持吓倒，被美国的原子弹吓倒，被蒋介石军队庞大的数量和优势的美械装备吓倒。这些善良的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战乱之后，对于新的战争的前途不免悲观失望。就是在中共党内，在这战云飞渡的时刻，战争究竟将怎样发展？究竟怎样认识气势汹汹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个问题也并不是解决了的。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深刻地懂得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必须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讲清战争的前途，必须从本质上讲清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讲清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必须被打败，而巨能够打败的道理，以鼓舞人民群众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他坚信那些丧失了必然性的东西，即使它们还是庞然大物，也没有光明的前途，等待它们的必然是无可挽回的衰落和灭亡。他老早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他更是反复他说明这一点。

还在中共七大会上，毛泽东便对美国繁荣后面隐藏的危机作了大胆的预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2页。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5页。

言。他谈笑风生地议论美国的情形说：

美国的资本主义从现在看，它还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大战中获得了它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发展，超过了战前生产的一倍到两倍。1928年繁荣期间，美国生产力600万万美元，现在为2000万万，有人说1800万万，斯退丁纽斯说1500万万到2000万万，战后要维持1500万万的产额，这比战前增加了900万万，现在不止1000万万，它发了这样大的财，因此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是对的。但拿这一点来肯定美国资本主义是“万岁”的，说它一直上升，如此说法那世界上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不会的，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它总还要发生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十年工夫就发生了很大危机，那时胡佛总统吹牛皮，说美国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不会发生危险。讲了以后，不到三个星期，危机就来了。1933年罗斯福上台，作了12年的总统，搞新政策，使资本主义又“繁荣”了，但主要是战争时期的“繁荣”。从前生产600万万，现在1500万万到2000万万，如果美国在前线有1000万士兵，2000万军需工人，他们回去后，生活职位如何解决？美国共有1亿3千万人口，有6000万工人，二个人中间就有一个工人，这6000万人口，我看怎样解决？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上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看，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来克服。

毛泽东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他要求如实地承认美国有繁荣和强大的一面，又有危机和衰落的一面。它是资本主义的喜马拉雅山，但它又终究不能长期维持的。从此出发，在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问题上，要看到它们有气势汹汹吓人的一面，又有虚弱和无能的一面。如果不这样看问题，就会丧失我们的信心和斗志。

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观点：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不害怕它的威胁，如果它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那么我们随时都准备着。就是明天早上要打，我们也准备着。

1946年3月15日，毛泽东把和美蒋的斗争形势概括为四句话：人民民主胜利开辟了道路；敌人还有力量，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任务是壮大人民力量，分化敌人内部。4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对帝国主义力量估计过高，把革命力量估计过低，惧怕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的片面认识和右倾观点，写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文件，在中央部分领导同志中传阅。

他指出，在目前，“美苏必战”是一种错误悲观的估计，事实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因此必须和必能克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美、英、法同苏联之间，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这种妥协，不是全面妥协，而是在若干问题上，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妥协。妥协不是革命人民放弃斗争的结果，而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坚决有效的斗争的结果。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妥协，是属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是不同的两件事，不能把它混淆起来。不能以国内的妥协去服从国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把国际关系中的某种妥协和国内无产阶级与反动

势力的斗争结合起来，肯定当前的斗争不可避免，只有坚持严正斗争的立场，不怕得罪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才能有人民的光明前途。他再次说明了中共和革命人民应取的立场和斗争策略。

全面内战爆发后，从表面形势看，并不利于我们。蒋介石在美国的援助下，拥有 430 万军队，其中正规军 220 万，非正规军 100 余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 100 余万，有 3 亿人口的地区；在 86 个整编师（相当于军）中，美式武器装备了 22 个师，一个主力师装备有 1.1 万支步枪，其中冲锋枪 2370 支，各种火炮 440 门，汽车 360 辆。人民军队方面，有 120 万人，野战军 60 万人左右，一个主力野战师装备步枪 1.39 万支，其中冲锋枪 92 支，各种火炮 46 门，人民军队虽然较之从前扩大了，但敌人总兵力仍比我们多三倍，正规军比我军多四倍。敌人是飞机加大炮，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只有 1 亿人口、230 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蒋介石在发动内战后，极其狂妄。他幻想 24 小时有惊人的消息发布；估计到 6 个月可以消灭共产党。他气势汹汹地采取总体战，采取全面分区进攻，先南线，后北线，先关内，后关外。“先占领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步步进逼，使之被迫决战，然后一举歼灭。”蒋介石的凶猛势头使许多人昏头转向，悲观失望。中间力量有些动摇起来，怀疑共产党是否有能力与蒋介石较量，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国际上也有人劝中共不要打，怕打起来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会使用原子弹。

在美国的报纸上，舆论也是一边倒，刊登的尽是蒋介石制造的假象和谣言：蒋介石捷报频传，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迅速地把最精锐的部队运到华北和满州的各大城市，而共产党的游击队只能在城外活动。他不用费很大的劲就肃清了京沪周围地区，把众多的共军赶到黄河以北。一位国民党军官说：“共产党是小孩子，不懂得打仗。”美国的报刊上，没有别的信息从中国传来，人们很难相信共产党能顶得住，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了。上海的美国商人以不无夸耀的口气向美国写信说，美国已经把蒋介石的军队整顿得面貌一新，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的腐败样子了。这支军队经过很好的训练，纪律严明，装备精良，士气旺盛。“共军是打不赢它的”，一位美国商人在信中自信地写道，“战争将在几个星期内结束”。

事情的发展竟是这样的严重，对于形势不作透彻的、公开的说明，是不能消除人们的忧虑的。毛泽东认真思索中共建立以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决定发表一次公开谈话，对美国当局支持下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的前途作一次透彻的说明。他希望有一次谈话，象他和斯诺的谈话一样，系统地阐明他的看法，并向全世界公布。

1946 年 7 月 31 日，这样的机会到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搭乘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正当斯特朗在延安初访时，蒋介石因国民党空军上尉刘本善不愿为其效命，由成都驾驶 B24 轰炸机飞抵延安，而下命于 8 月 2 日出动七架飞机，摧毁了停在延安乐关机场的这架飞机，并向延安投弹 11 颗以示报复，斯特朗成了这次轰炸的见证人。此时，中共中央很快安排了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会见。

《蒋总统集》第 2 册，台湾国防研究院印行，第 1597 页。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 22，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1984 年 10 月，第 30 页。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 11 页。

8月5日，是原定毛泽东和斯特朗会见的日子。但是一阵晨雨后，延河水暴涨无法过河，只得推迟会见。6日，河水消涨，斯特朗乘卡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热情欢迎她的到来，陆定一充当他们的翻译，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便开始了。这次谈话对斯特朗一生有决定意义，对当时指导民众认识当前形势也有巨大意义。斯特朗对这次会见作了很生动的回忆。她写道：

毛泽东身材魁梧，毫不拘束，举止象美国中西部的农民，缓慢、有力而从容。他那略带扁平的圆脸上，有一种平静而含蓄的表情；微笑起来就变得生动幽默了。在乱蓬蓬的浓密黑发下，高大的前额和敏锐的眼睛表明他的思想活跃，富于洞察力，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注意。一种高深而又具有灵活性的理智支配着他，使他生气勃勃。

他身穿一套普遍的深蓝色布制服装，态度不慌不忙，沉着而友好。

我们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平坦的土台上，下午慢慢地过去了，落日给贫脊的山丘增添了光彩。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陆定一翻译得既快又谨慎，使我感觉不到语言上的隔阂。

毛认为谈论美国同苏联之间的战争——当时是1946年末，冷战已经进行了一年——主要是“反动派放出的一种烟幕，用以掩盖更为直接的许多矛盾”。战争或许终究会发生，但是他认为可以加以制止。因为苏联不要战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的右翼”才要战争。有关战争的议论，以及煽动反苏的恐惧心理都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因为这样就给了它一个借口来控制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公民权利，也给了它一种武器去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毛说，但是要同苏联作战却不是那么容易。不可能直接发动这一类战争。“必须通过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和中国来发动。”

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毛笑着把茶杯和白色小酒杯放在桌子上，表明“美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不但有“美国人民”的障碍，而且在它和苏联中间还隔着一长串其他国家，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被拖入战争。他把火柴盒和香烟放进长长一串的行列里，风趣地说着它们代表什么国家。他说，如果很好地唤醒人民，“各国人民的合作”是会强大得足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取得胜利，否则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谈到从蒋的部队缴获的美国武器时，他称这些武器是“输血——从美国到蒋，从蒋到我们。”说到“美帝国主义”时，他讲：“它变得孤单了。它有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或病了，连盘尼西林也不能治好他们。”说起“反动统治者”时，他说：“他们是纸老虎。看样子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

他用了“纸老虎”这个词，看来很高兴，他停下来了，问我是否体会到它确切的含意。陆定一最初把它译成“稻草人”。毛让他停下来，请我解释什么是稻草人。他听后拒绝使用这个词。他说纸老虎不是插在一块田里的死东西，它吓唬的是孩子而不是乌鸦。人们把它做得象只危险的猛兽，但实际上只是用纸压出来的，一遇潮就软了。

毛解释后就接着说下去，用英文讲“纸老虎”，并且对自己的发音感到好笑。他说在俄国二月革命以前，沙皇看上去强大而可怕，但是一阵二月的雨就把他冲跑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

毛笑着用英语说：“蒋介石——纸老虎”。

“等一下，我是记者。我能够报道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么？”

毛答道：“不仅仅是这几个字。”他还在笑，然后义象一个要把话说得

十分准确而恰当的孩子一样，慢吞吞他说：“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抛弃人民并向他们发动战争——这，就是他正在做的事——他就是纸老虎，雨水会把他冲掉。”

“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因为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弹，也不是油田，更不是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对于这些人还要进行教育。”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在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只有小米加步枪。但最后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要比蒋的飞机加大炮要强些。”

问：“他们还有原子弹呢！”

毛答道，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搞臭了自己。世界人民反对它。”“归根到底原子弹不会毁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毁灭原子弹。”

“原子弹的诞生”，他停了一会说，“正是美国帝国主义者灭亡的开始。他们依靠原子弹而不依靠人民。最后原子弹不会消灭人民，而人民却会消灭原子弹。”

当毛泽东和夫人用煤油灯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我走下山坡时，已经接近午夜了。我们来到卡车等候着的小路旁，相互道了别。毛泽东站在小山上，注视着车子颠簸着往下开入延河的河床，溅起了浪花。在荒凉漆黑的延安山丘的上空，星星显得非常明亮。

之后，斯特朗还数次见到毛泽东。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夕。那是斯特朗离开延安前的晚上。那天斯特朗接到周恩来的邀请去和毛泽东告别。傍晚，斯特朗由“美军大院”来到杨家岭礼堂，在这里正在演出告别延安的晚会。斯特朗在剧场里见到了中共大多数领导人。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带斯特朗到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还有茶和花生。在那里，毛泽东和斯特朗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毛泽东不同意斯特朗打算随中共中央一起到山里去。他指出，斯特朗在延安的访问，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了解这里的一切情况，她应当带着这些情况和她的看法向全世界公布。毛泽东预言，当我们再次同外界取得联系时，大约需要两年。那时斯特朗还可以再回来。毛泽东认为，斯特朗没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带到莫斯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美国人民需要知道这些情况，而莫斯科不需要它。毛泽东要斯特朗把延安的情况直接带到美国，很明显，他是要让美国人民知道，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发动中国的内战，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是违背美国人民意愿的，是无望而非正义的。美国反动当局必须对中国的内战负重大责任。他希望美国人民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有力地制止美国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

第二天，斯特朗从延安飞到上海。她要把延安的情况向世界各地传播，特别向美国传播。3月11日，美军观察组也撤离延安，延安便不再有一个美国人。4月，斯特朗在《美亚杂志》上发表毛泽东和斯特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6月5日，《群众》杂志香港版第19期转载了这篇谈话，题目是《毛泽东论世界形势》。

以上引文摘编自：《斯特朗在中国》和《中国人征服中国》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9—43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第6—7页。

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这篇谈话，震动了世界，它远见卓识、闻名中外。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明确地和有声有色地重申原子弹是“纸老虎”这个重要观点，毛泽东的观点至今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很重要。与此鲜明对照的是，1948年初，当苏联在自己的核武器计划方面获得进展的时候，斯大林却大声赞美原子弹是“一个有威力的东西。有——威——力！”

的确，毛泽东宣布一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也是纸老虎，这绝非狂言，而是有根据的。其最充分的根据，就是中国人民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富于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和中共领袖们来说，“纸老虎”并不是一个新提出的论断，在中国现代革命斗争史上，广大革命群众和中共领导人，早就屡次证实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千真万确的论断。

1922年香港侮员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在中国横行多年，从来骄横残暴的英国帝国主义第一次向中国工人阶级低下了头，暴露了它的虚弱本质。中国工人阶级志气大振，工人群众在欢庆胜利的爆竹声中轻蔑地称英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24年，英国帝国主义支持香港和广州的买办资产阶级举行商团叛乱。中国共产党协助孙中山迅速将广东商团的反革命叛乱镇压下去，广州革命群众齐声欢呼，再次戳穿了英国帝国主义和商团这个“纸老虎”。

与此同时，党的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邓中夏等，也曾使用“纸老虎”来论述问题。

1922年，恽代英在一篇宣传民主革命的文章中，例举封建统治阶级种种复辟倒退行为都遭到可耻失败的事实时，指出：封建主义者总是要把自己打扮成真老虎来吓唬群众，但是，“纸老虎是不好戳穿的，一经戳穿了，还盼望用愚民政策，使他再信这个是真老虎，这简直是可笑梦想。”恽代英肯定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要群众相信它是“真老虎”这是办不到的，纸的就是纸的，它一经戳穿便原形毕露，剩下了一个空架子。

同年，中共理论家蔡和森在批判胡适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时，也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说成是纸老虎。中共“二大”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口号，胡适却把军阀和帝国主义看得无比强大，他鄙视人民群众的力量，认为群众对于军阀这种庞然大物无可奈何，唯望采用西方议会的办法来制约封建军阀。蔡和森无情地嘲笑胡适编造的这个神话，其实不过是“知识者的纸老虎。”他指出，依赖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封建军阀，他们到处为祸作乱，貌似强大，虽有凶恶的一面，但实际上只是“未曾解除武装而且反为新统治之主人的封建余孽”罢了，他们与历史上的反动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本质一样都是虚弱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革命一样能战胜他们。“不要以为除了革命还有别的出路，不要以为革命没有办法。”他指出，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人民一边，他们具有“浩大不可抵御的革命势力。”“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

邓中夏也把英国帝国主义称之为“纸老虎”。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省港工人罢工，省港罢工工人对香港实行全面封锁，使香港变成“饿港”、“臭港”、“死港”，英国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邓中夏

〔美〕斯日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恽代英：《民治运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

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据此指出：“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使这只纸老虎原形毕露。

毛泽东还记得，红军在中央苏区时，在作战的新闻报道中，也常使用“纸老虎”这个说法，《新中华报》便使用过“白军是纸老虎”的通栏标题。毛泽东自己过去也使用过“纸老虎”这个说法。1940年2月1日，在延安讨汪大会上，他用“纸老虎”这个说法来揭露顽固派的虚弱本质。他说：“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气，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穿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如果说，在中共和人民革命力量还非常弱小的时候，中共领导人便敢于直面庞然大物的反动派，宣布它们是能够戳穿的纸老虎，那么经过二十多年斗争锻炼之后，毛泽东就更有理由和信心宣布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是纸老虎了。当然，这不仅需要勇气和胆识，而且更需要有充分的依据。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它的黄金顶峰的时候，在它拥有独一无二的原子弹的时候，全世界许多人都被它的气焰所吓倒，这时候，能够无畏地、正气凛然地宣称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种磅礴的气概，没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勇气和远见卓识是办不到的。毛泽东不仅具有这种勇士般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从马列主义中，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中获得了辩证法的智慧，这使他能够透视这个庞然大物，看到它的虚弱本质。

毛泽东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的确有强大的一面。美国在太平洋上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大得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它企图把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同时它拥有原子弹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如此种种，不承认美国的强大的确没有道理。但是，毛泽东肯定，这种强大是表面的，一时的，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只纸老虎。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看问题的。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一样，美国帝国主义的强大也具有二重性。由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强大，它在世界上到处扩张，到处扶持各国反动派，这就使它和各国人民之间形成尖锐的对抗和矛盾，在人民还没有觉悟时，它是强大的，不过美国的扩张和侵略起到了教育人民群众觉悟的作用。“不要许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毛泽东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好事的辩证分析中，说明了美国的强大最终将转化成为虚弱的道理。

至于原子弹，它也只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种东西。在毛泽东看来，第一，原子弹虽然是一种大规模的杀人武器，但是它不可能把人民全部毁灭，只要它不能把人民全部毁灭，那么决定战争胜败的仍然是人民；第二，原子弹是要人来掌握的，原子弹掌握在反动派手中，便成为屠杀人民的武器，必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它在广岛的大爆炸搞臭了自己，全世界人

《邓中夏文集》第178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二版，第71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194页。

民禁止原子弹的呼声高涨，人民的力量能够迫使反动派销毁原子弹。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弹也只是一只纸老虎。

毛泽东认为，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不仅应当从辩证法角度看待它，而巨应当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它。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的实践代表历史的潮流，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反动派，不管它们一时如何强大得不得了，它们终究会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中，被证明为是一戳即穿的纸老虎。沙皇是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只能是如此。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向斯特朗、向美国和全世界人民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美国，另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所谓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就是从发展变化中，从斗争中看问题。在长期斗争中，人民的力量总是会由弱而致强，最终超过反动派的力量，战而胜之，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毛泽东由此对已经爆发的内战前途得出明确的结论：“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是一个亚洲中国荒凉的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山间小城，对繁华的南京和大洋彼岸发号施令的美国白宫毫无顾忌的宣言，这个只拥有一些破枪、穿着土布衣服的毛泽东，竟敢轻蔑地宣称拥有原子弹、为许许多多人畏惧的美国白宫的主人为纸老虎，以不屑一顾的气概慨然宣布迎接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挑战，这不能不使世界震动，不能不使那些吓唬人的白宫主人沮丧；不能不使世界人民由衷地佩服他的胆识、卓见和勇气，从而受到鼓舞，产生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毛泽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个对世界新霸主表示蔑视的人，是第一个预言世界仍然只能属于人民的人。他的气概、他的智慧、他的勇气、他的自信为自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起了一座丰碑。

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标志着毛泽东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巨在实际行动中与美国政府当局展开了全面斗争与对抗的时代。他针对蒋介石和美国当局而提出的“纸老虎”理论，是战后他针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它已成为鼓舞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彻底革命的科学理论。在后来的实践中，它被无数次斗争事实多次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自己高度重视他和斯特朗谈话的意义。他后来回忆说：“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军队。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19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195页。

会打赢它。”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发挥了 he 这个著名的理论。

肃清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影响 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对这场内战的性质作了科学分析。他指出，从实质上看，中国的内战不仅是中国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之间争夺政权的战争，而且是中国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它是抗日战争的继续，是中国人民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的继续。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而现在中国人民面临的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中国人民为敌了。蒋介石发动的战争，就“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美蒋反动派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除了斗争，别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这场内战的性质决定，中国人民在国内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反动派，在国际上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反动派。我们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对付美蒋两个结合一体的敌人，即是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又反对蒋介石封建买办集团。因此，对美蒋反动派必须予以坚决斗争，坚决揭露。

毛泽东要求全党和全国人民彻底打破对美国当局的幻想，要彻底认识美国当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既定方针，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他揭露蒋介石和美国签订的《美蒋商约》，是对中国的无耻大拍卖和美国殖民政策对中国的大掠夺。蒋介石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不惜出卖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权益于美国，为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扩张提供方便。1946年11月4日，蒋介石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友好”条约是对中国的一次大拍卖和大掠夺。条约规定：在权利方面，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的自由，其经营范围包括“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并为此可以在中国购买、保有、建筑和租借土地、房屋与产业。美国的“法人及团体”，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的待遇相同”，这就是说，中国的领土完全无异于美国的领土了。在税收方面，美国商品在中国“之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植物、出产物或制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任何禁止或限制”。就是说，美货就等于中国货，中国关税不能拥有采取保护政策的权利。在航运方面，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货物可以经由“最便捷之途径”、有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不得课以任何过境税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延迟或限制。”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遇到“任何危难”，均可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船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中国应对其采取“友好之待遇及协助”。这样，中国的航路、海港、陆道便变成了美国的航路、海港和陆道了。

毛泽东揭露，《美蒋商约》，乃是历史上最可耻的卖国条约，是蒋介石

《毛泽东选集—至四卷第二版编辑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46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2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45页。

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蒋介石把中国一切经济命脉双手奉献给美国金融财阀，把中国变成了美国商品所独占的殖民市场，使中国人民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蒋介石“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的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的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为捍卫中国的主权而斗争，把签订中美商约的国民党政府负责人员当作卖国贼惩办。

他揭露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内战实行的军事援助。他指出，蒋介石所以悍然发动反革命战争，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是依靠他们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是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蒋介石以为美国能够象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他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成为蒋介石敢于发动内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确也不遗余力予以支持。“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大批美国军事顾问给蒋介石出谋划策，“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美军人员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不仅在台湾一地，而且在南京、沈阳、北平、徐州、西安、汉口、成都、重庆、韶关以至新疆；所有训练军队的机关，都有美国人参加，训练蒋军使用新式武器，屠杀中国人民。蒋介石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蒋介石把中国人民投入了血海之中。“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运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美国帝国主义对蒋介石的全面支持，是它陷中国于黑暗、把中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必要步骤。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要清醒地认识这种情形，不要对美国帝国主义抱任何幻想。

毛泽东要求全体军民正确分析和认识美国对蒋介石援助的作用。内战一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37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13、1258、1237、1248、1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13、1258、1237、1248、1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13、1258、1237、1248、1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13、1258、1237、1248、1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13、1258、1237、1248、1376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376页、第1246页。

开始，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已达四十亿美元（包括武器、物资和借款），超过了战后美国对英国借款的总额，超过联合国救济总署一年中对全世界救济物资的总额。美国给蒋介石如此巨大的援助，就是要帮助蒋介石打赢这场反人民的战争。毛泽东并不否认，美国的援助，对蒋介石的确起了一些作用。如果没有美国帝国主义的撑腰与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日子会迟一些，其因内战而灭亡的日子亦会早一些。但是，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尽管如此，无论美国多少亿无的援蒋计划，也改变不了中国反动派灭亡的命运。一年的战争已经证明，美援造成的蒋介石的物资的优势，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了物质的人民革命力量，才能有真正的优势。他说：“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背向，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我们有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有了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美国的援助，只能对临死的病人起强心剂的作用，根本阻挡不了人民革命埋葬蒋介石政权。蒋介石从美国人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但只充当了运输大队长的作用，这些东西最终将转移到人民手中。事实正如此，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把从美国得到的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式武器装备都转送到人民军队手中。连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美国援助蒋介石的大量军事物资均已为中共军队缴获。“据信所有美国装备已经损失 80%，是确定损失大小的正确基础。在这一数量中至少有 75%的军火已被共军缴获。”“据目前所知，共产党已因空军的叛变，获得相当数量的美国制造的飞机。”1948 年，毛泽东诙谐地对警卫战士开玩笑说：如果我们去找苏联要武器，还不如要求美国多援助蒋介石一些武器，再由蒋介石把武器移交给我们，既不用打收条，又不用花钱，那多好呀！

毛泽东坚信辩证法揭示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只是次要原因的道理，一切事物发展都是如此，一万年以后也是如此。当然，对于美援这个外因也不是简单地蔑视它就就行了，还必须认真对待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了对付美援的具体办法，这就是：第一，是努力打蒋，打蒋打得愈痛，美援将愈动摇。第二是骂美骂蒋，引起美国的顾虑。第三是打美国人，美国怕死人……我们的对策是一出来就打，美国就不敢吭气。这三种对付美援的办法，有效地对抗了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

舆论宣传是行为的导向。毛泽东要求新闻报道要着力于揭露美蒋反动派的虚弱本质，帮助群众树立起美蒋必败，人民必胜的坚强信念。1946 年 9 月 27 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信中，要求在宣传上要有一个转变，在这之前宣传的重点是肃清美蒋散布的“和平”欺骗所造成的幻想；在这之后，则应重点宣传美蒋必败，人民必胜的道理。他在信中对陆定一说：文章的写法官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二版，第 1376 页、第 1246 页。

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6 册，453 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 134 页。

他要求宣传要重点向人民群众说明，敌人虽然有二百万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然已经占去了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美蒋必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要把宣传口号转移到“我军必胜”方面，同时提出“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以进一步打破美蒋和平攻势的欺骗。要求举行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并将致电联合国及美政府要求美军撤退与不干涉中国内政，进而将此运动和宣传转为揭露美军暴行，向司徒抗议等。

毛泽东强调，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不断肃清美国帝国主义在国统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中散布的影响和存在的亲美情绪。他指出，一部分受美国帝国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在人民斗争的大风暴中，依然还看不清方向。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的，似乎还是美国好些，他们对美国存在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中国讲平等，讲互利。毛泽东分析这种具有亲美倾向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主要地是长期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接受西方价值观的结果。他们幻想在中国走欧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因而对人民革命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对于他们必须以事实进行教育，帮助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对于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由于他们也对美国蒋介石存在某些幻想，对于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因而幻想在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寻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实行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在他们接受事实的教训，放弃幻想，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之后，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和“中间地带”的理论，以此分析世界人民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形势。毛泽东强调，在战争深入发展的时候，必须经常向人民群众讲清形势，特别是要让广大群众认清美国帝国主义在世界人民革命斗争中怎样朝着不利的形势发展，以增强人民斗争的信心。他指出，认清美国帝国主义所处的形势，要给予群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方法论，要着重分析：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不是解决了而是发展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受到了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大大地加剧了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垄断集团的争夺。美国帝国主义决不是如各国反动派想象那样强大。

毛泽东要求广大群众从美国帝国主义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中，观察它所处的形势。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那样强大呢？是否真能象流水一样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中的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象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为此，毛泽东号召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1948年4月30日，他为中共中央拟就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其中号召中国工人阶级和世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口号有：“十七、蒋管区的职工，联合被压迫的民族工商业者，打倒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十八、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十九、中国工人阶级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亚洲、欧洲和美洲民族解放运动、民主运动和职工运动！二十、向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援助中国职工运动的世界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拒运拒卸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援蒋物资的各国工人阶级致敬！向并肩反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各国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致敬！”毛泽东在口号里，表达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战斗，一定能制止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定信心和决心。

在分析美国所处的形势时，毛泽东援引日丹诺夫关于“两大阵营，的提法。1947年12月底，他第一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他指出，世界形势的变化，冷战的出现，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于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象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就使当今世界出现了两大阵营的斗争。毛泽东肯定，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已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的严重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各国共产党的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他们是不可能的，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将陷于孤立。

毛泽东从美国所处形势的分析中，形成了较之1946年对美国更进一步的看法。毛泽东看到，美国不仅在中国支持蒋介石反动政权，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支持各国反动政权，到处伸手，干涉他国内政。特别是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美国国会发表关于“援助希土”的演说，更公开暴露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面目。3月26日，《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杜鲁门的这个演说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杜鲁门抬起了反共的旗帜，这面旗帜乃是希特勒用过的，破烂了的，失败了的，臭不可闻的反动旗帜；第二是杜鲁门公然宣言要去援助象希腊这样的“民主国家”，这个“民主国家”的卖国、专制、腐败、黑暗，是在世界上列于第一等的；第三是杜鲁门开了一个先例，如果过去美国帝国主义干涉别国内政时还总想办法至少表面上要取得别国或几个强国的同意，那末这次干涉希土，就为了“美国的安全”，干脆不得任何国家的同意而独断专行。美国政府奉行的这种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政策，以及它支持各国反动势力的政策，成为毛泽东提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这个概念的根据。从这时起，他产生了要从两个阵营的相互关系中，分析中国与美国相互关系的认识。他要求把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纳入反对美国为首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8—1949），第112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59页。

《不是炸弹而是哀鸣——评杜鲁门反共演说》，《解放日报》社论，1947年3月26日。

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来分析判断它的性质，它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它的意义。他指出：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因此，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不仅具有独立解放的性质，而且具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抗的性质，它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它的斗争将有力地打击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

毛泽东的两个阵营的划分理论，是针对国际形势新变化的情况提出来的，是他的国际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理论的具体化，也是中国共产党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坚决倒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的标志。两个阵营划分的理论的提出，为他观察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根据，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初期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毛泽东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是和他的“中间地带”的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中间地带”的理论，又是和他对战后美苏关系的分析相联系的。毛泽东针对二战之后“美苏必战”的论调，肯定这种看法缺乏现实可能。美国现在还不可能发动侵苏战争，这是因为在美、苏之间还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他指出：

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一个十分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把美国与苏联的直接斗争变成了一种缓冲形式的斗争，“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美国的全球战略，首先在于使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屈服于它的霸权之下，仰仗于它的保护，从而组成反苏反共的同盟；对于亚、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在于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动势力，压服和消灭革命势力和进步势力，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使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彻底臣服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因此，美国目前不是直接向苏联进攻的问题，而是与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的问题。

根据广阔中间地带存在的情况，当前世界主要矛盾是中间地带的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美国反动派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使美国不可能立即发动反苏战争。当然，美国帝国主义的确是在准备反苏战争的，但是在现实上还不可能。首先就是上述矛盾的存在绊住了它的手脚，其次是美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因此，反苏战争的口号，一方面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施放的烟幕；另一方面，是用以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即与苏联争夺广阔的中间地带，所以反苏战争并不是立即就要进行和立即就可能进行。这种情形，和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反苏战争”的口号作幌子，加紧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行侵略的情形，颇为相似。“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同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4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193页。

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如此。”因此，提出“美苏必战”，被反苏战争的口号吓倒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指出，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人民斗争，对于世界形势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不是美苏的力量起着关键作用。美苏之间，是否爆发战争，并从而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之间各自的意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间地带的人民的革命斗争。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向前发展，是美国同苏联达成某种妥协的前提条件。因此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某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为了战胜美国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向世界民主力量的进攻，美国人民、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必须组成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战线，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力量，这个统一战线的力量，无疑会得到苏联的同情和支援。

毛泽东针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关于“两大阵营”的理论，是他战后针对美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这些理论是他在分析美国的政策，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等方面之后形成的，是他对美国政策认识的一个深化的结晶，因而构成了他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进行到底

戳穿司徒雷登支持蒋介石进行和谈的阴谋 内战全面爆发后仅一年，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便由防御转入了反攻。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共俘敌46万3千人，毙伤了31万2千人，争取起义5千人，合计消灭敌正规军78万人；歼敌非正规军114个团、54个营、一个日本大队，共俘敌21万4千人，毙伤11万4千人，争取起义5个团、2个营共1万2千人，合计消灭敌非正规军34万人。以上两项合计，共歼敌军426个刚、俘敌67万7千人，毙伤敌人42万6千人，争取起义1万7千人，合计消灭敌军112万人。

毛泽东指出，战争进程的发展，证明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之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要快些。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人民革命战争已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47年9月，中共中央将战争初期提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口号改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0月，毛泽东在他亲自拟定的《中同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基本政策，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要求：对于一切战争罪犯，必须缉拿归案，那怕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

在中国人民革命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祭起“和谈”的法宝，企图为蒋介石争取喘息之机。马歇尔使华期间，1946年7月，根据马歇尔的提议，杜鲁门任命所谓“享有对全体中国人民都友好的美国自由派人士的名声”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出生在美国的美国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战期间坐过日本人的监牢，平素口称爱美同也爱中同，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一些影响。司徒雷登自我感觉良好，曾说“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

司徒雷登在协助马歇尔担任国共谈判调解人期间，竭力袒护国民党，为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时间。他对中共的动向极为关切，对于毛泽东的言行注意搜集。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司徒雷登在搜集到此报告以后，详加研究，并空邮送呈美国国务院。1948年1月9日，他在致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报告发表了如下评论：

“（一）胜利信心的语调，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经获得，虽然毛氏小心地指出还需要更大的牺牲。（二）继续与讥讽地攻击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战绩战报》，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27页。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

国是世界的大敌人，是对中国连续不断的内战负责者。毛氏无尽地重复申述此点，说反动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人。虽然近数月来，都看到了日渐增多的对美攻击，但这是头一次该党最高领袖之一，公开参加这种叫嚣。

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来说，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率直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他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

该宣言非常注意说明应不顾一切遵行土地改革纲领之必要，以满足农民的希望而不顾对那些占有土地者的代价如何。这与大使馆近数月来所收到的关于土地纲领之进展的零散报告是一致的。

有意义的是，他们呼吁中农的支持，毛氏说他相信中农将愿意为共同幸福而作某些个人牺牲。不过，对于任何反对土改者不予宽容的威胁，无宁是说明了共产党人不拟专赖良心以求合作。与中农调和的姿态也只能认为是一种宣传策略，可以随意改变的。

重要的是，这一声明与一年前陆定一的新年文告相比较，是更进一地离开毛氏1945年4月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特点即口头上的协调与温和。大使馆觉得毛氏与全世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提出的论点和谩骂有着显著共同之处。大使馆也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跟从着列宁在其四月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路线的（除了目前情况所需要的一些例外，更甚于过去任何时期）。目前一切证明指出共产党愿意并企图去采取与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以达到最后目的，即完全的权力。甚至于暧昧不明的字汇也不能模糊这样的事，这就是毛氏所说，而且也不能掩盖他认为这将实现的信心。”

司徒雷登的上述评论，对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所表示的强硬态度感到惊慌，把它诬蔑为“叫嚣”、“谩骂”，尽管他使用了这些非常敌视的字眼，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进攻无比蔑视，他们有决心、有信心从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这些不能不使他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深深地忧虑。

一年多的中国内战，使这个“中国通”的司徒雷登看到蒋介石的军队“素无斗志，贪污腐化，臃肿无能”，在战争中不堪一击，依靠武力根本不能战胜中共，因而，他乃主张与中共进行和谈，达成“纯粹地域性的、只是暂时的休战”，来为国民党争取喘息之机。

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通过司徒雷登通知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声称将派张治中来延安谈判和平。这是司徒雷登和蒋介石导演的又一次欺骗中国人民的“和谈”。

中共中央负责人为此指出：如果去年一月马歇尔与蒋介石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撕毁干净，而马歇尔则主张片面援蒋，发动内战，则现在又由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不是欺骗？

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尖锐揭露司徒雷登导演假“和谈”的欺骗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50—851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22页。

性质。社论指出，以蒋介石这样一个毫无信义，而且以背信弃义为当然荣誉的人，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现在居然又嚷起“和平”来了。这岂不是活见鬼？

毛泽东也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就是要“就地停战”下来，让他得到休整时间，巩固统治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取得美国政府五万万或更多的借款和军火援助，有了再来大举进攻的力量，那时蒋介石还必定要更加无法无天。“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我们一定不要上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当。

司徒雷登对假“和谈”有特殊爱好。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往访蒋介石，与蒋谈到“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取和平”的问题，蒋介石予以推脱。司徒雷登谋求的“和平”，其目的不是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而是想要造成中国的分裂状态和地方割据状态。就是要在“一个松他的联合的基础上来安排停战，并在划分领土时尽可能留出一片广大的中国地区，保存着一个或者几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如果中同回到地方割据状态，美国的经济援助应该用以加强地方政府，“使中国人民的反共的基本特质能够继续坚持，并相应地削弱对于共产党的同情。”美国政府不同意司徒雷登的上述建议，认为按这种办法去做，可能造成如同东欧联合政府那样，最终为共产党所吞并。8月12日，美国政府指示驻华使馆称：“一、美国政府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和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二、美国政府无意再度担任中国的调解人。”

1948年11月26日，南京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代理外交部长。12月28日，司徒雷登往访吴铁城。吴铁城向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在军事上已允办法，准备考虑“光荣的和平”。他试探请求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是否可行。12月25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又向苏联发出“和平解决”的要求。美国政府也颇希望国民党在“在光荣的条件上获得和平”。美国政府和司徒雷登的一轮新的“和平”攻势，又在喧嚣的锣鼓声中开始了。

对于蒋介石政府，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策划的这一轮新的“和平”阴谋，毛泽东坚决予以戳破。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从几个方面揭穿了美国和蒋介石卖国政府策划的这一“和平”阴谋。

首先，毛泽东指出，从反动派的本质看，他们绝对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他们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向人民投降。美蒋在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单纯的军事斗争已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转而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利用“和平”的阴谋，正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就是司徒雷登所说那样，力图在中国建立非共产党的政府，以便使他们在华继续立脚下去。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揭露：“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

《毛泽东新闻工作义选》第262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8页。

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

其次，毛泽东指出，只有彻底消灭反动派，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来，到1945年重庆谈判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共和中国人民无不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国民党能建立国内和平，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撕毁和平协议，把战争强加给人民。现在，当他们在军事上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时候，“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大谈什么“光荣的和平”，粉饰他们“从来是追求和平的”。美同的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年12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只要从历史事实中便可以知道，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国政府玩弄“和平”，只不过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他们不过是一条冻僵了的蛇，如果我们接受它，一旦它苏醒过来，便会对人民狠狠地咬上一口，而置人民于死地。因此，对于恶人不应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把蒋介石及美国在华势力彻底消灭。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了所谓“和平”的五个条件。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的评论，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身分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和平”乃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四人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同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同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那就一概不可以。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先决条件。

司徒雷登对毛泽东的声明简直气急败坏。他感到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极其苛刻，几乎等于让人无条件投降。”尽管如此，他认为暂时达到和平毕竟对国民党统治有利。因而他应国民党政府的请求，要求美、英、法、苏四国出面斡旋。“我请求四国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有关国家政府也都及时作了回答，但都婉言拒绝了。”司徒雷登的使命宣告失败。毛泽东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说：“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德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

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揭露司徒雷登在贩卖“和平”阴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2月15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写道：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374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376页。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08、209页。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08、209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09页。

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毛泽东对于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个”，一手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甚为鄙视，称他是搬起“和平攻势”的石头，最后却打在自己的脚上了。

司徒雷登在离华的最后时刻试图见到毛泽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出于无奈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22日，毛泽东在他改写的新华社发表的《蒋介石打“引退”真相》的消息中，揭露蒋介石的“引退”只是美国政府换马的把戏，司徒雷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的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李宗仁上台后，在美国支持下，以“和谈”为烟幕，欺骗人民，同时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兜售划江而治的计划，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但他的企图很快破产。4月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更张、万船竞发，胜利地渡过了长江，23日占领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迁到广州。1月26日，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司徒雷登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大使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1月19日的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和其他属员随同前往，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美国国务院也有此决定，杜鲁门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国务院和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司徒雷登在谈到他留在南京的目的时说：“我非常想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意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我还希望所有的外交官继续同我们一起行动，所以我要北大西洋集团的使节在下一个礼拜再举行一次会议。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向各个使节派出国的首都，也包括华盛顿发了函件。”

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他认为，以前燕京大学校长的身分，可以影响许多已经在共产党中处于重要位置的他的学生。“他作为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西方的政策。”3月10日，他给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资格，而是以个人的资格”和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司徒雷登试图以他的特殊身分向中共领导说教，要他们相信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他要警告那些中共领导人，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现代民主，而把苏联的专制政体的模式移置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31页。

〔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以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口吻，盛气凌人地还想给中共领导人一次当面教训。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但要求他不要把话说绝，不要走漏风声，以免引起国会反对派反对。

毛泽东亲自掌握中共外交政策，他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他指出，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承认的问题，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应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与帝国主义建交，这样对防止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乱有好处。周恩来也指出，必须“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对于美国，毛泽东则着重强调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就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处在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根据上述精神，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任何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但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利益和人身安全。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毛泽东指出，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使司徒雷登大为恼火。他把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看作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但是，他负有“特殊使命”，因而只能以无可奈何的心情等待事态发展。“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分听从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与指点。”他十分急于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以探听中共的真实意图。

司徒雷登对中共外交路线的理解是片面的。毛泽东制定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不含有丝毫的排外性质，它是为着与各国建立正常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页。

《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41页。

的外交关系而积极工作的。基于此，5月初，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事会议，考虑到美同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上海，决定派黄华到南京去从事外交工作。

5月6日，司徒雷登派他的秘书傅泾波求见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即王汝梅）。黄与傅泾波有同学关系，同为燕京大学的毕业生。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傅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怪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同意。黄华对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了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多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前往司徒住处，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意参加中国内战。他已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表示，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对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进行多方辩护，并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划脚。黄华指出，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正式表示，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一次，并声称他想去北平的意图是得到美国 国务院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的。会见后，黄华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来北平一访，但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乃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于6月16日给司徒雷登一封英文邀请信。信中说，陆志韦会见周恩来先生，周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司徒雷登希望黄华去电北平，问明陆志韦来信是否可靠。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已获北平来电，同意他的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听此消息，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6月24日，星期四。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要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

6月28日，星期二。

傅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消息是他下午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一个小时。

从司徒雷登的日记中，反映出司徒雷登是从两条线和中共领导人联系的。一条是通过黄华，另一条是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陈铭枢。6月10日，陈铭枢前往北平时曾在南京会见司徒雷登。陈铭枢将上北京参加政协筹备会，司徒请他探问是否有与中共最高领导会晤的可能。6月24日下午5时，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此行的目的。他认为，北平一行与毛、周晤谈，他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派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此行也会有消极后果，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而引起非议；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他强调说毛、周、黄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等待答复。他希望国务院尽快作出指示。与此同时，司徒雷登积极准备成行，他通知在北平的朋友们说，他有可能上北平。但美国国务院此时却以“国内可能产生不利反应”为由，于7月1日指示司徒雷登不能去北平。司徒雷登遂于7月2日告知黄华。

黄华回忆说：“7月2日，傅径彼来访说，艾奇逊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他回闷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我即告他，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清而同意他去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傅径波问司徒雷登返美后如何保持联络，我告以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他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他会晤后，立即返回华盛顿。

7月9日，陈铭枢会见了司徒雷登，并将他们的几次谈话整理成备忘录，交与司徒雷登。备忘录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革命的分阶段简

《司徒雷登日记》第42—43页。

中同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5页。

《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6—767页。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1页。

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国出现。这一点共分四个方面叙述。陈铭枢向司徒雷登介绍了他对毛泽东及中共领袖的观感，对人民解放军、支前民工和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印象。

他向司徒雷登介绍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泽东，下至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将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对没有寒暄。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

陈铭枢针对司徒雷登对中共“一边倒”的方针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所作的错误理解进行了说明。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到，中共原则立场的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犹如毛泽东指出那样：“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这两段讲话，全面地解释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当然完全适合美国，而且主要是针对美国讲的。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坚决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的研究者们后来针对毛泽东的态度指出，实际上“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他：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我作这些阐释，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部主席陈铭枢将军备忘录》，《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65页。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66页。

〔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75页。

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已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

在陈铭枢的夫人罗海沙为陈铭枢所作的备忘录中，记载了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毛泽东要求陈铭枢将这些意思转告司徒雷登。

陈铭枢转告说：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毛（泽东）仍然能准确地说出去年司徒雷登同陈的会晤日期。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当然不是指美国会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或者投入苏联的怀抱，而是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象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那样有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象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

毛泽东私下告诉陈铭枢先生，请司徒雷登先生读读他6月20日的讲话，他将从中知道他（毛）的态度。当然，他指的是这篇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在其中表示希望说，中国愿意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至于美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称法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

陈铭枢转告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的意见，应当说是可靠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死。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中一样，中美关系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过去中美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中国人民革命改变了这种关系，中美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平等的关系，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毛泽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朝前看的、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同时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历史已经过去，只有朝前看才有前途。抛开历史包袱对于中、美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只要美国政府本着朝前看的态度，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中美之间良好的关系就能建立起来。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对中美关系都抱着积极的态度，他在任何时候都关心着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也关心着中美新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他既有恢宏的气度，又有足够的耐心。但是，司徒雷登戴着有色眼镜，他看不到这一点，当陈从北平回来时，将载以谈话内容的书面报告交给司徒雷登。阅后，司徒雷登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报告中，“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司徒雷登的看法在美国政府中很有代表性，美国政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中国新政权的态度。

由于美国的方针既定，美国政府不愿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错误地把中国归结为苏联的卫星国，这就注定美国在关键时刻不可能采取纠正错误的政策，中美关系由此走进死胡同。

8月2日，司徒雷登及秘书傅泾波等一行八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指定的航线由南京飞冲绳返美。就在司徒雷登离华的第三天（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正如毛泽东指出，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看破了

《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

《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

《美国外交文件集》第8卷，1949年，第782—783页。

司徒雷登在南京原来不是要与中共进行联系，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而努力，而是想要通过他的努力，保持美国在中国旧的基础和造成一种反共的新势力，他的意图不能实现，便只好悻悻地回国了。毛泽东不无嘲讽地写道：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子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看得出，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抱着极大的自信，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四、评“白皮书”——中美关系的历史性总结

毛泽东作出“一边倒”的决策 司徒雷登把中美关系的最终破裂，归结为毛泽东对苏联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从而为美国敌视中共政权的作法辩护。他宣称，为了严厉打击中国内外那些以为经济困难就会迫使共产党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达成某种妥协的人，毛采取了一条绝不调和的路线：一方面以《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苏联拥抱，一方面否决那些认为西方的援助是必须的想法以及请求这种援助的意图。很显然，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实行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进行了曲解，当然这种曲解具有必然性，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认识，当时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从他们一贯的帝国主义逻辑出发，也会产生这种曲解。

毛泽东和中共实行的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的实质是什么？是不是“一边倒”就意味着中国倒向了苏联的怀抱，成为了苏联的卫星国或附庸？是不是就意味着中共政权在国家关系上将采取和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合作和敌视的态度？当时美国的政治家们对中共的“一边倒”政策缺乏认真的分析，也不愿意认真分析，他们从冷战的立场出发，毫不犹豫地把中共归结为苏联的卫星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的态度。他们对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熟悉，不理解，也不愿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帝国主义立场。

在陈铭枢提交司徒雷登的谈话备忘录中，陈铭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谈话的原意，对“一边倒”作了准确的说明：

“一边倒”这个术语指的就是政治路线，它决不能被误解为依赖别人的意思。如果那样理解，将是一种侮辱。它应当被理解为，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它还应当进一步被理解为，事关我们的民族独立，决不可能有依赖别人的问题。

而且，民族立场和政治路线不容混淆。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又彼此对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俄国的政治路线与英、美不同；然而，从民族立场的观点出发，俄国却能够同英、美并肩战斗。另一个例子是你们的华莱士先生，他对人民深怀同情，这自然与杜鲁门总统的立场相反。尽管如此，却不能说华莱士先生在美国的民族立场这一个问题同杜鲁门总统有分歧，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必定有着深厚的爱国热情。现在的中国革命，除了要根除封建和买办的影响，抛弃所有的外国锁链之外，还必须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我们必须赢得一个长久的和平建设时期，必须取得一个强大的地位。

陈铭枢记录的毛、周对“一边倒”的解释，强调了政治路线和民族立场的区别和联系。这是理解毛泽东制定的“一边倒”政策的关键。

“一边倒”必须准确地理解为中共的政治路线。中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现阶段，它是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而奋斗的，就政治路线的基本立场和意识形态来说，它与社会主义的苏联具有一致性；它要通过新民主主义制度而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就这一点说也与苏联具有一致性。一边倒从现象上来说倒是倒向苏联，从本质上说是倒向社会主义制度。就政治路线说，中共从来就是“一边倒”的，毛泽东在他一系列著作

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7页。

和讲话中从来毫不隐晦地阐明中共追求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主张，原因是只有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和繁荣富强，当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分步走，这是另外一回事。不坚持这种一边倒，中国就没有出路和前途。早在1948年，毛泽东便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在中国没有“第三条道路”好走，不是站在社会主义苏联一面，就是站在帝国主义的一面。“三十年的历史难道还没有证明：一切既不满意帝国主义，又不满意苏联的人们，一切站在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战线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地的走狗的人们的革命战线之间的所谓‘中间路线’，所谓‘第三道路’的虚伪的彻底破产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痛切地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不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一边倒”作为政治路线，保证中国有独立富强的前途，就这一方面说，它和民族立场具有一致性。但是，“一边倒”并不取代民族立场，就是说苏联虽然是社会主义之首，中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并不意味着中国便没有自己的民族立场或取消自己的民族立场，如果是那样中国便没有独立，这和从前有什么两样呢？“一边倒”是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的体现，在政治路线上“一边倒”意味着中共政权选择倒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这是独立自主作出的决定，决不是苏联从民族立场上压迫中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的政治路线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的意思。在民族立场上，独立自主是“一边倒”的题中应有之意，“一边倒”意味着中共政权为着已获得的独立，必须为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而斗争，“一边倒”就是捍卫独立和主权的一种措施，因为社会主义的苏联是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所以“一边倒”实质上包含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尊严的根本要求。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便并不拒绝与任何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方针，在当时具有现实的针对性。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美英帝国主义者曾一再顶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毛泽东对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嘘声恫吓轻蔑不置。上海回到人民怀抱中，人民有能力把它治理好。毛泽东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他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相信革命的逻辑，而只相信他们自己的逻辑。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及其他中共军队已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共产党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948年10月17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72—1473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87页。

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关闭匪区港口、断绝航运、摧毁匪区经济》的大字标题下，大肆鼓吹以上海为封锁对象。美国支持蒋介石对中共的封锁。（1951年，美国又操纵联合国通过了十六国参加的对华禁运的决定）这种封锁确实给新生的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毛泽东和中共面临着帝国主义经济扼杀的新的考验。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这也是一场严峻的斗争，这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干涉的又一形式。毛泽东愤怒地揭露美国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然而，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的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42年后，薄一波在回忆毛泽东这一外交战略方针的制定时，他肯定毛泽东的这一外交战略方针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引用邓小平1949年7月19日致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的精辟论述来说明这一问题。邓小平指出：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是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邓小平对“一边倒”的说明，很清楚地表明，就现实针对性说：第一，它是对美、英封锁政策的一个反击，是打破封锁之道的措施；我们有了个可靠的同盟军，有利于我们放手进行国内建设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很显然，实行一边倒在战略上能起到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第二，它是使我立于坚固基础之上的三大措施之一。这三大措施（占领全国、一边倒和自力更生）的全面实施，就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即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独立的基础上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同时不敢对我进行轻举妄动。第三，一边倒既然是外交路线，它就不能取代对内政策，对内政策的根本立足点是自力更生。如果用一边倒取消自力更生，一边倒就会以丧失民族独立为代价，中国革命的一切努力就将白费。所以一边倒与自力更生是相辅相成的。第四，一边倒不仅不排斥和西方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且决不排斥和西方进行正常的经济贸易。1949年，毛泽东访苏期间，11月22日，他电告中共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

即使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是高度重视和美国的经济往来的重要性的。

可见,一边倒的政策决不是一种偏狭的政策,也不是在外交上自我孤立的政策,它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又具极大的开放性;既具有倾向性,又具有广泛性;既具有社会制度的固有特性,又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灵活特征。如果美国政府能够冷静而灵活地理解这一政策,在中美关系上便不会走向极端。当然美国的固有政策,当权者一贯的偏见,以及美国国内情况,都限制了美国政策可能对这一政策作出清醒而如实的理解。中美之间长达 22 年的隔绝开始了。

毛泽东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三天,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关注和讨论。白皮书的讨论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力量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很具有教育作用。他要求通过白皮书的讨论,使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本质有一个透彻的认识,对历史上的中美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此,新华社接连发表了关于美国白皮书的六篇评论,其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为毛泽东所写。这五篇评论,是毛泽东对 1840 年以来中美关系的系统总结,(以下引文出自这几篇文章,不再注明出处)。

毛泽东尖锐指出,近代中美关系史,就是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他严厉驳斥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把“侵略”说成“友谊”这种黑白颠倒,系统地回顾了美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指出,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时间最长。“自从一八四一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共计 109 年,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这 109 年的最后 3 年,美国把对中国的侵略推向了高峰,“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美国对中国的长期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人民沦人万劫不复的苦难之中。

第二,手段最狡猾。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除了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直接采用武力的一手、赤裸裸的一手外,还大量地采用欺骗的一手、隐蔽的一手或趁火打劫的一手。“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传教也是一条。”美国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侵略原则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它最善于打扮和粉饰自己,明明是侵略,偏要说成是“友谊”;明明是掠夺,偏要说成是门户开放;明明破坏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偏要说成是“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明明是一手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偏要说成是“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如此等等。它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国人民对他们

的侵略必须表示感谢，必须把这一切看成是“友谊”的表现。美国帝国主义者，把对中国侵略的 109 年的历史，说成是一部对华的“友谊”史，但是，这样的“友谊”杀死了几百万中国人，使中国的“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毛泽东愤怒地戳穿其“友谊”的实质：所有 109 年美国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说穿了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掠夺中国、破坏中同行政和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这就是美国老爷的逻辑，艾奇逊的逻辑。毛泽东反复说明美国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狡猾性，不看到这一点是不行的。

第三，最注重于精神侵略。毛泽东重申他在 1923 年就形成的对美国侵略特点的判断，指出最注重精神侵略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突出特点。这种精神侵略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实行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内，更加注重文化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上。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存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四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美国的文化侵略，据艾奇逊说，给中国人带来了“盖世无双的技术”、“高度文化”和“新思想”，据说还带来了“进取性”、“友谊”等等。其实艾奇逊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时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它的目的就是要征服人心，只有征服了中国人的心，中国人才能安心做奴隶，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才能永久。其次，注意培养亲美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在中国培养亲美的知识分子特别热心，这是他们在中国办学校和吸引大批学生到美国留学的原因。“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悉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他们在中国造成了少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美国帝国主义者把这些人看做精神侵略的开路先锋，对他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通过他们把西方的价值观源源不绝地输送到中国来，征服中国人民的思想。就是它在中国遭致大失败的时候，它还要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洒一点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上述特点，表明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殊性，因而有必要予以特殊地分析。但是，不管怎样，美国的军事侵略，“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应当说，这一点也是美国帝国主义者预料到了的，只不过他们不肯承认罢了。

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早在 1858 年，马克思针对中国的问题，便指出过：对立统一是否是一个万应原则，只要从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中便能得到证明。马克思预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如同对立统一规律揭示那样，一定会走到它的反面，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和斗争。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国文明的伟大复兴，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美国白皮书根本不承认这一点，艾奇逊说什么：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于是便发生了革命。艾奇逊这样说，便是要掩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引

起中国革命这个铁的事实。

艾奇逊的看法如此不高明，以至于他连一个稍有实际眼光的美国人都不如。美国作家杰克·贝尔登便指出，中国革命同任何其他社会大革命一样，其前提是：一、社会处于解体中，它已病人膏肓，再也无法解决本国的迫切问题和保障人民的生活条件；二、人民痛恨现政权，广大群众中出现了革命情绪，人们被逼得走投无路，为了找到活路，准备不惜一切牺牲，铤而走险，视死如归；三、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集团丧失了一切创造精神，对把社会拉出死胡同毫无信心；四、出现了一个新集团或政党，能够利用上述各种因素来取得对社会的控制，并实施它自己的拯救社会的纲领。在贝尔登看来，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就存在着用革命加以改造的迫切必要性。但这革命一直没有完成，原因很简单：外来帝国主义的力量太大，不准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为远东最危险、最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日本被打败了，西欧的帝国主义也遭到削弱，这才使中国革命成为可能，并使它转入一个新方向。杰克·贝尔登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的看法，基本是符合实际的，但分析并不深入。

毛泽东针对艾奇逊的观点，指出只有把中国革命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联系起来，才能达到真正透彻的认识。

首先，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断言，近代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的侵略史。自从1840年英国入侵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1931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东北的战争，1937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这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造成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毛泽东讥讽艾奇逊看问题太不实际，他把中国革命说成是人口多了，是吃饭问题引起的，或是“西方的影响”的结果，这统统都是唯心史观的谬论。革命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而产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腐朽生产关系，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在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和变中国为殖民地所引起的种种社会矛盾的高度和斗争尖锐化。美国政府的主要决策人杜鲁门和艾奇逊回避这一铁的事实，是因为中国革命使他们感到刻骨铭心地难受，承认这一点会使他们更加伤心。

其次，毛泽东指出，不仅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而且还为人民革命准备了各方面的条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美国帝国主义和各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了它们始料不及的结果，为了侵略的需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中国的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

国无产阶级。这就使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先进的阶级和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为中国革命准备了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贫农群众，这就给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准备了最广大的、强有力的同盟军。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而帝国主义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极少数人，其他不能控制的都是走到了反面。他们造反了，不愿意跟着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走了。为了侵略的必要，他们不惜用最恶毒的字眼，把中共形容成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但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总之，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革命准备了精神条件和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制造的。”正是在这些条件逐步具备的情况下，中国便发生了革命，而巨经过若干失败之后，终于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当它在中国彻底失败的时候，公布它的白皮书，实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有利于中国人民利用白皮书做反面教材，认真总结百余年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它有利于利用白皮书做反面教材，提高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使那些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还抱着糊涂观念、糊涂认识的人清醒过来。“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甚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白皮书的发表表明，美国全球战略遭到了重大失败。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主要分为欧、亚、非三个部分。在亚洲，中国是重心。如果美国夺取了中国，把中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那么整个亚洲便是它的了。有了亚洲巩固的阵地，加上它认为已经巩固了的美洲阵地，那么，它便可以放心地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了。因而中国的得手，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关键。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出钱出枪，让蒋介石出人，替美国人打仗杀中国人的原因。但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如意算盘，美国的侵略政策在中国彻底失败了，这个责任不小，引起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公开争吵。艾奇逊不得不发表白皮书，为他们推卸责任。但是，美国政府中的人们的个人责任可以推卸，美国对中国侵略的责任却不可推卸，这种侵略永远写进了历史中。

毛泽东强调，中美人民之间是存在友谊的，中美人民是要世代友好下去的。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决不是美国人民的民意，是华尔街的“民意”，是“强奸了美国的民意”。美国人民的民意限制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所以不敢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现在还没有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这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是“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撤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中国革命拆除了美国反动派在中美人

民中设置的障碍，“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毛泽东相信，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必将开辟中美人民友好关系的新篇章，中美人民的友谊将要发展到极亲密的程度。尽管中美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他坚信这种情况必将出现。

毛泽东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高屋见瓴、深刻透辟。他从错综复杂的中美关系的种种现象中，抓住其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实质，科学地总结 109 年来的中美关系史，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宣传的种种唯心史观的观点，在中美关系上散布的一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说法予以了澄清。在中国人民胜利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时候，对过去的历史作一个冷静的客观的回顾，对于广大群众是必要的，对于领导新的人民斗争也是必要的。毛泽东虽然总结历史，但是并不要求背上历史的包袱，他对中美关系总是朝前看的，他希望美国制定政策的人们，以 109 年侵华历史教训为戒，改弦更张，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独立完整的基础上，重新谱写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几乎同时接到苏联承认和美国不予承认的消息。美国宣布继续承认蒋介石台湾政府，这样，美国便继续把自己捆在 109 年来的历史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将继续下去，历史的转机还需要等待。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美国的直接较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迅速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但是，美国在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新中国的大门口。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严重挑衅和威胁，也是对中国人民斗争意志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毅然决定，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必须高举反侵略的旗帜，举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和美帝国主义面对面地直接进行较量，把美帝国主义打败。毛泽东在这场战争中，显示了他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斗争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气势汹汹的侵略行径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他的不信邪、不怕压、敢硬顶的斗争精神，在抗美援朝中再次发扬光大。中国人民再一次充分显示了不畏强暴、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经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认识了毛泽东和中共，对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他们再也不敢轻率从事。

一、必须高举反对美国侵略的旗帜

举行抗美援朝战争是美国所逼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朝鲜战争是共产党领袖们的“狂妄”行动，是北朝鲜对南朝鲜的“侵略”；为此，“民主政治”必须“发挥作用”，否则共产党就会“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即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杜鲁门狂妄地认为，当今世界的历史状况是，“几乎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建立在象美国那样的“民主体制”之上；另一种是建立在“恐怖与压迫”之上，后者以苏联为典型。他肯定朝鲜战争中，“民主体制”必须毫不犹豫地战胜“恐怖与压迫”的体制。为此，他决定，美国海军和陆军给予南朝鲜部队以掩护和支持，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明目张胆发动侵朝战争，并侵占我国领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协助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这样，朝鲜战争转变为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参与的侵略战争。

7月1日，美军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朝鲜地面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统率侵朝干涉军。8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7月中旬，李承晚将南朝鲜军队也交给麦克阿瑟指挥。

美国方面对于打赢这场侵略战争充满了信心。军方人士认为杜鲁门的政治声明还不够坚决。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把正在反攻中的朝鲜人民军打垮，消灭北朝鲜共产党政权。6月30日，艾森豪威尔在五角大楼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定立场，过不多久我们就将遇到十几个朝鲜。”“我的观点是，诉诸实力本质上就不应该是片面的。一旦决定诉诸实力，就应该认真准备起来，尽一切可能的合法手段行动起来。”“我们必须研究应变的各个方面，包括

最后不得不使用原子弹（这事老天不容）。”很显然，美国一开始便决心要彻底占领朝鲜，甚至设想借此扩大战争或使用原子弹，不仅在朝鲜实行它的殖民统治，而且如同历史上曾做过的那样，再次把亚洲作为它的侵略战场。

9月15日，在侵朝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指挥下，美军在仁川登陆。16日美军正面战线的4个师和南朝鲜6个师，配合仁川登陆的美军，对朝鲜人民军实行夹击，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28日，美李军占领汉城。27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命令，28日，麦克阿瑟作出越过三八线的计划。29日，美第8集团军进抵三八线。同时南朝鲜伪军在东海岸襄阳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为此，10月1日深夜，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和外相朴宪永致电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对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战争给予特殊援助。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他作出最后决策，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抗击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极其慎重考虑的结果。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于侵略者的侵略必须予以反击，不管这种侵略来自何等强大的对手，如果不回击侵略者的狂妄挑战，便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没有主权和国家尊严可言。1951年10月23日，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回顾出兵朝鲜的必要性时说：“大家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不会和美军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的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并非是一开始就作出的决策。完全是在美国扩大侵略，使形势继续恶化，严重威胁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生存和我国安全而不得不作出的反应，完全是站在反击侵略者的立场上的。

建国之后，毛泽东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解决国内问题上。还在建国前夕，他便考虑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他指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毛泽东肯定，新中国将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把主要力量集中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和文化建设上。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建国之后，他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同时，“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

为此，1950年6月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

罗伯特·H·费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34页。

《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1951年10月23日。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66页。

报告，为了使财政经济状况实现基本好转，他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国内工作。23日，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国会议上，他提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将旧有的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围绕大规模土改运动和经济建设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也有了新的规定，主要是完成解放西藏、台湾，消灭残余土匪，参加生产建设，提高部队文化水平和进行整编复员等任务。

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把眼光和精力重点集中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进行大规模经济与文化建设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希望有一个和平劳动和建设的机会，也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

当然，毛泽东丝毫没有放松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警惕。早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他便反复告诫与会代表：“在这里，我认为有此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就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毛泽东估计，美国敌视新中国的行动大致可能有如下几种：一是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和捣乱工作；二是，唆使中国的反动派，加上他们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三是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可见，他已经估计到美国帝国主义有可能在中国边境上发动侵略。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毛泽东都有思想准备，他要求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他要求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国国土。在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他向全党提出了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要求。1950年1月18日，他在与刘少奇的电报中，要求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消除他们的恐美病。他指出：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为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

1月19日，他亲自为新华社草拟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造谣和谈话的新闻稿，严厉谴责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造谣。艾奇逊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演讲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艾奇逊的通篇演讲，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没有一个字不在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谎言。毛泽东驳斥艾奇逊关于中国的满州已成为苏联占领地的谣言，他不无讥讽地说：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以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毛泽东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高度警惕和针锋相对的斗争立场，是他作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决策的思想基础。但是，中国人民必须集中精力医治战争的创伤，百废俱兴，百业待举。毛泽东认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能转

移国内工作的重心。为此朝鲜战争一开始他便决定：中国人民必须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但是尽量争取采用其他形式，不一定出兵朝鲜。

1950年6月28日，美国出兵朝鲜之后第二天，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的广泛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第二天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是建国后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第一次发表的公开评论，是对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径的公开谴责。毛泽东的态度是严厉的，他谴责和蔑视美国帝国主义，再次宣布它是“外强中干”的，这种无畏精神，表示了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反美斗争的道义支持和鼓舞，但还看不出任何直接出兵朝鲜的迹象。

西方多数学者认为，是形势而不是战略促使北京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应当说，这个看法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一旦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便把这一行动纳入了战略考虑之中。

从美军人侵朝鲜开始阶段看，毛泽东和中共主要是积极地从道义上和其它形式上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入侵朝鲜后第二天，6月28日中国政府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六月二十七日声明和美国武装侵略我国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发表《斥帝国主义强盗杜鲁门的非法声明》；7月6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为反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事致联合国秘书长赖依并转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的声明》，14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8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北京各界庆祝八一建军节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示威大会上发表演说，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14日，毛泽东致电朝鲜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金科奉委员长，祝贺朝鲜解放五周年。所有这些声明、社论、电报等文件，一方面严厉谴责美国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另一方面从道义上支持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如毛泽东在给金科奉的电文中指出那样：“中国人民热烈拥护朝鲜人民为抵抗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及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战争，并深信朝鲜人民一定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和中国政府，都希望朝鲜战争能够和平解决，减少朝鲜人民遭受的战争痛苦，并利于亚洲的安全和稳定。8月2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和秘书长赖依，支持苏联和平调处朝鲜问题，强调朝鲜问题必须予以和平解决。

见1950年6月29日《人民日报》。

其后的事态发展中，美国不断扩大侵朝战争，并派遣美机多次侵入我国领空，对我边境和平居民进行扫射，在辑安城、安东市区、临江城等地扫射、投弹、侦察，美舰并袭击我商轮，制造种种挑衅。尽管如此，我方仍保持了极大的忍耐和克制的态度，希望能通过联合国制裁美国的侵略行径和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动。朝鲜事态继续升级，严重影响了我国领土安全。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救邻即是救己，不是惹火烧身，而是敌人欺人太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高举起反侵略的旗帜，美国便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其侵略行径将更加嚣张。即使我们有再大的困难，要冒多大的风险，也必须针锋相对的与其斗争。这样，一场由美国侵略逼出来的战争，便无可避免，中美直接对抗的战争帷幕迅速拉开。

毛泽东作出与美军直接对抗的决策 关于出兵朝鲜，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既十分慎重又十分果断。从中不难看出他博大的视野和临危不惧的雄才大略。

9月15日，美军集中260余艘舰艇，50余架飞机，掩护其步兵和李承晚伪军共七万余人，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被南北分割，处于被动态势。侵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气焰万丈。当9月21日他接到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新的训令，要他在北进计划中列出如果苏联和中共出兵将采取何种限制行动的对策计划时，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他宣称：这一战争是莫斯科和北京赤化亚洲的首次尝试，侵略的祸首是莫斯科和北京，我们正与祸首对抗。因此，要想在亚洲恢复和平，就决不应该限制军事行动。即使苏联和中共介入，也要粉碎他们，以拔掉共产主义者征服亚洲的毒牙。如果苏联和中共进驻北韩，联合国军在三八线停止进军，那末，共产主义者就会重新发动侵略。为此，麦克阿瑟在回答华盛顿的电报时说：除非和直到敌人停止抵抗，我将把整个朝鲜都视为对我们的军事行动是开放的。”9月28日，美李登陆部队占领汉城，两天后越过三八线疯狂向北进犯。由南朝鲜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编写出版的《韩国战争史》（我译为《朝鲜战争》），用洋洋得意之笔描写了仁川登陆到越过三八线后的情形：“历史性的仁川登陆成功后，国军和联军发起总反攻，一举突破三八线，以破竹之势北进，10月10日攻陷元山，10月19日进入平壤，10月26日占领楚山，10月30日占领惠山，前进到朝满国境，胜利的气势达到了顶点。”

对于美国气势汹汹地扩大侵略，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9月27日，应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请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军委对外联络处约见了她。潘尼迦向聂荣臻老话重提，他提起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麦克阿瑟对美联社记者所说：“给我500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的狂言，他很耽心美国扩大侵朝战争会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的工业将遭受破坏”，“中国的建设将拖后十年、八年”。聂代总长坚定地告诉他：“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有它们自己的弱点，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发展。”

9月30日，周恩来在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

[美]小克莱布尔：《麦克阿瑟》，解放军出版社，1977年，第341页。

固城、齐丰、龚黎译编：《朝鲜战争》第1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页。

柴成文、赵勇：《板门店谈制》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4页。

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这就清楚表明中国政府有可能出兵朝鲜，制止侵略。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明确转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不管。周恩来要突出一个“管”字，他要印度大使注意到这个“管”字的意义，如果美国再如此猖狂下去，我们可就要“管”了。但是，美国对中国政府传递的这些信息置若罔闻。杜鲁门小视毛泽东和中国政府，错误地认为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敢与之直接对抗。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月三号国务院收到了许多封电报，报告同一件事情：中国共产党威胁着要参加朝鲜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现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召见印度驻北平大使潘尼迪，并且告诉他，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就要派遣军队援助北朝鲜人。不过，如果只是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种行动。”“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扬言要在朝鲜进行干涉。”杜鲁门无知地藐视中国，他断定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不敢下出兵朝鲜的决心。迈克尔·沙勒认为，经过三年的失意的冷战之后，有一位美国将军正在真正的战场上打败共产党人。只要麦克阿瑟的行动是成功的，杜鲁门政府就将顺水推舟，坐享其成，用不着理会中国的警告。

杜鲁门在这个问题上失算了。从国庆节开始，毛泽东便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成员讨论研究出兵援助朝鲜的问题。那几天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围绕关于出兵与不出兵的利和弊，毛泽东让大家敞开思想发言，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做到畅所欲言。对于各方面的意见，他都认真倾听，他自己也反复分析各种情况。由于思想高度集中，他连续几天不能入眠，吃安眠药也睡不着。10月2日，经过三天的讨论，意见初步集中，毛泽东下了出兵朝鲜的决心。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说明必须出兵朝鲜的理由和我党的决心、措施等六条。

关于出兵朝鲜的理由，毛泽东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疯狂的军事行动，已有全部变朝鲜为殖民地的可能，因此，必须派出一部分部队以志愿军的名义，与美伪军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力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的安全和利益，把军队开到中国边境炫耀武力；它把战舰开进中国领海巡逻，保护被推翻了的国民党，这是中国政府绝不能容忍的。毛泽东想得更深远，他把出兵朝鲜提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出兵朝鲜，是打破美国亚洲战略的关键环节，不如此，美国在亚洲便会取得步步进逼的主动态势。

关于和美国对抗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指出，既然决定出兵朝鲜，我们便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个思想准备包括两方面：“第一，就是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毛泽东充分估计志愿军入朝作战，在中美关系上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美国把侵略战火扩大

《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432—433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5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5页。

到中国本土，使中国的工业和经济遭致严重破坏。毛泽东认为，即使会产生这样严重的后果，出兵朝鲜，仍然是值得的。不如此，其后果将会更加严重，美国将疯狂地在整个亚洲推行其武装干涉的殖民政策，那么不仅中国、亚洲将永无宁日，世界局势也将变得严重而动荡不安。

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长期和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斗争的一贯经验为据，肯定出兵朝鲜之后，要避免中美关系朝最严重的后果发展，关键在于能否集中力量把美国军队打败，只有给予它狠狠的教训，才能使它不敢小视中国。他向斯大林指出：只要我军能在朝鲜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牌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有利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和中国宣战，这个战争也就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最为不利的情况就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战争将长期持久地进行下去，这就会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对美国还有恐美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因此，毛泽东决定，必须坚持我军过去的老办法，不打则已，打则必胜，胜利越大，主动权越多。要避免最坏的后果，不能乞求，也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只能以胜利去争取。从决定出兵朝鲜一开始，毛泽东便决定要狠狠教训侵朝美国军队。

毛泽东进而向斯大林指出，保证我军决胜的策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战役上做到一能全歼，二能速决。虽然我军从装备上远远劣于美军，但我军能集中兵力、形成优势。这就是说，应当准备着当美军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集中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一个军。

可以看出，在最初决定出兵朝鲜和美国军队作战时，毛泽东便集思广益，周详地考虑了与侵朝美军作战的种种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他不打无准备之战的一贯军事思想。毛泽东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既周密地考虑了各种风险和问题，同时充分考虑了国际主义的要求。他对薄一波说：“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可以说，从10月2日起，出兵朝鲜的决策基本定下，以后虽然还在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只是对这个决策的推敲，深化和完善，并不是动摇这个决策。

出兵朝鲜，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在作出出兵朝鲜时，许多人普遍耽心的问题。毛泽东从他早就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和两大阵营理论分析问题，指出不存在这种现实可能性，不必作这样的耽忧。他说：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英美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他肯定出兵朝鲜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紧迫的。

10月2日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对于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毛泽东做了说服工作。他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

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4日，彭德怀由西安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会议。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决策，主张给予美军迎头痛击。彭德怀说，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们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我有全国政权，有苏联援助，比抗战时期要有利得多。彭德怀的坚决态度，使毛泽东把人朝作战的重担放在了他的肩上。

10月6日，毛泽东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研究人朝作战具体问题，会上决定由周恩来及林彪赴苏联与斯大林商谈，争取苏联供给武器并出动空军，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

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毛泽东的上述命令，使志愿军处于临战状态，箭在弦上，待机而发。他在下达命令的同时，并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转告金日成中国党和政府的上述决定。金日成在得知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入朝参战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对我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武官柴成文说：太好了！太好了！请你们向毛主席、向中共中央转达我和朝鲜党和人民的衷心感谢！他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深表敬佩。他说：“过去我们并肩战斗，打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现在让我们并肩战斗，再打败一个美帝国主义。”

8日后，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周恩来在苏联黑海之滨的克拉斯诺波梁纳休养地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共出兵朝鲜的决定，要求苏联提供一定援助。周恩来来说，新中国成立不久，财力不足，武器弹药运输工具都有困难，空军也刚刚组建，这些方面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在支持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缺乏国际主义的考虑。据当时随同周恩来一道去苏联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秘书康一民回忆说：周总理此行的目的是，告诉苏联领导人，中国决定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要求苏联给中国军事援助和派空军进驻东北及北京、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总之，抗美援朝，由中国人出人，苏联出武器就行了。其他问题，苏联就不用管了。斯大林答应先装备中国十个师，并同意派空军到东北安东一带和沿海大城市驻防。因此，中苏双方在会谈中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736页。

柴成文，赵勇著：《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就抗美援朝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于会谈十分顺利，因此周恩来在第二天就返回莫斯科。刚回莫斯科不久，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周总理，说：现在，我们不赞成你们出兵了，也不准备给你们军用装备了。这时，周总理发了脾气，说刚刚决定的事情，还没隔几小时，怎么你们就推翻了呢？周总理说，不行！不管你们怎么样，我们中国已经决定了，是一定要出兵的。周总理同莫洛托夫争论的结果是，苏联方面仍旧同意中国出兵并给予军事援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出兵问题上，态度坚决，毫不动摇，与斯大林恰成对比。斯大林对中国出兵朝鲜与美军作战能否取胜表现出明显动摇和怀疑，出自一种狭隘的考虑。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苏联又出动空军掩护过中国军队，那么美国便会将矛头转而指向苏联，苏联就会和美国发生对抗，就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苏联非常不利。因此，虽然斯大林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但仍不出动空军。他表示，他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没有空军支援中国军队。

为此，12日，毛泽东通知高岗、彭德怀立即赴京商谈，并决定志愿军暂时不动。彭德怀到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下是否立即出兵朝鲜的问题。会议决定，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军队也必须立即出兵朝鲜。1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通报中共中央不可动摇的决心：

（一）政治局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为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很明显，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不是回到前几日的情况中，继续讨论参战不参战的问题，而是讨论在没有苏联空军掩护的情况下，是立即出动还是推迟出动的问题。从电报中看得出，斯大林的态度，并未动摇毛泽东的决心。他没有表现出动摇和犹豫，相反，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的信心，他坚持把抗美援朝纳入建国后通盘考虑的战略构想中。其后，毛泽东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相结合，“三套锣鼓一齐敲”的设想。他考虑得很深远、很有气魄。虽然中国面临的困难很大，但是必须敢于斗争，这不能不使斯大林深受感动。

毛泽东这时在出兵问题上已义无反顾，他全部身心扑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战略布署上。他决心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之军来一次强硬较量。但是在作战上，他是十分慎重的。他坚持一贯的原则：慎重初战。他亲自布署入朝事宜。14日，他给陈毅一个电报，命令由宋时轮任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第9兵团，依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待命开往东北；命令高

齐德学对康一民的访问记录，1989年2月12日，齐德学著：《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第62、63页。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6页。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47页。

射炮团火速开往东北，以实施对美机的防空。他预计到，我军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美军的空军将是十分猖獗的。

同日，毛泽东给尚在苏联的周恩来两封电报。在这两封电报中，毛泽东告知朝鲜美伪军的作战态势，并通报了我军入朝后的对策，以便周恩来转告斯大林。

美李军越过三八线之后，遭到朝鲜人民军的英勇抵抗，进展迟缓。美伪军方面，美第1师、美第2师、美第24师，第25旅及伪军第1师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的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的准备。美军是否进攻平壤，似乎尚未最后决定。李承晚伪军首都师、第3师已集结到元山，第6师、第7师、第8师正在逐步向元山区域集中，从海上得到补给。美陆军第1师在汉城、美军第25师在大田、水原线，美第7师在大邱、釜山线、美第8军军部在大田，伪军两个师在南部各地被阻，朝鲜大部地区敌情是空虚的。朝鲜人民军方面，10月10日金日成在平壤发表“用鲜血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的广播讲话，在美伪军进逼平壤时撤至平壤东北160公里处的德川，继续指挥尚能作战的部队在三八线坚决对敌。

为此，毛泽东向周恩来转述了彭德怀于12日在安东与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和志愿军兵团领导，共同商定的入朝后志愿军的布署和作战计划。我军入朝后，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二百公里的德川县山岳地区，而以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熙川、前川、江界地区。如此布署，第一，可以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人占领。这样，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第二，如元山、平壤两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山岳地区，则我军可以必要的兵力箝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伪军。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便大为松动了。毛泽东完全赞成彭德怀的意见，并再次告知彭德怀完全支持他的决策，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同日，毛泽东再给周恩来一电报，通报中央军委对入朝作战正式布署，指出：

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以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和很有利益的。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志愿军入朝后的布署的基本要点是，首先取防御态势，构筑牢固的防线，争取有六个月的装备和训练时间，然后再举行大规模的反攻。这样的布署，圆满地照顾到两个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必须尽快出兵，不能拖延，否则局势如果迅速恶化，将对出兵发生很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尽快出兵又有很大困难，首先是部队装备训练就是很大困难，显得十分仓促。这个问题也必须解决，事实上，志愿军的高级将领们对这种准备不足，仓促出兵便很有顾虑。杜平回忆说：“说实在的，就是在出兵前两天，我们兵团几个负责人还在考虑，由于准备不足，困难不少，是否推迟出动的。我们曾联名致电彭总，说明在我高射炮火太少，又无空军配合的情况

下出动，弊多利少。”他们建议，在三两个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毛泽东综合考虑了上述两方面实际情况，他判断出兵朝鲜宜早不宜迟，但装备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要充分考虑，因而制定了以上布署，让志愿军迅速过江，过江之后占领阵地，再以六个月的时间进行装备训练。

15日，毛泽东电告高岗，志愿军定于10月18日，至迟19日开始渡江入朝，粮食弹药等项应立即渡江往前运送。同日，彭德怀从北京飞回安东。当日毛泽东再给高岗彭德怀并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鉴于三八线上之美英军及伪军已于13日占领金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美陆战师准备从镇南浦登陆协攻平壤，由中路前进原拟向元山集结之伪军第六第八两师也转向平壤攻击的情况，毛泽东要求志愿军先头部队最好能在17日出动，23日到达德川地区，从25日开始构筑工事以制敌先机，争取主动。

16日，彭德怀在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的任务。按12日商定的布置和毛泽东的指示，确定了入朝后的部署。

17日，毛泽东再次电召彭德怀、高岗到北京。主要是周恩来17日将回到北京，他让彭、高及政治局其他同志共同听取周恩来苏联之行的情况汇报后，对出兵的具体措施再行周密考虑。但是，不论周恩来传达的斯大林的意见如何，立即出兵的决策很显然是不会改变的。毛泽东在17日给彭、高的电报中肯定地指出：（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再有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18日晚9时，毛泽东给在安东的13兵团司令员邓华等人一封电报，指示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按预定计划进入朝鲜作战，从19日从安东和辑安线渡过鸭绿江。为了严格保守机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切实检查。为了取得经验，19日只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决定增加或减少。19日，当志愿军正式渡江入朝开始后，毛泽东又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各负责同志一封电报，要求入朝作战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

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浩浩荡荡，按西线、中线、东线三个方向秘密渡过鸭绿江，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出动前，以团、连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的口号，我军斗志昂扬，毛泽东充分肯定誓师会的做法，要求将志愿军誓师大会的誓词、口号和其他办法交给随后入朝的六十六军。”

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果断决策下，中国人民高举反侵略的旗帜，展开了和美国侵略者的直接对抗。

实践证明，毛泽东果断地决策出兵朝鲜完全正确。这个决策迎头痛击了美伪军的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美伪军的进攻势头，使美军在朝鲜的战略计划流于破产。决策出兵朝鲜这迎头一棒，使美伪军指挥者始料不及，大力震惊。韩国战史狼狈地写道：“就在这梦寐以求的国土统一即将成就的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3月，第40页。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44页。

时候，祸从天降，遭到了中共大兵团的进攻，战局发生逆转，我军不得不冒着朔风雪寒，饮恨全面撤退。”狂妄不可一世的侵朝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经根本不相信中国有能力出兵朝鲜，即使有可能出兵，但他认为，中共已坐失良机，如果在8月份关键性的釜山战役之时，仅需派出二个师的兵力，即可扳成平局，但此刻已太晚了。因而他指示美军可以放心大胆北进。在三八线上，他指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和第10军司令阿尔蒙德，“所属的全部部队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北推进。”他狂妄地宣称：消灭北朝鲜军队、平定全朝鲜，让士兵回家过圣诞节。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打破了他的如意算盘，这位不可一世的将军的意志也不能不发生动摇。他在一份公开的发表的公报中说道：“我们一开始与之交战的北朝鲜部队已被消灭，或丧失了战斗力……，但现在一支新的生力军在与我们对垒，这支部队可能得到了大规模外国后备部队的支持，这个敌人可以垂手得到足够的后勤补给，但却处在我们目前军事行动的限区之外。”看得出，这位从不认输的美国将军，面对从天而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吃惊恼火，而且已惊惶失措了。

毛泽东作出入朝作战的决策，体现了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结合，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怕困难，不畏强暴和敢斗邪恶的无畏精神，同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也是对美国向中国挑战的一个有力回答。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既然美国（尤其是麦克阿瑟将军）想早一天检验中国的战斗精神，那么毛便决心迎击美国军队！

《朝鲜战争》第1卷，第1页。

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第353页。

袁明、[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95页。

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毛泽东彭德怀给美伪军的迎头一击 毛泽东在谈到军事计划的制定时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自己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志愿军入朝后，便遇到敌情迅速变化的情况，毛泽东、彭德怀根据新情况，果断地变更了原定的作战计划，准确抓住战机，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夺取了对美伪军的首战胜利。

10月19日，志愿军在向朝鲜开进之际，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在安东向彭德怀介绍了朝鲜的局势。他指出，朝鲜局势正在急剧恶化之中。17日，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4号作战命令”，改变了原定美军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10军在平壤——元山蜂腰部汇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急进，直到鸭绿江边。18日，美伪军队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动强攻。下午，美伪军已突破了人民军的两道防线，在空军和炮兵的支持下，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当天，美军第1军的3个师占领平壤。20日，美军187空降团在肃川、顺川降落，企图切断自平壤北撤的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从朴一禹介绍的情况看，美军进攻的速度，比毛泽东、彭德怀预料的要快得多。

20日平壤陷落之后，美伪军以嚣张的气焰继续大摇大摆分兵冒进。至20日，西线伪第2军第6师为先头部队，向楚山和碧淹进击；伪军第8师跟进，以攻占熙川和江界，而尔后向满浦进击。伪7、8二个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我预定的防御阵地球场、德川、宁边等地仅70至100公里；东线伪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达到了我军预定防御地区。而我军已渡江的5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新义州以东的塑州、满浦地区，离进入预定防区尚有120——270公里。看来，我军要赶在美伪军之前进入预定防区，已不可能。

毛泽东根据敌情的迅速变化，断然决定改变入朝前我军作战部署，不再是首先打防御战，而是争取有利机会打运动战。19日，他在与志愿军各首长的电报中，便有“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的初步指示。21日，他在与彭德怀和志愿军诸首长的二个电报中指示，根据敌情新变化，原有作战部署必须改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必须利用美伪军尚未察觉我军已经入朝，敢于兵分东西两路，分兵冒进的情况，抓住这个于我有利之机，精心布署，以运动战的形式，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打好出国第一仗。他向诸首长分析敌情：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3师似将进至咸兴。伪6师改由破邑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7、8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隅里、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鸭绿江界的新义州一线。估计伪首都师和伪3师要7天左右才能到达长津，然后折向鸭绿江边。据此，毛泽东指出，我军第一仗如果不打这两个师，那么只须用42军1个师的兵力在长津

地区阻击敌人即可。42军主力应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6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敢北援，便于我集中3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6、7、8等3个师。如果伪6师由破邑至德川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10月24日或25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40军全部能于23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6师的后方，让出正面给38军或39军使用，如果行动太迟，那么伪6师便有可能先占领德川。因此，关键在于运动神速，先敌之机。他指示13兵团司令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地点和彭总汇合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我军要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以7至10天的时间，打好出国第一仗，争取全胜，以开始转变朝鲜战局。

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我军应抓住时机，全歼冒进之伪6、7、8等3个师，以扭转战局。毛泽东的设想与彭德怀新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21日，彭德怀在与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必须改变原决心和部署，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意见。在征求金日成首相同意之后，彭德怀、邓华作出集中3个主力军于西线作战，分别歼灭伪6、7、8师的布署：东线以42军的10个师加上1个炮兵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伪首都师、伪第3师，以该军主力控制小白山地区，视情况再向孟山以南地区挺进。西线，以40军进至德川、宁边地区，38军进到熙川，39军进到泰川、龟城地区，尔后视情况寻机坚决歼灭当面之敌。我军必须先敌抢占熙川、长津两个战略要点，造成在云山、熙川地区围歼伪6、7、8师的态势。39军东进后，新义州、定州地段空虚，为防止敌人海上登陆，彭德怀电请中央军委让66军立即从天津出发开往安东，以1个师负责新义州、定州交通线，主力作为志愿军预备队。

毛泽东高度重视首战必胜的意义，他密切注视朝鲜我军与美伪军态势的变化，精心考虑作战计划的实施和有关问题直至细节。21日20时，他与彭、邓一电报，指示应迅速抓住战机：（一）现得悉伪6、8两师20日经德川向熙川推进。（二）我40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为好。凌晨4时，他再与彭、邓一电报，提醒注意占领关键要地，注意隐蔽和司令部安全，要求：（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去为要。（二）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三）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同日，他写信告诉胡乔木，必须严密封锁志愿军入朝作战消息，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27日，毛泽东在接到彭德怀关于作战布署的电报后，立即与彭、邓一电报，同意彭、邓的部署，并进一步分析战况，对有关作战问题再次下达具体指示。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根据伪军2军团长20日16时30分称：第6师正集结顺川新仓里面，拟命其抵新义州。第8师正集结成川顺川间休整，但严禁抵顺川。伪2军团指挥所在三登。据此可以判断，如果在数日之内，敌机还没有发现我军的开进，那么伪6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伪8师将进奉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伪7师则在顺川作预备队。如21日伪6师、8师继续前进，则22日，伪6师可进至新安州，8师可能进到军隅里，为此，毛泽东要求我军行进必须尽量封锁消息，防止敌人察觉，以便利用有利时机

消灭敌人。“因此我军行进路线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而此次作战，则以在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为最有利。”

关于美军情况，毛泽东指出，据有关情报称，美 10 军团的首都师，由咸兴向北青城推进，第 3 师集结咸兴，其军团部也在向咸兴移动。估计美军暂时不会去长津。为此，我军 40 军和 39 军在围歼伪 6 师、8 师两师时，必须派一个师的兵力占领长津，并派兵控制妙香山、杏川洞、小白山等，以确实隔断东西之敌。当战斗紧急时，伪 7 师和在平壤的伪 1 师可能出动增援，因而也要作好打击的准备。毛泽东把侧重点放在打击伪军上，指示对美军暂时避其锋芒，并周密部署了围歼伪 6、8 师的计划。

毛泽东决心要在志愿军入朝后，以一仗吃掉伪军 2 至 3 个整师的战绩，震慑伪军和美军，一举打出志愿军的赫赫声威，使美国帝国主义不敢藐视我英雄的中国人民军队，使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从 22 日到 25 日，他通过电报频繁向志愿军司令部发出指示，从各方面要求保证这一战略要求的实现。这些指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力争在吃掉伪军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师的有利条件下，采用包围城市的办法，置敌人于彻底的被动地位。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作战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他深知彭德怀指挥作战的特点，一是稳，二是韧。他欣赏彭德怀的长处，只有这样才能咬住敌人，抓住战机。毛泽东设想，如果首先能够做到在敌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下，向敌人发起突击，全歼敌人二三个甚至三四个师，那么就将打乱敌人的部署，使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我军能有效地利用夜间行军，避开敌军轰炸，并能继续进行野战，攻打敌人的许多孤立据点，除少数大城中我暂时无能力攻打外，其余地方的敌人均被我歼灭。如此，就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在这种情况下（在运动战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伪军师），即使美国再调 5 个至 10 个师来朝鲜，形势仍然于我有利。毛泽东强调，以上设想是否正确，有待于这次战役及几个月后的经验和证明。如果不能做到上述各点，形势将变得于我不利。因此，他要求，应力争在敌机轰炸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其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看得出，毛泽东的基本设想是：通过首战全歼伪军几个师以求站住脚跟，然后采用我军一贯以占领广大薄弱地带包围大城市的作法，取得全局主动，以迫使敌人和我们坐下来谈判或利于我军最后决胜。这种指导思想，主要地运用了我军过去形成的经验和基本作战原则。

第二，高度重视全歼伪 1、6、8 师的战略意义，要求充分发扬我军优势和一贯战法，保证将首次战役打好。毛泽东要求我军行军必须迅速，与敌人拼速度，“否则将失去先机”，拟于全歼的敌人，一定要“分数路出发包围攻击之”；要发扬连续作战和集中兵力的原则，“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仗”；为了确保战略计划不至于过早暴露而影响全局战果，部队要注意“隐蔽集结”，要注意避免“与敌过早接触”，要注意在战役总攻发起前“避免和敌打响”；对于伪敌，要让出一些地方，以利于诱敌深入，特别是在敌人尚未发现我军的情况下，要“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

“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毛泽东对战役实施中的若干细节作了详细安排。

第三，坚持首战暂时不打美军。25日，毛泽东指示彭、邓：美24师和英27旅一道已过新安州清川江，据说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毛泽东认为尽管据说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在确实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暂时不打以免胶着起来贻误战机。26日，他与彭、邓电报指示说：美24师英27旅已在新安州一带渡过清川江，请令39军勿去龙山〔洞〕宁边，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纠缠住，而应由泰川向云山及其以北方向前进寻找伪1师作战，与40军38军配合，首先歼灭伪1、6、8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如伪1师与美英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1师、待伪6、8师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26日，他指示彭德怀，应命令39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线，以有力一部隔断伪1师与美英军的联系，以主力配合40军一部保证迅速歼灭伪1师，然后改向南面防御，待伪6师伪8师均被歼灭后，看情况再定对美英军作战的部署。毛泽东指示，暂不打美军，其目的是为求得在战役上速决，首先吃掉弱敌。他心目中的中心目标是打美军，但是在打美军之前必须弄清情况，取得经验，使我军有充分准备。

毛泽东上述构想和部署，反映了他既高瞻远瞩，不拘泥于眼前和局部的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又反映了他冷静、科学、足智多谋的战术考虑。他深知志愿军面临的是凶恶的美国侵略军，必须大胆而谨慎，周密而果断，才能克敌制胜。

25日，战场出现突然情况，使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受到影响，不得不作部分改变。

25日拂晓，伪第1师先头部队，在坦克大炮掩护下，以摩托化步兵开路，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进入志愿军40军120师360团阻击区域，遭到我军突然打击。与此同时，伪第6师第二团1个先头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镇进犯，进至我118师354团在丰中洞、两水洞的埋伏圈时，在353团的配合下，被我军分割包围。将其大部歼火，活捉伪军数百人、美军顾问3名。当晚，40军118师、120师主力乘胜占领温井，切断已进至楚山、古场的伪2师第7团退路。这样，第一战役的序幕便拉开了。

我军虽然旗开得胜，但是有可能过早地暴露了我军。而且敌人以师、团为单位分兵冒进，战线拉得很开，要集中兵力围歼敌人3个师有较大困难。彭德怀决定改变原作战方案，采取一个个包饺子的办法，把敌人分师分团包围起来吃掉。25日21时，他在致军委的电报中说：“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1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

毛泽东尊重战场的变化，充分尊重一线指挥员的决定。26日，他在与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肯定：“先歼敌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他强调歼灭伪军三个师的计划不应改变，不如此不能震慑敌人。他指出：“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即1、6、8师——引者注）为目标，分为几个大

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

毛泽东此时认为，如有可能采用聚歼的办法消灭敌人二、三个师，仍然是最理想的目标。26日，彭德怀根据情况变化，决定放弃首歼熙山之敌的计划，以40军坚决阻击向温井进攻之敌，对伪6师第7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法，引诱熙川、云川伪军6~7个团的敌人，然后集中38、39、40军将敌人围歼于云山以北。毛泽东极赞成此计划。28日，他在与彭、邓的电报中肯定：你们两个新的部署电都是好的，以115师及50军一部围击伪7团于楚山桧木洞之间（请注意于两三天内包围而不歼灭，让其大唤大叫），吸引1、6、7、8等四个师北援，以便主力聚歼。他指示，只要确实抓住古场、楚山的伪7团，使其不能逃脱，如此则伪1、6、8师非增援不可，我军便有仗可打。

但是，敌人与我军对峙一天以后，大队龟缩不动，伪8师第10团仅两个营由熙川来援，伪8师主力仍在熙川、球场地区，伪1师也停止在云山以北地区，我军诱敌深入的意图没有实现。

为此，彭德怀再次部署在云山地区将伪军第1师包围起来待机歼灭的计划，并对敌暂时实行围而不歼，吸引熙川伪8师来援，以便一齐聚歼。与此同时我40军经过一夜激战，于29日晨消灭伪6师和伪8师共4个营。由于38军在穿插过程中不能及时到达熙川，致使伪8师逃逸。鉴于此，彭德怀改而决定歼灭云山之敌。

此时，伪第6师、第8师各两个营虽为我军全歼，但美伪军并未引起足够警戒。自从美军仁川登陆后，美伪军中弥漫的骄横气焰一直未消减。麦克阿瑟总司令部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的出兵”，“中国人在虚张声势，保住脸面，或仅仅是试图保护鸭绿江上的许多水电站而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情报来源得到他们的大部队已进入北朝鲜的任何确凿的证据。”麦克阿瑟把我军看做小打小闹，他调整部署，用美军代替吃了败仗的伪军，继续向北冒进。美第24师、英27旅分别进至龟城、宜川地区；美第1军骑兵第1师已从平壤调至云山，增援伪1师；伪8师退守球场，伪第7师东调球场、德川；伪第1师撤至宁边及东北地区，以保障和加强其侧翼；美第9军第2师由平壤北调安州地区，作为美军第8集团军预备队。

根据美伪军的上述部署，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实行战役迂回，结合正面突击的办法，集中于敌三倍的兵力，给予伪军致命打击，并视情况聚歼美英军。这是志愿军司令部第一次作出直接歼灭美英军的作战部署。

30日，毛泽东回电同意直接歼灭美军。他肯定：“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1师伪7师英27旅美24师及美骑1师一部及伪6师伪8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与美军直接作战的决策便这样作出，这个决策具有历史意义，中美之间的对抗，由间接冲突，最终发展为直接冲突，中美两军在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交锋的帷幕迅速拉开。

根据战役要求，为了确保集中优势兵力聚歼美军，31日，毛泽东致电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等，要求9兵团迅速开进朝鲜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该兵团到达指定地点后受志愿军司令部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美军第7师及陆战第1师等”。

11月1日，我军向云山猛烈进攻，云山美骑1师第8团和伪军第1师第12团遭到致命打击。敌人的坦克、汽车被炸毁堵塞在公路上，美军士兵狼奔

豕突，四处逃窜，战场一片混乱。志愿军总部政治部主任杜平回忆说：“美国兵从来未碰到过如此神速的猛扑，如此果敢的拼杀，一个个象患了‘撤退症’，争先恐后沿公路逃跑。”杜平回忆美军的狼狈情况，完全符合实际。小克莱·布莱尔在麦克阿瑟的传记中，描写了美军遭到致命打击时的恐怖情景：“11月1日至2日夜，中国人哨子和冲锋号齐鸣，俄制火箭齐放，向美军第8骑兵团发起了攻击，给该团造成惨重损失。遭此打击后，沃克停止进攻，撤到清川江一线。他向麦克阿瑟报告说，他遭到了‘组织有方、训练有素的生力军，其中一些是中共军队’的伏击。他缺乏食物、弹药，缺乏一切。”至11月3日，我志愿军将被围之美第1师第8团之大部 and 伪军第1师第12团全部歼灭，取得辉煌战果，迫使美伪军全线大溃退。云山成为美军士兵第一个孤魂长眠之地。

第1战役于11月5日结束。我军给伪第6师以歼灭性的打击，重创伪第1、第8师和美骑兵第1师，歼灭英军27旅一个榴弹炮营，共歼敌1万5千余人，把美伪军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企图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取得了第1战役的伟大胜利。

志愿军歼灭美军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作家罗素·斯泊尔指出，在麦克阿瑟看来，近代中国历史上各种军队都污七八糟，自从军阀混战以来这些军队从未有所改进。几百年来中国军队从未战胜过第一流的外国军队。因此，麦克阿瑟甚至希望中共军队会撞在他的枪口上。他在威克岛曾对杜鲁门宣称：“如果中共军队渡过鸭绿江，我将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屠杀来对付他们。”为时不久，得到教训和惩罚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麦克阿瑟。这位五星上将统率的所谓世界第一流的军队，可耻地败在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脚下。毛泽东和中共的仁义之师，旗开得胜，打出了军威和国威。毛泽东舒展开了他紧锁的眉头。

毛泽东和柳亚子的词以“妙香山上战旗妍”结尾。第一次战役给麦克阿瑟的美国侵略军以迎头一棒，但是这位傲慢、自负、目空一切的美国五星上将并没有清醒过来，他浅薄地认为中共大规模出兵朝鲜的可能性很小，美军面临的共军只是小股部队的骚扰而已，共产党是雷声大、雨点小，不可能派多少兵入朝。

11月4日，麦克阿瑟在与杜鲁门的报告中，对中共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作了如下分析：

第一，中国共产党政府打算以其全部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在它认为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这一行动。第二，它将隐蔽地给予军事援助，但是为了外交上的理由，尽可能地掩盖起事实的真相。第三，允许并唆使或多或少也算志愿的人员源源不绝地越过国境，加强并援助北朝鲜的残余部队，使他们能够为了在朝鲜保留一个名义上的立脚点而继续斗争。第四，这样的干涉，也是存在的，是因为他们相信除了南朝鲜部队外，联合国部队是不会在朝鲜的极北地区使用的。

麦克阿瑟认为，第一种或然性代表一种具有最严重国际意义的重大决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65页。

小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第350—351页。

罗素·斯泊尔：《韩战内幕》，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

《杜鲁门回记录》下卷，第446页。

定。虽然这种可能性似乎已经很明显，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和这种看法相反的逻辑上的基本理由，而且也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使人能够很快地同意这种看法。为此，麦克阿瑟决定，必须继续向北进攻，挽回美军在朝鲜的败局和面子。

11月6日，麦克阿瑟决定轰炸鸭绿江的公路和铁路大桥，杜鲁门同意了他的决定。

同日，麦克阿瑟发表公报，对我国进行大肆污蔑。11月11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关于我国人民志愿军援朝抗美是完全合理的正义行为的声明》，严厉驳斥麦克阿瑟，指出：麦克阿瑟的报告和奥斯汀的声明，从头到尾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装腔作势，藉以吓人。真正的事实是美国侵略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中国人民有一切理由控诉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挑衅与侵略。中国人民出兵朝鲜、志愿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是出于义愤、完全合理和正义的行动。

麦克阿瑟不顾中国人民的严正抗议，悍然出动大批飞机轰炸鸭绿江大桥。黑压压的美国飞机布满了鸭绿江天空，狂轰滥炸。据韩国战史宣称，到11月25日，美军及联合国侵略军共出动飞机72224架次，投弹共41127吨，发射火箭弹9585枚，炸毁铁路车辆和汽车7361辆，炸毁隧道79处。丹东市区60%成为废墟。

麦克阿瑟兴高采烈地向华盛顿保证，他能够“阻止具有足够力量的增援部队跨过鸭绿江”，中共军队绝不会对他的部队造成任何真正的威胁。麦克阿瑟认为他的空中攻势已经奏效，便确定11月24日，感恩节的第2天再次发动进攻。11月7日，麦克阿瑟在东京与美国驻南朝鲜大使约翰·穆乔会晤时说：我们将发起攻势，在10天之内，就可以彻底消灭北朝鲜和中共军队。

麦克阿瑟的进攻计划得到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麦克阿瑟在西线部署了美军第2师、第24师、第25师和骑兵第1师，英军第27、29旅，土耳其旅和南朝鲜第1、6、7、8等共8个师零3个旅共13万余人；在东线美军共有第3、7及陆战第1师，南朝鲜首都师、第3师等，共9万余人。

针对美军的部署，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再次给予敌人沉重打击。11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指出：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8日，彭德怀、邓华致电军委，提出：敌为牵制我主力，有沿清川江北进，配合其东线迂回江界企图，我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以诱敌深入，各个歼击方针。9日，毛泽东回电，肯定“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毛泽东要求为确保歼敌之需，必须切实保证运输和粮弹供应。他明确指示，必须争取在本月内至12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毛泽东强调，对于美军，为取得全歼的效果，必须集中数倍兵力对付之。12日，他致电彭、邓、朴（朴一禹）：美军陆战第1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9兵团的26军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

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为他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稿中，添写了一段

话，强调指出：据我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 16 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8 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为进攻局面，而这是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5 个师）还很猖獗，现在增派 8 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战局。毛泽东认为，目前美军对我大规模入朝作战还缺乏准确判断，麦克阿瑟骄傲横蛮，信铁不信气，十分藐视我军。骄兵必败，这正是我军聚歼美军之据。只要我军稍示其弱，迷惑麦克阿瑟，诱其深入便可抓住战机，予以痛击。

毛泽东、彭德怀采取示弱诱敌的办法，使美军骄纵大意，盲目深入。志愿军前线各部队采取了一系列诱敌措施：开始逐步减少节节抗敌的时间，使敌军误认为我军军力不支；在撤退的路上丢弃一些缴获的破旧器材和枪支，使敌人误认为我已溃不成军；我转入侧翼和山区的部队，严密伪装，保持行动肃静。所有这些措施收到了诱敌深入的良好效果。罗素·斯泊尔认为，志愿军的这些行动，助长了麦克阿瑟再次复生乐观情绪。在最为关键之际，中国军队突然无影无踪了。11 月 6 日黎明前，驻守在清川江北部美第 8 集团军防线前部的澳大利亚军队，遭到了中国 1 个师的不断攻击。但是，天刚破晓，攻击即完全停止了。这些部队沿山岭向北撤退，突然难以置信地神秘消失了。中国军队的士兵轻装前进，利用黑夜行军，白天则小心地隐蔽起来。他们隐蔽如此巧妙，似乎钻入了地下。美国空军对北朝鲜的狂轰炸滥炸，杀死了无数平民，但对中国军队没有造成值得一提的损失。麦克阿瑟再次向鸭绿江挺进，他认为中国军队已经离去。他拥有 10 万之众的军队，可以将敌人陷入中国边境狭长地区的钳形包围之中。麦克阿瑟的狂妄和轻率使他的失败不可避免。

为了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并进一步迷惑敌人，彭德怀、杜平等志愿军司令部首长决定释放一批美伪军战俘。毛泽东当即批准了这个决定。18 日，他在与彭、邓、朴的电报中说：（一）你们释放一些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则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毛泽东强调诱敌深入必须成功，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以振奋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舆论。24 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等志愿军司令部首长，肯定我军释放俘虏的作法说：你们释放俘虏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22 日，他为中央军委拟发给志愿军第 19 兵团和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军区的电报，要求 19 兵团及各军区部队，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其在物质上、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特别是要鼓舞士气，清除对美军战斗力作过高估计的片面认识，敢于和美军打硬仗。他指示将开进入朝的 19 兵团首长及各军区首长：你们应在 19 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各军区，特别是华东、

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11月24日清晨，天空晴朗，麦克阿瑟展开了全线进攻。美第8集团军气势汹汹，在大炮坦克飞机的掩护下蜂涌而来，在几乎没有遭到抵抗的情况下前进了12英里。但是惩罚的铁拳迅猛击来，25日，我志愿军展开了全线的猛烈反攻。小克莱·布莱尔写道：

“但是11月25日天黑不久，灾难降临了。约二十多万中国人穿插沃克的第8集团军与阿尔蒙德的第10军之间的空隙，向第8集团军的右翼——韩国第2军发起了攻击。韩国部队崩溃了，仓皇逃跑，使中部美国第9军暴露出来。第9军先是收缩，然后坚守，最后撤退了。在左边，第1军和第9军一起后退。两天后，11月27日，在东部战场，另一支中国集团军攻击了第10军——奥利佛·史密斯的第1陆战师，中国军队插到背后，将海军陆战队围困在楚新水库地区。事情很快就十分明显了，联合国军遭遇的是第一流的军队。令人十分吃惊的是，中国人纪律严明，指挥有方。沃克的第8集团军被这突然袭击完全打晕了头，很快开始全线后撤。”

志愿军铁拳对美军的打击，使麦克阿瑟惊惶失措。这位从不认输的美国五星上将将在与华盛顿的报告中说：投入北朝作战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而且数量在继续增加，打着志愿或其他旗号进行小规模支援的任何借口再也站不住脚了。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新型的战争。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增派援兵的紧急请求。他说：本职指挥的小小部队，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面对着整个中国。

当麦克阿瑟清醒过来，向美国五角大楼提出增兵的请求时，毛泽东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给予美军以歼灭性的打击，争取大胜。28日，他致电彭德怀、邓华等志愿军司令部诸首长：（一）庆祝你们歼灭伪2军团主力的大胜利。（二）目前的任务是集中我42军38军40军39军歼灭美骑1师第2师第25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毛泽东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仗，务必打好。同日深夜，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邓华等志愿军司令部诸首长，要求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此役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必须抓紧战机，达到战役预定目标。他指出：你们11月28日给西线各军电及同日15时给9兵团电均是很正确的。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5个美英师及4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1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20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休整，每次少者一天二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一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志愿军以同仇敌忾之势沉重打击美军。第38军113师急速行军插至三所里，切断敌人由军隅里经三所里向顺川逃跑的退路，接着113师占领龙源里，把敌人退路彻底堵死。我军完成了对美第2、第25师及土耳其旅余部和美骑1师、伪第1师各一部的三面包围。从29日起，龙源里、三所里激战猛烈进行。我39军、40军也分别得手，歼灭大量敌人。113师在三所里、龙源里阻击敌人取得辉煌成绩。12月1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命令围困于三所里和龙源里的美军向安州方向突围，敌人丢弃一切辎重，仓皇逃命。

西线我军经过激战，歼敌伪 7 师、伪 8 师和土耳其旅大部，给美第 2 师、第 25 师歼灭性打击，重创美骑 1 师，缴获大量武器物资。东线我军经过数日奋战，消灭美陆战第 1 师 1 个团大部和伪首都师 1 部。

11 月 30 日，杜鲁门在美军惨败的情况下，威胁要使用原子弹。但毛泽东毫不理睬他的讹诈性威胁。12 月 2 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致电彭、邓等首长：“庆祝我 9 兵团两次歼敌大胜利”。指示我军乘胜前进，将主力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

同日，毛泽东致电天津市工商界李烛尘等人，高度赞扬天津工商界举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的正义行动。他指出，天津工商界 42989 位爱国同胞的示威大游行，是人民群众对美国侵略政策认识的一次大提高。你们认清了美国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本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立场上，并在 11 月 30 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动，是值得赞扬的。

毛泽东为广大工商界爱国觉悟的提高和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认识的提高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民一定能战胜美国侵略者的根据所在。早在 11 月 12 日，他就在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求全国加强对抗美援朝认识的教育，象北京市委所做那样，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肃清部分群众中的崇美、恐美心理，组织群众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现在，他看到全国各界群众抗美援朝觉悟大提高，抗美援朝运动热火朝天。他高度赞扬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又一次大焕发。他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一条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任务：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12 月 3 日，毛泽东致电彭、邓等志愿军首长，要求再次采用围敌诱援的办法，引诱增援敌人出动，予以围歼。电报说：我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地区将陆战第 1 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 7 师 1 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 7 师 1 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此增援部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场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 26 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敌人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

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再围歼伪军两个师和美军 1 个团，进一步扩大战果，便可以大大稳定朝鲜局势，迫使美军停止进攻。在打援作战中，要沉得住气，不宜过早歼灭被围之敌。他进一步发挥了我军在辽沈战役中围锦打援的办法。

12月4日美伪军在我沉重打击下，大肆溃退毛泽东指示我军应乘胜追击，派1个师或1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志愿军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兴奋不已。这种胜利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他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挥毫亲自草拟战报，要胡乔木立即登报、广播，让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知道。新闻稿指出：在这次战役中，“美国侵略军的第2师、第25师、土耳其旅、李承晚匪军的第6师、第7师、第8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1师、步兵第2师、英澳第27旅及李承晚匪军第1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战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与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与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7师1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3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击中。”

这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亲自草拟的第1份战报，足见毛泽东对这次朝中军队伟大胜利的高度重视。这份战报成为毛泽东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一份应战书，表明了他极其蔑视外强中干的美国侵略军的英雄气概。12月5日，美伪军不战而丢弃平壤，撤至三八线一带。6日，朝中军队解放平壤。毛泽东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再次草拟战报新闻稿，向全世界宣布平壤解放。他写道：

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收复平壤标志着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毛泽东在战报新闻稿中，第一次使用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的提法，公开了我军入朝作战部队的实力，以此警告麦克阿瑟，如果麦氏胆敢把我志愿军人朝视作儿戏，只能遭致失败的可耻下场。

第二次战役，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和牺牲。在中美这场短兵相接的对抗中，我志愿军战士受饥挨饿，在冰天雪地下，不惜英勇牺牲以消灭敌人。毛泽东为中朝人民的安宁、为世界和平也贡献了他的长子毛岸英。12月25日，就在志愿军打响第二战役的第1天，美机轰炸志愿军总部，毛岸英不幸牺牲。

按照彭德怀的说法，毛岸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战士。在毛泽东作出由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率军赴朝时，毛岸英便第一个找彭德怀报名到朝鲜参战。那时他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刚结婚不过一年。他要求到朝鲜前线去经受战火的锻炼，毛泽东支持了他的请求。

毛岸英这个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早在1942年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关键时刻时，他便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到前线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写道：“我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5日。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7日。

爱苏联就象爱中国一样。我不能眼看德国法西斯的铁蹄蹂躏您的领土，我要替千千万万被杀害的苏联人民报仇。我坚决要求上战场，请您一定批准我的请求！”

毛岸英作为第一批渡江入朝战士，被分配在志愿军总部工作，担任彭总的秘书和俄文翻译。12月25日，几架美军轰炸机向我志愿军总部投掷了凝固汽油弹，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来不及撤出办公室，被烈火包围，不幸以身殉职。

彭德怀司令员在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向毛泽东汇报了毛岸英牺牲的经过，以及他的忠骨埋在志愿军总部驻地的简要情况，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掐着指头数了一遍，点点头说：

“岸英刚满28岁，他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毛泽东的儿媳刘恩齐因岸英的去世万分悲痛，毛泽东这个通达宇宙、胸襟博大的伟人，没有用一般的语言去安慰她。他抄录了李白的诗句送她：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是啊，宇宙天地万物流转，个人在其间仅一尘埃而已。唯有将自己的生命融于宇宙，顺乎宇宙之规律，才能永生！在毛泽东看来，惩罚那些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千百万人的流血死亡基础上的战争刽子手，不正是为万民争存，顺乎宇宙之规律吗！

毛岸英的牺牲，丝毫也动摇不了毛泽东教训美国侵略者的钢铁意志。他把对儿子的思念和个人痛苦深深地埋在心中，集中全付精力指挥这场中美军队历史上的大对抗。他为志愿军的胜利感到欣慰，高度肯定这些胜利的深远意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他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铁多气少”，这是毛泽东对美国军队士气的评价。这个评价既是实事求是的，又是充满了革命豪气的。美国钢铁再多，如果士兵没有士气，不是也必然败北么！毛泽东拿起老友柳亚子先生写赠的词《浣溪沙》仔细欣赏：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推翻原子更全圆。/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天安门上万红妍。/毛泽东读罢，不禁诗兴大发，欣然命笔和柳亚子原韵写成《浣溪沙》一首：颜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毛泽东由天安门上鲜艳的红旗，看到妙香山的我志愿军战士手中的红旗。他再次发出乘胜追击的命令。

突破临津江，越过三八线，歼敌迎新年 第二次战役由于我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战，战役结束后，战士极度疲惫，装备、运输很差，牺牲

伤亡不能及时得到补充，部队病员急增。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首长根据这种情况，决定志愿军适当休整补充，把第三战役放在明年二、三月间进行。12月8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中提出，拟在二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让敌人占三八线，以便明年再战歼灭敌人主力。

毛泽东考虑，一、二次战役虽然给了敌人沉重打击，但要迫使敌人坐下来谈判或撤出朝鲜，条件还不具备，必须进一步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才能办到。第二次战役之后，中央给志愿军司令部的第一封电报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设想：朝鲜战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要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这对促进帝国主义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的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鉴于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政治斗争需要出发，要求志愿军连续作战，在明年1月上半月立即举行第3次战役。毛泽东在给彭总的电报中说：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过多揣测，民主战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1月上半个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

当毛泽东考虑给侵略者以更大的惩罚来结束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决策者们也准备以更大的对抗来把朝鲜战争进行下去。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不排斥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12月4日，杜鲁门和国防部长马歇尔派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到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商议美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接着柯林斯和麦克阿瑟又飞抵朝鲜，会见了沃克和阿尔蒙德，麦克阿瑟提出了进攻和报复中国的方案。16日，杜鲁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将美军由250万人增至350万人，其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一年内将分别提高4—5倍。

美国的核讹诈和扩大备战，没有吓倒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却使它的盟友英国工党政府惊惶不安。12月4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匆匆赶到华盛顿。艾德礼一方面主张给中共军队以“严重教训”，“必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力和威信”；另一方面，艾德礼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出发，不能不顾及与中国的关系；同时英国担心美国在朝鲜陷得太深而无暇顾及欧洲，因而主张和平谈判。但是艾德礼又再三提醒杜鲁门：中共绝不会愿意按照联合国所宣布的原则来解决问题，他们希望试试他们的力量，试试独立的感觉。因此，即使俄国人想结束战争，也不见得能说服毛泽东。艾德礼认为毛泽东会采用强硬的态度。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可能要在什么价钱之下才肯停火？有这么一种危险，如果我们表示妥协，价钱就可能上涨。而他认为我们应该讨论讨论，我们准备搞到什么地步，我们打算谈判哪些问题，什么地方我们应该

转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40页。

《杜鲁门回忆录》下卷，第475页。

坚持。”杜鲁门对在朝鲜停战不感兴趣，他确认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过，在亚洲也有必要守住这个“滩头堡”，“尽可能给中国人以更多的惩罚”。在当前，可以提出停火的要求，以调动国际舆论和掩护备战。他和艾德礼最后达成协议：“准备遵循谈判途径，设法终止敌对行动。”如果中国不接受他们的作法，就应由联合国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并“通过联合国，来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12月5日，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印度、菲律宾等13个亚非国家代表呼吁北朝鲜和中国政府将部队控制在三八线以南。14日，联大会议通过决议，由伊朗、印度、加拿大代表组成朝鲜三人停火小组，要求先停火后谈判，这个决议符合美国的要求，美同表示赞成。

上述情况更加促使毛泽东定下越过三八线打击美伪军的决心。从现在情况看来，美军可能后撤，同时放出谈判的汽球。他们有可能用“和谈”一手，来争取战争一手得不到的东西，犹如当年马歇尔调停国共关系一样，用和谈掩护备战。我们也是主张和谈的，但是要谈就必须掌握主动，否则美国便会利用它在军事上的优势来要挟我们，使谈判长期没有结果或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必须再打一仗取得更大主动权。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高：

（一）密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军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恶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道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在我13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二）麦克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四兵团（阿尔蒙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10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10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10日有二百余辆卡车由陆1师师长史密兹少将率领，冲击包围，逃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敌之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首长了。许多通讯社报道，中同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表示很大的耽心。他耽心敌军逃逸过快，没有受到致命打击，在得到喘息和装备之后会卷土重来，或至退到三八线之后立即利用国际舆论造起谈判的空气，从而不利歼灭敌人。对于美军是否如外国通讯社报道那样，将撤出朝鲜，他虽然未作否定，但表示怀疑。他要求志愿军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不要为现象迷惑，也不要因麻痹大意而影响士气，必须沉住气，静观其变。

13日，毛泽东下定决心立即发动攻势打过三八线，粉碎敌人备战和假和谈阴谋。他致电彭德怀等志愿军司令部首长，指示，英美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

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他要求我军必须乘胜南进，如能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地区寻机歼灭几部分敌人，然后再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那么我军可以在开城一线和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的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6个军在平壤和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从政治上考虑，毛泽东强调我军必须立即越过三八线自逼汉城，才能置美李军于彻底被动之中。

19日，彭德怀回电毛泽东：“得13日复电后，现已遵示越三八线作战，如无意外变故，打败仗是不会有，攻击受阻或胜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为避免意外过失，拟集中4个军（50军、66军在两翼牵制敌人），首先歼灭伪第1师以后，相机打伪6师，如战役发展顺利时，再打春川之伪3军团；如不顺畅即适时收兵。能否控制三八线，亦须看当时具体情况再行决定。”彭德怀以稳妥、周密出发，设想了几种情况，作了比较保守的估计，他情愿在估计战况时稍微保守一些，在具体作战时争取战果更人一些。这是因为他对我军的艰苦情况深有所知，这一次战役，应该说带有若干勉强性。他认为美军现在不可能撤出朝鲜，必须作好和美军长期作战的准备，速胜盲目乐观情绪是极其有害的。

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及志愿军司令部各首长，完全肯定彭德怀19日电报中的战况分析和我军作战计划，指出：（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存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使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入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果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29日，他致电彭德怀，再次强调越过三八线的必要性。他指出：“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

毛泽东认为，战争既然是美伪军发动的，他们既然能够突破三八线、占领平壤，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不受三八线约束，严厉惩罚侵略者。只有越过三八线，美国才知道中朝正义之师是不可侮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必须给敌人以应有的惩罚，才能解决问题。

为了有效地打击美伪军，毛泽东对各个方面作了周详考虑。

第一，他要求给作战部队补充足够的新兵，尽量争取间隙时间，适当进行休整。13日，他指出：明年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9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17日，他指出，9兵团英勇奋战，减员甚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21日，他指示：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不应使部队过度疲劳。他指出，第三次战役打完后，我军和朝鲜人民军都应有一次较大休整。

第二，他要求注意解决部队运输、粮食、弹药、给养的问题，以保证作

战。13日，他告诉彭德怀，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21日，他要求高岗加紧对前线物资运送：“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26日、29日他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均再次强调了保证前方物资供应问题。

第三，他要求注意总结我军作战经验，予以发扬光大。18日，他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将志愿军第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战经验总结批发各中央局、大军区及有关单位，肯定“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他指出：“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他后来对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说：你们打的敌人有飞机、大炮、坦克和海军的优势，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你们每打一仗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的确，我军非常注重总结作战经验，在头两次战役中，我军发扬了传统作战的一贯打法，同时又创造了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韩国战史的作者把志愿军作战的战术归纳为：机动进攻战术、尖刀突破战术、穿插分割战术、随机应变的防御战术、机动防御战术、第二战线战术、对精锐强大敌人的进攻战术、中心开花战术、其他战术等。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的战术具有渊源流长的历史，其战术具有多样性、有效性等突出特征。韩国战史写道：“中共军在国共内战时期采取避免作战，保存实力，争取逐渐发展的纯流动性防御战术，得以生存下来。其后，又以游击战为主，巧妙地运用了野战条件下的运动战和防御战，他们就在这种战术原则，练就了他们特有的战术，因而这一次参战，就结合了我国地理、气候和风水条件，采用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战术。”

美国海军陆战队官方战史，对志愿军的战术写道：

虽然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的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它的军力不足可能归咎于缺乏某些武器和装备，但它的半游击战术是以机动性为基础的，因此它不能有重武器和交通运输的负担，身穿厚棉制服的中国苦力在做一件事情时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士兵做得更好；他能够用难以相信的秘密行动潜入到敌人阵地的周围，只有有这种经验的美国人才能够体会到半夜被偷袭时的震恐心情，因为偷袭者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妖魔鬼怪那样用手榴弹和冲锋枪的子弹射击我们。记者们总喜欢谈到“亚洲游牧群众的人海战术”。再没有比这更不真实的了。实际上，中国人很少以团以上的单位进行出击。甚至这些行动也通常缩小到似乎是无休止的排它的渗透。中国红军之成为可怕的力量，不是依靠他们人多，而是依靠诡计和突袭。

第四，毛泽东要求第三战役必须周密考虑、精密部署。24日，他致电彭德怀，指出美李军已在37度至38度线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这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为了防止敌人后撤，我军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休整以迷惑敌人。另外，原定朝鲜人民军第2、5兵团深入三八线以南牵制敌人、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26日，他再次致电彭、朴并告金日成和高岗，强调：11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不但人民军2、5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军两军感觉安全，

《朝鲜战争》第1卷，第124页。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91页。

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他指出，人民军第 2、第 5 军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 37 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毛泽东认为，作这样的部署，可以稳住美伪军，以便狠狠予以歼灭。他的这些部署，经彭德怀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修正，并取得军委同意后（例如，彭德怀提出，我军越过三八线后，不必再退回三八线以北休整，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第五，他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强调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反对速胜的有害观点。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不仅在中朝部分士兵和指战员中滋生了盲目乐观、轻敌速胜的思想，朝鲜劳动党中央和苏联驻朝大使也产生了这种片面认识。彭德怀清楚看到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情绪弥漫的危险。他在 12 月 19 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不安地指出：两次大胜之后，朝鲜党政军民情绪与中国志愿军的影响大为提高，速胜盲目乐观情绪也在各方面滋长。苏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种意见，不仅是苏使意见而是朝党中央多数同志要求。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美伪军士气虽然较前低落，现还有 26 万左右兵力。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于帝国主义阵营来说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美国这样做，如再吃一两个败仗，再被消灭两三个师，可能退守几个桥头阵地（釜山、仁川、群川），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

21 日，毛泽东回电彭德怀，肯定彭对敌情的分析，要求作“长期打算”的准备。26 日，他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进一步明确长期打算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他强调，战争仍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大部，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以上诸方面的考虑，取得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诸首长的赞同，并得到有力贯彻，为第三战役的进行作了有力的准备。

美国方面，在这一段时间一方面放出和谈空气，一方面却在加紧备战。美伪不放西起临津江口东至海岸 400 余里的正面，南北 140 里纵深布置了三道防线，共 8 个伪军师 4 个美、英师作正面设防。除利用旧有永久洋灰钢筋碉堡外，并遍筑地堡交通壕、设铁丝网、埋地雷，企图固守以待增援兵，再行进犯。

1950 年除夕，中朝军队在朝鲜东西海岸间沿三八线四百余里宽的阵线上，向敌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年总攻势。我军以排山倒海、狂涛怒浪之势呼啸前进。敌军晕头转向、丢盔弃甲、仓皇失措、狼狈逃窜，我军强行渡江、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经过激战很快突破临津江。1 月 2 日，我军全线突破敌人防御纵深 15—20 公里，由伪军组成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右翼完全暴露，敌人 10 多万军队拥挤在汉江北岸，陷于危险境地，被迫全线溃退。接着，我军突破美军防线，立即转入全线追击。美军溃不成军，丢弃汉城拼命逃跑。4 日晚，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汉城，5 日，朝鲜人民军举行入城仪式。当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祝捷狂欢晚会。

5 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 军团渡过汉江。7 日，解放水原、原州、龙仁、利川、杨平、川阳、侏州、横城等，8 日占领仁川。经过 7 天 7 夜连

续战斗，我军前进 80——110 公里，将敌人驱逐至北纬 37 度线附近之平泽、安城、堤川、三陟一线，歼敌 19850 人，取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我军适时停止追击，第三战役胜利结束。

毛泽东从政治上考虑，第四次战役仍然必须进攻。美军第 8 集团军在沃克死后归李奇微中将指挥。在第三战役中，第 8 集团军再次吃了败仗。不过，李奇微在后撤中有他的打算。他企图诱使我军深入南进，待我极度疲劳，给养缺乏，战线拉得过长的時候，对我军再实行一次仁川登陆，分割包围，陷我军于被动之地。彭德怀看穿了李奇微的计策，在 37 度线附近停止了追击。1 月 25 日，彭德怀在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的报告中，就为什么没有对美伪军实施乘胜追击作了说明。他说：

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了 30 至 50 公里，这是因为敌主力还未被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我军乘胜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火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击败敌人后，曾实行相机追击；在西线亦曾以一部分兵力分三路相机追击败敌，但主力则集结休整，准备再战。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战果。第三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作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很大的战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体力、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我们没有采取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彭德怀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第三次战役我军已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第三战役之后，我军实力大受损伤：骨干伤亡过重、部队极端疲劳、后勤供应不上、士兵没鞋穿、粮食成问题、弹药接济不上、冻伤人员急剧增加、士兵身体素质急剧下降，所有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要给部队休整时间、恢复疲劳、补充物资和人员，改善供给条件。彭德怀深知，军队没有良好的状态，没有确实可靠的实力保证，要保持胜利的势头是很困难的。因此，第三战役一结束，志愿军党委便指示各部队：今后的中心问题在于全党全军努力克服困难，准备充足的作战力量（体力、物力、战术、技术等项），很好地总结历次战役经验，特别是第三次战役经验，提高技术、战术，争取下一战役伊始，连续作战，根本解决朝鲜问题。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1 月 8 日，我军主力开始集结于汉城、横城一线以北地区，转入休整。计划休整两个月，从 3 月份起转入春季攻势。

毛泽东同意彭德怀的考虑，他肯定部队转入休整是完全必要的，我军必须有充分准备，才能给予美军更大打击。1 月 4 日，他指示各大军区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指出：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也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10 日，他在给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批示中，要求改善 9 兵团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14 日，毛泽东在一个电报中正式肯定，我志愿军必须有 2 至 3 个月的休整时间，以利于春季再战。他说：

在目前开始的两个月至三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均有很多严重的工作要做，这主要是补充新兵到军队里去，使新兵向老兵学会作战方法，加强军队的装备，修理道路，储备粮弹，改善运输系统和后方勤务工作。只有完成这些工作，才能保障最后胜利。今后敌人统帅部的方针有两种可能性。

（一）在中朝两大军队压力下，略作抵抗，即退出南朝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我们充分准备工作的结果。因为敌人知道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了，敌人才知难而退。

（二）敌人在大邱釜山地区作顽强抵抗，要待我们打得他们无法再打下去了，方才退出朝鲜。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做充分准备才能再战。……有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我们在二月间就要打一仗，打了再休整，再上完成最后一战的准备工作，这一点也要估计到。但是，如果不发生这种形势，则以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充分地完成上述各项准备，然后举行最后性质的春季作战，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中朝两国同志都应当定下决心来做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作。

毛泽东当时估计基本的情况是两种可能：敌人略作抵抗而退出南朝鲜，或在我军激战失败之后再退出南朝鲜。这两种可能都只能在我军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强大的实力之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因此，用二三个月来休整是完个必要和正确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敌人不待我军休整好，立即在2月份发动进攻。那么，我们便只有发扬我军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克服任何困难，打完这一仗再休整。毛泽东对各种情况下我军应取的方针都作了明确规定，他对战争的未来有深入全面的考虑。

美国方面，为了对付第三次战役的失败，着重抓了几手：

第一手是，再次提出停火建议，企图在舆论上陷我于被动。

1月13日，联合国第一委员会根据美国的意图，通过了所谓“朝鲜停火三人小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一）在朝鲜立即安排停火；（二）一旦停火实现，则加以利用，以便考虑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步骤；（三）一切非朝鲜军队分适当阶段撤出朝鲜，并以各种措施实现联合国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四）在完成第三条的步骤之前，依据联合国原则订立适当的临时措置，管理朝鲜和维持朝鲜的和平与安全；（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毛泽东对于美国谈判这一手的实质看得很透。我们不是不愿停战，而是在什么条件下停战。所谓五个步骤，关键的步骤是先停战后谈判。只要先停战，美国就可以保存在朝鲜的实力，使李承晚保有若干地区和武装资本，而谈判可以无限期拖延，达不成任何协议。而且，正如美国学者指出那样，美国政府并不肯定想与毛泽东谈判：当时美同很注意促进大陆上第三种势力的出现，它既反对毛又反对蒋，可以先在北京夺权，然后再媾和。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指出，必须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的主张：应当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如果美国不接受这个合理的尊重一个国家主权的条件，我们便只有准备和美国军队继续打下去。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月17日，我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关于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复电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主席阿彼拉兹。周恩来在电文中指出：所谓解决朝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其基本要点仍然是先在朝鲜停战，然后才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而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因此，

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除这一基本点外，其他各项原则亦规定得极不明确，而所谓现存国际义务又未明白指出为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这就极有利于美国为维持其在朝鲜、台湾和远东各地的侵略地位作辩护。

为此，周恩来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的提议：甲、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的基础上举行有关各国的谈判，以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乙、谈判内容，必须包括美国武装力量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退和远未有关问题；丙、举行谈判的国家，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印度和埃及七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即从举行七国会议予以确定；丁、七国会议的地点，应选在中国。当然，美国不会接受中国提出的上述建议。如果要无条件地撤退朝鲜一切外国军队，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美国感到对南朝鲜李承晚会非常不利；要以谈判为标志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台湾蒋介石会非常不利。杜鲁门是不会放弃共立场，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考虑这个问题的。更何况美国提出谈判本身具有绥靖性质，在达不到目的时，便只有让它破产了。

美国的第二手是，企图策动台湾蒋介石军队反攻大陆，牵制志愿军在朝鲜的行动，使我国面临两条战线作战的困难局面。

早在 1950 年 12 月，麦克阿瑟便一再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利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麦克阿瑟提出了四重战略：封锁中国沿海；用海空轰炸中国的工业基地；在朝鲜使用国民党部队；允许国民党采取各种牵制行动。麦克阿瑟一再坚持他的上述战略，要求五角大楼批准他的计划。

为此，蒋介石也跃跃欲试。1 月 8 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见麦克阿瑟，商谈反攻大陆的计划：准备用 20 至 25 万兵力进攻厦门、汕头，以配合朝鲜方面作战。台湾国民党总统府顾问郑介民也密飞东京和麦克阿瑟密商利用大陆土匪武装进行骚扰问题。据称，麦克阿瑟已通知蒋介石，美国可能在 1 月份结束对台湾进攻大陆的限制。

针对麦克阿瑟策动蒋介石军队进攻我国东南沿海的企图，毛泽东于 13 日、16 日指示陈毅，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兵力，确保厦门安全，并在汕头及海陆丰部署 2 个军，加强福建广东江浙诸省的剿匪，江浙两省沿海亦需作好对付敌人进袭的准备，全歼来犯蒋军。由于东南沿海我军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麦克阿瑟的建议，经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复考虑，感到并不可行，予以否决。

美国方面抓的最主要一手，是在朝鲜战场上。第 3 次战役后，美军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范登堡被派到朝鲜视察美军第 8 集团军。他们在报告中指出，第 8 集团军并没有被摧毁，该军阵容良好，而且天天在改进中。中国人由于补给线太长，显然已经落到不能进行有效作战的地步。麦克阿瑟也保证说，除非俄国插手干涉，看来只要我国整个民族利益需要，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朝鲜继续打下去，而又不会使第 8 集团军遭受严重的危险。第 8 集团军指挥官李奇微也认为，中共第一、二、三次战役，每次历时不过 8 天，每次进攻均在夜间发动，每次本可以乘胜追击，却突然停止。这一切说明，中共军

队不具有长时间作战的能力，它不能防空，补给十分困难，因而只能发动“礼拜攻势”。李奇微认为，美军凭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能力对中共军队发动一场闪电式进攻战。这一新的报告使华盛顿欣喜若狂。美军在迅速得到各方面的补充装备之后，于1月25日，以23万人之众，在炮兵、坦克、飞机等现代化装备支援下，由西而东全线发动大规模进攻。

敌人迅即发动的进攻，来势如此之快，是我军始料不及的。27日深夜，彭德怀电令各部队停止休整准备作战。他反复考虑到我军休整期太短，各方面准备很差，应当再争取一个缓冲的时间来加强部队作战实力。为此，当日深夜，他发电报向毛泽东汇报请示：（一）美军约三个团（后续部队不详），分三路越金良场里、水原线北数里，有相机攻占汉城、市江南岸桥头阵地模样，企图以此稳定联合国内部目前严重混乱现象，为增加帝国主义阵营矛盾，可否以中朝两军拥护限期停战，人民军与志愿军从乌山太平里、丹立里（原州南）线，北撤15至30公里，消息如同意，请由北京播出。（二）敌继续北犯，我不全力出击，消灭一个师以上，保持桥头阵地，甚为困难。出将破坏整训计划，推迟春季攻势，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最快亦须下月初旬，才能勉强出动。我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在国内外政治情况是否许可。……政治上又不许可放弃汉城、仁川，即须被迫部署反击，但从各方面考虑，甚为勉强，以何者为是，盼示复。

彭德怀的考虑，主要出于军事的角度，不能不承认是实事求是的举措。对于敌人进攻的规模会有多大，虽然此时他还缺乏准确的判断，但不能不把情况估计严重一些。因此，他主张采取适当军事斗争策略，如暂时同意和敌人谈判，或者主动放弃一些地方，以争取时间等。这些考虑，单从军事斗争策略的角度看，应当说是完全可取的。而且，彭德怀在头脑中始终有一个观念：和美军进行斗争，不是可以速胜的事情，必须真正树立打持久战的思想。因此，根据我军一贯的作战原则，为了更好的前进而后退，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放弃一城一地，都是必要的。正是基于这些考虑，他给毛泽东发了上述电报。

28日晚，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回电。毛泽东的打算，与彭德怀的打算不同，不是退却，而是要进攻。他说：

（一）一月二十七日廿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人田安东之线以北地区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保持仁川及汉江南岸，为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办法。

（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江后停战。

（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江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江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六）我军没有补充弹药也不是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全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

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指导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敌军以北区域以后再行两个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毛泽东的主张不是停火、退却，而是要继续进攻，以争取我军取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他把军事从属于政治，军事行动必须体现政治的要求，服务于政治的目的。就政治形势说，美国还操纵着联合国，还能够使国际舆论随它的意图摇摆；敌人的有生力量还没有受到致命打击、我们的优势还不突出、不巩固，凭借这种优势要想迫使美国退出朝鲜，或坐下来谈判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还有很大困难；而已现在我军在美军主动进攻面前便宣布停战或退却，便将使我在政治上丧失主动，志愿军的形象在国际上受到影响。因此，即使是最困难的时候也必须顶住，在历史上我军是不乏这样的先例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要求第四次战役首先应当打成一场政治仗，这场政治仗的意义更大，从政治仗的要求出发，决定了军事仗的打法和出发点。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志愿军司令部总部决定我军的作战方针是：“力争停止敌人前进，稳步打开局面，并从各方面加紧准备，仍作长期艰苦打算。”根据这个作战方针，我军在西线组织防御，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则让敌深入，然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敌一二个师，进而向纵深发展，从侧翼威胁西线敌军主要集团，形成我军反击态势。

战役开始后，我军在西线有力地阻击了敌人。在东线，2月11日晚，发起向横城之敌的反击，歼灭伪8师3个团，美2师1个营，美伪军4个炮兵营，加上人民军取得的战果，是役共歼敌12000余人。2月16日，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我军共歼敌22000余人。第二阶段开始，我军处于全线防御，到4月21日第四战役结束，再歼敌5、6万余人。整个战役历时87天，歼敌达7、8万人，较之前三次战役总和还多。

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第四战役的实际进程，使毛泽东对朝鲜战争我军作战的根本指导方针思考更加成熟完善，其根本方针是“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毛泽东深知，战争是人力、物力和智慧的竞赛，我军在物质和人力上的弱点是不能不承认的。还在第四战役中，毛泽东便深切地注意到我军在一二月份作战中伤亡较多，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大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堵截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毛泽东是最尊重事实的，从敌我双方情况看，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必须从根本上树立准备长期战争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才能尽量争取较短时间结束战争。为此，毛泽东考虑了如下措施：

首先，毛泽东强调必须把国内抗美援朝的宣传和我军在朝作战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抗美援朝运动，使前线战士受到巨大鼓舞，使国内群众受到深刻教育，从各方面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西北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汇报后，他要求：抗美援朝运动要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这个运动应该普遍展开，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造谣的特务，要镇压一下。要把抗美援朝、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当前的三大运动。

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拟定的要点中关于抗美援朝,他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全国普及深入地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16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号召: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运动,进一步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以期一致奋起,家喻户晓,揭露美国的侵朝阴谋,坚决抗议武装日本,继续支援中朝人民志愿部队,击败美国侵朝战争,保卫中国与世界和平。

之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作出决议,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作为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3月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宣传准备今年‘五一’全国大示威的指示”,要求把抗美援朝运动变成“爱国主义的劳动竞赛”,工人阶级“必须站在这一伟大运动的最前列,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中坚力量”。接着,全国青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等都作出决议、发出指示,号召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蔡畅、吴玉章、郭沫若、朱学范等均发表谈话,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号召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把抗美援朝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4月上旬,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派出中国人民首届赴朝慰问团赴朝鲜慰问英雄的中朝人民军队,并邀请志愿军战斗英雄回国作报告。同时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派出医疗队赴朝。一个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同范围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毛泽东不仅使抗美援朝运动成为和美国侵略者对抗的强大力量,而且使抗美援朝运动成为推动国内经济建设、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强大动力,在全国人民中树起了与美国侵略政策长期斗争的思想。

其次,毛泽东提出我军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方针。2月7日,他给周恩来一信,并转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同意周恩来和聂荣臻关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计划。他要求将杨得志19兵团3个军、杨成武20兵团两个军、董其武23兵团两个军共7个军,编成第二番入朝作战兵力,加以人员,弹药补充,于4月开赴朝鲜作战,将13兵团6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四个月,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3月1日,毛泽东就朝鲜战局和我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致电斯大林,详细说明我军准备与美军长期作战的原因和轮番作战的方针。

毛泽东指出,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一方面,从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美军的陆军还较我军占优势,其技术装备也占优势,他们正设法利用技术消耗我军,同时不断对朝鲜沿海袭扰,不间断地轰炸我军运输线,使我军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物资在中途被炸毁,不容许我军在前线得到必要的休补。由于我军目前确有很大困难,要实行战役决战还不可能,因此,必须作好朝鲜战争长期化的准备。他说: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

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敌人准备在长期中消耗我军，我们则用轮番作战的方法消耗美军。毛泽东分析，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便能“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的目的。”这是因为，我军在士气和数量上远远超过美军；我军在朝鲜获得补充休整较困难，但在国内得到补充休整则较易，因而部队轮番作战可以解决补充休整的困难，使部队始终保持充分的实力，便不怕美军的消耗，反而能够有效地消耗敌人。这就是以我之长，胜敌之短。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从长期中争取短期。彭德怀充分肯定轮番作战方针的意义。他说：“我军实行轮番作战，改善志愿军装备，加强后勤机构、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部队参战，这就是为了尽可能争取短期。”

由于我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大大地加强了我军实力，使志愿军与美军的对抗更站在主动的地位上。

最后，毛泽东决定，对美英军目前应采取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作战方法。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从美英军和我军实际情况出发，每次歼灭敌人一个营。他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

毛泽东记得一、二、三次战役，我军都曾对美军师或团进行过包围，他也多次指示要全歼美军1个师或几个师，但是每次战役在我军装备给养都极差的情况下，要围歼具有现代化武器设备和运输设备的美军1个师甚至几个师，都较难奏效。毛泽东也曾估计美军的战斗力不会很强，但几次战役之后，毛泽东改变了看法，美军仗恃钢铁优势、仗恃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胜仗的气势，因而在打仗中还是怕丢面子的。而且如果是撤退，由于有机械化运输工具，跑起来也很快，因此全歼美军一个师确有困难。入朝以后，我军全歼美军的历史是一个整团。因此，毛泽东一直在酝酿实行小包围，每次歼火敌人一个营的想法。他对38军政委刘西元就曾说过：你们38军在朝鲜打了胜仗，把美国佬打痛了，名气可大哪！美军装备好，仗着它的飞机大炮来欺负我们。我们的办法，就是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我们的长处，同美国人打运动战，打近战夜战，把敌人调动开，分散开，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口一口地，一股一股地把敌人吃掉。

毛泽东也记得，彭德怀在电报中曾经反映过，一仗聚歼美军两三个师有很大困难。考虑上述种种原因，毛泽东根据我军历来的作战原则，决定每次力争能歼灭美军一二个营，用这种办法长期消耗敌人，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取得胜利。他指示志愿军：为了打落敌人的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8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8个整营，这就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16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他把这种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敲牛皮糖”。

毛泽东强调，在对付美军和李承晚军队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打美军和打伪军不同，打美军要采用由小歼灭到大歼灭的办法，这就是作战规律。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351页。

转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119页。

而李伪军的作战能力极差，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1军、新6军、18军和桂系的第7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人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

5月2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见志愿军司令部首长陈赓和解方，对上述问题作了深入部署。他指出，打法上同意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应加强政治工作。对朝鲜战局长期性、艰苦性应有充分认识与准备。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愿军司令部与各军。之后毛泽东又向邓华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指导方针：总的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这样，毛泽东在第五次战役前后，关于对美军作战和解决朝鲜问题的全部战略方针便达到全面成熟。我军对美军作战更有信心，战胜美军的部署更加精密。

在“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略方针指导下，4月22日，我军发起了第五次战役，至6月10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历时50天。我军共投入15个军（包括人民军4个兵团），歼敌8万2千余人，粉碎了美李军企图在我军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企图。摆脱了我军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志愿军新参战的部队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美军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他们要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战胜志愿军、人民军的企图已经破产，美军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美国不得不坐下来和朝中谈判解决问题。

中美两军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的五次战役，美军在总体大遭致失败。美军的惨败只是现象，实质是美国侵略政策的惨败，是杜鲁门反共产主义冷战政策的惨败。

曾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指出，杜鲁门主义的中心，就是把反共产主义作为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艾奇逊宣称：共产主义的威胁是一种讨厌而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瘟疫。这个说法，道出了杜鲁门主义仇视共产主义的实质。杜鲁门主义着眼于东方共产主义与西方社会制度之间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在这种强烈反共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美国政府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无端地看做是对美国社会制度的真正威胁，看做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国义不容辞的义务，就是抵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在任何地方承担维护“和平”的义务。因此，杜鲁门把南北朝鲜的内部冲突，看作是共产主义向“民主”制度的进攻，这种虚妄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352—353页。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第263页。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4页。

的、无中生有的判断，构成了杜鲁门入侵朝鲜的政策基点。

与此相反，中国军队在朝鲜和美国军队兵戎相见，不是出自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制度的对立，根本上是出自于国家主权的需要、和平建设和安全的需要、世界和平的需要。毛泽东不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而把中国士兵派到毗邻美国的任何一个国家去作战而威胁美国的安全，而杜鲁门却因为北朝鲜和中国的社会制度与美国的制度不同，派兵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安全。这样，杜鲁门政府便把在朝鲜的美国军队从政治上置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中国军队虽然装备极差，但它是正义的仁义之师。中国军队有理由理直气壮地打击侵略者，这就是志愿军在五次战役中打败美军的政治基础，这也是美军不得不坐下来进行谈判的政治原因。

三、谈判是为了寻求和平

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第五次战役之后，杜鲁门政府感到要在朝鲜扩大战争，赶走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不可能了，必须坐下来用谈判的方式争取用战争得不到的东西。艾奇逊觉得，“如果要结束敌对状态，现在是寻求结束的好时机。”

艾奇逊求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的乔治·凯南，艾奇逊知道他和克里姆林宫有极好的关系。5月31日，凯南在纽约海滨长岛格作科夫庄园的避暑别墅和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共进午餐，他小心翼翼地说出了美国的和谈提议。

马立克和凯南的谈话，很快传到了北京。6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深入讨论这一事态的发展和它的意义。毛泽东判断，现在和美国谈判的时机已经到来，我军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剥夺了美国在谈判中提出过分要求的根据，美国同意讨论逐步撤退外国军队、以及朝鲜前途等问题，这种态度也值得欢迎。

美方与朝中方面的停战谈判进入准备阶段。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安排我方谈判班子和指示注意事项。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派邓华副司令员出席谈判，由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毛泽东回电同意。他并告诉彭德怀，国内已派李克农，乔冠华等，于7月4日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与朝鲜谈判代表会合。

根据过去与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谈判经验，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总部，在谈判期间，丝毫不能放松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和谈判期内，美李军可能对我来的一次大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毛泽东要求，如果在谈判期间，敌人大举进攻，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而且，必须防止美李军趁机在元山登陆和在西边登陆。他要求，在达成停战协定以后，还要保持应有警惕，设想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早作对策，以免被动。他的指示的总体精神，就是要作好两手准备，能谈也能打。彭德怀把这个精神具体化为：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

7月10日，谈判开始，毛泽东密切注视谈判进展情况，随时给我方代表以具体指示。

朝中方面在谈判中，提出三条原则建议：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应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10公里内确立为非军事地带，同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商谈；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在议程讨论中，美方不同意把撤退外国军队列入议程讨论。毛泽东认为志愿军在合理的条件下撤回国内，是没有问题的，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军队不从朝鲜撤出，朝鲜的和平统一便没有保证。我们提出这一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来，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有权讨论撤兵。他指示我方代表，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但是为了使谈判能进行下去，我方采取灵活策略，经过双方协商，同

意将这一问题放在另外会议上去解决。

在谈判中，毛泽东把朝鲜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谈判只要有利实现朝鲜人民的和平和主权，其他一些枝节问题，都可以让步，可以灵活的解决。

谈判中，首先发生的是记者采访问题。美方首席谈判代表乔埃要求朝中方面于7月12日允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采访。我方建议在议程问题取得完全协议后，容许双方同等数目的记者到达开城地区采访。美方不顾双方并未达成一致协定，于12日将20名记者偕同美方谈判代表到达开城东板门店我军防区，我方不同意记者通过，美方代表团竟率记者全部返回。为此，美方致函朝中代表，抓住这个问题人做文章。李奇微致函彭德怀和南日，除再次提出记者要求外，还要求划一个圆形地区为中心区，以开城的中心为圆心，半径为五公里，东面以板门桥为界。在整个会议期间，在中立区内不能从事任何敌对行动，会议区和双方代表团人员前往会场区所经过的公路不驻扎武装人员。

毛泽东指示，可以同意李奇微的要求，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此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能顺利进行。毛泽东认为，记者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小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但是，应当提醒美方注意：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美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毛泽东强调，谈判双方是对等的，任何一方都应当尊重对方，不可盛气凌人、任意要挟对方。

接着，美方又提出一个中立区问题。7月14日，中立区协议达成后，我方只在中立区留少数军事警察，我志愿军只在会场区外担任警卫。8月4日下午、志愿军一个连在高丽洞广场开会，布置如何维护中立区安全，一部分警卫人员在赴会途中，误入中立区。当日下午美方乔埃将军提请我方注意。8月5日晨，我方通知美方，保证此类事件今后不再发生。但美方却小题大做，于8月5日当天拒绝到会。李奇微并致信金日成、彭德怀，宣称：只有这一事件得到满意解决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时，才能恢复继续谈判。8月6日，金日成、彭德怀复信李奇微，再度强调我方的诚恳态度，表示为了使我们的会议不致因这类偶发的枝节事件而受到阻碍，已再度命令开城中立区的我方警卫部队，严格遵守7月14日的协议，并保证不再发生违反协议的事件。毛泽东针对这一事件，指示我方要从中吸取教训。他把这个问题提高到维护我国外交信誉的高度来认识，他说，不管对方如何，只要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我们就要坚决执行，决不可轻言寡信。如有违反，只要是我方的责任，我们就要实事求是地承担并予以妥善解决。事关国际信誉，说话算数，这是新中国的外交风格，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才能永远立于主动地位。为此，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予该队首长以纪律处分。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充分表现了朝中方面和毛泽东对和平谈判的诚意。

但是，美国方面除了在谈判中纠缠于枝节问题，为谈判制造种种障碍外，还在会场外制造种种事件，破坏停火谈判。

8月19日晨，我军军事警察遭李承晚军伏击，排长姚庆祥当场被枪杀。

22日，美军军用飞机侵入中立区低空盘旋，在我方代表团驻地，俯冲投弹扫射，严重威胁我方谈判代表安全。29日凌晨，美军军用飞机又飞临开城中立区低空盘旋，威胁开城居民安全。30日，我方军事警察、人民军战士郑重南、杨显泽、张仁风在开城中立区以内，遭美李军袭击，枪杀杨显泽，重伤张仁风和郑重南。9月1日，美国军用飞机飞临开城上空，投掷炸弹，并以机枪扫射。上述事件，虽经朝中方面严重抗议，但美方或是横蛮予以拒绝，或是无理开脱，蓄意破坏谈判。更有甚者，在讨论军事分界线时，美国借口其同朝中军队比较，有“海空军优势”，必须在陆上取得“补偿”，提出将分界线划在志愿军阵地以北的38—68公里的开城。伊川、通川一线，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1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遭到朝中方面严正拒绝。

美方仗恃其钢铁优势压迫朝中方面让步，公然宣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李奇微更不可一世地要挟，“用我们联合国军的威力，可以达到联合国军代表团所要求的分界线位置。”李奇微大要美国的霸权威风，谈判桌上硬要，如果不给，便在战场上硬抢，实在抢不到了，再坐下来谈。

毛泽东对于美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种种表现认真分析，他要求对美国是战还是和的真实意图，不要只听其口头说得好听，还要多看他们的行动。我们是要真和的，但美国不一定要真和。他指示彭德怀：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作好作战准备是完全必要的。

果然，美李军在8月中旬发动了“夏季作战”攻势。8月18日，美李军集中了3个师的兵力，向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约80公里朝鲜人民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他们企图利用夏季洪水冲坏公路交通运输线给我军造成的困难，以他们的空中优势开展“绞杀战”，企图陷我军于困难，夺取谈判桌上不能得到的东西。

毛泽东指示，对于美李军的进攻，必须予以反击。他要求我方拟出反击计划，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反应将会如何，都要事先考虑到。军队位于原驻地，要加强训练，并准备随时对付美李军方面的登陆袭击。9月1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部队开始参战。我年轻的空军作战顽强，取得辉煌战果，粉碎了美军仗恃空中优势“绞杀”朝中军队的阴谋。与此同时，美李军的陆上进攻在朝中军队的反击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军在夏秋季防御作战中歼敌15万余人，美军不得不停上所谓“夏季攻势”。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中朝军队英勇作战的精神，要求再接再厉，坚决粉碎美李军的一切进攻，迫使他们再次坐下来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毛泽东致电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中央对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指出，整个形势对于中朝人民取得最后胜利有利。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持中朝军队。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虽然也有困难，有些困难还很大，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朝中人民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尽管美国方面用战争败坏和平谈判，但毛泽东仍呼吁美国不要迷信武力，应当认真地回到谈判桌上来。10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深刻阐述中国对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原则立场。他指出，我们是不怕美国的武力威胁的，要打我们就要

陪它打到底。“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主张和平谈判的。“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毛泽东严正宣告，如果美国没有诚心坐下来认真谈判，还想用霸权政策，威逼朝中人民就范，这只是妄想，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他用历史经验正告现在还在做着称霸世界美梦的国家，应当正视历史事实，趁早收起自己的计划。

停战谈判恢复后，美国方面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不可能取得的东西，或者提出各种无理要求，或者拖延达成协议。毛泽东指示我方谈判代表，这是美方的斗争策略，必须妥善对待之。他指出，我们是希望尽早解决问题的，但许多事由不得我们。有的事，美方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更急，立即达成协议固然好，拖长时间也不怕。美李方要拖，我们也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在谈判中再拖它几个月，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美国方面便无所施其技了。

从1951年10月25日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开始，到1953年7月28日停战协定签字为止，时间近两年，朝中方面与美国方面在谈判桌上历尽艰辛和斗争，在战场上也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反复较量。其间，毛泽东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决策和指示。通过谈判和斗争，争取与美国达成公平合理的、有利于朝鲜和平和安全的停战协议，始终是毛泽东在处理朝鲜战争中与美国关系的准则。

美国方面总是把谈判和军事威胁结合起来，企图用军事威胁来压迫朝中方面接受它的无理条件。毛泽东指示，一切威胁都是徒劳的，美方的目的在迫我就范，但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这种不稍示弱，既包括战场上不稍示弱，而且包括在谈判桌上也不稍示弱，应主动反击美李方面提出的无理要求和提案中各项荒谬之点。在我方合理要求方面坚持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方立于主动地位。对于谈判，我们要坚持基本立场。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7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毛泽东诚恳地希望，美国方面在谈判中拿出诚意来，迅速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不仅在谈判桌上和战场上企图实现它的霸权要求，而且采取反人道主义的作法，实行细菌战，威胁中朝人民的生命安全。美国飞机在朝鲜前线，进而在我国东北地区大肆空投带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等病菌的昆虫。又勾结蒋介石妄图骚扰我国华南沿海。在战俘谈判中，坚持扣押朝中战俘。如此等等，企图从各方面扩大侵朝战争。

在毛泽东看来，美国所采用的一切手段，不外是要显示它的强大，使人

害怕它，屈服它，从而接受它的霸权主义的权威和统治。但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怕霸权的，要打就打，中国人民愿意奉陪到底。1952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严正地指出：“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略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国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国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国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毛泽东从来有一个信念，我们是要和平的，但和平不取决于单方面，必须大家都要，才能实现。和平不能乞求，一切希望的结果只有斗争才能取得，打仗虽然是我们最不喜欢的，它给我们造成的困难和损失也是巨大的，们是天要下雨，娘要嫁女，是由不得我们的事情，只能由它去，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只有敢于斗争才能胜利。

对于美国采取绝灭人性的细菌战，毛泽东要求全体军民一要揭露，二要认真对待，三要不怕。2月24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侵朝美军撒布细菌的罪行的声明》。第二天，郭沫若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声讨美军实行细菌战的反人道主义行为，要求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动员起来，制止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其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所使用的拖延战术。2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就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一事发表谈话，严厉谴责美军使用细菌虐杀朝中人民军队和朝鲜人民的行径，强调美军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用极端残暴的细菌战也是不能得到的。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指出美国这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是对国际公约的严重破坏和践踏，是对世界人民野蛮的挑衅，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为了有效地对付美军的细菌战，毛泽东要求军委严加注意，采取措施严密处理，准备多种疫苗为军民注射，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把揭露和防止结合起来。美军的细菌战并不能给它带来实际利益，相反，使它更深深地陷于世界人民同声谴责的困境之中。

1952年底，艾森豪威尔竞选成功，接替杜鲁门担任总统，为了挽回美国在朝鲜的失败形象，他宣称，他必须唱“高调”。他要告诫“自由世界”，不要对美国失望，苏联人不应当产生错觉，“以为他们能够牵着我们鼻子走”。为此，美国无理中断朝鲜谈判。艾森豪威尔亲自飞临南朝鲜，视察了美军战线。他考虑了几种方案：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满洲，打击中国在满洲的机场，封锁中国的海岸；帮助李承晚扩军至14师52万5千人；从日本和美国本上向朝鲜增兵；使用原子弹。与此同时，第七届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朝鲜战争遣返战俘问题的提案。这个提案支持美国政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289页。

《艾森豪威尔日记》第299页。

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1卷，三联书店，1978年，第211—212页。

府违反国际公约强迫扣留战俘的立场，允许不把全部战俘遣送回家，规定将没有遣返的战俘交给联合国。联合国通过的这个提案，违反国际公约，毛泽东指示，断然拒绝。

毛泽东根据上述情况和美李军的动向，综观全局，判断美军有可能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的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7个师左右的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为此，毛泽东指示，应当充分估计到美军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我们应火急准备对付美李军，粉碎其登陆计划。接着，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志愿军党委的指示电报中要求，必须坚决粉碎美李军的登陆进攻。必须在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到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粉碎美李军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1953年4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是我们战胜美李军的关键。我们必须粉碎美军新的进攻，我们能够粉碎美军新的进攻。他指出，两年多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美军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军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致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

毛泽东要求我军，要继续坚持打小歼灭战的方法。在若干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的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予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我被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反击。

他要求志愿军要小心谨慎，坚韧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作好一切粉碎美李军登陆作战的准备，争取胜利。毛泽东的指示，使志愿军在朝鲜北部东西海岸，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我军严阵以待，美李军不得不放弃登陆进攻的计划。

在此期间，美军不断派遣飞机，深入我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除侦察外，并空降特务，破坏我国安全和建设。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供称，美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除已知的外，还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这些空降特务，目的是在深山建立游击根据地，或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通过在我国骚扰，威胁我国安全。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门，对于美国空降特务的破坏绝不可等闲视之，必须严密布署，采取有力措施专门对付敌人的空降特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军民高度警惕，美国空降特务不断落网，美国对我实行的空降特务骚扰，宣告破产。

在战俘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和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美军残害、虐待和阻挠遣返战俘的违背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的种种反人道主义行为。美国为了阻挠朝中战俘顺利遣返，违背国际公法和日内瓦公约，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和“不强迫遣返原则”，对中朝战俘实行强迫扣留。美国在其管辖的战俘营内，使用大批美国的、李承晚的和蒋介石的特务担任战俘营中的负责职务，甚至使用李承晚和蒋介石的特务冒充朝中战俘，混杂

在战俘营中，进行破坏。他们对战俘经常用屠杀、酷刑、集体罚饿等极端野蛮、极无人道的方法，来对朝中俘虏实行所谓“劝导”、“甄别”、“再甄别”和“征询”，胁迫他们表示“拒绝遣返”、“不愿回家”。凡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战俘，都遭到特务或管理人员的毒打。在战俘重伤、昏迷之后，就划破他们的手指，用他们伤口上的血，在所谓“不愿回家”的“甄别”书上打指印。或者在战俘身上刺上侮辱他们人格、违反他们意志的背叛祖国的字样。有些特务甚至用自己的手指，蘸上战俘伤口的鲜血来伪造指印。美国方面把战俘营变成了“死亡营”。

毛泽东指示我方谈判代表，应坚决抗议美方在战俘问题上种种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必须指出，美国提出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和“不强迫遣返原则”，是阻挠朝鲜停战的借口，同时又是迫害我方战俘的阴谋，应当坚决揭露。对于任何有助于解决战俘问题的提议，我方都应认真予以考虑。在战俘问题上要据理力争，并实事求是，详加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以事实驳斥美方的任何托词。他要求在战俘问题上既要坚持原则，又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挫败美方的种种无理要求，使战俘问题得到公平合理地解决。

经过艰苦的、长时间的斗争，朝鲜停战协定终于达成。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朝中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李方面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各种文本分送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签字。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以激动的心情发表讲话。他指出：三年之前，英雄的朝鲜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独立自由，英勇地展开了光荣的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自卫战争。中国人民在受到美国侵略战争威胁，并在美国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之后，为了保卫自己祖国的安全与和平建设，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了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才毅然决然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组成了自己的志愿军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彭德怀指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原在于争取条件，使朝鲜问题得以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获致和平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意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作坚强后盾。彭德怀的讲话，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始终一贯的目的：用正义战争赢得和平，争取和平、保卫和平。

毛泽东在停战协定签字后，信心十足地宣布：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他和彭德怀将军一样，再次重申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根本宗旨。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朝鲜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与美国对抗的历史评价，众说纷坛。

杜鲁门以他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把美中在朝鲜的对抗的结束，看做是使世界免除了一场由共产党人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壮举。他宣布：“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让共产党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随意进入朝鲜或其他地方。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事实上我们就这样做了。我们必须迎击这一挑战，使全世界不致卷入一切全面的战争。”杜鲁门在虚幻的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把美国在朝鲜战争的真实目的掩盖起来。

杜鲁门的继任艾森豪威尔虽然宣布他唱的是高调，然而他的实际嗓门并没有杜鲁门那么高。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艾森豪威尔的感受是：“首先我们想到的是，为达成这次体面停战而献出生命的英勇的孩子们。他们的牺牲再次证明了自由战士的勇敢。我们还想到由于关在敌人后方好几个月而变得筋疲力尽的其他孩子们。他们如能全部迅速回国，将给许多家庭带来欢乐。这也将证明同我们签订停战协定的那些人的诚意。”在他的感受中，包含了一种酸溜溜的情绪，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得到，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不能不使作为美国的当权者感到沉重和迷惘。

朝鲜战争成了美国学者们议论、评价最多的话题。而美国学者们的看法，往往和美国官方决策人的看法有很大差异，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学者们对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的立场的评价，其观点也发生显著变化。50年代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与朝鲜战争的评价，否定较多。到了60年代至80年代，开始发生转变，立场趋于公正客观。

费正清在他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朝鲜战争使中国和美国都蒙受重大损失，流了很多血，损失了很多财产。当然抗美援朝运动在国内掀起了爱国主义的热潮，并且帮助巩固了新生政权。但是，这只能视为偶然的副产品，干涉行动的消极影响大大超过了这种实惠。中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又被联合国打上了“侵略者”的印记，从此它被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达20年之久，它也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的插手而无限期也延缓了它解放台湾的目标，东北仍然是中国人的，未受侵犯，但那简直不是什么纯收入。

费正清的观点是，虽然朝鲜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一定好处，但从它带来的消极影响看，对中国是很不值得的。费正清的观点虽然有一定客观性，但看问题的观点则是微观的，实用主义的，排除了毛泽东从整体上和宏观上的考虑。

美国约翰卫律父子出版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学者孔华润的专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评论了朝鲜战争，他看问题的眼光更深刻一些。他指出，自从1947年杜鲁门的冷战政策制定以来，冷战政策的制定者们，不自觉地使这种反苏行动的冷战政策发展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战后的中国局势由于美苏两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合作中断而复杂化。由于美苏的互不信任在加深，双方的野心发生冲突也趋于明显，美国越发决心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并企图把俄国人对满洲及华北的威胁降至最低限度，当美国人想帮助中国政府恢复对华北和满洲的控制时，俄国人却发现可以利用中共来阻挠美国作这方面的努力。

孔华润教授的看法，道出了美国发动朝鲜战争的实质。美国与苏联的对抗，集中在对中间地带的争夺上。美国不征服广大的中间地带，便不能征服苏联，称霸世界。朝鲜战争，正是美国争夺中间地带的战争。但是中国作为中间地带的国家，并不是美苏争夺中一个可以任意牺牲的卒子。中国有自己的主权和利益，中国必须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它既不是为了苏联，也不能屈服于美国。在国家的独立、主权问题上，中国是超社会制度的，又是超意识形态的。就是中国选择共产主义制度，也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而

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222页。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292页。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8页。

不是屈从于谁的结果。杜鲁门政府站在冷战政策和霸权政策的视角上观察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决策，当然不可能作出正确结论。朝鲜战争没有使美国政府中的决策者清醒一些，认真地考虑一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究竟伤害中国的是什么，而是继续沿着反共和霸权政策的思路，得出了更为错误的结论。正如孔华润指出：“尽管杜鲁门及其顾问寄希望于中共的民族主义，他们被迫作出结论：不论毛泽东是否有独立性，他都是强烈反美的。对毛的敌视态度必须给以报复。腊斯克公开宣称，中国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工具，是一个‘斯拉夫人的满洲国’，要象反对苏联一样有力地反对中国。作出他们自己的工具蒋介石及其残存的政权在危急的最后关头获得缓期执行死刑，继续维持着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神话，暂时倦伏在福摩萨，而所有的人都称它为台湾，中国的一个省分。”美国学者已经看到，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从反共政策和霸权政策出发，继续采取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这就是导致美中长期疏远的根本原因。

美国许多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朝鲜战争给中美关系留下了痛苦的遗产。爱德华·W·马丁指出，由于美国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士兵，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措施无法很快得到修正，因朝鲜战争而繁殖起来的麦卡锡主义分子的歇斯底里也会始终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乔纳森·波拉克指出：这场战争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惨重代价，特别是朝鲜人民；它推迟了中国军队的复员和恢复经济的计划；它使中美两国关系处于双方都不能或不愿意改善的敌对状态，直到20年后面对同一个安全挑战为止。其中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台湾无限期的与大陆分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力阻止的。美国决定加强同台湾的联系，并支持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因此，朝鲜战争排除中国内战提前结束的结果，确定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的疏远格局。

的确，朝鲜战争给中美双方都留下了痛苦的遗产。但是，毛泽东认为，既然美国以战争威胁了中国，中国无法回避它，那么中国便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把坏事变成好事。

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可以比较集中地在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找到。

首先，是对朝鲜战争的战略分析。毛泽东指出，美国的战略重点从来放在欧洲，是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美国把欧洲看做是它的根本利益所在，把苏联看做它的主要对手，亚洲在它的战略中，是要防止共产主义蔓延的地方，不是它的战略进攻重点，它不可能在亚洲大打。因此朝鲜战争只能是局部战争，不可能升级为世界大战。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毛泽东坚持他二战后形成的对国际形势的分析：目前不可能爆发新的世界大战，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不可能发动新的世界战争。同时，美国当局也低估了新中国捍卫独立和主权的决心，低估了新中国的能力。他们一再错误判断认为中共和毛泽东能够吞下美国侵朝的苦果，不会作出行动上的反应。正如毛泽东所说：“他们出兵侵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89—190页。

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第244页。

乔纳森波拉克：《朝鲜战争和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308页。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后，美国当局虽然十分恼火，但是，由于“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致使它也不能把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美国政府不得不把朝鲜战争始终限制在朝鲜范围内，既没有把它扩大为侵华战争，更不可能把它扩大为世界大战。虽然美国多次制定针对中国的计划，但形势迫使它不敢实施，这一点毛泽东有充分的预料和十足的把握。事实证明他的预料和把握是正确的。正是在吃透美国战略计划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以求得朝鲜问题的合理解决，同时保卫我国的主权和安全。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志愿军能在战略上立于主动，调度自如。既有目标，又有界限，掌握火候，适时谈判，这就为解决朝鲜问题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我军能不能与美军作战的问题。我军在总体上是打的防御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我国的目的。但是，防御战绝不是消极的防守，防御中必须有主动地进攻，才是真正的防御。要打好这种积极的防御战，就有一个力量较量问题，即我军能不能与美军作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志愿军参战前和参战后两三个月内都存在。毛泽东说：“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能不能打，是我军的战斗力问题；能不能守，是我军的战术问题；有没有东西吃，是我军的后勤保障问题。这三个问题，在战争中都解决了。毛泽东说：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上述三个问题，在新形势下对我军都是新问题。但是在战争实践中，依靠我军政治上的主动性和政治觉悟，依靠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苏联的支援，依靠战争中的摸索和认真总结经验，我们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把我军的作战能力和进行现代化战争的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此，毛泽东把抗美援朝看做是一件好事，它给我军带来了宝贵的财产，就是第一次使我军获得了异国作战的经验，第一次获得了现代战争的经验。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大大地提高了我军的战斗力。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毛泽东用辩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他看到朝鲜战争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遗产，还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财产。应当说，抗美援朝对我国许多方面的影响是积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952年8月4日。

极的。

再次，是解决朝鲜问题的根本办法问题。从志愿军出兵朝鲜起，解决朝鲜战争的根本办法，就是毛泽东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打到底，用正义战争战胜非正义战争，迫使美军和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由朝鲜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个办法是，打到一定程度，迫使美国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两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中，要达到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美国不会情愿如此，在我们也有实际的困难。因此，用第二种办法解决问题，对于美李方面和朝中方面都较实际。特殊的条件导致了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和是基本趋势，打是为和。美李方面以打求和，是为了在和中实现他们的目标；朝中方面以打争和，是为了求得朝鲜问题合理解决。

为什么和是志愿军参战后的基本趋势呢？毛泽东说：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这是因为：一、要死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毛泽东指出，有了这四个因素的作用，美国就不可能把战争长期打下去。1953年9月12日，他又把上述四个因素，概括为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因素。指出军事方面的因素是第一个因素。美军在朝鲜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有了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原因，美国便要与我们讲和。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当然，和美国和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在什么时候和，不能由我们决定。“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只有在逼不得已时才能和。

毛泽东把解决战争的立足点放在和上，他要求把打服务于和，通过打求得和，争取和谈成功。这符合现实可能和要求，又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朝鲜战争最终实现了毛泽东的预测，这怎么能不使毛泽东更加充满信心呢！

毛泽东肯定，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有很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第一，美军把战争打到了我们的边境，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然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实际经验，把美军的底摸熟了，知道它并不可怕。我们取得了这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朝鲜战争结束了。毛泽东对世界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和乐观。他对战争留下的遗产，积极的方面和正面的方面看得很多。他说：“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

就干到底。”他从朝鲜战争中大大地增强了新的信心，他宣布：“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

关于中国和美国，在毛泽东看来，如果要对抗下去，我们不会害怕，当然如果能有改善之机，我们也一定要争取。

他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中的中美对抗，把中美关系凝固化和僵化。中美之间并没有宣战，这是历史事实。

第六章 由对抗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

朝鲜战争过去了，中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美国对中国继续推行遏制政策和封锁政策，形势使毛泽东对美国采取了严峻的态度。他坚决反对美国的反共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干涉别国主权。但是，他对美国人民始终保持着深深的友好之情；他始终不放弃一切可能的机会，力争在公平合理、互相尊重主权的基础上，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美双方和解的时机到来。在毛泽东晚年，他以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为他一生留下了最后一座灿烂的丰碑。

一、毛泽东不信邪坚决打破美国敌视中国的遏制政策

我们奉行和平外交路线，中国不会去侵略美国 美国学者南希·塔克分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国的政策，认为这个政策集中到一点就是孤立和敌视中国。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杜鲁门政策的继续，它从属于“遏制”共产主义，进行全球扩张的总战略。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朝鲜战争证明，美国的国家安全在亚洲已受到了威胁，朝鲜的流血冲突增加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紧迫性；共产主义在亚洲东方取得成功，会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在亚洲地区土崩瓦解；朝鲜战争表明，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毛泽东已心甘情愿地听从莫斯科的命令，从而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和盟国的利益造成了严重危害。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孤立和遏制中国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好处是巨大的。一方面，可以通过惩罚中国，从而使其他国家不敢效法中国的做法；另一方面，采用这样的政策，可以用共产主义威胁的神话，使公众接受每年高达数百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安全费用；也可以使西方各国接受美国的盟主地位，由美国来扮演最得力的为消除共产主义对西方的“威胁”而战斗的斗士角色，实现美国争霸世界的目的。

当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的同时，从遏制和冷战的需要出发，又支持法国的侵越战争。1950年到1954年期间，美国又为法国侵越战争提供了12亿美元的援助。到1954年，美国承担了法国军事预算的70%，美国支持法国把战争进行下去，在中国周边地区继续保持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美国第七舰队继续留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1954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声称美国将用武力帮助蒋介石政府，“以抵抗武装入侵和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接着美国又策划组织马尼拉条约，防御共产主义的“扩张”，共同保障东南亚地区的“安全”。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予他在台湾地区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权力。1955年3月8日，杜勒斯在“从亚洲回来后的报告”的广播演说中，杜撰共产党中国已造成亚洲安全“威胁”的神话，提出要用美国拥有的“更大的力量”来对付中国。3月21日，他再次发表演说，竟然宣称中同具有“侵略狂热”，中国比苏联“更加危险，更会刺激战

南希·塔克：《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359页。

沃尔特·拉菲伯：《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1984》第174页。

争”。在此之前，3月10日，他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如果我们要保卫金门、马祖，我们将要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反击大陆的飞机场。”他俨然把中国的金门、马祖看做了美国的一部分，这种大国主义，使中国人民无法容忍。除了上述行动之外，美国还在联合国无理阻挠我国恢复合法席位，对我国实行孤立政策。

当美国把“侵略狂热”的帽子戴在中国头上，在实际上侵略中国的台湾，干涉中国内政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国政府与美国完全相反，正为致力于亚洲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而努力。毛泽东、周恩来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中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时，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倡议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9月21日通过的、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我们奉行的是“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

1955年4月，中国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非29个国家的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共同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万隆会议通过的《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维护和平的十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印度和缅甸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时，宣言的十项原则中也规定了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国热爱和平，愿意和任何国家保持和平共处的友好关系。他说：“我们认为，亚非会议宣告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这十项原则又一次替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这十项原则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这次亚非会议所一致协议的十项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进行谈判。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方针，使美国制造的中国“侵略”的神话，不戳自破。

面对美国对中国奉行的遏制和孤立等政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侵犯，毛泽东强调，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1952年7月10日，他在与军事学院的训词中指出，必须建设“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在给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中，他指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第2册，第535页。

周恩来：《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1955年5月13日。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0页。

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侵略，依靠我们过去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

1954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中，对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毛泽东要求建设强大的陆军、空军和海军。来保卫国家主权和建设。他诙谐地说，我们制定这样一部宪法，蒋介石是不会高兴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但是我们不要管他们。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1954年9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国防现代化”的概念。1958年，毛泽东正式把国防现代化和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并列，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概念。

毛泽东阐明，我们建设强大的国防，是为了反对侵略，维护和平。“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对于美国，我们也愿意和平共处，我们不会去侵略美国，但对于美国的挑衅和侵略，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执行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在边防斗争中，我们严守疆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严守自卫立场。毛泽东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主张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要采取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方法。他说：我们国家海防线长，完全不让敌人不进来不可能。他这里不能进来，那里则有可能进来。与其守不住让敌人打进来，不如主动放敌进来，有计划有目的地将其诱至我有把握打胜仗的地区，将其歼灭。毛泽东指出，历史经验证明，不让敌人进来的打法并不是有效的方法。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从龙口登陆，从背后占领了青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在法德边界设置了马奇诺防线。德军绕道瑞士，置这道防线于无用之地。马奇诺防线未能挡住德军，却使许多法军兵力陷了进去。

毛泽东强调，放和顶是结合的，必要的顶是积极防御的需要。他指出，诱敌深入不是不要防御，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我们不能学蒋介石，让日本人很快打到了南京、长沙；不能学斯大林，让希特勒一下就逼到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该顶的地方还是要顶，而且要顶相当长一段时间，但顶的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我们后边有时间作些准备。顶到适当机会，就要把敌人放进来，诱其进入我预备战场，将其消灭。

毛泽东指出，在反侵略战争的初期，我们的口不能张得太大，这跟吃饭一样，如果一口吃得太多就嚼不烂。要先打小的，集中十倍八倍的兵力消灭敌人个把两个营，个把两个团，个把两个师，有了经验之后，再逐步扩大，逼着敌人逐步增兵，一个一个吃掉它。仗要越打越大。毛泽东强调要打歼灭战。敌人来了，只是沿途敲敲打打，不打歼灭战就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想办法把敌人分割开，集中力量吃掉它一坨。

可以看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战略思想，完全是建立在反对侵略，维护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60页。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

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954年9月15日。

和平的基点上。而美国口里高唱维护和平，却在亚洲和世界各地进行扩张，用武力威胁别国的独立和主权。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不能不使真正爱好和平的毛泽东和中国保持高度的警惕。

毛泽东分析世界形势，指出由于美国的反共遏制政策和大国霸权政策，使美国成为当今战争的策源地，“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好战分子要发动战争，这不是我们左右得了的，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是美国的好战分子不会听我们指挥。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我们的态度。对于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毛泽东阐明，如果美国挑起对中国的战争，那么中国将坚决站在自卫立场予以回击。

针对杜勒斯对中国的无端指责，他指出，究竟谁是侵略者，只要看看近代历史便会知道。中国没有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侵略别人，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都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美国组织 16 个国家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它却说它是爱好和平的，说朝、中两国是侵略国，有这样的道理么！毛泽东对美国当权者这种既要侵略别人，又要别人恭维其热爱和平的强权政治，表示极大的愤慨。他宣布，新中国决不会接受这种强权政治。中国人民不要战争，但不怕任何侵略战争，谁要把这种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人民就和他打到底。他表示这样的态度，是对杜勒斯的好战言论的一个针锋相对的答复。1954 年底到 1955 年初，杜勒斯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发表了一系列威胁中国的言论，声称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甚至要使用原子弹。美国在台湾海峡剑拔弩张，使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化。毛泽东镇定自若地回答，使杜勒斯对毛泽东颇感恼火。对付这种软硬不吃的人，杜勒斯确实也有些无技可施了。

毛泽东再次重申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基于美国当权者对中国的敌视政策，毛泽东主张不仅要有强大的国防，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对人民进行经常教育，使全体人民具备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他经常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居安而思危，对于世界形势要作辩证的分析。一个方面要看到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利，社会主义正走向欣欣向荣，帝国主义各国内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但是，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报告，这使美国的一些当权人物欢喜若狂。杜勒斯认为斯大林倒了，现在是集中力量打倒毛泽东的时候了。1956 年 6 月 21 日，杜勒斯在基瓦尼斯国际第 41 次年会上发表“自由和专制之间的斗争”的演说，他把中共和毛泽东打扮成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义者。他向与会者说：“的确，中国共产党在野蛮方面企图超过斯大林。苏联继承斯大林的人至少还声言在国际事务中不使用武

毛泽东：《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955 年 1 月 28 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 年 3 月。

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却仍然拒绝这样做。我们一直而且正在耐心地设法使他们发表一个不使用武力，特别是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的有意义的声明，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

杜勒斯对毛泽东在反对美国的大国政策和霸权政策中的强硬立场特别不喜欢，他不喜欢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不喜欢毛泽东要求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者的好战政策保持警惕，他多次对毛泽东的言论进行攻击。但是，毛泽东是不信邪的，是敢顶敢斗的人。杜勒斯不喜欢的他偏要讲。就在杜勒斯把中共和毛泽东说成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与两位拉丁美洲人士的谈话中，针锋相对地又谈了杜勒斯不喜欢的话题：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他激愤地指出，美国当权者总是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国干涉别国的事务，因而到处欠别人的账。他说：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了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毛泽东说广大人民不喜欢美国，不是指美国整个国家，而是指美国政府中有权决策的人们。他们奉行反共政策和霸权主义政策，不允许别国人民选择他们的社会制度和道路，任意干涉别国的内政，因而得不到各国人民的欢迎。至于美国人民，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是和他们亲密友好的。因为对于美国当权者。“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美国人民是不喜欢美国把军队派到朝鲜去的，它使无数无辜的美国青年在异国葬身；美国人民也不喜欢美国把军队派到台湾海峡去，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能够解决自己的内政问题，无须美国当局把美国人民创造的财产化为军火，抛到台湾海峡的海水中。

毛泽东重申 1946 年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观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现在，他特别强调，美国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他指出，人类阶级社会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凡是脱离广大人民的，人民就不喜欢它，它就是纸老虎。现在美国帝国主义者脱离美国人民，脱离世界人民，它就是纸老虎。历史是由人民决定的，它不是由敌视人民的人决定的，这些人的命运也必须由人民来决定。历史规律就是：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但反人民的，弱。照这个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

关于原子弹，毛泽东指出，也有必要说一说，应当怎样对待它，从朝鲜战争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不止一次声称要使用原子弹。1952 年，美国研制出第一颗氢弹。1953 年 1 月中旬，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核实验场，用一种大口径火炮发射原子弹头爆炸成功，这就使原子弹不仅具有使用于战略的功能，而且也有了使用战术的功能。氢弹的成功和战术核武器的试验成功，使美国的当权者们腰杆更加硬扎。杜勒斯在朝鲜停战谈判中，便威胁和警告周恩来，如果不能按美国的要求达成停战协议，美国就要用核炮弹轰击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1956 年 7 月 14 日。

鸭绿江以北的满州庇护所。使用原子弹成为美国好战者经常挂在嘴边吓人的词语。

毛泽东丝毫不为之示弱。早在 1947 年 2 月，毛泽东在和斯特朗谈论原子弹后快一年，毛泽东在撤离延安时，又和加拿大记者盖恩谈论了原子弹问题。盖恩在日本工作了 15 个月，他告诉毛泽东广岛的可怕情形：在一刻之间，数以千计的人死于一个炸弹。盖恩的谈话，使共产党的其他一些高级领导人中的某些同志产生了担心：美国会不会用一两个原子弹来毁灭延安共产党的根据地呢？几天后，毛泽东召集党的高级干部，问他们：“原子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吗？不能，绝对不能。我们的同志为甚么把原子弹看得那么神奇呢？是资产阶级影响。武器决定一切的想法，是资产阶级在我们队伍中的影响。”当盖恩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指出他对原子弹的说法不正确。他说，帝国主义者发明这个武器来吓唬意志薄弱的人，但共产党的意志是坚强的。他极而言之说：“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美国可以在中国投下一万颗原子弹，但我们还会剩下足够的人民作战到底，获得最后胜利。”毛泽东从原子弹一问世，就对它表示了蔑视。

以后，他多次强调，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他指出，中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他主张用辩证法看问题，只要坚持辩证法，美国的原子弹便没有什么了不起。

1957 年，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美国的原子弹威胁，再次发表了一篇气贯长虹、洋洋洒洒的讲话。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是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个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毛泽东对原子战争的极端情况作了设想，他认为即使出现这种最坏的情况，也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曲折，人类能够经受住这样的曲折。当然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一种曲折，但帝国主义不顾人类的前途硬要造成这种曲折，也就只能用这种态度对待。这种辩证法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不怕，帝国主义要我们怕，正是因为他们怕，我们不怕，他们反而怕起来。这就是辩证法。毛泽来说：古时候打仗没有火箭和原子弹，刀枪剑戟打起来，死人也不见得少。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呢！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只顾怕，这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地反对它，但不要怕它。

从辩证法看问题，毛泽东还指出，原子弹威力虽然大，但是总有它的对立面，总有制服它的办法。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

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那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因此，原子弹也不可怕。毛泽东针锋相对地宣布中国人民对原子弹的态度，有利于打破帝国主义的核讹诈。

但是，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只说大话的人。他指出，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毛泽东向全中国人民指出，我们必须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使我们的国力强大起来，只有国力强大了，人家才不会瞧不起，帝国主义才不敢经常威胁我们。他说，过去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又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平时期。把工业发展起来。

毛泽东在建设问题上，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他强调，落后就要挨打。他要求，全国人民也要有一种紧迫感。中国人民要有志气，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我们要以美国为目标，努力赶上它。

1956年8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心潮澎湃，讲了一段激动人心的话。他说：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一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吨、三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上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又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敲起警钟：赶不上美国就要被开除球籍！他发出这个严重警告，要求全体人民在当今国际风云迭变，险象丛生的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一种忧患意识，有一种危机感。他号召中国人民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高潮中去，大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他深感，西方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必须认真对付之。他要求中

国人民要争气，要有勇气、有豪气，认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把中国的建设搞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于原子弹，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怕它，但是也要拥有它。拥有了它，就可以减轻美国的核讹诈。因此，我们也要搞点原子弹。他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8年6月，他又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办法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只要我们工业上去了，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大炮，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的思想，目的是要打破美国的核垄断，使我国真正强大起来，彻底改变历史上受西方国家欺负的落后地位。

毛泽东高度重视原子能的开发。早在1950年，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便建立起来。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我国原子核物理学家和地质学家们关于发展原子能的汇报。毛泽东以高度重视和尊重科学的态度宣布：“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毛泽东号召科学家们努力攻下原子能这个堡垒。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援助我们，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单方面终止了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另一种形式的讹诈没有屈服，他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1960年7月8日，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再次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号召下，我国科学家奋发图强，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沙漠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零八个月之后，我国第一个氢弹爆炸了，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力，使毛泽东无比兴奋。他指出，我们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用和平的办法，实现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是成功的，连美国的当权者也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说三道四。毛泽东说：我们这里对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骂人写文章。他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毛泽东对我们用和平的方式取得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的经验很重视，中国避免了苏联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怠工、破坏、拿起枪杆子来打的局面，连美国当权者对中国的作法也挑剔不出什么。我们的事业正在前进，这就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事情。

1958年，毛泽东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期间，对“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再次发表讲话。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台湾海峡紧张的形势，毛泽东坚定地回答：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看来还有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他再次分析，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在内，它们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我们要看到它们的两面性，用两点论的办法看待它们。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从历史上看，资产阶级有一个由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的过程。它们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真老虎，后来它转化为反动派，转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第二，从现实看，帝国主义也还有两重性，一面是真老虎，它还有力量，它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但从本质上看，它又是反动的、落后的纸老虎。树立了这种二重性观点，我们就可以做到：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

毛泽东基于对人民的伟大力量的坚信，他一贯以是否站在人民一边，作为划分社会阶级是否有前途，有力量的标志。一切反人民的社会力量是没有前途的，是最终要被历史淘汰的，因而只能是纸老虎。但是，一切反动的社会力量决不会自动退出社会历史舞台，即使将被历史淘汰的、没有前途的社会力量，它也会为自己的存在千方百计奋斗，因此它又是有力量的，是真老虎。毛泽东不是玩弄辩证法，这是他牢不可破的宇宙观，他要求全体人民接受这种宇宙观，这种宇宙观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行动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进入50年代，美苏在欧洲的两极对峙的格局基本形成。美国政府在把对抗的重点放在欧洲的同时，加强了对中间地带的争夺。它加强了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扩张，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填补英法势力，和苏联在这些地区展开争夺，造成了这些地区的动荡局势。

毛泽东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局部战争在世界上一天也没有停止；美国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敌视态度，变成了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冷战、遏制的依据；美国到处插手各国的内部事务，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它对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活动，总是站在对立面以各种形式予以反对，世界正处在新的动荡不安之中。毛泽东越来越相信，美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世界人民渴望和平，但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1956年9月25日，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中，他要求全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斗争，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他说，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毛泽东非常重视局部战争的研究。他分析，美国现在的战略是，在准备世界大战的条件下，搞局部战争，连锁反应，一个一个地吃掉我们。这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美国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帮助南越打北越，都没有引起什么连锁反应。因此，他认为，只要世界人民在局部战争中能制止美国的侵略，世界大战便打不起来。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了骚乱事件；同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事件；美国除了在外交上、政治上、宣传上表示对暴乱者的支持而外，还允许两万匈牙利人到美国去“避难”。在中东，英、法、以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更加深了毛泽东对美国侵略政策的警惕，吸引了他研究问题的目光，强化了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一贯认识的根本观点。他要求广大群众和干部都要从这些事件中受到教育，提高认识。他说：“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他认为，这些事件的发生，虽然是坏事，但有利于教育群众，提高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因而也可以变成好事。

1956年5月，埃及断绝同蒋介石集团的外交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杜勒斯对埃及的行动大为恼火，宣布撤消对埃及援助的计划。一星期后，纳赛尔作出有力反应，宣布将由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决定对埃及实施武力报复。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巨大的石油利益，美国政府如果支持英、法，将会激怒阿拉伯国家并危害自己的利益，因而主张成立一个运河使用国协会共同管理苏伊士运河。英、法拒绝美国建议。10月31日，英、法联军空军轰炸埃及，并派军队入侵埃及。美国为了保证在中东的石油供应，在英、法势力退出中东之后取而代之，因而压迫英、法在中东停火。

毛泽东对于中东事件中，美国、英国和法国各国的矛盾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中东事件，反映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和争夺。帝国主义也不是铁板一块，帝国主义之间的内乱，对我们有利，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要争取一些西方国家不反对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要讲话，要发表声明，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

他说：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了！这样的错误，在它的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同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盾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

毛泽东：《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956年9月25日。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的。毛泽东指出，美国和西方各国。它们假反对共产主义之名，在亚非扩张侵略，争地盘，他们越是争得凶，人民便越反对，越觉醒，这些地方的民族独立运动便越是高涨起来。美国在中东，既采用文的，又采用武的，和其它西方国家闹，闹就让它去闹，如果它要和中国闹，我们就斗争。毛泽东在和帝国主义斗争中，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他的策略思想，他在策略上运用自如，更加纵横捭阖。

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遏制政策处处可见。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7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毛泽东的讲话发表评论，他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说成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他说：“我上星期曾经说过，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自从那时以来，我以为看来已经十分清楚，这是一种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杜勒斯从西方的立场曲解毛泽东的讲话，他不提民主的阶级性，把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他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民主，要么就是自由化，要么就是“诱人陷入罗网”。这种西方式的思维，妨碍杜勒斯对中国、对毛泽东作出正确判断，他对中国的方针政策妄加评论，他的冷战语言，更引起毛泽东的反感，杜勒斯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政策的一个典型人物。

美国对各国内政的干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激起毛泽东对美国大国政策的强烈反对，他在国际讲台上对美国的大国主义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尖锐批评。他指出，美国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他强调，美国的明智之举，就是不要干涉各国人民的内政，美国执意要这样做，只能遭到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58年7月，中美关系再度紧张。7月15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粗暴干涉黎巴嫩的内政。与此同时，美国积极鼓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蒋介石派出飞机深入大陆散发反动传单、空降特务、轰炸福建、骚扰江浙。美国海军大批军舰、飞机从地中海调到台湾海峡，加强了在台湾地区活动的第七舰队，并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破坏和骚扰。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8月8日扬言，美国海军正密切注视台湾地区局势，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

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反击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决定炮轰金门、马祖。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持中东人民的斗争。7月27日，毛泽东致信彭德怀、黄克诚，对炮轰金门、马祖作出部署。他说：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够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所谓“运筹于帷幄之中，制敌于千里之外”，就是要通过炮轰金门、马祖，调动远在中东的美军，使中东的局势缓和下来。他要求周密部署，务必达到这个目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充分准备，8月23日中午12时，我军以每小时几万发炮弹的密集发射，开始炮轰金门。金门的炮声，大大震慑了蒋介石，也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紧张万分。

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炮轰前的空战中已击败蒋介石空军，夺取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中国海军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福建、汕头等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鹰厦铁路已经修通。种种迹象使艾森豪威尔判断，中国军队炮轰金门的行动，绝不仅仅为了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

为此，9月4日，在罗德岛新港，杜勒斯在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在艾森豪威尔授意下发表声明。他把中国解放台湾、金门、马祖，说成是“使用武装力量来夺取新领土”的行为，宣布美国可以用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他认为是保证保卫福摩萨所必需或适当的、现在在朋友手中的该地区有关阵地和领土。”接着，美国从中东将第六舰队的半数舰只开到台湾海峡，又从美国西海岸和地中海调来一些舰只，使台湾海峡地区集中了六艘航空母舰和130只舰只，500多架飞机。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也在台湾登陆。杜勒斯宣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兵力集结。毛泽东炮轰金门之举，调动了美国在中东的军队，达到了缓和中东的目的。

紧接着又发生了美舰护航事件。由于中国军队对大小金门及海上运输线的炮击和封锁，使金门粮弹补给中断，陷于危急之中。9月7日，美舰对蒋军舰实行护航，蒋舰在中，美舰在左右，向金门出动，紧急运送物资。毛泽东为了试探美蒋共同防御效力有多大，美国在台湾海峡介入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命令福建前线解放军，待美蒋联合舰队进入金门料罗河港口才打。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如果美舰向我开火也不还击。当联合舰队到达料罗河港口，中国炮兵对蒋舰实行猛烈炮击时，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掉头就跑。从这次战斗中，毛泽东对台湾海峡的形势看得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要拉美国下水，美国却力求避免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的方针也是力求不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

炮击金门是中国内政，毛泽东从来没有打算对美国采取什么主动攻击行动，相反，始终坚守自卫的立场。毛泽东明确规定，我机不得出领海，不打美机。但如果美机侵入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之。9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时，再一次阐述了中国不会主动和美国发生冲突的自卫立场。他指出，中国炮轰金门、马祖并不是要武力解放台湾，只

是要惩罚国民党部队，阻止美国搞“两个中国”。他强调，如果美国进攻中国，甚至使用核武器，中国军队可以从周边地区撤向内地，诱敌深入，最后使美军陷入中国军队的夹击之中。

9月8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发表了充满乐观看法的讲话，他肯定世界人民反侵略的和平力量已经占据优势。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总的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他说：美国九年来侵占了我们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毛泽东指出，美国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它自以为紧张局势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毛泽东这次讲话，发表在他接见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后两天，当时赫鲁晓夫对炮击金门很不放心，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破坏他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计划，甚至于导致苏美冲突。毛泽东的讲话，对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讹诈面前所表现的胆小怕事，恰成鲜明对照。他认为赫鲁晓夫不懂当前的形势，不懂辩证法，想要迎合帝国主义，而不用斗争的方法争取世界和平只是幻想。美国正在把自己置于越来越被动的局面，看清这一点才能有胜利信心。

10月6日，毛泽东亲自为国防部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这个文告向全世界宣告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对台湾蒋介石和美国的态度的态度。文告指出：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和台湾的领导人都肯定台湾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因此，台湾的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可以通过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美国侵占台湾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文告劝告美国趁早从台湾撤走，不要干涉中国内政，以免越来越被动。毛泽东说，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会被动。一个东太平洋的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于9月30日在记者招待会提出的“停火”要求，诙谐而讥讽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停火，岂非笑话？

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草拟命令，在命令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对金门的炮击，再停两星期，这是从“民族大义”出发的，是为了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从中取利的企图的。毛泽东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台湾问题在没有获得合理解

《新中国的外交风云》第136页。

《人民日报》，1958年9月9日。

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美国人想在我国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他们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的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毛泽东坚决要求，美国不得在金门、马祖问题上插手。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

炮击金门涉及的是中国内政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再次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的态度：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中国也不怕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事情发生，中国将抵抗到底。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可以通过双方坐下来谈判解决。炮击金门不仅给美国提供了一个认识毛泽东的对美政策的机会，也创造了一个中美谈判的机会，毛泽东的斗争精神和策略使各国人民莫不由衷钦佩。

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 还在炮击金门前，毛泽东便明确反对赫鲁晓夫在对美国侵略政策上的妥协态度。赫鲁晓夫希望和美国直接打交道，通过实现美苏和解来主宰和支配世界。毛泽东不反对美苏首脑的接触，但是坚决主张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不能作出妥协和让步，对于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

1959年杜勒斯病逝后，艾森豪威尔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他提出了和苏联对话，缓和美苏关系的设想。1959年7月22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去苏联主持了全美展览开幕式，在苏联进行长达11天的访问，在这之前，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访美的邀请。9月中旬，赫鲁晓夫头戴一顶杭堡帽，身着黑装，胸前挂着三块金光闪闪的勋章，乘坐图——114涡轮螺桨飞机、风风火火地来到华盛顿安德鲁机场，开始了他对美国的访问。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进行了两天会谈。赫鲁晓夫称赞艾森豪威尔“作为本国人民绝对信任的人”，“真诚希望和平”，“也和我们一样在为保障和平而操心”。他们讨论了裁军问题，赫鲁晓夫急切地想达成一项为能够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创造条件的协定，艾森豪威尔拒绝了。不过两人都表示要进一步改善美、苏关系，由此产生了“戴维营精神”，宣告美苏走向缓和。赫鲁晓夫的访美，为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一些无原则的做法，非常不满。他认为，斯大林的好处，就是敢于和帝国主义坚决斗争。赫鲁晓夫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赏识。他对赫鲁晓夫无原则地讨好美国当权者的行为不无讥讽地说：赫鲁晓夫访美，他和艾森豪威尔都给对方脸上擦粉，但比较起来，美国人倒是有原则、有分寸些。赫鲁晓夫得意地说什么“戴维营精神”的划时代意义，但是1960年3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却说，他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和王明一样，送上门去，结果被人家一个巴掌打了出来。

毛泽东非常不喜欢赫鲁晓夫这种缺乏斗争的性格。对于他以说好话的办法企图换得美国允诺和平的天真作法，嗤之以鼻。他并不反对世界走向缓和，

相反，他希望有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能集中精力加快国内建设步伐。但是，他始终认为，在现今的世界上，要消灭局部战争是办不到的事，而世界大战是否能打起来，也不能单方面由我们决定。

他针对赫鲁晓夫关于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看法说，世界大战打不打，不决定于我们。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我们说了不算数。世界大战还是有两种可能性。即使签订了不打仗的协定，战争的可能性也还存在。帝国主义要打的时候，什么协定也不算数。至于打起仗来用不用原子弹、氢弹，那是另一个问题。曾经有了化学武器，但是打仗的时候没有用。经过极大的努力，签订打仗时不打原子弹、核武器的协定，打起仗来都还用常规武器，这种可能性也还是有的。即使两个阵营不打仗，也不能保证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打仗。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可能打，帝国主义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可能打，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现在就在打。毛泽东强调，在指出新的世界战争有防止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指出还存在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性，只有同时指出这两种可能性，采取正确的政策，作两方面的准备，才有利于动员群众进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在帝国主义一旦把世界战争强加于世界人民头上的时候，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才不致于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1960年5月，正当美、苏、英、法四国首脑准备在巴黎举行高级会晤的时候，5月1日，美国空军飞行员鲍尔斯，驾驶一架U—2型飞机，从巴基斯坦白沙瓦起飞，准备贯穿整个苏联疆域，沿途扫摄重要军事设施、雷达站及工业基地，飞越苏联领空2919英里，最后在挪威的博德降落。但是，和往常U—2飞机飞行的情况不同，这架在苏领空7万英尺以上高空飞行的“黑衣谍女”。在苏联的重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苏联导弹击毁。他本人被集体农庄庄员生俘。

5月5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宣布了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被击落的消息，向美国提出了强烈抗议，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美国的间谍活动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同声谴责。法国总统戴高乐也认为这是不体面的事情。他说，多年来，美国通过这类侦察飞行，搜集了很多精确而极有价值的情报。这次事件刚好发生在首脑会议召开之前，确是遗憾。

毛泽东认为，U—2飞机事件是对赫鲁晓夫的绝大讽刺。他不是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真诚希望和平”的人么？事实又怎样呢？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事件，使赫鲁晓夫能清醒一些，少办一些荒唐的事情。5月14日，他在武汉接见日本、古巴、巴西、阿根廷的朋友时，在谈话中评论了这一事件。他说，最近美国派U—2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一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对于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1959年底至1960年。

《阿登纳戴高乐论中苏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41页。

《人民日报》，1960年5月15日。

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毛泽东对于四国首脑会议在当时情况下能否给世界带来和平深抱怀疑，他相信人民斗争力量才具有可靠的作用。果然，由于U—2飞机事件，5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美、苏、英、法四国首脑会议，很快流产。

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美国政府以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为名，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霸权政策。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亲美独裁政权，破坏、阻挠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上奉行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剥削政策。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奴役，激起拉丁美洲国家人民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怒。1958年4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时，拉美人民举行了反美示威游行。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示威群众包围了尼克松的车队，用鸡蛋和洋葱袭击尼克松，使尼克松狼狈不堪。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进攻哈瓦拉，美国扶植的古巴亲美政权覆灭。1960年3月，艾森豪威尔对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以期缓和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稳住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阵脚。艾森豪威尔对古巴革命施加了一系列压力，卡斯特罗坚决顶住，1961年初，艾森豪威尔政府断绝了和古巴的外交关系。

毛泽东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和古巴人民的斗争。他指出，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他强调，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1961年4月，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大力支持下，1400余名古巴流亡分子在古巴南海岸猪湾（吉隆滩）登陆，被古巴军民英勇击退。1962年美国U—2飞机在古巴上空发现古巴设有近程导弹发射场，肯尼迪决定对苏联在古巴设置导弹基地作出了强硬反应，导致了所谓古巴导弹危机。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约翰逊政府的动向，古巴事件使他相信，新的美国政府依然侵略本性难移。1961年4月28日，他在杭州接见亚非外宾时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进攻古巴，再一次在全世界面前揭露了它的真面目，说明了肯尼迪政府只能比艾森豪威尔政府更坏些，而不是更好些。美国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作为工具侵略刚果和杀害卢蒙巴，将非洲人民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与美国之间相互核讹诈，是对世界人民的威胁。有的时候，例如在加勒比海危机中，赫鲁晓夫心存侥幸，投机取巧，不负责任地进行核赌博，以便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他的核讹诈一旦被对方识破，并遭到对方的反讹诈，他便马上节节败退，从冒险主义退到投降主义，在核赌博中输得精光。

针对美国对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压制，毛泽东号召组织广泛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

1960年5月上半月，毛泽东在济南、郑州和武汉，分别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非洲和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就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政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3日，毛泽东在济南接见了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和妇

《人民日报》，1961年7月26日。

《人民日报》，1961年4月29日。

女代表团的代表。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对古巴以及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目前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感谢他们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并指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

7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参观的来自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以及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代表。毛泽东听取了各国友人介绍他们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斗争和情况。毛泽东代表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对于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完全支持。他还表示同情和支持南朝鲜人民、土耳其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和它的奴仆的爱国正义斗争。毛泽东认为，南朝鲜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这种斗争，表明亚洲各国受压迫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风暴，将会更大地兴起。这个斗争对于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将是一种支持。

8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人士。他们向毛泽东介绍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情况。他们表示，拉丁美洲人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一定能够取得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毛泽东感谢各国朋友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他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毛泽东说，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奴仆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他们的人数很少。毛泽东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他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他肯定，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要求，他要求各国人民通过斗争，争取和平和捍卫国家主权。

9日，毛泽东在郑州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伊拉克文化代表团、伊拉克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和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的人士。毛泽东就如何认识美国帝国主义谈了看法。他说：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在很多国家有它的奴仆。美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人，正是广大人民所唾弃的人。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巴蒂斯塔、赛义德、曼德列斯之流，或者已经被人民所推翻，或者将要被人民推翻。毛泽东对日本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表示支持。他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得到，并将继续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他认为，为了战胜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必须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必须团结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14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工会总评议访华代表团、日本医学代表团、日本职工运动知名人士高野实和日本新闻工作者以及古巴学生代表团，巴西广播电视工作者代表团和阿根廷文化代表团。

毛泽东关心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1951年，美国为了把日本扶持成为亚洲的反共势力，先后和日本签订了《日本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在条约和协定中，规定美军可以无限制地驻留日本，并允许美国设置军事基地，允许美军出动镇压日本的“内乱”，日本成为半独立、半占领的国家。

毛泽东向日本朋友指出，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压迫广大日本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全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他说，日本人民正在行动起来，现在广大的日本人民正在举行比过去规模更大的示威，反对岸信介政府同美帝国主义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这一斗争。毛泽东又说，美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奴仆，这些奴仆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人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

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上正处于困难时期，国内有严重的困难要克服。但是，毛泽东认为，由于赫鲁晓夫对帝国主义无原则的妥协，危害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事业，中国必须承担起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任务。因此，在六十年代，他发表了许多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激烈的言论。

1961年10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日本朋友，他指出，“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毛泽东指出，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侵略，使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毛泽东密切注意着日本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斗争，他殷切希望中日人民团结起来，阻止美国在亚洲的扩张。

1963年8月，毛泽东接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一批非洲外宾，毛泽东在接见这批外宾时，应当时正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的请求，发表了《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他指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的黑人，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样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同乘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11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的歧视和迫

害，是特别骇人听闻的。毛泽东指出，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他历数美国黑人的反抗斗争，对美国当局对歧视和压迫黑人的行为表示愤怒。他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他指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毛泽东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毛泽东以发自内心的义愤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毛泽东以中国人民在解放前受帝国主义分子歧视、压迫的深切体会，切肤地感受到种族歧视给黑人带来的痛苦和悲惨遭遇。他肯定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包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

艾森豪威尔下台之后，约翰逊政府继续扩大对印度支那的战争，镇压南越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美国特种部队支持吴庭艳政府对南越人民的反抗斗争进行镇压。1963年5月，南越佛教僧侣利用释迦牟尼日在顺义举行示威，抗议信奉天主教的吴庭艳及其家族对佛教徒的迫害，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指挥警察袭击示威者和佛寺。接着吴庭艳又把大批民主人士和示威者投入了监狱。

肯尼迪政府又支持老挝亲美势力。1961年4月，向老挝派出军事顾问300多人，向亲美政权提供了3200万美元的援助。1962年7月，包括美国、苏联和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确认老挝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但是美国并没有停止对老挝的干涉行动，致使1963年老挝内部发生分裂。

8月29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微规矩些。”他要求印度支那人民千万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纸协议上，也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和它的奴仆的“明智”上，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和肯尼迪一样，十分重视维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1964年1月，在巴拿马，一名爱国学生在巴拿马运河区内升起一面巴拿马国旗，被美国驻军枪杀。这一枪杀事件激起巴拿马人民的极大愤怒，3万多群众在运河区举行了游行示威，再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镇压，打死打伤多人，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爆发了收回巴拿马运河的斗争。

巴拿马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声援。1月12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毛泽东历数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径，以充满斗争和激愤的语言指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国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军舰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并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的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踩在自己的脚下。

毛泽东指出，美国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他再次号召全世界人民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他强调指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美国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国手里虽然有原子弹、氢弹，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一定能取得伟大的胜利。

1964年，日本人民再次掀起反美风潮。1月26日，日本群众举行了反美大示威，反对美国F—105D型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等。

1月27日，毛泽东就最近日本人民反对美国的爱国主义斗争发表谈话。在谈话中，他表示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国的压迫。美国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生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他强调，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国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毛泽东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国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可以看出，从朝鲜战争到60年代，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侵略性、扩张

《人民日报》，1964年1月13日。

《人民日报》，1964年1月28日。

性的忧虑明显地加强，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关心的，就是怎样挫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和富有侵略性的干涉政策。这一时期，是他发表最激烈的言论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猛烈抨击的时期，在国际关系上，是和美国最疏远的时期。他谈论美国时，使用的词汇最为激烈。

造成这种状况，并非如西方某些人士所评，毛泽东越来越变得“好斗”，而是有其客观的原因。

首先，正如毛泽东指出，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美国各届政府，在总体上都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态度，美国侵略中国台湾，一再干涉中国解放台湾的行动，制造两个中国，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对美国政策所包含的严重敌意抱高度警惕和对抗的态度。

其次，美国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对中国保持长期的武力威胁，在朝鲜、在印度支那实行扩张，在日本和东南亚设立军事基地，培植反共势力，中国进行建设，就不可能不高度关注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敌对行为。毛泽东为亚洲和平考虑，为中国建设考虑，不能不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的行动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

再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苏联争霸世界愈演愈烈，美国为遏制苏联的势力，除了竭力填补因英、法势力衰落而退出的地区外，还激烈地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为此，它镇压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干涉别国内政，甚至把它的部队派到别国去实行武装干涉。毛泽东把美国的这种富于冒险，侵略、扩张的政策，看作是美苏争夺“中间地带”的斗争，其发展结果将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因此，毛泽东认为支持“中间地带”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是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维护世界和平的必要斗争。

第四，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越来越保持高度的警惕。赫鲁晓夫企图通过美苏缓和，由苏联和美国来共同主宰世界；另一方面，赫鲁晓夫把核武器说成是决定人类命运的东西，借此抬高美苏的霸权地位。毛泽东对美苏主宰世界的霸权主义抱极大的反感，他坚信，不反对这种新的大国强权政治，世界各国便没有独立和主权可言。中国永远不称霸，但也决不赞成其他国家称霸。毛泽东对霸权主义的态度，就构成了他对美苏的霸权政策同时持猛烈抨击的重要原因。

最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也构成了毛泽东这一时期对美国的国际政策持坚决反对态度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对美国的国际政策的激烈抨击，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生硬态度的结果，而是从近代中国革命斗争中总结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重要历史经验出发的。他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对于外来势力或邪恶势力，都必须以斗争的精神对待之。放弃斗争，必将任人宰割，前途不堪设想。斗争才是胜利之路，因而对于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毛泽东号召世界人民与之斗争。

可见，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待美国的国际关系政策的态度是有高度原则性。当然，在他发表的对美国的言论中，也显示了他的鲜明个性，他的信仰的坚定性，他的语言风格的战斗性。这一时期他留下的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献，鲜明地打上时代特征的烙印和个性的烙印。

二、毛泽东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

美国和中国之间，因为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而疏远，但是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毛泽东高度评价美国人民，他说：“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即使在中美疏远的年代里，毛泽东也关心着美国，他希望了解美国，希望加强中美人民的往来，他和美国人民之间不断建立和加深着友谊，他致力于把这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桥梁进一步建造和巩固起来。

建国以后，毛泽东也总是想要尽量了解美国。美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他们勤劳、勇敢、智慧，在他们的辛勤劳动下，在较短的历史中，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毛泽东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人，他一生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各国人民学习，包括向美国人民学习。建国以后，他也总是想要尽量了解美国，从美国人民的创造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或者尽量了解美国的政策，使自己对美国的看法，尽量符合实际。

毛泽东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那有这个事？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东西，我们要不要学？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地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薄一波回忆说，毛泽东非常重视向美国学习。毛泽东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说到美国，他肯定美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谈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1970年，他再次向斯诺指出，美国的体制中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309页。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88页。

他说，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事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中央是不行的。毛泽东并不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就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地方，凡是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应当研究和吸取。

毛泽东非常注意阅读有关美国的书报杂志，收听有关美国的新闻广播，他在战争年代就养成了了解美国各种信息的强烈兴趣。即使是在长征途中，他也仍然收听关于世界大事的广播。在延安，毛泽东每天坚持收听美国的广播。加拿大记者盖恩回忆说：延安那台残旧的收音机，每天都把美国的广播送来，包括华尔街股票市场的行情等等。毛泽东研究了股市行情后，便预见美国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将有助于美国人民觉醒。

建国以后，只要有机会，他就要阅读有关美国的杂志书报，而且读得极其仔细。例如，1960年12月5日，他致信黄炎培，告诉黄他和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的谈话，美国刊物已登出，请黄找来一阅。1964年9月9日，他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某书记，要他代为借阅有关美国的书籍。他写道：“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可以看出，他十分注意研究美国，并始终不渝地在为中美实现邦交正常化做着扎实的准备。

当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接见了他和他的秘书程思远。毛泽东知道他们从美国归来，便和他们讨论了美国问题。程思远告诉毛泽东，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他要他的部下研究中国。程思远还告诉毛泽东，国民党人也研究毛泽东。一个国民党人说，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毛泽东指出，他的书是为人民而写的，用来反人民是不灵验的。他和李宗仁、程恩远的谈话，使他对美国又有了一个了解的机会。

1965年，斯诺曾经告诉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理论，曾经引起了肯尼迪总统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促使他去研究毛泽东有关的军事著作。使斯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的消息是灵通的，毛说他读到过这个消息。毛泽东说，中国人也研究美国人写的书，例如，他读过美国驻西贡大使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写的《音响不定的号角》这本书。毛泽东了解到，泰勒将军的看法是，核武器未必能使用，所以非核武器将会起决定作用。他赞成发展核武器，但希望把发展核武器的优先权交给陆军。现在他有机会试验他的特种战争理论了。他去年6月才赴越南就任的，来的时间还没有朝鲜战争那么长。泰勒将军在越南会得到一些宝贵的经验。毛泽东还读过几篇美国当局发给部队的关于如何对付游击队的文章。这些指示谈到游击队的缺陷和军事上的弱点，认为美国有希望获胜。毛泽东读了这几篇文章后认为，美国没有看到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政治事实，即不管是吴廷艳还是其他傀儡，一个脱离群众的政府是决不能扑灭解放战争的。帮助这样的政府决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毛泽东通过不断阅读有关美国的著作和文章，加深对美国政策的认识。在这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第134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7页。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52页。

次会见中，毛泽东还向斯诺详细询问了约翰逊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

为了沟通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1956年8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在美国政府对美国实行严格新闻封锁的情况下，对于美国新闻界是一个巨大的轰动。它使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加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美国国务院不肯废除不准不论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去旅行的禁令，这激起了美国报刊和新闻界的愤怒。它们强烈批评美国国务院：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这种作法，认为这并非明智之举，中美人民的交往怎么能封锁得住呢！事实果然如此，有几名美国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中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中国来看看。之后，中国表示愿意继续发签证给作为普通旅游者来中国的美国人。毛泽东的开放政策，促进了中美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了解。

毛泽东和各方面的国际友人讨论美国问题，他力求要对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有客观的了解。

毛泽东在接见各国来宾时，只要有会，就和他们讨论关于美国的问题，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

1956年法国前总理孚尔访华，毛泽东和他讨论了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美国往往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从中取利。他讲了一个鹤蚌相争、渔人得利的中国寓言故事来说明问题。孚尔问：“他是俄国渔夫或者美国渔夫？”毛泽东微笑着回答：“在我看来，他可能多半是美国渔夫。”正是美国人使中国感到不安，美国的敌意不能不使中国高度警惕。他指出：“他们为什么要在我国领土邻近建立基地？我们并没有在美洲附近建立中国基地。”孚尔问：“你的确认为美国人想要战争吗？”“美国人民当然不要战争。”孚尔说：“美国领袖也不要战争。”他告诉毛泽东：1955年举行日内瓦会议的一星期内，他每天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见面，因此对艾对和平的深切愿望深信不疑。他希望毛泽东注意到这个情况。孚尔接着指出：如果缓和政策过去曾有一些进展，而目前已受到阻碍，那么造成这种事态的原因，是不能归咎于西方国家的领袖的。毛泽东和孚尔的讨论，使毛泽东了解到一位西方领导人对美国的不同于中国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有助于毛泽东对美国作更深入的比较和了解。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和葛罗米柯就国际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非常关心美国问题，关于美国，他提出的主要问题有：“能否确定美国的政策，具体地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策是侵略性的政策？”“美国的经济实力真的强大到已经很难同它进行斗争的程度？”毛泽东是想要了解，是否有可能使美国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国，首先是不强加给中国。

1958年8月，当台湾海峡出现第二次危机时，葛罗米柯奉苏共中央之命秘密访问中国。9月6日，毛泽东接见了。毛泽东重点和他讨论了远东的紧张局势，特别是环绕中国沿海诸岛的形势，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等。毛泽东的谈话基调是，不应向美国让步，要按“针锋相对”的原则行动。毛泽东指出，美国可能冒险对中国发动战争。

中国应当考虑到，并且正在考虑到这种可能性，但是，中国不打算投降。中国将站在自己的立场，待敌人从沿海深入到中国的内地。再予以歼灭。

毛泽东在第一次会见来访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和他讨论了美国的援助问题，毛泽东针对美国的强权政治，阐述了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他肯定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1958年8月，西哈努克再次在中国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他讨论了许多问题：同邻国的关系，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问题等。西哈努克感谢中国的物质援助。他向毛泽东谈起他对中国的援助和美国的援助的对比所产生的感受：中国给予物质援助不附带条件，也不讲任何令人不愉快的话。使用中国的援助是完全自由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西哈努克把这种态度同美国人老是埋怨他保持中立作了对比。他对毛泽东说：美国人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说服国会继续援助中立的柬埔寨方面是存在很大困难的，而且这方面的困难继续存在，将来也还会有。他们把这一点强调到我有以下感觉的程度：即他们对帮助不发达国家人民提高生活水平和捍卫自由方面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是想要收买不发达国家人民的良心。我们将不断受到美国人的这类压力：“我们对于明年能否继续这项援助毫无把握”，言下之意是警告我们，“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中立政策”，我们经常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一些多余的忠告。

毛泽东向西哈努克指出，美国的援助并没有改变它附带政治条件的作法，对于这样的援助应当有所警惕。

毛泽东在会见墨西哥总统希尔时，讨论了美国和邻国的关系问题。希尔指出：墨西哥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有几乎三千公里的边界，我们遭受过美国三次入侵，在第一次入侵中失去了我们一半以上的领土。美国政府企图使我们不在宪法中写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最进步的原则，但是它什么也没有得到。

和希尔的谈话，使毛泽东获得直接了解美国和美洲其他国家关系的情况的材料。

1974年和1975年，毛泽东两次会见英国前首相爱德华·理查德·乔治·希思。他们讨论了美苏关系问题。毛泽东担心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始终将发生冲突，他唯恐赫尔辛基会议表明西方在苏联的力量面前软下来，并问及美国是否继续具有保住它自己的地位和西方的地位所必需的意志。他和希思的讨论，是对美苏两国霸权政策的一次有益探索。他给希思的印象是，毛泽东对世界局势是持现实态度的，他的看法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接了当。

毛泽东在接见澳大利亚前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时，再次表现出他对西方国家领导人发表的对美国的看法有莫大兴趣，尽管这些看法与他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他和惠特拉姆讨论了西方哲学、历史、当前的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惠特拉姆认为，毛泽东很熟悉情况，知道美国和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取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刺激，不论对方的意见和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总是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利用一切机会从书报杂志中、从来访者的谈话中对美国作深入了

参见《西哈努克回忆录》。

解。他渴望更多地知道美国的情况、美国政府的政策等。这使他对美国的态度不是感情式的、而是理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对美国并不抱有先人为主的固定看法。他注意着美国政策的调整，也在调整着中国的对美政策。正如许多西方领导人指出那样，毛泽东对美国抱着现实的态度。

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中国通们再次到中国访问 中美关系在 40 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转机，一批熟悉中国情况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和作家，在深入了解了中共和蒋介石政权之后，向美国国务院作了客观的报告，提出了一些冷静的建议，或者在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预见性的看法。但是，随着杜鲁门反共冷战政策的形成，特别是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由大陆逃到台湾后，在朝鲜战争和反共的麦卡锡时代，这批职业外交家受到了打击和迫害。他们被追究为失掉中国的罪人或共产党的“间谍”而被赶出了国务院。这批中国通的遭遇，是 50 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的反共政策的结果。

首先受到指控的是欧文·拉铁摩尔。他虽然不是外交官，但对中国发表过许多公正的评论，是继斯诺之后到达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问的人。1950 年 3 月 23 日，麦卡锡指控欧文·拉铁摩尔是苏联在美国的头号间谍。拉铁摩尔用长达 42 页的《诽谤的考验》的答辩词，回答了麦卡锡的诬蔑。接着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为首的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进一步对拉铁摩尔进行了指控，他们利用太平洋关系协会的档案材料，传唤了 66 个证人，印制了一部共 5000 多页，分为 14 卷的调查记录，对与拉铁摩尔有关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中保存的 675 页材料进行反复盘问，以期诱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而抓住他的把柄。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是他们在舆论上把欧文·拉铁摩尔，弄成了一个在美国尽人皆知的叛国通敌的代名词。

接着麦卡伦为首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根据太平洋关系学会档案中 107 页与费正清有关材料，对他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去中国的活动和他与那些中国朋友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对他提出了 10 多项指控。军方拒绝批准他去访问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纽约时报》也停止约请费正清撰写有关亚洲的重要著作的书评。

麦卡锡迫害的另一个人，是当时唯一还留在国务院任职的谢伟思。麦卡锡在各种场合莫须有他说谢伟思讲过：“共产主义是亚洲的唯一希望”，或者“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希望。”麦卡锡声称：谢伟思同毛泽东有交往，他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同伙与合作者”。1950 年 5 月 26 日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开始了对谢伟思的审查。他同时接受泰丁斯委员的审查。1951 年秋末，谢伟思再次受到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12 月 13 日，委员会作出结论，认为谢伟思犯有指控的罪行，不到数小时，艾奇逊便把谢伟思开除了。他后来来到了一家蒸汽阀门公司工作，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当上了该公司国外部门的总经理。

1951 年 6 月 27 日，另一名中国通柯乐布接到了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一纸清单，对他的指控共有 10 项，其中有 9 项说他是一个亲中共的分子。他们是：“（1）1931 年到 1934 年间在中国汉口和共产党人有交往；（2）1932 年到 1934 年，以赞同的态度看待共产主义的某些方面；（3）1934 年至 1935 年，在中国北平，有明显的‘粉红色’倾向；（4）在 30 年代初期，对某些共产主义的原则有明显的偏爱；（5）1935 年到 1937 年，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持友好态度；（6）1940 年以前，被归入‘淡红色’一类，并信奉共产主义理论；（7）1940 年，在中国上海，百分之百的亲共；（8）1933

年到 1934 年，对共产主义持“赞同”态度；（9）同下列各人有（或有过）密切的和惯常的交往……。”

从指控柯乐布的这些罪名中，可以看出忠诚审查委员会语无伦次、逻辑混乱，目的就是要达到把这位外交官说成是“亲共”分子，或者干脆就是共产分子。这位被包瑞德认为是“可靠到了令人讨厌地步”的外交官，在外交界有供职 24 年的资历。1952 年 2 月 11 日，他被迫提前退休。

另一个中国通文森特也受到了麦卡伦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审查。麦卡伦得到报告“文森特和费正清都是共产党人”。1951 年 1 月，文森特到麦卡伦委员会作证。10 月，他接到了这个委员会对他提出的一份起诉书，控诉他与中共和苏联特务有勾结。1952 年 12 月 12 日，文森特被宣布停职，1953 年 1 月 29 日，他在杜勒斯的亲自要求下被迫辞职。这个有着 27 年外交官资历的中国通，落到连讲课都无人敢听的地步。他的主持人认为，请一名声名狼藉的亲共分子去占据他们清白的讲坛，是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被迫害的中国通中还有戴维斯，他 1908 年出生在四川乐山，父亲是美国的传教士，后来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回美国读完哥伦比亚大学，1931 年被国务院录取，从此他就成了一个职业外交官被派往中国。1944 年，他曾被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外交官飞往延安，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讨论美军在抗战的最后阶段在中国沿海和华北登陆时，共产党能给予什么样的援助，他们常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到深夜。1953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决定对他重新审查，这是他第 9 次受官方的严格审查。这一次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积极地反对并损害美国的对华政策”。赫尔利和魏德曼出席了他的听证会，这就决定了他的命运。11 月 5 日，杜勒斯解除了他的职位。

美国的外交官中的中国通们，遭受如此迫害，以致使美国的正直人们感到良心不安。1951 年美国《外事月刊》曾发表社论，力图争取国务院支持谢伟思。20 年后，它又发表了阿米斯特德·李的评论谢伟思《关于亚美杂志：中美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的申辩文章。阿米斯特德·李写道：“在参议员麦卡锡的受害者之中，很少有人辩白洗雪得如此彻底。这也是外交界许多钦慕它的人共同的胜利……。将来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国务院里挂起扁额，来表彰谢伟思这样的外交官。他是我在 25 年中认识的最优秀、最能干的外交官，因为他以自己的莫大牺牲来抵抗〔麦卡锡的〕这种企图。”7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邀请谢伟思、戴维斯、费正清到他的外交委员会，就中国问题作证。富布赖特对他们各位说：你们老老实实地报告了中国的情况，但因为你们的诚实而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在一个所谓文明国家里发生这种情况，岂非咄咄怪事。

富布赖特从这一痛心的事件中看到了它的后果的严重性，它使美国在观察中国的问题上失去了客观的立场，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指出，有些居于官方地位的美国人，在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之前的日子里，曾经提供过比较客观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见解。这些在中国战时的观察家，包括约翰·S·谢伟思、约翰·佩顿·戴维斯和戴维·D·巴雷特上校。他们都是同情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至少说，他们主张后者进行某些改革，也许才能得以幸存下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客观地汇报了国民党的羸弱和

腐败与在延安总部的共产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还提供了这样的情况，表明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根本无意于屈从于苏联，而希望和美国合作。这些人的观察不仅没有受到注意，后来他们还因此而遭到攻击和迫害。巴雷特上校没有被提升为准将，虽然他在陆军中的资历应该得到升迁，而谢伟思和戴维斯则支持他们所预见到的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甚至对此负有责任的罪名而被逐出外交部。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就失去了他们的正确的观察和可贵的洞察力。

正当富布赖特在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发表上述讲话的时候，《时代》周刊老资格的记者赖斯顿正在北京同周恩来谈话。周恩来告诉赖斯顿：中国欢迎四个中国通——费正清、文森特、拉铁摩尔和谢伟思到中国访问。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反共行为对中美关系的严重伤害，深为不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1959年10月6日，他在答谢福斯特等美共领导人的电报中，高度肯定美国共产党人和美国主持正义的人们，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抗美国的反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特殊光荣的地位。他指出，“中国人民懂得，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他们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在50年代麦卡锡掀起的反共潮流中，受迫害的不仅是持客观立场的中国通们，美共更是首当其冲。1955年至1956年一年内，139名美共领导人在“阴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罪名下，被捕入狱。美共领袖福斯特也受到两起治安罪起诉的束缚。毛泽东坚信，美国政府所做的伤害中美人民感情的事，只是美国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好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少数人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毛泽东给福斯特的信，是对麦卡锡时代美国国内泛起的反共浪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相信，这种浪潮终究阻挡不住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

1971年，谢伟思夫妇接受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于9月26日抵达北京，开始他的故地重游。他在中国访问了六个星期，他没有要求同毛泽东见面，他觉得这类事情总得由毛泽东提出才好。他与周恩来有几个见面的机会，那时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没有时间和谢伟思长谈。就在谢伟思结束访问前一天，周恩来会见了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问候了其他中国通们。

麦卡锡的反共浪潮过去了。但是，它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深刻的伤害，其教训是深刻的。正如富布赖特指出那样：由于我们在战后的反共歇斯底里，我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就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怀有敌意的；同时，尽管有着明显的相反的证据，我们命定地把我们的赌注押在中国内战中的输家一方，这就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僵化和敌视。富布赖特的这个见解，已经成为今天明智的美国人的共识。

毛泽东三次会见斯特朗，毛泽东告诉她，他想去美国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毛泽东对美国人民抱着友好感情，对他的美国新老朋友们抱着真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第50—51页。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第56页。

诚的尊敬，从 1959 年到 1965 年，他三次会见美国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这些会见中，毛泽东对美国问题议论最多，他对美国人民的关心，对美国政策的关心，在这些会见中充分表现出来。

1959 年 3 月初，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斯特朗和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邀请来华访问的美国著名黑人学者和作家杜波依斯及其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杜波依斯。这是毛泽东 1947 年离开延安以来，和美国人的第一次会见。

毛泽东一开始便向美国客人们谈起他想去美国游泳的愿望。他说：虽然我感到上了年纪，但我依然很有精力和体力。由于精力、体力充沛，我每年仍然可以畅游长江。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我愿意去游密西西比河。但是，我想另外三人可能反对：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

“相反”，杜波依斯说，“他们可能愿意看见你在密西西比河游泳，特别是靠近它的河口。”

毛泽东高高兴兴地回答：“如果是那样，我可以几天之后就去，完全像一个游泳者。我不谈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上游泳。然后，如果艾森豪威尔总统允许，我将看他打高尔夫球。也许去医院拜访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似乎不懂得毛泽东的幽默，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那一定会给杜勒斯一个打击。毛泽东马上纠正道：这不是我的本来愿望，我很希望杜勒斯先生健康。他说：“作为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处。”“杜勒斯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坚持自己的原则。他反对共产主义，反对苏联，反对中国。为了这一目的，他压迫人民，在世界各地派驻军队，建立军事基地。所有这一切，对整个世界都是有用的，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毛泽东由想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说到了杜勒斯。到密西西比河口去游泳，这是他 1936 年就产生的强烈愿望。33 年过去了，他的愿望还没有实现。现在他又提起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这一语双关的愿望，表达中国愿意和美国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的诚挚愿望。如果两国人民能够无拘无束地友好往来，这对两个伟大的国家和人民将带来多大的益处啊！但是美国的冷战阴云笼罩着这两个国家，毛泽东想到了杜勒斯，想到了横亘在中美关系中的障碍。看来这些障碍一时要消除是困难的。那就只有面对现实了，只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他用自己的哲学来看待这个问题，心里便宽慰了许多。

毛泽东对杜勒斯作为教员的作用，作了充分发挥。

他说，他希望杜勒斯再将他的政策继续 10 年。美国军队现在占据着中国的台湾，但他们终将不得不离开。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时间越长，就越能教育中国和世界人民。毛泽东说到“中东事件”，他希望美国军队在黎巴嫩住长一些，这样可以教育中东人民。

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想法，“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者师”，他说：杜勒斯制造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我们是有利的。他把局势弄得越紧张，我们就越容易动员世界人民。每一个人都被迫面对战争问题。杜勒斯本人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怀疑他所制造的紧张局势，究竟是对他有利，还是对东方有利。

毛泽东历数过去 14 个月中，由于杜勒斯制造的紧张局势而引起的 12 起

以下有关内容参见谢春涛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主席的三次谈话》。

世界性事件：首先是委内瑞拉的反叛；其次是尼克松副总统对 8 个拉美国家的访问，在那里，人民用鸡蛋和口痰来欢迎他；第三是去年 6 月 14 日的伊拉克革命；第四是 6 月 15 日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的登陆；第五是对中国金门的炮击。

毛泽东对美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表示强烈义愤。他说：我们与蒋的战争，已经持续 30 年了。但因为我们炮击金门，美国派出了其半数的军用飞机。不管怎样，这是我们的地方！毛泽东批评美国对中国实行的战争边缘政策说：“他们坚持其‘战争边缘’政策，他们护送蒋的船只，但在我们追击时，他们总是在 3 英里外的地方观看。他们停止在边缘。”“所以，现在我们把杜勒斯当作师，我们也是停止在边缘。我们炮轰蒋的舰船，美国的舰船挂着巨大的国旗，因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与蒋的舰船区分开来。我们不炸美国的军舰，我们向杜勒斯学习，也把战争避免在边缘。”

毛泽东关于中国对“战争边缘”政策的立场，明确地告诉美国朋友，美国政府用战争边缘政策来威胁中国，中国并不害怕，但美国要避免与中国最后直接发生冲突，中国也很理解。因此，我们一方面抗议美国“战争边缘”政策对中国造成的武力威胁，另一方面也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武装冲突。总之，两国的问题可以通过谈判解决。

毛泽东和杜波依斯及斯特朗谈起人民必胜的信念。他指出：“美国有 1800 万黑人，灭绝他们是不可能的。将被灭绝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你们。资产阶级在苏联已经消灭，在中国也将很快被消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共产主义者与和平战士永远不会死亡。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但是，杜勒斯及其同伙将被灭亡，他们正做着他所能够做的灭亡自己的一切。这也就是我如此欣赏他的原因。”

毛泽东谈话又回到杜勒斯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紧张局势及各个世界性的事件上来。毛列举“美国共和党在去年 11 月选举中的大败”；“1957 年下半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摩擦的增加”；“苏联向太阳岛发射了一颗新的卫星”；“苏联的第七个五年计划”等等。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古巴革命的意义。他说：“古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只有 600 万人民，相当于美国黑人的 1/3。古巴离美国很近，恰好在它的脚边。但古巴并不畏惧原子弹和氢弹。对古巴人来说，它并不能说明什么。”

毛说：“过去，我们的人民害怕美帝国主义，这是一种疾病。他们羡慕美帝国主义，也是一种疾病。当恐惧和羡慕联系起来时，就成了崇拜。”

之后，毛泽东又和美国朋友们讨论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如果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使他们力求阻止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那么这种恐惧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无人想发动战争，他自己也不相信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尽管战争可能会继续存在多年，而且在有些战争中可能使用核武器。他不相信会因为偶然事件而使用全部核武器，也不相信它们能毁灭全人类。即使核战争发生，全部核武器也不能毁灭地球上的全部生命。而且，如果人类全被毁灭，进化将再次产生出人类。

毛泽东指出，由于人民要求和平力量的增强，核战争不会发生。我们不会去发动战争。“不是我们的军舰在美国沿海，而是美国的军舰在我们的水域。帝国主义者虽然将会发动战争，但他们受到人民压力的限制，如美国在占领黎巴嫩后就迅速地撤了回去。”

毛泽东这次接见斯特朗、杜波依斯等美国朋友时，正是第二次台湾危

机、美国实行战争边缘政策对中国实行武力威胁刚过去的时候。毛泽东在与美国朋友的谈话中，集中批评了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他要通过美国朋友传达中国的原则立场：一是不怕，中国人民不怕战争威胁；二是不要，中国人民不要战争，美国不应当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它必须从台湾海峡撤回去。毛泽东在第二次台湾危机刚过去之后，对美国朋友的一番谈话，和对美国政策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政府对其政策进行认真反思，及时改弦更张。同时毛泽东谈了一番想去美国游泳的话，其意味十分深长。可惜的是，当时美国政府是来不及去回味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的，美国政府再次拒绝了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斯特朗，他们又集中谈了美国的政策问题。

毛泽东询问美国客人：“有人认为美国把苏联当作它的主要军事目标，有人则认为认为是中国。你们怎么看？”

毛泽东仔细倾听了斯特朗和其他美国客人的看法。斯特朗认为，没有什么迹象证明华盛顿要发动一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规模战争，倒是有可能发动局部的战争来占领较小的、不发达的国家来接收那里的财富，和利用他们作为将来更大战争的基地。在选举年——1964年，华盛顿无人想动用军队。

在场的另一位美国人说，美国已发现他们难以对付小的战争，如越南，现在正被迫防御。因此，美国更有可能企图在东欧通过颠覆而不是战争来谋取地盘，而有些国家则是受这种颠覆的。

第三位美国人则引述了西方报刊的共同主题，即美国把苏联视为眼前的敌手，而把中国看成是将来的敌人。

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些看法都很有意思，他乐意听到关于对美国政策的不同看法，以供他比较思考。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赫鲁晓夫与美国之间正在达成某种交易。赫有时和美国对抗，有时又妥协。“不久前，他逮捕了美国间谍教授巴霍恩，这不是对抗吗？当然，几天之后就放走了他。……在美国和赫鲁晓夫之间，还没有完全成交。那是他不能答应美国向东欧要求的一切。”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在中国政策的若干问题上，替美国政府说情表示严重不满。

毛泽东指出，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会谈以后，他来到北京告诉毛：“找到了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赫鲁晓夫说：“在某些方面，对待台湾应当象列宁对待远东共和国那样。”毛泽东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的，而且当时就控制在苏联共产党手中。他问赫鲁晓夫，他是否认为台湾今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之下？

赫鲁晓夫还提出，中国应释放一些在朝鲜战争后跳伞进入中国东北的美国间谍。毛说：“那很困难，你知道，我们国家有法律。”赫鲁晓夫因为答应了艾森豪威尔，因而他坚持要毛泽东放人，被毛泽东顶回去了。

毛泽东确切地肯定，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他说：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时候，苏联和东欧人民不可能不一起加以反对。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加拿大，大洋（洲）国家及其他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美国正弄得柬埔寨人民无法生活，所以，西哈努克亲王起而反抗。

毛泽东对世界各国人民与美国侵略政策斗争的形势充满了乐观。他说：“拿南越来说，它虽然很小，但美国没有任何办法促使其人民屈服。今年，1964年，刚过去短短10几天时间，但我们已经听到了来自巴拿马和桑给哈的两声春雷。虽然还没有春天，但它却表明大的风暴就要到来。”

毛泽东谈到他发表支持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的斗争声明时说，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太注意巴拿马的一些小的示威。他们告诉我，那是少数人示威并高喊“美国佬滚回去”，不是一场革命，甚至也不是一次体制的变革。所以，中国为什么有2000万人（相当于巴拿马人口的20倍）示威表示对巴拿马的支持？为什么中国发表团结声明？毛泽东对此回答说：“我们看到，巴拿马群众直接起来反对美国军队。我们认为这有着极大的意义。任何地方发生此类行动，只要他们需要，我们就将给予可能的支持。”

毛泽东第二次接见斯特朗，正是他发表一系列声明，谈话支持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与美国客人的谈话，再一次表明他对美国侵略政策持坚决的谴责态度。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与赫鲁晓夫不同，决不会对美国采取无原则的妥协态度。

1965年11月22日，斯特朗80岁的生日前两天，他在上海第三次会见了斯特朗。这一次会见，共有30多位美国客人和中国人参加。

斯特朗注意到这次大型的谈话，与美国的动向有关。在11月的同一周内，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作了他的第7次西贡之行，以策划越南战争升级。同时，美国和平力量也正在向华盛顿进行着一个被称为“华盛顿所知悉的最大的和平示威”的进军。那一周，中国的报纸4次在头版报道了美国的示威。”斯特朗认为，毛泽东这一次对众多美国客人的接见，是要表明这样一种看法：当华盛顿正在进行战争升级，并对我们进行原子弹威胁的时候，请注意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不同。

在第二天的中国报纸上，以头号新闻报道了毛泽东与斯特朗等美国客人的谈话，并同时刊登了毛泽东接见美国客人的照片。毛泽东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但中国与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从来没有忘记把美国人民和制定战争政策的决策者区别开来。

毛泽东与斯特朗等美国客人的三次会见，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也通过他们传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和主张。

毛泽东四次会见斯诺，在第一次会见时，他便向斯诺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中去游泳。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中国政府坚持和美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继续表示愿发签证给想作为普通旅游者来中国的美国人；同时表示愿意向许多美国著名人士发签证，其中有埃莉诺·罗斯福夫人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等。但是，美国国务院不让他们接受，警告说接受签证是违法的。

1960年，埃德加·斯诺以美国《展望》杂志的作家代表的身份申请来中国，勉强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1960年6月，他经由莫斯科到达北京。

斯诺到达北京后，受到了中国人民热情的欢迎和接待，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中美关系。在5个月的时间里，他对中国进行了广泛地参观访问。他访问了14个省的19个主要城市，他会晤了中国各方面人士，从毛泽东、周恩来到工人、农民和各种人士广泛地进行了交谈。

阔别24年后，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埃德加·斯诺。当

斯诺和其他客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革命胜利 11 周年时，他又和毛泽东重逢。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接见了斯诺，他们在一起渡过了 9 个小时。他们谈到了这些年来发生的事，也谈到了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斯诺发现，毛泽东的生活依旧俭朴，他的“享受”大致等于长岛一个事业顺利的保险公司推销员在较好的牧场式平房里所享受到的东西。

毛泽东很轻松地 and 斯诺谈论各种话题。他不忘 24 年前在保安向斯诺表达过的强烈愿望：他希望能够见到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大峡谷和黄石公园。能够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这一次会见，毛泽东又轻松地提起这个后题，他说他想要在还不太老的时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马克河去游泳。他认为华盛顿不会同意他去波托马克河，不过也许会让他在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儿有 50 英里宽。

毛泽东的谈话使斯诺感到他对美国的深深的友好之情，也感到他的气魄很大。没有一个美国总统到密西西比河口去游过泳，甚至连这样的想法也没有产生过。但是，这个曾经被西方人轻蔑地称之为“东亚病夫”的民族领袖，竟一再要去密西西比河口游泳，这种气魄，不能不使人吃惊。斯诺知道，1957 年，毛泽东在汉口，以“打游击的办法”，轻松地游过了长江，他随波飘浮，迂回前进。江中很快布满了跟随他搏浪前进的人。在上海附近渡江的人之多，竟使国外出现谣传，说中国准备进攻台湾。毛的一位外宾说，这条消息夸大了，中国不会用一支游泳队去占领台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和斯诺讨论了美国的政策。斯诺认为毛泽东对美国的分析是有其个性见解的。对毛来说，美国在台湾的地位既符合老殖民主义的定义，也符合新帝国主义霸权的定义。在斯诺看来，一方面毛自己关于“美帝国主义”的概念是令人怀疑的，过于简单化的。另一方面，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虽然只有洛甫和董必武到过美国，但他们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驻华美军打交道的经验，对美国有过一次直接的、反面的了解。美国在内战期间对蒋介石的慷慨支援，后来同在台湾的蒋介石结盟，实行经济禁运而对中国国内发展造成严重障碍，带头把中国排除于联合国之外，还有在东亚维持美军基地，这一切不能不使中共党人对美国的敌意有深刻的了解。这一切都有助于共产党人争取群众的爱国主义感情，来支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敌意。

但是，斯诺认为，毛泽东和中共是有诚意解决中美问题的。在这之前，斯诺和周恩来讨论中美关系时，周恩来便明确地谈到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中国和美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一项和平条约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争端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两国会有外交关系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周恩来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而在这个长期努力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反复提出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中美争端，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诚意。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以另一种方式再次向美国政府表明了解决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

1965 年 1 月 9 日，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时，受到了毛泽东第二次接见，这次谈了 4 个小时左右。

这一次谈话，《人民日报》作了重要报道，刊登了毛泽东和斯诺的大幅照片，斯诺以“《西行漫记》美国作者”的身份被作了显著介绍。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被允许大部分发表。斯诺将其首先刊登在巴黎《新直言报》上，1965 年 2 月 4 日到 17 日，登在东京《朝日新闻》上，不久又登在汉堡的《明

星报》，罗马《欧罗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华盛顿《新共和》杂志上，毛泽东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

斯诺认为，这次谈话的发表，显然加重了这件事的份量，使它绝不仅是重叙旧谊。侵越战争正在全面扩大，美国海军陆战队正不断派往南越，北越受到美机轰炸，中国又受到类似侵朝战争初期那样的威胁。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很可能想通过这种方式，把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条件看法，特别是对越南问题的看法通知美国。美国应当了解中国的看法并作出明智的反应。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声明：除非中国领土受到直接攻击，中国不会介入越南。

他谈到美国现在在越南所起的作用。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毛泽东说，在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政府站在蒋介石一边，这帮助了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主要依靠蒋介石的军队转交给他们的美国武器。现在，越南的解放部队也是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武装的。正是蒋介石和日本军阀直接教会解放军怎样打仗，而美国则是他们的间接教员。

毛泽东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认识到，它们的战争行为正在起相反的作用这样一个真理。如果我对美国领导人说，他们是在培植一个最后将把他们打败的革命运动，他们是听不进去的。他们不愿意让越南人决定自己的事务。他们听过吴庭艳的话吗？但性急的美国将军们越来越讨厌吴庭艳，把它干掉了。可是，在他被暗杀之后，天地间是不是安宁些了呢？现在已经有美国的干预来帮助和教育越南的解放军官兵，反对美国的人不再限于解放军了，就是吴庭艳也不愿听命于人。这种独立性现在已扩大到将军中间，美国教员正在取得成功。

毛泽东从辩证法的立场，对美国的反面教育作用作了发挥。

毛泽东肯定，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革命。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同反帝和反对新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是过去压迫和欺侮的结果。欧洲国家也曾经经历反封建的革命，但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封建时代，美国先打了一次进步的、从英帝国主义统治下争取独立的战争，然后打了一次为建立自由劳工市场的内战。华盛顿和林肯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进步人物。当美国刚建立共和国的时候，欧洲所有帝王都恨它和怕它。这表明在当时美国人是革命的。毛泽东从欧洲历史和美国历史的事实中，进一步说明，美国政府去侵略和压迫别人，只能引起革命的结果，这就犹如它自己历史上发生过的革命一样。因此，毛泽东忠告说：我们早已提出过，美国应该撤一点军队，美国的手伸到了全世界。象往常一样，美国统治者不听劝告。

斯诺问及毛泽东关于原子弹的问题：“你现在还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毛泽东回答，那只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终人将消灭原子弹。到那个时候，它就真的变成了纸老虎。毛泽东相信，不管原子弹的威力多大，但它要毁灭人类还办不到。

毛泽东说，他最近注意到一个报道，美国人在比基尼进行核试验6年后，去那个岛进行调查。从1959年起，研究工作者一自在比基尼。他们第一次进入主岛时，不得不在灌木丛中砍出小道，老鼠跑来跑去，鱼照常在河里游，井水可供饮用，到处草木茂盛，鸟儿在枝头鸣啭。细菌繁殖率达到每平方亩400公斤。核实验后大概有两年不好，但是自然界还是继续发展。对细菌、鸟、鼠和树木来说，原子弹实在是纸老虎。对人类来说，它也许又有所不同吧……毛的最后一句话的更深刻的含义是：即使人类从地球上消灭了，生命

不可能被人造的原子弹消灭。他对原子弹的态度既依据于科学，又依据于宏大的气魄和胆识。

1964年，中国也拥有了原子弹。斯诺说：“中国原子弹先生”也犹如当年“苏维埃先生”一样，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麻烦。毛泽东认为，这些麻烦是这些人自我的。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想要。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不喜欢“中国原子弹先生”。可是把一切都归罪于“中国原子弹先生”，掀起反华运动，这难道公道吗？难道是中国杀了吴庭艳？然而这件事毕竟发生了。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时，中国（共产党）人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可没有谋划暗杀他。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的时候，中国人又一次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下命令这样做呀！他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表明中国对原子弹的立场。中国拥有原子弹，但中国不会用原子弹去威胁别人。世界上发生的麻烦事情，不是中国引起的，而是帝国主义者引起的。

斯诺和毛泽东讨论了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问题。斯诺说：印度尼西亚已退出联合国，这开了一个先例，其他国家将会跟着退出吗？

毛泽东指出：首先开先例的是美国，它把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现在大多数国家可能会不顾美国的反对而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了。于是有了一个新的计策：不能凭简单多数而是需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但是问题在于，中国过去十五年呆在联合国外面，究竟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印度尼西亚觉得留在联合国里好处不大，所以退出了。至于中国，它本身不就是一个联合国吗？中国的几个少数民族，任何一个在人口和领土方面都比联合国中投票帮助剥夺中国席位的某些会员国要大得多。中国是个大国，它在联合国外面要做的事情已经够忙的了。

毛泽东申明，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参加联合国，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邀请中国参加，而中国人不接受，那中国人不是要被叫做民族主义者（即反国际主义者）了吗？但是，即使联合国决定承认大陆中国而不再承认台湾集团，不是仍旧存在着困难吗？他们怎么能够一面给中国席位，一面又仍旧谴责中国为侵略者呢？（指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的决议——引者）但是假定从中国头上摘掉侵略者这顶帽子，那又会怎样呢？联合国会指责美国是对越南的侵略者吗？大概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变化吧？中国还没有要进入联合国的危险。

毛泽东对中同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表示了原则态度。那就是联合国不再承认台湾集团，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成为少数超级大国操纵的表决机器。中国在联合国问题上并不着急，它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再次显示了毛泽东的战略家的气魄。

关于中国和美国，是斯诺和毛泽东讨论最多的话题。

斯诺说，“过去十五年，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几乎继绝了一切交往，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这个鸿沟似乎比过去更扩大了，但是，我自己不相信会发展到战争，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

毛泽东回答：历史的各种力量把美中两国人民分开，历史的各种力量最后也必然会把两国人民再带到一起来的，这个日子一定会到来。也许我是对的，在那以前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毛泽东指出，中美之间可以不发生战争。只有美国军队入侵中国，才会

发生战争。他们可能来，他们也可能不来。如果他们来，他们确实不会得到很多便宜。那简直是不允许的。美国领导人大概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不会入侵中国。这样就不会有战争，因为如果他们不派军队到中国来，中国当然决不会派军队去进攻美国。

毛泽东反复强调，中国军队是不会越出国境去打仗的。这点很清楚。只有美国进攻中国，中国人才会应战。这不是很清楚的吗？中国人自己国内的事务已经够忙的了。他针对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所说，“如果中国放弃侵略政策，美国将从越南撤退”的说法回答道：中国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好放弃。中国在侵略什么地方？中国不曾有过侵略行为。中国支持革命运动，但不是靠入侵别的国家。当然，什么时候解放斗争起来了，中国就发表声明、举行示威来支持它。使帝国主义感到烦恼的正是这些事情。”

毛接着说，有时中国故意大喊大叫，例如围绕金门和马祖的问题。那里的一阵炮轰，就能引起很大的注意，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人远离家乡，所以感到不安。试想，在中国领海内打几发空炮，能起什么作用？不久前，美国认为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不足以对付这些炮弹，又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朝中国调来，还从旧金山调来一部分海军。到了这里，他们发现没有事可做。所以，看来中国能够把美国军队调来调去。毛泽东指出，我们在自己国内放空炮被称为侵略，而那些真正进行武装干涉、轰炸和焚烧别国的人，却不算侵略，这是什么道理？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革命与美国的关系时说，有些美国人曾说，中国革命是俄国侵略者领导的，但实际上中国革命是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同样，越南革命也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武装起来的。最近几个月，不仅大大地增加了他们得到的美国武器供应，而且还吸收南越傀儡军中美国训练出来的士兵和军官进行扩充。毛泽东认为，美军目前还不准备离开南越，战争或许还要继续一两年。然后美军会发现呆下去没有味道，于是就可能回家去或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毛泽东这一次与斯诺的谈话，比他和斯特朗的谈话要早 10 个月，这两次谈话和会见，《人民日报》都作了报道，清楚地传达了毛泽东的意图。毛泽东通过斯诺向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表达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他要求美国保持克制，不要重蹈朝鲜战争的覆辙，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毛泽东肯定美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克制作法是明智的，中国赞赏这种作法，两国之间不存在战争，重要的是美国必须继续向前迈步，那么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便很有希望。

197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来华访问的斯诺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将斯诺和他的妻子洛伊斯引到毛泽东身边，斯诺和毛泽东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五十万人的集会。斯诺认为，毛泽东当众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中美之间的重大的事情正在发生。

在毛泽东 77 岁生日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斯诺与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对于斯诺，《人民口报》介绍为“美国友好人士”，同时在报纸右上角的小方框中刊登了毛泽东的一条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斯诺意识到，毛泽东是要把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中少数奉行敌视政策的人区别开来，凡是对中同人民持友好态度的人，都能受到中国

人民的欢迎和尊敬。毛泽东用这样一张照片来推动他的中美外交的大战略，他要向尼克松政府再次传达中国政府的信息。

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谈话，毛泽东再次谈到美国问题，并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

毛泽东与斯诺的几次谈话，尤如他们1936年在保安的谈话曾促使了美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一样，再次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车轮的转动，促进美中的相互了解和关系的正常化。斯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中，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再次发挥了卓越的作用。

三、由会谈走向关系正常化

从日内瓦会谈到中美大使级会谈 50年代，尽管中美关系处在僵硬对立之中，但是，这两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却开始了对一系列问题的长期会谈，进行了一系列接触和探索，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

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全面展开外交工作的新时期已经到来。1954年4月24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出席有苏、美、英、法和中国参加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会议期间，杜勒斯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态度傲慢狂妄。但是美国代表团的其它成员，却对中国代表团表示了友好态度。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在酒吧间，主动找周恩来的秘书浦寿昌攀谈。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很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哪儿学的？”他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史密斯的友好态度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第二天休息时，在酒吧间，周恩来主动和史密斯打招呼，史密斯虽然避免和周恩来握手，但他笑容可掬，和周恩来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他又一次赞扬中国的古老文明，美丽河山，还说他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在他家的客厅里就陈设着许多中国瓷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周恩来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周恩来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咪咪地走开了。史密斯用摇胳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的敬佩。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尽管外表上激烈反共，内心却有兴趣探索同中国缓和紧张关系。美国的一些盟国也认为，中美双方如能接近一些，将会促进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为此，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5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采取主动，向新闻界发表了“中国愿意就美国扣留我国侨民和留学生，及美国在中国被押被俘军人和犯了罪的平民问题进行谈判。这个建议得到了美国代表团的响应。”

6月5日至6月21日，中、美方面在国联大厦进行了四次会谈。7月16日和21日，双方派联络员接触了两次。中国方面态度积极主动，并通情达理地处理了一些问题。而美国方面，在遏制和反共的总政策制约下，表现出固执和僵硬的态度，以致常常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尽管如此，日内瓦会谈，打开了中美接触的大门，为中美会谈作了铺垫，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1955年4月18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意义深远的万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中美关系发表了历史性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的声明，表明了中国致力于缓和远东和国际紧张局势，改善中美关系的立场，受到了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赞赏。许多国家希望美国响应中国的声明，与中国进行直接谈判。美国在国际国内压力下，也希望找机会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了解中国在若干问题上的态度。7月13日，美国政府通过英国向中国方面建议，中美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从8月1日开始，美国派出约翰逊大使，中国派出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在日内瓦开始了大使级会谈。会谈中，中国采取主动步骤，在第一次会谈时，首先宣布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赢得了世界舆论的欢迎，也使美国政府看到了中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作的真诚的努力。会谈首先围绕遣返侨民问题进行磋商。9月10日，经过艰苦努力，中美双方达成了—个《协议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并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份《协议声明》写法独具一格，别出匠心。正如当年参加会谈的王炳南大使指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以后尼克松和周总理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

周恩来对这个《协议声明》表示赞赏。50年代末，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9月20日至12月12日，会谈继续进行，从第一次会谈到12月12日，会谈共进行了73次。第二轮会谈进入了中美关系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中方提出台湾问题和周恩来直接与杜勒斯进行会谈问题；美方则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保证不诉诸武力的问题。约翰逊根据杜勒斯的指示，把这两个问题故意纠缠在一起。他要求中国首先必须宣布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才同意举行中美外长级会谈。中国方面严正指出，美国侵略台湾已酿成中美争端，美国军事力量在台湾海峡已威胁东南亚和平、安全与稳定，威胁中国的安全和建设，美国应从台湾海峡撤退其一切军事力量。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愿意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中国在台湾问题的上述立场，和美国的遏制与反共政策、霸权政策相抵触，美国不可能接受。其间，尽管中方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协议草案，均为美方拒绝。中美会谈陷入毫无进展的僵持之中。12月12日，美国方面宣布约翰逊调任驻泰国大使，无端停止了中美会谈，使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针对中美会谈和中美关系作了一段总结性谈话。他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美苏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王炳南：《中美关系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未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莫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毛泽东对中美会谈和中美关系，抱着一种远大宽阔的胸怀。他相信，事情总是在起变化，中美关系也处在变化之中。中美之间的困难不会是永久的，终究会得到克服，中美尽快建交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条件不具备，急于求成就容易丧失原则，反而不利，时间会帮助克服困难，只要具备条件，水到渠成，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必然的事情。

1958年，台湾海峡发生第二次危机。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进行骚扰，制造紧张局势。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马祖，对叫嚷“反攻大陆”的蒋介石集团进行惩罚，调动了美国的巨大的军事力量。为了缓和中美关系，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中美之间举行谈判，解决两国争端。9月6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政府表示欢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

为了准备继续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底，毛泽东召回了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谈判代表王炳南。两天后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中美关系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听取了王炳南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报告。毛泽东对王炳南的报告表示满意，并指示拟定重新开始中美会谈的新方案。在王炳南返回华沙时，毛泽东接见了，他指出在会谈中应注意的事项。他说，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你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譬如说，你们美国是一个大国，我们中国也不小，你们何必为了仅仅不到1千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呢？你们现在的作法究竟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他指示王炳南，在会谈中要多用脑子，谦虚谨慎，说话时不要对美国人使用板门店谈判那样过分刺激的语言，不要伤害美国民族的感情。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和好。毛泽东把中美大使级会谈看做是中美双方互相了解、中美人民建立和加深友谊的机会，他的着眼点始终在中美人民。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中方谈判代表仍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谈判代表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由于美国方面始终坚持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中美大使级会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1960年9月6日，中美大使级举行了第100次会谈。《人民日报》发表了《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回顾了中国在谈判中的真诚努力，对美国在谈判中所持的没有诚意、拒绝解决问题的立场表示深深的遗憾，并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还愿意谈下去，中国方面是愿意继续同它谈的。”

此时，艾森豪威尔因大选即将来临，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他亲自到台湾访问，美国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领空领海，并把武装或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

东。为此，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对于这种反华现象，没有什么可怕。他说，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了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华，也有间隙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问题可惜，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的建设搞得越好，国家强大起来，这种较大的间隙性就会到来，这时美国就会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毛泽东要求全党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不要被暂时的反华现象迷惑，要努力做好国内的工作，创造解决中美两国关系的条件。

1961年美国新总统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华沙会谈继续进行。1961年9月，美国新任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接替比姆继续会谈。1962年，蒋介石集团借中苏不和及国内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之机，积极准备窜犯大陆，蒋介石决心很大，关键还要看美国是否支持。6月23日，王炳南向卡伯特表达了美国对台湾海峡形势的严重关注，指出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玩火，绝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表示，将把会谈情况尽快电告美国政府，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美国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它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卡伯特的态度，不是他个人的态度，而是美国政府的姿态。美国不愿意因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而承担引起世界大战的风险，破坏它的全球战略。这就再次证实毛泽东关于美国政策具有虚弱性的一面的论断。

中美会谈136次，在这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仅就侨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但是，中美会谈在两个完全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旷日持久地进行了10多年，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通过这个渠道，两国政府保持了外交联系和经常接触，交换了双方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的看法，沟通了信息渠道增进了双方人员间的友好交往，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既为中美双方互相了解提供了机会，也为中美双方进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会谈，作了一定程度的准备，提供了经验。它也为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中美大使级会谈在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中美关系的解冻，美国和中国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弗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

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关系继续萦绕在尼克松脑际。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肯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致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第90页。

转见李长久、鲁施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210页。

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

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陈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斤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同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59页。

基辛格：《白宫岁月》（节选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9页。

奢侈品了。”

尼克松积极推进对中美关系的探索。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1969年11月起，美国与中国之间就开始了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这种小步舞安排得如此微妙，以至双方总是可以说他们之间还没有任何接触；如此风度优雅，以至任何一方都无需显出主动的样子。

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个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同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同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时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心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6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正当中美关系出现转机，朝着关系改善方面发展时，出现了曲折。4月3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台湾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将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尼克松、罗杰斯和莱尔德。接着，4月28日，美国派兵入侵柬埔寨，发动了所谓“第四十二号全胜作战行动”。5月9日，在华盛顿白宫南面广场爆发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美国群众反战示威。18日，中国新华社授权发表声明，鉴于美国在4月30日悍然出兵柬埔寨，“扩大美国在南越和柬埔寨的侵略战

争,中国政府认为按原定5月20日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已不适宜。今后何时举行,将通过双方联络人员另行商定。”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对美国在印支的侵略行径进行了严厉谴责。毛泽东对尼克松和解的真实性表示了深深的怀疑。

但是,尼克松决定打中国这张牌,为他再次当选总统作铺垫。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华沙会谈的中断,给他们提供了避开国务院与北京直接联系的机会。6月,尼克松指示弗农·沃尔特斯中将与中国驻巴黎官员接触,中方没有予以答复。6月4日,美国众议院从其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国会表明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协定。这是14年来的第1次。7月10日,尼克松在回答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的问题时,公开表示,他赞成给中国以外交承认。8月26日,美国宣布取消禁止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装载非战略物资运往或运出中国的船只加油的禁令。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表示了他的强烈的访华愿望。他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我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尼克松通过与中国友好的国家,向北京传递信息。10月25日,他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时,他要求叶海亚·汗向中国政府传话,他认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合谋反对中国,并表示愿意派一位美国高级使节秘密访华。第二天,他在为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举行的宴会上谈到中国时,他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正式使用这个名称。

11月中旬,叶海亚·汗抵北京进行国事访问,随身带来了尼克松的亲笔信,信中正式提出了美国总统访华问题,并建议基辛格在此之前访问北京,他将被授权“讨论台湾问题”。叶海亚·汗受到毛泽东亲自接见。11月的晚些时候,周恩来接见了罗马尼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这位高级官员带来了尼克松托齐奥塞斯库转达的口信。

对美国一系列表示,毛泽东、周恩来给予了积极的反应。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将亲自掌握未来中美关系的进程。

10月1日,斯诺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让斯诺站在他身旁观看了浩大的群众游行。毛泽东以独特的方式向美国政府传达了接受尼克松和解的要求。尽管中国通讯社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情报机构也照例记录了这一消息,但是美国政府不理解毛泽东独特的表达问题的方式。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它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12月8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格哈·希拉利在基辛格白宫办公室向基辛格宣读了一封周恩来给尼克松的正式个人信件。周恩来在信中强调,他不但代表他自己,而且也是代表毛泽东主席说话的。信中说,中国一直愿意并且一直在设法通过和平方式谈判。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周恩来指出,中国政府曾经通过各种途径收到来自美国的许多其他的信件。但是,这是第一次由一首脑通过一个首脑给一个首脑提出建议。我们很重视来信。

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斯诺进行长时间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欢迎尼克松来，因为目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必须他解决。尼克松如果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毛泽东说，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的。毛泽东最后告诉斯诺，如果你看到他，请告诉他，我欢迎他来。

看来，中美之间的沟通，正在朝最高层直接接触的方向迅速发展。中美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已具备良好的准备。

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和慕辛格秘密访华 1971年一开始，虽然尼克松在越南战争中推行“狂人理论”使南越军队入侵老挝，这对中美会谈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中美双方都坚定不移地促使向关系正常化方向迈进。

2月25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美国将“准备与北京对话”，声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他说，在今后一年里，我要仔细研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进一步的步骤，以创造美中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机会，以及怎样消除实现这些机会的不必要的障碍。他表示，凡是我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他在美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呼。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宣布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秘书齐格勒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

毛泽东看准中美关系的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对于美国的种种表示，是作出中国式反应的时候了。

4月初，在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乒乓球队向中国队领导表示想进行访华，希望受到邀请。报告从日本名古屋送到了国家体委和外交部，并转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报告了毛泽东。

让不让美国乒乓球队来？毛泽东颇费思考。他考虑的是战略问题，而不是策略问题。是让尼克松先来中国？还是让美国乒乓球队员先来中国？是让美国官方先来，还是让美国民众先来？美国官方和美国民众都提出了这个要求，毛泽东必须作出决策。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让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毛泽东此举大处着眼、用意深刻，反映了他一贯的思路和战略。首先，毛泽东历来注重中美人民的友谊，增进和发展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他制定政策的一贯出发点，中美人民的友谊，是中美两国发展正常关系的基础，中美两国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强大动力。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反映了中国对美中友谊的一贯重视，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其次，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是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取消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禁令的一个积极响应，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迅速发展。中国政府早就主张，尽管中美两国暂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不应当妨碍两国人民的往来和交流。为此，中国政府早就对美国新闻界、知名人士和其他友好人士敞开了大门，欢迎他们到中国来访问、参观、旅行。但由于美国的禁令，使中美两国人民长期隔绝。现在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了禁令，两国人民交流有了条件，中国政府采取实际步骤，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参观

访问，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做法，有利于实际改善中美关系。最后，毛泽东决定让美国乒乓球队先来中国，也是给美国政府传递信息的有效方式，美国政府可以从这一举动，了解到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两国关系采取的积极主动的姿态。毛泽东的外交显示出稳健、沉着、从容不迫的气势。他是采用中国的表达方式，向尼克松政府表达中国政府的意愿。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两国的关系，在小球的推动下，迅速地转动起来。

4月7日，中国乒乓球队负责人宋中遇到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对美国队访华的正式邀请。尼克松获悉了美国队接到访华邀请后，立即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基辛格在会上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作了概述，但是为了向国务院封锁消息，并没有介绍两国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真正谈判的情况，尼克松立即批准乒乓球队访华。美国国务院为此发表声明，认为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发展”，并表示美国“将以欢迎的态度看待中国体育队进行任何对应性的访问。”

4月10日至16日，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周恩来在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团长斯廷霍文谈话时说：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中国的乒乓球外交使尼克松受到鼓舞，激起了他迫不及待的访华的愿望。为此，尼克松进一步加快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步伐。

4月14日，尼克松发表一项声明，决定在对华政策方面采取如下五步骤：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将放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或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

——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前往中国的港口。

——要求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4月16日，尼克松在同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成员谈话中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结束。”他再次表达自己想到中国看看的愿望，并希望他的子女有机会能尽快地到中国“看看伟大的城市和人民及那里的一切。”

中美高级领导人直接会晤商谈中美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毛泽东表示要去密西西比河河日去游泳，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北京来看看伟大的人民和城市，中美两国最高层的沟通在双方的信号中已表明水到渠成。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向美国方面发出邀请，“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尼克松得到中国政府邀请后，极为高兴。4月29日，尼克松除口头表示接受邀请外，5月17日，又请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基辛格“将被授权讨论以下问题，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创造最有益的环境、会晤的议程、访问的时间，并开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初步交换意见。”尼克松要求这一切都必须绝对保密。

中国政府原来主张基辛格公开来中国。毛泽东说：既然要来，就公开来嘛，何必藏头露尾呢！周恩来也认为，他们很难保住密，从美国原来与中共的谈判经验便可以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但美国回信坚持秘密来，我们只好说在中国境内可以保密，在中国境外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5月31日，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转告尼克松：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1971年4月29日、5月17日和22日的口信，并向毛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6月15日到20日之间。周恩来表示，尼克松有可能会见毛泽东。并强调，不言而喻，中国和美国之间首先要具体地解决美国武装部队如何具体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这个关键问题。

中国方面的复信是6月2日到达华盛顿的。周恩来的复信使尼克松再次感到欢欣鼓舞。基辛格热烈地向尼克松祝贺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接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尼克松为能会见毛泽东而无比高兴，在盖洛普的民意测验中，他的声望将重新上升，无数选民将向他欢呼。他抑制不住兴奋，马上取来陈年白兰地，破例地在晚饭后同基辛格干杯祝贺。看来，毛泽东已鼓舞起尼克松的巨大的希望和热情。

6月4日，尼克松回信表示，他十分感谢中国邀请他访华，但由于时间仓促，并且需要为基辛格失踪找到借口，建议基辛格7月9日到达北京，11日离开。基辛格将从巴基斯坦秘密搭乘波音707飞机，由伊斯兰堡直飞北京。6月11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6月底，白宫新闻秘书在新闻发布例会上宣布：基辛格奉尼克松总统命令，将前往亚洲进行一次“了解情况的访问”，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身份进行这种旅行。基辛格的访问将从7月2日开始，预定在西贡、曼谷、新德里和伊斯兰堡等地停留。他将在巴基斯坦假装得了胃病，7月9日从那里飞往北京进行两天会谈，然后赶回来飞往巴黎参加与黎德寿的秘密会谈。在这个过程中必须绕过国务卿罗杰斯。尼克松将把罗杰斯请到圣克莱门蒂去，等基辛格顺利上路后，才把此行的真实目的告诉他。

7月1日基辛格离开华盛顿，经过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到达伊斯兰堡。8日晚上，在叶海亚·汗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他按照预先安排的计划，装起肚子痛来。叶海亚·汗请他去那蒂亚加利的总统别墅里休息，以摆脱记者的追逐。9日凌晨4时半，基辛格由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等陪同，乘巴基斯坦民航707飞机直飞北京。当天12时15分到达北京南苑机场，中国官方代表叶剑英、黄华、熊向晖、韩叙等在机场迎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

年以来，第一位来自美国的官方使者。

基辛格在北京 48 个小时，先后与周恩来会谈 17 个多小时，毛泽东亲自掌握会谈情况，显示了中国对会谈的高度重视。

第一次会谈在钓鱼台 5 号楼进行。美方参加会谈的除基辛格外还有霍尔德里奇（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成员）、斯迈泽（主管印支事务官员）和洛德（基辛格的特别助理）等，中国方面参加者除周恩来总理外，还有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基辛格说，他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访华进行预备性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宣布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 2/3 的驻台美军，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基辛格后来以崇敬的心情描述了他初次接触周恩来，周恩来潇洒自如、精明强干、无懈可击的外交风度给他留下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写道：

他面容瘦削，但神采奕奕，两眼炯炯发光，让人感到他是精神贯注而又十分安详；既是小心翼翼而又泰然自若。他举止文雅庄重，他使举座侧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风度和钢铁般的自制力，宛如一根收紧着的弹簧。他表现出一种轻松随意的神情，然而细心观察，却又并非如此。他脸上常常露出笑容，还常常表现出明白语意的神情，从而清楚地表明，他不需要翻译就可以懂得英语；他思想敏锐，使人一见就能感觉到。这些特点说明，半个世纪来的风霜阅历，已将这种非常可贵的自制而沉着的品质，深刻地铭刻在他身上。

周恩来在会谈中强调，中美双方有不同的看法，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他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必须废除。

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对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指示。

当周恩来谈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一点军队时，毛泽东诙谐地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汇报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以下情况参见魏史言：《基辛格秘密访华内幕》和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

第二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会谈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就世界性的大问题和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根本态度。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周恩来指出，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领黄河以北，美国占领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感到周恩来的谈话有一股凛然正气，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可侮的。他说：请你们放心，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勾结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当晚，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在向毛泽东汇报，当说到基辛格表示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当周恩来中途赶来，向毛泽东汇报，须和基辛格发表一个公告，他谈到公报草案时，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经过中美双方讨论，中方提出一个公报稿，翌日毛泽东看了公报稿后很满意。他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象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不等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基辛格对公报稿感到满意，认为这一稿设身处地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他要求在接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

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公布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的发表，正如毛泽东预言，震撼了世界。

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中，毛泽东对尼克松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们谈哲学问题。7月15日，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宣读了基辛格访华时达成的公报。尼克松以庄重和颇为自得的口气说：“正如我在过去三年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七亿五千万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稳定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之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他满怀自信地说：“我将进行一次我深深希望成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不仅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且谋求我们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的将来世世代代的和平。”

7月3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赞扬美国总统由于决定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从而在促进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和平方面采取的主动行动。

尼克松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访华日子的到来。8月4日，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他即将访华的意义时说：“这是从来没有任何联系的对抗时代走向进行讨论和谈判的时代。这并不是说，我们双方中任何一方在举行这些会谈时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分歧存有任何幻想，我们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他又说：“当我们看着本世纪剩下的时间里和下一世纪的世界和平问题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进行联系，并进行某种谈判，否则是不可能全世界人民能够依靠、同他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世界和平的。”尼克松再一次承认了一个不容抹煞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今世界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他要抓住机会、创造历史，在中国问题上走一步活棋。

中美双方为尼克松的访华作出积极准备。根据双方的议定，有关事项的协商，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由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为美方代表，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为中方代表，渠道往来的口信都将绕过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双方通过巴黎秘密渠道进行了频繁接触，到1972年3月，共接触45次。基辛格1971年来黄大使官邸三次，1972年来过一次，陪同基辛格来的有温斯顿·洛德，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

基辛格第一次来访，他向黄镇表示，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黄镇大使赞赏这种态度，他指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关于基辛格中期访华问题，黄镇向美国传递中国的口信：同意基辛格1971年10月下半月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有关政治会谈；周总理将亲自同基辛格会谈。双方商定自10月20日起访问四天。关于基辛格访华预报，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10月5日发表预告。美方倾向于前者。中国获悉，9月联合国开会时美国将提出一项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为避免不利于我国的舆论，中国主张10月5日发表预告。同时中方认为，尼克松访华应主要集中于重大问题，枝节问题留在以后再谈。

10月22日，基辛格到达中国。尼克松授权基辛格代表他来谈判他访华的公报。基辛格带来的公报是经尼克松批准的。公报用空洞的陈词滥调掩盖两国的分歧，用模糊不清的词语强调了两国的共同点，表面上搞得很热烈，实际不能解决问题。10月24日，周恩来向基辛格指出，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周恩来指出，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否则，措词就会具有一种“不真实的外貌”。

周恩来向美方提出中方的公报草案，它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准确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和中美分歧，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寸步不让。基辛格和他的助手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是世界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但是冷静思索之后，基辛格不得不承认，公开表明分歧，表明了双方的真诚，公报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双方的盟国和朋友也能放心。它们的利益得到了维护。如果双方能形成一些共同的立场，那么，这些立场将显得双方坚持原则的领导人真正的信念。这是解决中美难题的妙法，是中方方案的高超之处。基辛格不能不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坚定原则性和不可企及的外交艺术水平所

折服。他发现，中国在原则立场上从来坚定不移，不存在讨价还价，但在非原则非根本问题上，中国乐意照顾对方，对于对方合理建议，中方总是高兴接受。基辛格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巨人的胸怀和宏大的眼光。

就在基辛格即将离华前夕，传来联合国对恢复中国席位问题进行表决的结果，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联合国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驱逐出去。周恩来耽心基辛格知道了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在他离华前一直没有告诉他。

关于尼克松访华的先遣组，即使经过压缩以后，人数还是庞大得可以。基辛格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中国过去虽多次受到野蛮部族入侵而没有被征服，但却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先遣组。在基辛格看来，甚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他们也没有遇到过一个总统的先遣组，特别是由尼克松的白宫政府中疯狂地热衷于公共关系的人员训练出来的先遣组。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犹如对待入侵者中国自有办法一样，对待尼克松的先遣组，周恩来也自有他的办法。

1972 年 1 月 3 日，由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领的 18 人的先遣组到达北京。他们前来安排尼克松总统有关礼宾、安全、接待、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具体问题。

关于安全，保安小组的头头出了一个洋相，他们要求中方为可能访问的地方，开出一分捣乱分子的名单，基辛格为他们的洋相大为恼火。他写道，这个要求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中国，保守的共和党人毫无疑问会被中国人列为捣乱分子，而如果我们问中国有多少共产党的同情者，我们会得到令人不安的答复：八亿。

关于卫星转播，周总理指示，请美方帮助租用一个卫星，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并向使用者收取费用；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美国方面对周恩来处理问题的巧妙方式感到无比惊讶，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他表现了高度的警觉性和高超的艺术水平。

当黑格一行完成打前站的任务返回美国时，毛泽东亲自指示给美国客人每人送一盒十斤重的水果糖，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先遣组成员一人抱着一个大糖盒笑咪咪走上飞机，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对待第一个来中国的总统先遣组的绝妙办法。

尼克松访华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迫。他阅读了有关中国的大量资料，并约见了曾会见过毛泽东的法国大作家马尔罗，听他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他力图准备好一些，以便把去中国的心理负担尽量减轻一些。

1972 年 2 月 17 日，尼克松在白宫草坪举行了访华的简短仪式。他说：“这将是一项谋求和平的旅行。当然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将到那里进行的一周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人。”

接着，尼克松乘上直升飞机到安德鲁机场，换乘总统座机，开始了他盼望已久的中国之行。尼克松及其夫人率领 15 名正式随员和 300 多名美国人的大队人马，飞跨太平洋，于 21 日上午 9 点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在上海机场

逗留一小时，继续起飞，于上午 11 时 30 分在北京降落。

当尼克松和夫人下到舷梯的一半时，站在舷梯下的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也按中国习惯鼓掌相报。尼克松心情激动，他认为应当主动弥补 1954 年在日内瓦会议上规定美国人不许与中国人握手的过失，当他走完舷梯最后一级时，他远远地、主动地将手伸向周恩来。尼克松写道，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我被介绍给所有的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尼克松下榻二个小时后，毛泽东立即和尼克松举行了历史性的会见。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去中国，最为耽心的是毛泽东的会见。因为事先并未说定毛泽东一定要会见他。尼克松记叙道：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到尼克松时，尼克松的顾虑打消了，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

尼克松、基辛格乘车去毛泽东的住所。他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毛泽东的坐椅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毛泽东站起来，他以特有的斜视的眼光向尼克松表示欢迎，并和尼克松握手，他们两手相握大约一分钟左右。世界上长期隔绝的两个大国领导人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尼克松为这动人的时刻大为激动。

毛泽东虽然有病，谈话吃力，但他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深刻而非凡的印象。基辛格写道：

就一个中国人来说，毛泽东的身材算得上是高大魁梧的。他凝视着客人，脸上露出一副洞悉一切而又带点嘲讽意味的微笑，神态之间似乎发出警告，他是熟谙人性弱点和奸诈的行家，如想欺骗他，那未免是徒劳了。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散发出粗犷的而凝聚的意志力，可能夏尔·戴高乐是个例外。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有一位女服务员在旁搀扶着他。他主宰着整个房间的场面——大多数国家都是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使领导人增添一定的威严，但他不是这样，而是靠他那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来胜过对方。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与基辛格有所不同。如果基辛格从学者的角度，突出地感到毛泽东超凡的智慧、钢铁般的意志，作为精神领袖身上散发出的是压倒一切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的话，尼克松突出的感受到的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性的伟大人物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宏大的气魄和控制历史进程的不可置疑的自信力。尼克松是这样描写他和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的：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他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象腊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象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了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看表，因

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眼里，毛有一种谈吐随便而深奥的风度，这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他是一个胸中同时盘算着各种思想的人。他提出他的观点，声调安详平板。他是直爽的、质朴的、有棱角的，洋溢着一种天生的吸引力。

显然，他有着一种天生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仍然象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正在进行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尼克松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主席叫他什么？”

当尼克松提出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泽东和周恩来说到蒋介石时，如此轻松、幽默，略有一点嘲讽的味道。他们把和蒋介石的斗争不当一回事，显示了他们应对裕如、思虑广阔高远、视野远远超过这类在外国人看来应当是最重大的问题之外的更远的地方，这使尼克松不能不感到毛泽东气魄宏大、眼光深邃。

但是，毛泽东的特有幽默和无所不知，又使客人感到轻松。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象一个特工人员。”尼克松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在巴黎吗？”毛装着不相信的样子。

“凡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尼克松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罗？”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尼克松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客人们哈哈大笑。

谈到美国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说，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尼克松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尼克松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

到，至少目前是如此。”尼克松说。

毛说他投了尼克松一票，他说他喜欢右派，其实有深刻的寓意，显示了毛泽东看问题的辩证观点。资产阶级的右派当权，往往直截了当地、毫无掩饰地在他们的政策中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对外政策的反共色彩鲜明。毛泽东认为右派当权，更能暴露资产阶级政府的实质，比所谓左派羞羞答答来得直截了当，容易使人看得穿，更能教育人、提高人。他们的功利主义来得更加鲜明，只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就能去实行。正如尼克松所说，“美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这样，他们反而能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采取行动。毛泽东欣赏这种做法，共产主义者也是如此，共产主义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放弃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全力以赴地努力。大家都为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声称他喜欢右派。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转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和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象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 8 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当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评论了尼克松在飞机上对乔冠华说的一句话，即他认为毛泽东是可以同他谈哲学的人。毛泽东略带嘲讽地说，哲学可是个难题，对于这个题目他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说，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以后，毛泽东真的谈起哲学，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国际问题讨论时，毛泽东客气而又坚定地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他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谈的。

尼克松要和毛泽东讨论哲学，他在毛泽东这个世界性的大哲学家面前，应该说是他选择了一个艰难的题目。毛泽东对东西哲学的精通程度，即使是大政治家也不是每一个都可以与之匹敌的。毛泽东对美国杜威、詹姆士的哲学如此熟悉，并作过深入研究，甚至亲耳聆听过杜威、罗素这些大哲学家的讲演，因此，即使和尼克松讨论美国的国家哲学实用主义，也绝不会败在尼克松手下。至于说到欧洲哲学和中国哲学，尼克松便很难与毛泽东匹敌了。好在他们的会见只有一个小时，否则如果真正进行一场哲学讨论，其结果如何，便可想而知！

在会谈结束时，尼克松说：“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尼克松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

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象放空炮！”周哈哈大笑，尼克松觉得自己免不了又要听一番贬低自己的空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象我这种人”，尼克松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身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們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客人告辞的时候，毛对尼克松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一个小时的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身体很差，正在病中。但他清晰地记得尼克松已抵达北京，他躺在病榻上不时地问尼克松专机抵达时间以及到京后的情况，工作人员把了解的新情况及时报告了他。毛泽东在尼克松到达北京后4个小时内，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病弱的身体，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尼克松。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把毛泽东1944年想和周恩来一起去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的愿望来了一个颠倒。28年后，美国总统亲自到中国来会见了他和周恩来。历史从它的起点出发，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起点。不过已经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终于实现了闭路沟通。

22日的美国《纽约时报》，以《出乎意外的会见和周总理的方案》为题及时报道了这次历史性会见：如果说尼克松还因为北京机场没有出现盛大的欢迎场面而感到有些惆怅和不快的话，那么当主人改变了日程，让尼克松总统享受在接受的时候就去毛主席的寓所进行会见这种殊荣，他原先无论怎么不高兴，这种情绪很快就过去了。事后宣布说，这次会见从下午3：00——4：00，持续了一个小时。照共产党人的说法，宾主进行了“认真和坦率的讨论”，这意味着他们不只礼节性的交谈，而且还表明会谈中不时出现不一致的见解。白宫除了重复主人的说法之外，拒绝对会谈的气氛作更多的解释，也不说毛先生的寓所在什么地方。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见，使尼克松对中国为期一周的访问很快进入了高潮，在周恩来为客人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毛和尼克松会见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记者们纷纷猜测，尽量打听，总想了解更多情况。

在宾主吃过一道三鲜鱼翅的菜之后，周恩来总理站起来致欢迎词。他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宣布，他“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他热情地“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他称赞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

的人民”，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邀请，前来中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接触、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周恩来的讲话，简捷凝炼地概括了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意义。的确，尼克松访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历史上他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总统；而且，他也是第一位为谋求中美平等关系而来，而不是为了谋求殖民利益而来的美国最高领导人。这本身就表明世界处在天翻地覆之中，昨天的中国已经不能与今天的中国同日而语了。

吃过油闷大虾之后，尼克松致答词，他称赞受到的款待无可比拟，赞美这次盛大的晚宴以及人民解放军乐队演奏的美国音乐，说是在外国听到奏得最为动听的美国音乐。

尼克松声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能改变世界。他说，我们正在设法搭起一座桥，以便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他肯定中美两国过去曾经敌对，今天还有分歧、但此时的“共同利益”是超过一切的东西。“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统治对方。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伸出手去统治世界。”尼克松引用毛泽东的词：“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请求：“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权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或统治。”尼克松的答词受到热烈欢迎。

就在尼克松总统启程前往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两天，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中美人民的友谊的使者埃德加·斯诺在日内瓦湖畔寓所去世。毛泽东、周恩来对他们的美国朋友表示了深深的哀悼之情，毛泽东在唁电中指出：“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周恩来盛赞斯诺的一生，是中美两国人民诚挚友谊的见证。他第一个冲破重重障碍，热情地把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介绍给美国 and 各国人民，在我国解放后，他又多次来访，报道了毛主席领导下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进程，他在病重期间，仍然念念不忘为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而工作。周恩来深情地说：“对这样一位老朋友，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尼克松访华顺利结束了，中美公报发表了，中美关系长期冻结的坚冰打破了。中美两国人民为谱写中美关系新的友好篇章而盛情赞美。美国报纸对尼克松访华中的种种插曲，充满了美好的感情。当周恩来在钓鱼台回访尼克松时，尼克松满面笑容，主动伸手为周恩来脱掉呢大衣，美国电视观众为尼克松的热情友好举动表示赞赏，好些报纸刊登了这幅脱大衣的照片。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了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从争取选民的角度来说，一幅电视画面顶得上一万个字。”

当尼克松从亚洲腹地访问英勇归来时，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机场热烈欢迎他，他成为一个凯旋而归的英雄。尼克松自己也认为，对中国的访问，实

在不虚此行，其收获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形成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写道：

我们发现中国人看起来比较容易相处，原因之一是他们一点也不骄傲自负。他们和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周不断地提到他们需要了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我就不禁想到赫鲁晓夫怎样吹牛皮说大话，和他相比中国人的态度要健康得多。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态度，他们有意作出决定要这样来看待自己，事实上他们绝对相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极端优越，认为总有一天要胜过我们和其他所有人的文化和哲学。

然而，我发现自己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

尼克松的访华的确说明，世界正在改变着，这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潮流。

尼克松的访华，使那些二次大战的中国通们不禁感慨万千。巴巴拉·塔奇曼说：在二次大战期间，从中国写情况报告的那些人现在看到一位美国总统，竟路途迢迢地前往中国，谁能不意识到强烈的讽刺意味，以致哑然失笑呢？谁要是记得往日的态度，而现在又看到尼克松总统和毛主席在照片上双双并排地坐在一对沙发上，怎能不由衷地意识到事实确实比虚构更加不可思议吗？

一年以后，5月30日，在美国国务院8楼庄严的富兰克林大厅里，有250人应美国外交协会的邀请，举行了集会，这是一个为四十年代的中国通们举行的集会，由于希望参加的人很多，大厅容纳不下他们，不得不在大楼的其他地方，通过闭路电视向600名观众转播。外交协会理事会主席哈罗普在措词不同寻常的请柬中，对受邀的客人说：总统的北京之行和开辟的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使人们注意到1942年到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驻外处的内行们所写的许多报告的预见性。

历史学家赞扬在那个动乱时期，驻在重庆使馆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交官们所具有的洞察力和直截了当。然而，他们所报告的事不为国内所欢迎，许多这样的外交官在国内遭到粗暴的批评，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

美国外交协会将于1973年5月30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8楼举行午餐会，宴请40年代初期在中国由于如实报告情况，而表现出他的职业尊严和诚实正直的外交官……。

午餐会开得隆重而热烈，谢伟思受到大家起立欢呼。这样的欢呼声是意味深长的。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毛泽东为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不懈努力，他给美国客人留下了最后的难忘的印象。尼克松访华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正如预言那样，毛泽东把中美关系奠定在崭新的基础上，中美必须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毛泽东虽然已经步入了他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但是这件大事不解决，他是放不下心的，他必须把这个大事业推进到底。他继续拖着病体接见美国客人，给他们留下了最后的难忘的印象。

1973年2月13日至19日，11月10日至14日，1975年7月19日至23日以及10月下旬，基辛格多次来华访问。这几次访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处在相当恶化的状态，但是，为了推进中美关系朝着最后实现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毛泽东每次都抱病接见他，和他进行了广泛的谈话。

基辛格对毛泽东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感到毛泽东的人格伟大和极具感染力。他在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追忆说：

在会见一位出名而掌握大权的领袖人物时，人们往往分辨不出在多大程度上倾倒于他的人格，又在多大程度上敬畏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会见毛泽东的情况却是不容置疑的。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有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基辛格在每一次会见毛泽东时，都深切地感到犹如处在一种力场之中，不能不受到巨大的震颤，受到巨大力量的作用，毛泽东的语言总是充满力度和深度的。即使他几乎不能讲话了，在死亡的阴影下，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而带嘲讽的。

基辛格感到，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他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毛泽东也不象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他在开玩笑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进几句时而寓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总的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以致意思是表达出来了，同时规避了义务。他有时也下几句断语，这种断语使听者猝不及防，造成一种令人迷惑并略带威胁的气氛。这种情况竟象是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一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也会无情地揭露一个问题的核心。当他对邓小平说，中美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时，第二天，毛泽东便有力地批驳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们和你们的总统？”

1973年2月17日已是晚上11时，毛泽东在他的住所会见了基辛格。基辛格明确地感到毛泽东希望在他有生之年把中美关系解决好。

基辛格认为，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中美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基辛格问候毛时，毛说：我看来还不错吧，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来了。基辛格深思其语，既感到吃惊，又感到寓意深刻。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基辛格觉得，这话也并不突兀，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基辛格记下了毛泽东关于中美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的基本看法：

——毛泽东强调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已建立起来。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任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泽东幽默地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

——毛泽东要求中美双方都不要采取一种近视的政策，要从大处着眼处理中美关系。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

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

——毛泽东主张处理中美国家间关系时，要超越意识形态，按和平共处的原则行事。他强调，意识形态的分歧并不妨碍国家间应有正常的关系。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 1972 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

——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前进的症结。美国如果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基辛格认为，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种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

——毛泽东表示，中国将实行开放政策，必须向外国学习，当然也包括向美国学习。基辛格认为，现代化已是毛感到紧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他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性意义所在。他要求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基辛格发现，毛泽东提出的解决中美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阐述了中国的原则立场，实际上成为中国政府后来解决中美关系遵循的一贯方针。

基辛格还发现，毛泽东对美国内的问题，欧洲、世界各地的问题了如指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年迈的领导人对于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如此熟悉，以至不用任何提纲就能以无可抗拒的力量推演出结论。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去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一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同时又使谈话者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毛泽东的谈话就象紫禁城里的庭院一样，每个庭院都引向一个更深的庭院，庭院之间只有面积上微小的区别，而最终的意义寓于整体之中，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才能抓得住。

1975 年 10 月 21 日，当基辛格再次来华访问，为美国新任总统福特访华作准备时，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后任美国总统的布什也有机会会见了毛泽东。布什对这一次访问也形成了深刻印象。

他和基辛格在毛泽东的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当时已经 81 岁的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两名女服务员扶他站了起来。这是布什到中国以来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远远看上去，客人们对他的身体状况很吃惊。毛主席迎接基辛格时只在喉咙里出了一点声音。

毛泽东泰然自若地对客人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

毛泽东和基辛格、布什讨论了国际形势，讨论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给客

人的印象是，他并不着急，他说这个问题到时候就解决了，大概需要“一百年”甚至“几百年”。客人们感到，毛泽东是要外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他们把时间和他们的耐心作为对付性急的西方人的武器。

12月1日——5日，美国新任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毛泽东会见了福特，布什第二次见到了毛泽东。

12月29日，前任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到中国访问。31日，毛泽东会见了他们。在除夕的钟声敲响十二下，在紫禁城的深处，在毛泽东的书房里，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神明般的人物，而是一位态度安祥而健谈的老人。这位82岁高龄的老人，在两位年轻的美国客人眼中留下的印象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巨人。美国人谈到他时，绝对把他看成一个巨人。砸碎一个世界的人就可以称为巨人。他砸碎了，而且相当彻底。可现在，巨人垂垂老矣，连头发都要别人替他抚平。

——他面孔的上半部是智慧的。前额宽阔而平坦，夸张地说，不仅能跑马、能跑汽车呢，耳朵很大，紧贴在头上，耳垂薄薄的，这种形态本身对那些想朝里面灌谎话的人的就是莫大的威胁。眼睛里有火。

——他对尼克松表示问候，他的话里含着温情，并表示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他并不在乎什么水门丑闻，他认为西方政治充满虚假味。

——他是两位年轻美国客人在中国遇到的第一位不伪称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完美社会的人。尽管这位主席经过82年的艰苦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他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巨大的动乱和变化、死亡和天翻地覆。但是，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的力量的突出证明。

“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这就是两位年轻美国客人最后的结论。

1976年2月23日，尼克松夫妇应中国政府邀请再次来华访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但是，他的思想依旧是敏捷和清晰的。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时刻会见尼克松，尼克松的最后印象是：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他感到毛泽东始终不渝地在为他们的利益和理想而为之战斗和牺牲。他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他的意志力产生了他超凡的魅力。他对斗争有一种特殊的爱好。他以他的品质鼓舞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任务，这使他因而也使他们成了似乎不可战胜的人。他有一种轻松的不可抑制的幽默感，又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品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如果没有毛，就会缺乏神秘性。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尼克松深切地感到，毛还在奋进，在追求，他谈到他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感到他明白自己快要与世长辞了。

尼克松是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位美国客人，一位美国前总统。是他、周恩来和尼克松打破了中美关系的坚冰。毛泽东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但他没有等到中美关系邦交正常化这一天的最终到来。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他带着许多放心不下的事，带着许多遗憾离世而去。

但是，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特别是

在他晚年时光中奠定的中美人民友谊的丰碑。

大洋彼岸，9月9日，美国总统福特就毛泽东逝世发表声明：

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其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她本国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同美同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更为积极的时代。毛主席帮助创造的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趋势，将会继续对世界和平和稳定作出贡献。

同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毛泽东逝世发表声明：

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八十二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一九七二年在北京会见时，我们两个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都认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我们两国的利益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

他不仅对他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也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给我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我最后一次会见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他笑慰于九泉！

第七章 美国人眼中的毛泽东

在毛泽东漫长的生涯中，他和美国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不仅仅以其杰出的政治活动，影响和改变了中美之间的关系，而且以他的人格，他的多方面的思想，引起了美国官方和美国的研究者及美国人民的广泛注意。美国的研究者对毛泽东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和评论，讨论了他的思想和政策的多方面的影响。所有这些表明，毛泽东在美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论，构成了毛泽东与美国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美国人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个性特征的评价

毛泽东作为历史的巨人，他还没有远逝在地平线上 1976年，毛泽东去世了。中国和世界都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在美国，人们对毛泽东褒贬不一。有的人断言“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有的人却断言，对于毛泽东这样重大的人物，历史还没有作出它的裁决，也还不可能作出它的裁决，毛泽东虽然已不象60年代那样在中国和世界以高大威严的形象耸立在人们眼前，但直到今天，他却还没有远逝在地平线上，因此要对毛泽东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为时过早。美国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的著名学者S·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确实伟大，但又很复杂，他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但他的后半生，特别是最后二十年左右，很复杂，这个问题现在不容易一下子谈清楚。施拉姆的看法，代表了美国慎重的学者们的意见。

施拉姆还认为，对于毛泽东的研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第一，中国现在大量地发表了关于毛泽东的原始材料，这使美国和西方学者能够系统地提出对毛的评价的资料基础大大地扩大了；第二，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分析和其思想的论述，其范围大大扩展，中国人发表的文章，对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领导下出现的事实和毛泽东所制定的政策进行再思考，这些再思考为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第三，西方学者包括美国学者，已不再把眼光仅仅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了，他们有可能对毛一生的意义进行思考，而不是把某一段时期或某一个事件看做是毛的模式范例或毛的经验总结了。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施拉姆认为，对于毛泽东，美国学者还不能轻率地下结论，对毛泽东的一生作出历史的公正的客观的评价，这一切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但是，不管怎样，无论是美国官方，还是美国学者和美国人民，他们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人物”、一个“巨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和对世界的影响不容忽视。

美国政府中的官方人物是肯定毛泽东的。如前所述，罗斯福对毛泽东很感兴趣，他从《红星照耀的中国》一书中，熟知毛泽东早期的历史，他重视毛泽东传奇的经历，重视他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准备和他领导的共产党政府打交道。美国总统尼克松和福特，万里迢迢到中国来会见这位住在紫禁城中的中国老人。尼克松由衷地赞美毛泽东是勇气非凡和思想坚定的人，

参见〔美〕S·施拉姆：《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日本学者眼中的毛泽东思想》，1988年，第192—193页。

他高瞻远瞩，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他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福特肯定毛泽东是现代史上中国的“一位巨人”，他深刻地影响了本国的发展，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诚如特里尔指出，事情是这样的奇怪，五、六十年代诋毁毛的政府越厉害的，1976年对他的颂辞也越多。

不难看出，只要超越意识形态，尊重历史和现实，美国政府的官方代表，也能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出公允的看法和评价。历史毕竟是事实。毛泽东这位新中国之父，在中国悠悠数千年历史中，在中国最困难、危机最深重的时期，能够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结束一个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受人蹂躏的旧中国，缔造了一个统一的、在世界上占据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的新中国，这样的事实，谁又能否定得了呢？！这样的人物，又怎能说他不伟大呢！

在美国的历史上，华盛顿、林肯是美国人民公认的伟人。没有华盛顿、没有林肯，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华盛顿和林肯是开创基业的伟人，美国人把他们看作“美国之父”。奇怪的是，美国许多作家、记者、访问者，他们在接触毛泽东之后发现这位中国的革命领袖，竟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相同的思想、相同的气质，甚至相同的行为、外貌。许多美国人肯定毛泽东就象华盛顿和林肯。斯诺如是说，索尔伯兹如是说，海伦翁如是说，卡尔逊如是说，白修德如是说，他们似乎在中国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事实，毛泽东并不是华盛顿，也不是林肯。他们的时代相去甚远，他们的思想也相去甚远。但是，他确实和华盛顿和林肯有相似之处。正如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的那样，他们也和华盛顿、林肯一样，都是从事伟大而正义的事业。所不同的是，华盛顿把美国人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是把亿万中国人民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残暴的地主政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这种相同之处，使他们显示出他们具有的共同之处：目光远大、宏伟的气魄和恢宏的气度。难怪美国人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华盛顿和林肯的形象。

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对于世界历史发生持久的、深刻的影响的人物，不是以武力实现统治的人物，而是用思想和真理改变人民头脑的人物。在这种意义上，思想的作用比武力的作用强大，武力是征服不了思想的。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就是如此。在美国人看来，蒋介石的政权是没有思想动力的，它甚至“与任何乌托邦思想体系从未有过什么联系”、“甚至也从未与任何严肃的社会变革纲领有过什么联系”，他只凭借武力和专制，因而注定了他的失败。1946年，史迪威回顾他在中国的历史时说，蒋介石这个人想要用武力同一种思想斗争，他不懂得那种思想，他也不懂得武力，他用武力与思想作斗争，难道能成功吗？史对蒋抱着极大的轻蔑，他认为，如果及时地把蒋介石从中国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对中国、对美国 and 全世界都要有益得多。

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理论，看作二十世纪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另一些学者把毛泽东作为用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人物，列入了他们推选的世界人类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页。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53页。

历史 100 位名人之中。美国数学家麦克·哈克在和各类专家们广泛交流意见的基础上，参阅了权威性资料，列出人类历史上 100 位名人，他把毛泽东排在第 20 位的名次上。看看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有趣的。他概述了毛泽东的历史，特别对毛泽东后半生的历史功过作了概述。他写道：

“毛泽东接管政府时，历经 36 年之久的内战的中国，满目疮痍，贫困落后，大多数国民是文盲。当时毛泽东已 56 岁，担心在克服内战留下的困难中遭到失败，但他以非凡的耐力和决心，努力发展国家工业，极度重视教育事业，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终于成功地战胜了那些困难。对于落后的中国来说，这些变化自然是不够的，共产党政府所进行的第二项工作就是从经济上把国家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化为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方面，毛泽东建立了严格的专政制度。毛泽东发动了社会革命，力求将个人对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效力；这个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人以忠于家庭而闻名。此外，他还掀起大规模的批判孔子学说的运动。这个运动取得了可观的成功。

1949 年—1976 年，毛泽东是中国的第一号人物。1958 年的“大跃进”是他的计划之一，许多观察家认为，那次旨在强化农村生产手段的计划是失败的（无论如何已被废除了）。他的第二项计划是‘文化大革命’，始于 1966 年，那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的一场内战。

有趣的是毛泽东搞‘大跃进’时年已半百开外，进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年逾古稀，而他与美国开始接近时，年已八旬。”

麦克·哈克不仅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肯定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肯定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价值观，力求将过去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效忠转向为国家的效力。他要求人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超脱个人的立场和视野，把个人融于国家、人类的发展过程之中。因此，即使到了晚年，他还是致力于一系列巨大的事业，这些事业有得有失、有对有错，但留下的影响却是巨大的。这位美国的数学家对毛泽东的变革精神、进取精神和巨大的魄力赞叹不已。在中国现代伟人中，哈克的排名甚至没有考虑孙中山，而把由古代中国的秦始皇到现代的毛泽东突兀巍然地立于中国历史之上。

美国《大百科全书》第 18 卷，由唐纳德·W·克雷思撰写的《毛泽东》的词条，详细地叙述和评价了毛泽东一生。词条在概括毛泽东一生时写道：

“毛泽东（1893—1976 年）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 27 年的领袖。他并列于斯大林、罗斯福、列宁、希特勒和邱吉尔，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巨人之一。他使中国成为不再被否认的强国，1971 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受尊重的中国，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标志。在亚洲，毛是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把焦点从都市的无产者身上转移到了农民身上，原因是这些农民决定着亚洲的社会及其政治。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在以农业为主的第三世界他赢得敬佩的原因。在外交事务上，毛从靠近苏联的军事联盟转向提倡‘民族解放战争’，而且最终转向同美国建立邦交。”

W·克雷思高度肯定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的地位，承认他是影响 20 世纪的“政治巨人”之一，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

〔美〕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年，第 65—66 页。

一个为联合国尊重的中国。W·克雷思力图从毛泽东的战略上去描述毛泽东的影响，他创造了中国革命道路；他坚持独立地决定国家事务，摆脱对苏联的依靠；他支持民族解放战争；他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和霸权政策；他超越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和美国建立了正常的国家关系。所有这些，奠定了毛泽东作为 20 世纪有影响的“政治巨人”的地位，塑造了他历久不衰的形象。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可抹煞的。他由衷地写道：“确信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在于他是作为革命运动缔造者的角度。他论述游击战的著作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任何一个把他当成一位国家领袖的评价，他得首先从他在 1949 年接管一个贫穷、瘫痪、战乱的民族这一事实开始。在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他把中国塑造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之一。尽管人平均主要收入没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同过去相比，这也是一个可观的贡献。”

美国是目睹近代中国沦落的国家，也是亲自参加制造使中国沦落的历史过程的国家之一。在历史上，美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们在谈到中国时，他们使用的那种轻蔑的、贱视的、不屑一顾的语言比比皆是。他们把中国看做是“东亚病夫”，看做是一个下贱民族的国家。曾几何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努力，以扭转乾坤的力量改变了中国。这使公正、客观的美国人对中国重新刮目相看，W·克雷思的这段简单的文字，表示了历史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W·克雷思肯定，毛泽东是“古典伟大首领式的大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最大的成就表现在他改变了中国几亿人在近代形成的屈辱自贱的心理，重新赋予了中国人巨大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他也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这不能不使世界注目。W·克雷思指出：“毛最伟大的成就可能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他改变了中国市民所抱有的对他们自己的想象和对他们国家的想象：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而且，相类似地他把可怜的、轻视等这些外国人常常对中国的感觉转变为尊敬的、畏惧的，或二者皆有之的看法。”

W·克雷思认为，毛泽东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心”，对经济、技术的管理不在行，他“显然没有清楚地理解管理事务”。但是，“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周恩来，一位高水平的管理者，”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毛得力于当代最伟大的外交总理之一——周恩来的帮助。”

W·克雷思对毛泽东的评价虽然具有明显的西方看问题的惯常观点，但作为百科全书的词条，它保持了一定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如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业绩和他的过失，其影响是不小的。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纳森·斯潘塞强调：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既是高度开放的，又是高度独立自主的。旧中国的不独立和四分五裂造成的巨大灾害，深深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他的奋斗目标。对于任何外来力量涉及中国独立和统一的任何意图，毛泽东都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和反对。“毛泽东为建立强大的、统一的中国，奋战了 20 余年。现在，国家终于实现了统一，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国家，在苏联的影响下再度缓慢倾斜。他不愿意让共产党在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初期，费尽千辛万苦所激发

起来的革命热情，被丢弃。”

斯潘塞认为，即使是来自盟友苏联方面的任何造成中国对他人依赖的企图，毛泽东都会强烈地反对，甚至不惜与之决裂。毛泽东保持了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他吸取一切外国的先进技术，但是，他巧妙地拒绝了它们企图要强加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乔纳森·斯潘塞写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中国在过去奉行的孤立政策，并影响这个国家的接受能力。西方顾问所带人的每一项技术，最终都为所吸收。日心说、历年说、外科学、经济计划学、工程学、现代大学、长距离通讯、机械化战争说、核物理说，无一不被中国消化。西方人将技术援助，作为意识形态输入的外包装，企图迫使中国一口吞下。中国拒绝的正是这一点，就在它的国力最衰微的时候，中国人也意识到，以外国的条件接受外国的意识形态，只能是一种屈服。”

斯潘塞强调，中国文化的这种二重性特征，在毛泽东身上最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是中国能够改变和中国不能改变的原因。中国接受和消化了世界文明中的一切普遍成就，使它和世界先进文明看齐，它又拒绝了一切外来强加的意识形态，保持了它的民族性的特征，避免了文化同化。斯潘塞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毛泽东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1958年，他对赫鲁晓夫断然指出，中国不会放弃独立，也不可能被任何强加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同化。他说：“英国、日本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的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在美国学者看来，毛泽东的伟大正在于他改变了中国，但他又有效地防止了西方侵略者改变中国。

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施拉姆教授，高度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对他的历史功过做了严肃的分析。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不朽的造反者”，“毛泽东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毛泽东将彻底改造中国社会作为自己的目标，旨在将中国人民的力量解放出来。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但事实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领导能力的影响仍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以致有充足的理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毛泽东的中国’。”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他赋予了民众“由他这一代人来掌握中国命运的使命感”，“毛泽东极其坚定地相信自己与中国及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以终生的奋斗，“恢复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在1949年9月说，‘我们站起来了’。这句话是不会被人忘却的。”施拉姆肯定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之父，他和其他美国学者一样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把他毕生的精力和一切献给了中国，他怀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在奋斗。施拉姆写道：“毋庸置疑，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他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繁荣昌盛，要在世界上恢复她的地位。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毛在世时民族革命已经完成，最后的一幕是美国总统在紫禁城里访问中国的统治者。中国与其他大国真正平等，还有一段漫

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86页。

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第292页。

见《赫鲁晓夫1958年秘密访问北京情况》。

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6年，第2页。

长的路程。但是毛认为中国应该做到这一点，并且应以中国自己的方式做到这点的决心，仍然受到大家的尊重。”

施拉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最持久、最普遍、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理解毛泽东思想是理解毛泽东的关键。“毛泽东的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反过来，这个观点又意味着，如果不概括一生，你就不可能概括他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贯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但又具有持续性。他的思想来源于历史，也决定着历史的进程。现代中国历史离开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思议的。

施拉姆把毛泽东的思想分为六个阶段来描述。

1917—1927年是第一阶段，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毛的“革命的学徒时期”，后来改称为“性格形成时期”。这个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由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到列宁主义，并从城市中心论转到农村中心论，这种思想在1925年至1927年，他在农民协会工作期间达到了高潮。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自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在20年代没有“革命大师”可供毛泽东拜师搞革命。从孙中山到李大钊、陈独秀，同毛泽东的年龄经历相比，他们都是年长资深的革命领导人，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样才能使革命在中国这个国家取得成功，而斯大林也不是一个可信赖的领导人，因此许多重要方面只能由毛泽东自学而得到。很显然，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养成了独立思考、力求探索、不断提出独立见解的品质。施拉姆认为，到了这个时期的晚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事变中，虽然还不是主角，但却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了。

1927年—1936年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有了巨大变化。由于军事斗争始终是革命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逐渐形成，同群众路线相一致的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现。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个阶段，称之为“锻造武器”的时期。

1936—1947年，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完成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总结了中国的革命经验；斯诺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使他一步登上了国际舞台；他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加以贯彻和实现；在“七大”上他的思想成为全党工作的指南；之后，在马歇尔的调解失败后，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彻底推进国内战争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施拉姆把毛泽东的这一阶段，称之为“确定和实行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

1947—1957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在指挥国内战争最后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要求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和重工业上；他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他的《论十大关系》第一次阐述了不同于苏联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并且宣布阶段斗争在中国“基本上”结束；在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之一的时刻，这个相对多样化的阶段却为“左”倾主义的新高潮所取代。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从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道路’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收拢起推翻国民党的胜利成果，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建设社会主义

以上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前言部分和结束语部分。

社会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新任务。到了 1957 年初，中国和外国许多人都看出这个计划确实很有希望成功。

1957—1966 年，是第五阶段。这个阶段中，反“右”斗争导致了毛泽东第一次非常激进的创造；1958—1960 年的“大跃进”导致了经济混乱和群众饥饿；紧接着他制定了紧缩和调整的政策；1962 年他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从那时起他就准备反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党内“走资派”的那些人。施拉姆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不可思议的‘大跃进’”时期，他进行了三次宣战，1958 年他动员群众向自然宣战；60 年代初他向党内那些对他的政策积极性不高的人宣战；60 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战。

1966—1976 年，是第六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以到处泛滥的、猛然的暴力行动对付他在党内的对手，和所有那些他认为在思想上倒退、在行为上官僚化的人。在毛泽东最后的岁月里，困惑与挫折与日俱增，因此，毛泽东越来越渴望解决中国的问题。尽管这时他仍处在统帅地位，却越来越没有力量做这件事。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几乎不能思考，更谈不上说话，甚至象他在 1966 年所抱怨的那样，成了他自己葬礼上或种种愿望之坟墓中的一个失去生命力的偶像。施拉姆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试图铲除利己主义，他达到了继续清除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个目标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就改变人性这个目标来说，根据毛泽东逝世后几年发展情况看，人们所相信的显著改变完全是一种错觉。

在作六个阶段的概括之前，施拉姆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的态度进行了一个分期概括，这就是：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关心的主要是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并力图使别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年时期，在继续探求知识的同时，他十分注重创立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对他的追随者将是有约束力的。在晚年，随着这种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他创立的学说变成了教条，甚至成了宗教仪式的化身。然而，一直到死，他仍试图用过去的知识为未来指出一条道路。

看得出，施拉姆认为毛泽东一生就是在为自己、为中国创立思想模式，这种模式既规范了中国人的行动，又限制中国人的行动。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毛泽东不是在先知式地提出什么，而总是面对现实实际问题去解决它们，他的思想便是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中形成的。

施拉姆对毛泽东的六个阶段的分析，是三个时期划分的深入。他认为毛泽东在其生涯中，有伟大的贡献，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施拉姆指出，从毛泽东最后 20 年的情况看，他发自内心地相信他制定了一条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今天中国的领导人在承认他的历史功绩的同时，也承认了毛的贡献的历史局限性。引人注目的是，施拉姆和西方的一些著作家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他的思想逻辑发展的结果，相反，正是他违背了自己思想的结果。施拉姆认为，他晚年的错误也不是他年老体弱，脱离实际的结果，而是“他暴烈和容易冲动的性情，他好走极端的习惯，以及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想方设法对党内批评他的人进行报复的动机等等，都促使他走到了这一步。”对于施拉姆的这个分析，我们有不同看法，但毛泽

东后期在个人性格上的变化，也的确可以考虑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虽然去世了，他的功与过作为巨大的历史遗产留给了我们，它需要我们很长时间才能分辨和消化，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当然是正常的。

毛泽东的美国传记作者 R·特里尔对毛泽东也作出了详细的评价。特里尔的《毛泽东传》，曾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特里尔承认，毛泽东使中国来了一个彻底改变，他赋予了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热情。“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毛生于 1893 年，逝于 1976 年。这一时期，中国的一切事情几乎都翻了个过儿。封建王朝被推翻。战争象有轨电车一样去而复来，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密友翻脸。斗争的火炬传给新一代，而他们并未感到象毛在燃烧时的那种热度。”

特里尔指出，毛泽东从欧洲借来的不是机器、宗教或自由制度的蓝本，而是共产主义，他借助于技术和灵活性，对症下药，使一位病人膏肓的病人——中国起死回生。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古老帝国，毛泽东英勇奋战，同时也使他家中四分之三的人以身殉国，而他却毫毛未伤。在毛泽东个人身躯里含藏着中国革命的故事。对他怎样评价？农民造反者？军事统帅家？诗人？帝王？特里尔认为，各样形象兼而有之。

但是，特里尔认为，不管怎样，毛是二十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使中国有了一个新的开端。虽然没有毛，中国也同样会产生强有力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是，如果毛不在 30 年代成其为领袖，那么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就不可能掌权。一场没有毛的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逊色不少，它将失去其应有的、区别于其他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特色。

特里尔肯定，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毛都占有重要地位。毛领导了一场摧毁旧中国的革命，与其他任何主要国家急剧的社会变迁相比，他推动中国进入改革的运动可能更加剧烈。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作为主宰人物。在二十世纪全世界最引人注目、人口最多的社会中，毛本身就是一位巨人。在有记载的中国三千年的全部历史中，他可以列入六位最主要的统治者之中。作为一种学说的创始人，毛超过了包括秦始皇在内的以前任何一位中国执政者。也许，堪与他并列的是建构了中国人生活模式的孔子及其圣哲。在某些方面，毛又超过他们，因为他生前就声名远扬，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则是死后留芳。

特里尔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他写道：以二十世纪的眼光来看，毛之所以如此伟大，是由于他的影响在现代中国历经接连不断的种种动荡仍经久不衰。他的经历足以使他成为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合为一体的中国革命的化身。五十多年前，毛是中国的马克思，因为他分析了被外国列强瓜分了的封建中国的种种弊端，他成为中国的列宁，是因为他领导了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夺取政权的造反道路。1949 年他又戴上了中国的斯大林这顶帽子，因为他要用泥刀和砖头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

如同许多美国和西方学者的共同看法一样，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统一了中国。毛领导的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这一点

中国人看得相当重，它恢复了中国人的高大形象。“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独立，使中国人感到骄傲，中国在发展中的每一重大成就，都使中国人感到骄傲，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了自尊。

特里尔高度赞扬毛泽东给中国带来的这个巨大变化。他指出，毛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分之一世纪并不只是乌托邦理论的一段插曲。他的统治改变了中国社会，而且这种社会变迁将持续到未来。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等教育，成为大多数人的享受，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步，中国已向繁荣迈出了几步。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巨大的贡献和如此深刻的影响，因此，特里尔认为，毛泽东这个大地的儿子，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他却以本世纪世界政治巨人之一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特里尔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写道：“我认为，他曾有过的全球影响看，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者邱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

对于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还有许多美国学者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但是，不管这些学者在分析和评价毛泽东时，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和多少的不同，他们肯定毛泽东在变革中国历史，使中国走向独立，走向统一，走向现代化，独立自主地探索自己的道路等方面的作用，是大体相同的。这毕竟是无可否否认的事实。1976年，当毛泽东去世时，纽约联合国大厦降半旗志哀。这一小小的事实所蕴含的意义是如此巨大，应当说它反映的是100多年来中国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是与毛泽东分不开的。试想，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在西方人眼中哪有“东亚病夫”的什么地位呢！毛泽东虽然离去，但是没有毛泽东的中国和没有毛泽东的世界，并不因此而失去了毛泽东的影响，他贡献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仅是他造成的社会事实，而且是他经久不衰的思想，美国学者估计到的正是这一点，他的伟大和深远影响也正在于此。

毛泽东的性格一半是虎，一半是猴，美国人对毛泽东的个性发表了无数评论，但是毛泽东还是毛泽东。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由于存在着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了两国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应当是合理的，对对象的多视角的审视，会给我们提供可资比较的不同结论，会使我们在比较中更接近真理。

美国学者在研究毛泽东时，他们相信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对历史进程发生了巨大影响。而个性特征（思想、性格、作风等），又和文化背景密切地联系着。从文化背景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对毛泽东社会化的巨大影响。

关于毛泽东的思想、个性性格形成的文化背景，就我们所见材料，美国学者大致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承认西方文化对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形成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肯定，毛泽东终究还是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特里尔突出地强调这一点说：“不能撇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特点来解释毛的品格。刚果能产生毛这样的人物吗？新西兰能吗？我们不能仅仅从其个体

心理特质来说明毛的成功。旧中国产生了坚定的、反叛的、神奇的毛，正象毛缔造了新中国一样真实而合乎逻辑。”

特里尔肯定毛泽东的思想、性格、作风等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他举出一系列证据说：当北京的知识分子在北京展开了一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运动——改变传统、抵制日本对中国的干涉时，北京对毛泽东却没有吸引力，它没有什么可以使毛在北京呆上半年的时间，“就在北京学生砸烂孔家庙的时候，他去拜谒了山东省的孔子墓。”而到了1925年，他已经从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中“苏醒过来”，回到韶山，使他对十几年所受的城市教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矫正了自己对‘洋学’的态度。”“他现在喜欢旧式的中国学校胜过洋学堂，他不再反对他的父亲，他开始从更广阔的视野上看问题，他悄悄地向排外思想转变。”而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的新策略，就是按照中国传统行事。“他要象《水浒》里的农民反抗者那样，把队伍带进山里去。”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能够占据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地位，既不是单纯凭借他的组织才能，不是莫斯科的恩赐，也不是因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崛起是因为他有持之以恒的目标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他把一些简单的心理和社会真理付诸了行动。总之，特里尔的基本看法便是，毛泽东固守了中国传统文化，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成了具有鲜明中国个性的领袖。

当然，特里尔的看法也并非少数美国学者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美国学者R·A·斯卡拉皮诺也这样看问题，他说：“与本民族文化的这种认同，不仅影响了毛泽东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还影响到他的人格关系的信仰结构，不论毛泽东的叛逆思想有多么深，这些中国传统的因素终究在这个极为复杂的人的头脑里占了领先的地位。”

特里尔、斯卡拉皮诺等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个人性格，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塑造的观点，当然是不能令人同意的。他们对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缺乏时代的历史理解，对于他肩负的历史使命也缺乏真正的理解。毛泽东是时代塑造的人物，他肩负着中国走向独立、自强和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已经不能把这样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和思想塑造出来，他必须借助于当今世界时代思想的精华，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历史转换。因此，把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作用的结果，显然是不足取的。

第二种意见，与特里尔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一部分美国学者不否认毛泽东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认为塑造毛泽东以致形成他的思想的是西方的文化，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洪秀全的思想，还是毛泽东的思想“他们的思想体系都不是出自太平盛世的中国传统，而是以近代西方理性为源泉的。”“洪秀全和毛泽东都不是作为中国的圣人而出现在中国的圣人传统中的，相反，他们二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523页。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46页。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88页。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110页。

《年青的革命者——毛泽东的成长》。《亚洲研究杂志》1982年，第42卷，第1期。

人都是作为反传统者、新的社会理想的负载者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先知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这种社会制度是以从西方的理性与政治传统中推演出的普遍真理为基础的。”

迈斯纳认为，借助于西方的思想体系为中国革命的目的服务，它反映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一方面，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儒家传统，使革命成为可能并在实际上成为必然；另一方面，它还反对中国旧传统与旧制度的近代中国革命提供了新的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国的革命者运用西方的工具和观念不仅砸碎了外国帝国主义的枷锁，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束缚。迈斯纳写道：中国太平天国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纲领宣布，它将摒弃中国文化——历史的过去，这就奏响了反传统的和弦，其声响依然回荡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

迈斯纳分析，近代中国革命是以一种反传统的方式开始的，而且在总体上一保持着这种特征。太平天国开创了一个强烈的反传统的运动，它为后来历次革命运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所继承，而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行列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迈斯纳认为他们都倾向于采用那些被认为是西方提供的最激进观念和思想，并从这些观念和思想中推演出要求与传统方式实行完全彻底的、决裂的、激进的未来蓝图。

迈斯纳的这种观点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它代表了西方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早在他之前便有一些美国学者持这样的观点。

比如，美国记者白修德便认为，延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中，很有一些西方化的味道。在延安存在着一种熟悉的美国文化。1939年，他在山西的山里听到共产党的士兵在行军途中用中文高唱《前进、基督战士》这支美国歌曲。在1944年的延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人，随着《扬基歌》和《佐治亚进行曲》这两支美国乐曲跳舞。28年后（即1972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举行的招待会，革命胜利后有造诣的乐队为尼克松演奏了《美丽的亚美利加》这样高难度的美国歌曲。而最真实的美国民乐，是在1944年一个星期六的夜晚的舞会上响起的咚咚的鼓声的时候。那里穿着厚毛料棉衣的男男女女，头戴便帽在锤平了的泥土地上翩翩起舞——我们大家都在友好的节奏中一直跳到深夜。

在白修德看来，毛泽东的风格与其象中国人，不如说更象美国人。他记叙1944年10月30日在延安听毛泽东作《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报告时的情景时写道：这位主席那天下午走进了礼堂，周旋于当地官员和应邀参加的人士之间，就象一位美国政治家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会见医务和公共卫生工作者那样。他边走边同人握手。他身穿淡褐色毛呢衣服，扣着衣领上的钮扣。不久他登上讲台，开始讲话。我记得他讲话时那种异常平易近人和富于表情的特点，在我聆听过的美国政治演说家当中，只有休伯特·汉弗莱堪与毛泽东媲美。白修德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们对美国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政治局的13名委员，他们都有鲜明的性格，都渴望得到美国人的欢迎，都乐于开诚布公地提供情况。白修德断定，毛泽东与中共的领袖们不是中国传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页。

同上。

白修德：《探索历史》第162页。

同上。

统式的，而是西方化的。

白修德作为一名记者如是看，麦克·哈克作为一名数学家也如是看。他肯定毛泽东致力于变革孔子的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基辛格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断定毛泽东一生都在“致力于推翻传统中国的社会准则、结构制度以及形态风貌”。他们都把毛泽东看作是反传统主义者，把他的思想看作是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延续，把他的性格看作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为西方文化所塑造的产物。

此外，贾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中国人更加不拘礼节和“西方化”。斯诺从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非中国人”的特点，这使他在和毛泽东与中共要人接触时感到，“我身边都是美国人一样”。卡尔逊也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比中国社会中任何集团更象美国人——他们“直瞪瞪地逼视你的眼睛。”

很显然，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西方化了的的知识分子或革命领袖，是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也是不恰当的。毛泽东并没有割断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他立足于中国大地之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他没有抛弃传统或全盘否定传统，他做的工作只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改造传统，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他的思想、他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形成起来的。

美国学者的第三种意见是，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和性格，其中特别是他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这方面以施拉姆为代表。施拉姆借用中国学者使用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解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但是，他在这一命题中，强调的是民族主义和传统文化。施拉姆认为，中国化就是把作为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相结合。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相互关系中彼此消长着，这种消长导致了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施拉姆指出：早在五四时期，“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现这些思想体系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施拉姆肯定，毛泽东的早期思想“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而毛泽东成熟的思想，也是如此，例如，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便批评那些所谓的“列宁主义学者”，只会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词句，而对于自己的祖先，则对不住，忘记了。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同重要性。

施拉姆关于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的个性性格特征形成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毫无疑问，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是，有几个问题却必须认真考虑到：

首先，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就是接受西方文化呢？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不仅它的形式是西方的，它的具体内容也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特殊性是和普遍性相联系的，特殊

《基辛格回忆录》（1968—1973），节译本，第46页。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68—269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23、25页。

性中包含着普遍性，马克思在西方的形式和具体内容中，阐述了近代社会最一般的、最普遍的、带规律性的东西，他的思想不仅仅是属于西方的，作为普遍真理，它是属于全人类。它所以能对东方的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大作用，正在于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而马克思主义既是西方文化又是世界文化。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接受它的西方的形式和具体内容，而是接受它的普遍真理，即它的世界文化的成分。正如 1944 年谢伟思从共产党人那里得到的说明那样：要把马克思对他所在的那个社会（19 世纪欧洲产业革命）的全部解析，和他认为人民为摆脱那种状况而有必要采取的步骤，全部移置于中国，不仅滑稽可笑，而且也违背我们的现实的客观主义和回避说教式的教条主义的基本原则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产生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既不是西方化的产物，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普遍性与特殊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说：“‘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谢伟思从他在延安长时间的观察中得出结论：“共产党人努力使他们的思维和纲领成为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的。”“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模仿苏联的模式，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人正试图模仿美国模式”“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模仿任何人，他们强调是中国的。”“共产党人在每个领域都竭尽最大努力实现民族化，以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东西去影响他们。”¹

其次，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特征的影响，无可否认是巨大的。但是，传统文化能否如施拉姆和某些中国学者所说那样，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或基本构成成分呢？我们认为，它既不能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也不能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成分。所谓来源就是指它从哪里来，它属于哪个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思想，施拉姆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毛决没有否定欧洲倡导的两个伟大革命——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毛泽东思想不可能直接来源于属于农业生产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能提供关于工业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基础。说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就象说《易经》是现代科学的来源一样没有根据。至于说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也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有两个，一是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社会实际。这两个要素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便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文化传统是中国社会实际的一个构成部分，但不是唯一构成成分，也不是主要构成成分。主要构成成分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实际，文化传统作为实际的一部分，是从属于经济和政治的实际的。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中，是发生了积极作用的。

从内容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如同西方文化一样，它们既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积极成果，又包含着人类实践和认识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成果。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就在于它是人类

全部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的总结。毛泽东思想要具有可靠的真理性，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64 页。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 752 页。

S·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255 页。

它也必须总结和继承以往实践和认识的优秀成果，使它植根于深厚的土壤之中。毛泽东思想吸收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成果，并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在毛泽东思想中不是作为独立成分，而是作为养料被吸收、被消化。这同时使毛泽东思想在具体内容上也具有了中国的特殊性。传统的东西得到改造成为研究新事物的一个具有时代特点的方法论的思想资料。因此，把传统文化看作是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独立的因素，是不合适的。

从形式上说，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是它所以成其为传统，所以非常适合中国社会大众的显著特征。民族形式是传统文化的特殊性的重要方面，是形式对内容积极适应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是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思想，它要成为广大群众的方法论，当然必须取得民族文化的形式。它必须具有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传统文化的形式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延续，又因新内容的要求而得到改造和发展。毛泽东说：“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依据上述各点可以说，把毛泽东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制衡的一个矛盾体系的观点，显然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误解。

而且值得强调的是，毛泽东思想的个性，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主要地来源于毛泽东本人的个性，而是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个性。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个性就是特殊性。毛泽东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特殊环境指导中国革命的产物，因而它不能不具有个性、特殊性，但是它又是一个真理体系，因而它又不能不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这一点的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7年她在美国《亚美》杂志上发表了她在1946年在延安写成的《毛泽东思想》一文。她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她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用他们自己的办法以及他们认为正确的西方的任何办法，去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问题，尤其是他们运用社会分析的方法，即大家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他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他们的政策，甚至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都与欧洲的模式大不相同，他们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具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来自毛泽东。斯特朗认为，毛泽东思想的显著之处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新的条件下，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中国的或亚洲的形式。斯特朗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毛泽东的思想是有个性特色的思想，毛泽东的性格也极富于个性。他的个性特征既是属于他个人的，又与他的家庭生活、个人经历、学识修养、环境条件和他从事的事业有密切关系。他的个性特征又是一种时代特征的凝炼。毛泽东是适应中国伟大的历史巨变而被呼唤和塑造出来的人物，他的个性特征，多方面地反映了时代的历史要求，是时代精神在历史人物身上的凝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747页。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毛泽东思想》，《党的文献》1992年第3期。

结和典型反映。从他的个性特征中可看到时代变革的主要特征。美国许多学者都注意到这一点。

在美国人眼中，毛泽东有哪些个性特征呢？

——崇尚发展变化。“他极端恼恨僵化”，他不承认有什么恒定不变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发展变化自身。正因为如此，他渴求用变化之棒来搅动锅中之水。

美国学者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毛泽东崇尚发展变化的个性特征，是他对时代特征最敏锐、最集中的反映。中国社会很早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之中了，中国社会现在也正处在大变动之中。毛泽东早年便形成一种挺身而出迎接变动的性格。他认为，既然变也要变，不变也要变，变动既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最恰当的立场便是操变动的主权，掌握变动，控制变动，使变动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发展。他崇尚发展变化，但他更欣赏巨变。巨大的变动才能改变国家社会的面貌，才能造成人才，使社会面貌日新。但是，毛泽东也不主张一时一刻都要巨变。他主张细微的变化是巨变的基础，没有细微的变化，就不能造成巨大的变动。因而他乐于从细小的变化做起，从艰苦的基础工作做起。他崇尚变化发展的观点对中国社会曾发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曾发生过一些消极作用。但是，他的变化发展观点所体现的现代发展观，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这一点无可否认。

——喜欢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喜欢成为锋刃，而不是钝刀。”

许多美国学者都是这样说的，许多美国政界人物也是这样看的，连年轻的美国人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例如，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在见了毛泽东之后，便对毛泽东渴望斗争的性格形成了深刻的印象，说到斗争，毛泽东便像年青人那样兴奋起来，他使劲用两个手指相戳来强调这种斗争。朱莉写道：在毛泽东谈到斗争时，我坚决相信，尽管这位主席经过八十二年的生活已经衰老，但是他的头脑却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

美国人说毛泽东喜欢斗争。这当然有一定道理。早在青年时代，他便形成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性格。他认定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斗争便没有人生，便没有幸福，没有前途。他高唱：“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他渴望成为搏击时代狂风暴雨的雄鹰。他赞成这样的观点：“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他认为这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他早年从进化论和生命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斗争看作是“天择”的必要手段，他对抵抗斗争表示了无限的礼赞。他充满激情地写道：“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更强调“斗争的绝对性”，随时提醒人们斗争的作用，他经常主张要“七斗八斗”来推动社会的发展。

毛泽东的确喜欢斗争，但是，把斗争看作是毛泽东的个性性格的突出特征，我以为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其实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更充满了调和的特质，他喜欢调和，也善于调和，并且经常从理论上说明调和的重要性。最突出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大革命时期，他最坚决地主张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国人和东西北军将领、包括红军将领都主张将蒋介石处以死刑的时候，他最坚决地主张放掉蒋介石，实行新的国共合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 526 页。

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 338 页。

作；在抗日战争中他主张国共两党要“和为贵”，只要蒋介石不公开投降，我们就和他合作到底；建国前夕，尽管美国对中国持公开敌视的态度，毛泽东还是愿意见一见司徒雷登，和他探讨建立中美新关系的可能性问题；而经过长期的对抗之后，毛泽东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超越中美两国不愉快的历史，在紫禁城里和美国总统坐下来会谈，终于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

所有这些说明，毛泽东从来不无原则的偏爱斗争，需要斗争时，他坚决彻底，需要调和时，他毫不含糊。在政治生活中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个人生活和人际关系方面，他调和各种关系，表现出他调和的个性特征的例子，举不胜举，不必细说。

美国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把毛泽东的斗争性格绝对化了。他们没有看到他的性格的调和的一面。因而他们把他的性格肢解了，把他的理论片面化了。其实在性格上和理论上他都显示出对同一性的倾向，他历来主张同一性是辩证法的中心。这一点，我们将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加以介绍和讨论。

——很富于人情味。“他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斯诺写道：当他讲到他那些牺牲的战友时，两只眼睛是湿润的。史沫特莱感受到他有很深沉的情感。史沫特莱写道：有一次他还问我是否曾经爱上甚么男人，原因是什么，爱情对我有什么意义。有时他吟一段中国古诗，或者朗诵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是纪念他的第一位夫人。霍华德·海曼深感毛泽东是一位关心人的人。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和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她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总之，美国朋友一致认为毛泽东很富于人情味，这个观察被大量的事实所证明。

的确，毛泽东的人情味很重，这是他性格中显著的一面。他同情人、尊重人、爱护人，他有很深沉的、很丰富的感情。他的感情世界就象水量充沛的江河始终奔腾不息。毛泽东极富人情味的性格，受他的母亲的深刻影响。他的母亲就是一位同情心极重、极其慈爱、极其尊重子女和他人的人。毛泽东最感于她的，便是她的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他在早年写的《祭母》一文，对以亲赞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几。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毛泽东对他的母亲的歌颂，简直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在他的母亲的影响下，在他对周围贫苦农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和理解中，他形成了极富人情味的性格。他的同学去世了，他曾“冷泪侵双题”、“琴绝最伤情”，梦中还“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毛泽东极富人情味的性格，在革命之后，升华为对人民大众的热爱，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着想，巴心巴肝为人民谋福利，彻彻底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使他的人情味显得更加博大广阔，更加丰富深沉。他的人情味不是滥施的，对敌人、对他讨厌的人，他一点也不施予人情。1975年7月25日，他在看了朱老总送的反映江青《红都女皇》的信件之后，他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勃然大怒，在朱老总的信上他对江青断然写上一句批语：“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看来他又是这样的无情。人情施于谁，毛泽东有严格的界限。

——喜欢大，但他又不放过细节。海伦认为：毛泽东是巨型化了的普通人，是整个中国的缩影。“毛泽东的特点是大——在各方面都如此。他总是确定某项政策和某种理论的大轮廓，而把细节留给行政人员。”卡尔逊则认

为，毛泽东的确喜欢大，但他又不放过细节的问题。类似的看法，在其他美国人那里也有。例如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地认为，毛泽东喜欢谈的是战略问题，他的政策，总是一种大政策。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注意到，“毛泽东本人只关注国家大事”他一再号召人民“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白修德也认为，毛泽东气魄宏大，“藐视一切”，他“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决不受纸上的无谓纠缠。

毛泽东喜欢大，这的确是他的性格特征中的一个显著特点。还在早年，他就和“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江河湖海、五岳大山，喜欢谈宇宙、世界、人生；喜欢立大志、办大事；喜欢人生、社会“奇伟之大变”，如此等等。他喜欢大，这和他高远的志向，伟大的追求分不开的。他立志要做华盛顿、林肯那样的人物，以天下为己任。他喜欢大，还和他对祖国大好河山，悠久的历史的热爱分不开的。他总是要求自己把自己的胸怀和宇宙世界融为一体。毛泽东喜欢大，这又是和他受到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南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分不开的。老子言道，称之为“大道”，穷宇宙之极，浩浩荡荡，无始无终。道“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大道汜兮，其可左右”。正因为道为大，老子便喜欢大政策，“执大象，天下往。”庄子极颂其大。毛泽东最喜欢庄子的《逍遥游》开篇便极言其大：“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对蜩与鸠的渺小极尽嘲笑，对严鸩雀的无知而狂妄不屑一顾。小是不能理解大的，“此亦小大之辩也”，毛泽东极其欣赏庄子的宏大气魄和人生态度，他以此演化出一首寓意深刻的念奴娇的词，其词大气磅礴：“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廓。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中国南方文化重宇宙的穷极，富于形而上的特色，富于大的特色，这种特色在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中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但是，美国朋友们对毛泽东喜欢“大”的性格特征观察还不全面。他不仅喜欢大，反过来他也鄙视大。他对那貌似强大或庞大、实则空虚的事物，从来抱嘲笑和鄙视的态度。五四时期，他严厉斥责和嘲笑在巴黎和会上高视阔步的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大革命时期在中山舰事件中，他并不害怕手握大权的蒋介石，主张以兵戎相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小小的井冈山，敢于和统治全中国的蒋介石挑战；抗日战争时期，他把德意日法西斯反革命的大联盟视为“空架子”；解放战争时期，他并不害怕美国这座横亘在中国人民解放道路上的“喜马拉雅山”，这座山虽大，中国人民却能以移山填海般的力量搬走它。看来，毛泽东的确鄙视大。他总是以大无畏的气概向一些看似可怕的庞然大物挑战。

大在毛泽东的性格中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又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就是说，他不局限于大，他总是超越大、把握大、在大中显示其更大。它追求的大，是实在的、有基础的大，是个人的博大胸怀，人民的伟大事业，除此之外那些空虚的大，他是看不上眼的。正因为如此，对“大”的热爱又体现在对小的认真之中，正如斯诺指出，他对于工作总是事无巨细、一丝不苟。

——具有质朴纯真的性格。他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斯诺认为这是毛泽东性格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他写道：毛泽东喜欢毫无拘束地笑，甚至在说

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史沫特莱和王安娜也有同样的体会。毛泽东的诙谐幽默使他她们难忘。她们写道：毛泽东很富于幽默感，很爱说诙谐话，这一点使人极为愉快。说逸闻趣事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诙谐质朴的印象也极深刻。他认为毛泽东具有一种天生的吸引力，和他在一起会显得年轻。爱泼斯坦认为，在毛泽东的性格中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虚。连年轻的美国人也为毛泽东的质朴所折倒，朱莉写道：毛泽东纯真质朴，有时会象孩子般地高兴。总之，所有见过毛泽东的美国人，无不佩服他质朴和幽默的性格。

美国一些学者和国内一些学者，把毛泽东的质朴归结为他的农家出身，是他保持了农家的本色。无可否认，农家勤俭朴实的生活对他影响很深，在他的身上的确保持了很多的农民的生活习惯。但是，值得指出的，质朴与农民生活习惯并不是同义语。质朴是一种优秀品质，它反映一种人性的深层本质。只有热爱生活、贴紧生活，热爱人民、贴紧人民的人才能形成这种品质。否则质朴中便会显出粗陋，诚实中便会显出愚昧。而毛泽东的质朴既是自然的、又是机智的，既是纯真的、又是充满人性的。他的质朴乃是一种为人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忠贞不二的精神在个人品质上的反映；乃是人民性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乃是对大地的倾心，对人民的恭敬的内在本质的必然反映，是一种升华了的质朴，而不是一种原始粗糙的质朴。

毛泽东的幽默、诙谐，既是他的质朴品格的延伸，又是他的质朴品格的升华。他相信人民、相信正义、相信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必然实现。因而在质朴中浸透着无穷的乐观，在挫折中把握着未来的希望。困难摧不垮他，敌人的围剿吓不倒他，亲人的牺牲压不倒他。他在幽默、乐观、诙谐中不断地增加力量、勇气和信心，使自己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锻炼。他的诙谐、幽默当然是以学识为基础的，但是有学识的人并非就能幽默和诙谐，这乃是人性的深刻体现。

——具有坚强的意志力。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这样说。美国许多人士一致认为，毛泽东是“坚韧不拔”的，“象钢铁一样具有锐性和韧性”，没有什么力量能打倒他。他一生迎着挑战而上，为着挑战而活，哪里有挑战，他就冲向哪里。爱泼斯坦写道：在著名的“长征”时，红军中有些精疲力尽的部队，打算在富足的四川安居下来，不再前进，另一些人打算冲向苏联的边境，以求至少能在一个侧翼上有一个友区，以便整顿自己的部队，但是毛辩论说，中国人民要打日本，谁要是不把自己的脸面对着民族敌人，人民就会抛弃谁。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红军北上抗日最前线。特里尔注意到，毛泽东的胃口在战争中最好，消化最强。基辛格由衷地赞叹毛泽东：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象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他致力于在八亿人口中争取平等，把地球上历史上最长和从未间断的自治时期所发展起来的制度连根拔除，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献身，但是如此超级规模的事业必然带来巨大规模的痛苦。社会的本能的抵抗，由于它的抽搐受抑制而更加剧烈，激起这位巨人的更加强烈的反应，他的理想敢与天公试比高。毛泽东不用富丽堂皇的排场以增添一定的威严，他靠的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去胜过对方。尼克松则肯定毛泽东具有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和藐视巨大

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总是“鼓舞意志”。

毛泽东的意志力无比坚强，这实在无可否认。他的这种个性特征在早年已经形成，也是和他怀抱经纶天下的追求分不开的。国家必须振兴，民族必须自强。但是国民精神如此不振，令青年毛泽东无比忧心。他看到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推行殖民政策，其最恶劣的手段，就是首先打掉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没有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的民族，便只有永远沦为奴隶。他急切地认为恢复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意志力，是民族自强自振的首要条件。他把坚韧不拔的意志力看作是成就大事业的力量源泉，甚至就是生命本身。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反复说明强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意志力的一致性。“肢体纤小者举业轻浮，肤理缓驰者心意柔纯”。意志力就是自然之力、生命之力、抵抗之力，生长、征服、创造之力。没有意志力，个人就要走向坟墓，国家就要走向衰亡。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便是在他的崇高理想追求下磨炼意志力、运用意志力的一生。烈火焚烧，千锤百炼，他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块纯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摧垮他，甚至死亡。他永远是一个强者，他从不向命运低头，尽管他经历了重重挑战，他仍旧高歌猛进。戴维·艾森豪威尔在亲眼看见毛泽东无比衰弱时，为了把一杯中药从胸口举到唇边进行的巨大拼搏。他由衷地承认毛泽东是一个战士，一个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毛泽东以他巨大的意志力顽强拼搏了一生。他极富意志力的个性凝聚了民族振兴自强的深沉要求，他的意志力代表了中国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特征，它是来自于历史传统的，来自于母亲河——黄河的哺育，又是来自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意识的。因此，强大的意志力，不仅赋予了毛泽东一个人，而是赋予了整个中华民族。

——无比机智且大智大慧。美国朋友、学者、甚至美国总统对他的智慧都无比惊讶。他是一个“天才的预言家”，“一位走在时代前面 50 年的天才”，“他足智多谋，既能掌握枪杆子又能迫使历史的发展适合他的想法。”他的“知识无比渊博”，“他对西方的了解并不比东方少”；他能随时“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他的思绪显然象闪电一样敏捷”，他即使年迈“对遥远国度里的国内政治居然了如指掌”；他以“东方的智慧”打出小球，转动了地球；他机智地运用暗示，如让晚会演奏贝多芬的乐曲，“这是以另一种方法强调向外国学习的重要性”；“他是一位领导人，同时又是一位高级学者”；“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如此等等，美国各色人等对毛泽东的机智和智慧给予了由衷的赞美。

的确，毛泽东是智慧的化身。他的智慧并不是不可捉摸的神明似的启示，玄虚而奥妙，高远而抽象，它是一种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的实在把握，是脚踏人生社会实际，对人生、社会、世界这本大书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研究的结果。毛泽东的智慧和改造世界与中国的伟大抱负是分不开的。为了完成这个宏伟的理想，他总是感到自己不足，他不仅在成就伟大事业、改变中国面貌上有一种紧迫感，就是在学习上他也有一种紧迫感。他读“无字之书”和“有字之书”，从地上读到天上（坐飞机也读），从南方读到北方，走遍大江南北，读遍大江南北。中国之大，无不是他读书的场所；五千年文明积累的知识之多，无不是他想要开采的矿藏；世界万方绚丽的文化，无不是他想要采撷的精华。没有成就宏大事业的胸怀，便没有他无穷无尽的求知

欲，便不可能下毕生的功夫去认识世界。

毛泽东的渊博知识和机智，还来自于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在早年游学的时候，在接近工人、农民的时候，便有了这样一个坚定信念：“卑贱者最聪明”！他赞赏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他在农村调查之后，一再由衷地说，他从群众中得到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量知识。他恭敬地称群众是先生。他一再告诫全党，一定要认真地拜群众为师，先作学生，后作先生。他一生都向群众请教，恭敬地对待群众。因而他的知识是渊博的，又是朴素无华的；是极其深刻的，又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他精通马列著作，但是正如大多数接触过他的美国人所指出那样，他又总是用人民的语言讲话。他的机智不仅来源于书本，而且来源于人民的生活。毛泽东以他渊博的知识，无与伦比的机智，充分显示了他与人民割不断的联系，与古老的文化传统割不断的联系，与这块生他、养他，并使他一生为之奋斗献身的大地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伟大的事业、理想、抱负有割不断的联系。他不是一般的学者、智慧家，而是由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融铸出来的，由人民和事业培育出来的伟大的智者。

——个性中有一种紧迫感。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都深感毛泽东为一种神圣的使命所驱使，他要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事业的巨大发展和成功，他渴望中国早日摆脱受人欺凌的贫穷落后的局面。他“期望取得迅速突破和惊世骇俗的成就”。“大跃进时期的毛泽东，受到如下设想的激励：设想要迅速发展经济，设想一个由群众的创造性与大胆、灵活的领导相结合而促进的技术革命，设想构造一个以空前的速度消灭种种不公平的社会。”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把紧迫感，变成一种对速度的渴望，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目标变成了直接的目标，毛泽东主义宣称这些目标即刻就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标（其中包括国家的“自行消亡”这类乌托邦式的幻想）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遥远的未来，而是时代的迫切任务。”“毛泽东渴望行动的急躁情绪（这种情绪这些年中一直困扰着他的头脑）反映在他于1963年那首著名的‘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中。在词中他写道：‘一万年太夕，只争朝夕’。”尼克松也感到毛泽东个性中的紧迫感，施拉姆则把这种紧迫感说成是越来越发展的急躁情绪。

无可否认，毛泽东的个性确实反映出一种紧迫感。但这种紧迫感的形成并非他天生具有急躁情绪，而确实是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所致。中国必须改变现状，中国能够改变现状。他多次提醒国人：“落后就要挨打！”他也多次警告国人：要谨防被开除球籍！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搞不好没法到马克思那里去交帐。他深知中国革命来之不易，几千万人的牺牲和死亡使这块大地浸透鲜血，中国绝不能再付出这样大的代价。他必须为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他对全世界的竞争态势比国人都看得更加清楚，中国已经大大地落后，如果不奋起直追，我们便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便是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历史重任。这就使他偏爱速度，一切要快快从速。

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是有足够的耐心的，耐心也是他性格中一个重要特征。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便受到杨昌济达化斋不二之法门“以久制胜”的教导，杨昌济把做事的耐心、持久的韧性传给了他的优秀弟子毛泽东。毛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36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297、384页。

泽东一生都在磨炼自己的持久和耐心。在《体育之研究》中，他强调“凡事皆宜有恒”，一切“皆缘有恒而得也”，他把持久和耐心作为制胜的法宝。他向同志们宣布，他从事的宏伟事业，是“可大可久之基业”，因此必须长期地预备，才能见到功效。革命之后，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便包含着耐心和持久的功夫和韧性的战斗。抗战初期他针对甚嚣尘上的速胜论，从抗战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持久战”的著名论断，强调以时间换取空间，在持久中争取最后的胜利。

他的持久和耐心的个性，事实上使另一部分接触他的美国人惊叹不已。斯诺认为，一个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居然不向自己的追随者许诺迅速和容易的胜利，这大概是历史上鲜见的事例。甚至于在建国之后，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也表现出持久的韧性和足够的耐心。例如，他对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在一种持久的耐心中便包含着一种轻蔑的嘲笑。对于美国把中国排斥于联合国之外的无理举动，毛泽东也表现出一种不急不怕的耐心。中国不急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反而置美国政府于被动之地。

毛泽东要求全党在各方面都要有持久的韧性和足够的耐心。他说，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觉得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的这些告诫准确地说明了他的持久性和耐心。连基辛格也发现，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耐心。例如，在台湾问题上便是如此。基辛格写道：在初次的会见和以后的任何一次会见中，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它们，过一百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忽忽忙忙呢？”

可以看出，毛泽东个性中的紧迫感与持久的耐性是有机结合的。他的紧迫感确实导致过他的急躁和冒进，但持久的耐心却从来没有导致过他对事业和未来丧失信心。这两种矛盾的性格，往往起着相互制衡的作用。当他强调总体上持久的时候，他使用局部的速决来补充它，这就是“持久中的速决”；当他渴望速决而导致急躁冒进的时候，他使用持久的耐性来修正这种过失。他告诫自己和全党，一切都可能要用更多更长的时间。从他的紧迫感和持久耐性相统一的性格中可以看出，起主导作用是他对中国命运的关怀和思考，而不是空想、偏爱和固执己见。

——他是一个“最无私的人”。这是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形成的一个深刻印象。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用这样那样的语调描写过毛泽东的这个性格特征。而斯诺的描写尤能说明问题。1936年他在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他便坚定地相信：毛泽东是彻底无私的，他不考虑自己，他只考虑人民和事业的利益。斯诺写道：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3年以后，斯诺在延安再次见到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还是如此俭朴，仍然只有两套

制服和一件棉大衣。除此之外，他真是身无长物。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长征的壮举在塑造毛泽东的献身精神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长征塑造了毛泽东的献身人格，也塑造了中共献身的传统。

的确，毛泽东是无私的，他从来都拒绝对自己作什么特殊的打算。从青年时代起，他便养成了无私的品德，不计名、不计利、不追求留芳百世。但是他认为最大的欲望是人民的满足，最大的功利，是群众的利益。因而必须以全付精力为人民谋福利。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他写作《纪念白求恩》，提出了他的理想的人格标准。既然一个外国人尚能具备毫不利己的动机，为人民的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象白求恩一样，培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必须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情。他愤恨那些在工作中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人。他对那些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他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挑选和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时候，他坚决以能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私利为主要标准。他对私心的愤恨甚至发展到极端，急于要铲除人性中的这一弱点。于是他提出“斗私批修”的号召。正如施拉姆所说，在“斗私批修”的口号下，毛泽东试图铲除利己主义。毛泽东尽管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操之过急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或者混淆了利益与私心的界限，但是他的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他要求每一个国家公务员要全心全意地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做人民的勤务员和公仆；他愤恨官僚主义、腐败和做官当老爷。毛泽东以他崇高无私的品格和魅力，不仅赢得了了解他的美国人的尊敬，而且在中国人民中也赢得了永久的崇敬，他的无私的人格和品质是一本中国人民永远读不完的书。

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还对毛泽东的个性特征发表过许多评论，上述所举各点，远远未概括完美国人对毛泽东的评论。尼克松喜欢引用 s·特里尔对毛泽东个性特征的概括。特里尔认为，毛泽东的个性构成了他生命中的平衡，如果真有这种平衡的话，是来自对立面的冲突。尼克松和特里尔都引用毛泽东对自己性格特征的评论：在我的身上有虎气，也有猴气。

毛泽东的性格中的虎气是什么？尼克松认为，这种虎气就是，他在想要实现他的幻想时，会以他的行动“震撼中国”。的确，他有“震撼中国”的气魄。他有雄狮猛虎般的性格，他一生雄姿英发，勇猛战斗，斗天、斗地、斗人，从来未在对对手面前胆怯退却。他始终有充沛的精力、钢铁般的意志、压倒一切困难的气概。在冲突与对抗时他益增其猛；在激烈斗争时他欢乐振奋；对于对手他冷酷无情、横扫一切等等。这种虎气，带有湖南人“霸蛮”的特征。他的虎气，凝结在他的两句名言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性格中的猴气是什么？尼克松认为，乃是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毛身上的猴气被这种幻想所占有。对这一点似乎不能苟同。毛泽东的猴气，不是五彩的幻想，而是崇高的理想，他的智慧、机智，是战略上的洞察力，

战术上的高度灵活性；是他超凡的魅力和不可抑制的幽默感，是他敏锐的不可欺骗的感觉，以及他的落拓不羁，龙飞凤舞的浪漫主义等等。他的猴气，也凝结在他的两句名言中：“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欲与天公试比高”！

毛泽东个性特征究竟用一句什么话来概括呢？伊洛娜·拉尔夫·休斯写道：这位曾经是农民、哲学家、诗人、政治家和革命者的人，是中华民族化身。这也许是最恰如其份的评价吧！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自己，他虽然去世了，但他的个性特征却永存于中国人民心中，并影响着中国下一代人性格的形成。

二、美国人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评论

一些美国学者说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政治上的梦想家，但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他在现实中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的一些学者一致断定，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乌托邦主义者，梦想家，按照他们的说法，毛泽东的思想被幻想和空想占据着。

莫里斯·迈斯纳断言，毛泽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列宁主义者，他的思想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民粹主义，或空想的社会主义。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个是来源于一种深刻的唯意志主义的信念。他肯定，从前者说，毛泽东一贯认为“农民具有潜在的社会主义意识”，“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思想及其本质上的小农倾向和他对‘共同生活，共同劳作’的农民理想的浪漫称颂，使他把‘人民’这一概念仅仅理解为农民群众（因为农民毕竟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导致他高度评价他相信农民所具有的那种自发的革命性。”由于毛泽东的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导致了他对职业专门化的敌视、对知识分子和专家的极度不信任、强烈的反官僚主义的倾向、反城市的癖好及其革命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浪漫气质等。

从后者说，迈斯纳认为，毛泽东关于未来的信仰，并不是基于任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即客观力量这种信念之上的。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种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正因为如此，对于毛泽东来说，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而革命最重要的因素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人的思想和意志。这就意味着，中国革命无需依赖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既定水平，而革命行动也无须受制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公式。

迈斯纳肯定，就是这两个因素，使毛泽东成为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主义者，一个幻想家。他的革命贯穿了农民的空想，连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受到这种空想的激励。革命胜利后他的空想越来越突出，例如，迅速的合作化随即导致迅速的集体化，这使许多党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成为不顾后果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激进的社会变革已远远超过了中国脆弱的经济基础所能承受的限度。

莫里斯·迈斯纳在另一部著作《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原名为：《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对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深化。

他首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主义的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待乌托邦主义具有二重性的态度。马克思主义既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幻想的最强有力的方面，同时又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批判。

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凡属乌托邦的东西，充其量也不过是指对未来的空泛幻想，而且常常是指反对历史进步要求和阶级斗争必然性的一些反动思想。乌托邦主义者之所以成为空想家。不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是他们缺少达到那些目的适当的手段。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思维方式，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59 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209 页。

不是对历史的信念，而是对一种永恒性王国的信念。因而乌托邦主义者特别强调人类意志，尤其是强调那些持有真理和理性的天才人物的适时出现，乌托邦主义者不能在道德理想和历史事实两者之间建立起任何紧密的联系。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计划与现代历史现实相背离，充其量不过是对所谓“乌有之乡”的徒劳探求。

另一方面，迈斯纳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具有乌托邦的性质，它没有克服作为应然之物的道德理想与现实事物的历史必然规律之间的对抗。马克思在宣告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之前，就已经得出了共产主义在道德上是可以向往的结论。正是通过把道德上可以向往的东西同似乎有理由证明为必然的东西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才使得乌托邦主义成为现代历史中的一股强大力量。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未来，成为似乎是现在发生作用的客观历史过程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从而强化了乌托邦主义。

迈斯纳进而认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二重性观点非常重要。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并且在某些方面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对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积极幻想，同时又是带着马克思恩格斯轻蔑地称之为“乌托邦”的许多特征的一种学说。

迈斯纳通过毛泽东对农村与城市相互关系看法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分析，得出结论，毛泽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明显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即消极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首先，毛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和进步的阶段，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第二，毛主义否认（在其理论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实践中则是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承担者这一观点。第三，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而毛主义则用唯意志的观点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迈斯纳的上述观点具有典型性，但是，也有美国学者不这样看，施拉姆便不赞成这样的观点。

施拉姆指出，首先，说毛泽东的政治观点具有民粹主义的特征是站不住脚的，说毛泽东如同民粹主义一样，只相信笼统的“人民”的力量，而不相信阶级的力量并不可信。早在1922年9月，他在湖南自修大学的讲义中就对农民中的阶级作了最粗略的分析。1925年底，他在《政治周报》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文章，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进一步勾画。1926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他对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清楚地分析。毛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因而说毛泽东只是看重“人民”的力量，而不看重阶级的力量没有充足根据。

其次，毛泽东高度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施拉姆认为，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他用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而在于他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毛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仍然提到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的前一种观

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

最后，施拉姆并不赞成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毛泽东决没有把现代社会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想法，相反，他相信只有工业化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说“毛是田园诗式的乌托邦的信徒”，说“毛睥睨我们的先进的工业社会”，说毛敌视城市、敌视专家、敌视知识分子和敌视专业分工都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施拉姆要求注意到相反的事实：“在毛看来，工业是第一重要的。因而工业起着或可能起着增加中国财富和力量的作用”；毛要求引导中国“由一个农业国进到一个工业国”；他“要使农民学习知识，特别是学习城市所创造的技术知识，从而把他们带入现代世界”；他要求认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技术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用”，因而“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施拉姆认为，种种事实表明，毛并没有把他的理想建立在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空想基础上。

我们也认为，说毛泽东是一个政治上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个梦想家，是不符合事实的偏颇看法。

马克思主义不是乌托邦主义，它和乌托邦的本质区别在于：乌托邦是一种没有现实基础的、因而是没有方法可以达到的幻想。它是弱者对自己命运的叹息，是弱者在苦难世界中无法解脱而对虚幻世界的求告。马克思主义有它的社会理想，但是，它不是先建立社会理想，然后再求助于历史逻辑来保证社会理想。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把握，从社会规律客观性所揭示的发展趋势中建立社会理想。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不是幻想，它有实实在在的客观根据，有达到其理想的现实途径。

说毛泽东不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就在于他的思想的基本特征与乌托邦主义毫不相干。首先，毛泽东如同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并不是从理性的王国出发，而是从客观存在的中国社会实际出发的。在中国社会实际中，他又是从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的。他的社会理想，绝不是农民的乌托邦幻想的翻版，而是依据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客观分析出发而建立的。他不仅严格地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而且严格要求全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他把中国共产党行动的全部出发点归结为实事求是，要求全党要从客观存在的情况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晚年曾犯过急躁冒进的严重错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但那只是一段时间的错误。即使如此，也不是因为他首先建立了乌托邦的理想，才导致了他的唯意志论。他的唯意志论，是思想方法错误的产物，而不是所谓乌托邦理想的产物。

其次，毛泽东从来没有宣称，他要实现的就是中国小农千百年来的乌托邦社会。相反，他对小农的乌托邦的缺陷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农民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51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47 页。

的理想、农民的斗争呈现落后的性质，它们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农民追求其理想的斗争与革命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就使当时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他很早就提出了教育农民的问题，1926年在广州农讲所他专门开出“农民教育”一门课，实施“使农民得到解放之教育”。以后，他一再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把农民提到主力军的地位，但是他没有把无产阶级降到农民的地位；他强调农民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但他同时强调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革命。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村必须接受城市领导，农民必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这些确凿的事实，理应推翻所谓“乌托邦”的说法。

最后，断定毛泽东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建立社会主义便是乌托邦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迈斯纳从西方的正统观点出发，混淆了两个东西：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生产力。毛泽东认为：鉴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逾越的，但现代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没有与工业化相联系的现代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认识毛泽东是确定不移的。他提出在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步建立现代工业基础，发展现代生产力。新民主主义作为一个过渡社会，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建国之后，他推进“一化三改造”，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要巩固，要发挥其优越性，便要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虽然他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生产力发展的关注从来没有放松过。迈斯纳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唯一能发展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是一切国家的必经阶段，任何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都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乌托邦，他的这个观点，反映了西方历史观的狭隘性。

尽管一些美国学者说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一个政治上的梦想家，但是他们又都承认，毛泽东的理想在现实中已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决不是梦想，而是现实。

对民主的强烈追求是毛泽东政治思想最突出的特征，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懈地用民主制度的要求反对专制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捍卫民主制度，坚决反对官僚主义。许多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深刻地感受到，在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中，民主占据着中心地位。毛泽东对民主的强烈追求，给了美国人士深刻的印象。

接触过毛泽东的美国人认为，毛泽东首先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1936年斯诺亲笔记下毛泽东的诺言：“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的代议政府，对日抗战，还政于民和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那么，红军和苏区便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斯诺注意到，毛泽东肯定南京政府是一个专制主义的政府，它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1939年，斯诺再次见到毛泽东，他问毛泽东：“从战争开始以来，中国有没有向民主方向取得进步呢？人民有没有得到政治权利呢？”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孙中山的民权原则存在几十年了，但至今没有兑现。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性质起了什么变化。它还是一党专政的政府，这

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不满，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斯诺认为，毛泽东强烈地要求把中国真正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改变，如果不实行民主，抗日战争就不能胜利。斯诺对毛泽东如下一段话印象极其深刻：抗战和民主是同一把剑的两个刃。有人假装支持抗战，但却拒绝民主方针，他们实际上是对剑的两个刃都不愿意使用。

其次，毛泽东还把民主看作是一种政体。斯坦因认为，毛泽东提出“三三制”，并以“参议会”形式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民主政治，从而深受群众欢迎。他肯定“三三制”在实际政治工作中是行得通的，人民对于他们第一次的民主政治机会表示欢迎，他们觉得这个参议会是个前途光明的改革，他详细地记下了参会议员们对这种制度的看法。他们向斯坦因指出：这种新制度对于关于中国政治社会的改善的许多旧问题都给了答复，这种答复在战前是没有的。这是将来中国所能遵循的最好途径，倘若能使全国都改行这种制度，中国人人都可以有个好的生活。

福尔曼和斯坦因一样，他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权是一种民主政权，“三三制”的战略、公民权利的扩大、人们所熟悉的选举程序的执行，以及人民群众对政治过程的广泛参与，这一切使绝大多数的来访者感到信服，红色中国的政府机构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民主的形式。海伦·斯诺在她的日记本中写道：“共产党实行的是特殊的民主政体。董必武告诉我：‘我们的民主政体有些像法国的代表制，但并不是模仿外国人的，我们的政体产生于当地的特殊需要，而且是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

但是，一些美国人也按照西方民主制度的模式来硬套边区的民主制度，认为“三三制”的民主制度没有形成政治上的对立面，没有组织上的反对派，因而这种民主制度是不真实的、甚至是“一场滑稽戏”。

斯诺不同意这些观点。他称赞边区政府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所知道的民主的政府。他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作为直接的目标，他们作出了一个伟大的民主的选择。他否认中共将要在 中国建立一种美国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说法，毛泽东并未将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其自身的目的。他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只不过是中共将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更远大理想中的一个历史阶段。

再次，毛泽东把民主理解为人民的权利。尼姆·韦尔斯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和平方式，真正致力于政府的民主化，为人民争取发言权，至少要为他们争得抗日的权利。因为他们从历史上看到，拿破仑胜利的原因在于他率领的法兰西共和国的民主大军所捍卫的是民主，故而得到国内人民的支持。为什么弱小的美国能战胜世界上强大的帝国，在独立战争中获胜呢？

因为美国人民是为民主而战的。白修德也肯定，毛泽东把民主看作是老百姓的权利。他说：假如你遇见了这样一个农民，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一个地方政府，让他组织他自己的警察和宪兵，

《斯诺在中国》第 125 页。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第 272 页。

转见《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 181 页。

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 195 页。

转见《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 181 页。

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第 275、276 页。

决定他自己应纳的赋税，而且让他自己投票减租减息——假如所有这些都做了，这个农民就变成了一个有奋斗目标的人了，而已他一定会为了保护这个目标而向任何敌人斗争到底，不问这敌人是日本人或是中国人。而毛泽东和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民主权利交给群众，群众便无私无畏地为捍卫国家和民主权利而斗争。因此，要使国家独立不能没有民主，要使人民觉悟也不能没有民主。

最后，美国人认为，毛泽东所讲的民主还有其他的含义，例如民主是一种政治势力，毛常常讲到中国的“民主势力”，以此和“专制主义”势力相对。有时毛对民主作动态的理解，把民主看作一种过程，一种秩序，他强调共产党人希望经过“有秩序的民主过程”走向社会主义。他有时又把民主看做一种手段，一种“民主管理办法”，或“民主的作风”，或“民主概念”即民主思想等等。

总之，和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都认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民主政治的建设，他把民主看作是政府的最好形式和人类理想的生活方式。毛泽东肯定蒋介石政府是没有民主基础的政府，是一党专政的政府，是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与过去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专制而又无能、腐败而又黑暗。它不给人民以权利，人民也不支持它。蒋介石的反共、反民主的独裁政权，反映了他自私的、封建的思想。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了“美国对中国民主问题的政策”。他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作是美国在中国究竟是支持民主还是支持专制的试金石。有一次朱德向福尔曼指出，中国是在为民主反对独裁而作战。美国应该帮助中国的民主势力——而不是独裁势力。《亚洲》杂志的编辑们已经形成一个界限分明的“两个中国”的概念：国民党中国是一个独裁、腐败的警察国家；共产党中国是现代的、进步的 and 主张民主的。绝大多数讨论这个问题的美国人都承认，毛泽东是把民主作为专制的对立面加以强调的，他强调民主对于改造中国有现实作用。只有极少数的美国学者，如迈斯纳等人认为，毛泽东反对专制主义的斗争是出自于他的乌托邦的幻想。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的是民主还是专制？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既是正统的，但也有背离正统的特征。一方面，毛使基层群众广泛地分享民主制，这一点他超过了当代其他任何革命领导人。同时，毛又把民主的增进看作是只能在“强大国家”组织内实行的事项。遗憾的是，他的强大国家的思想特别象独裁，在这个强大国家中，毛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领导人，归根到底仍是一个“独裁者”。施拉姆实际上认为，人民民主专政有民主的一面，但又有很大局限性的一面。

施拉姆分析，从井冈山到延安，从延安到 60 年代初，毛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变的因素：就是强调由政治精英构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中，毛泽东强调集中比民主更重要；在群众路线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第 224 页。

转见《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 222 页。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 193 页。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 249 页。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124 页。

中，尽管领袖们信任群众，但群众最终却必须学习和领会领袖们的思想；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毛泽东更强调集权；1956年他强调了分权的重要性，但是即使是下放的权力也必须由党委会掌握。因此，施拉姆对毛泽东创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究竟能否给中国带来现代化表示怀疑。

迈斯纳认为，1949年以后，毛泽东对“民主”的概念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首先，在常规的意义它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他们有选举权，选举自己的政府，而政府又将对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实行专政。其次，民主是指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以及相应于这个阶段的政府政策，它是指历史发展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任务的完成。在城市中鼓励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在农村中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而是民主主义的步骤。中国社会既是一个后封建社会同时也是“前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便也是一个“民主主义”社会。第三，民主意味着被规定为“人民”的4个阶段的政治表现。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的最隐晦的方面。这就是，政治权力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迈斯纳接着分析，经过这样一个过渡的民主主义社会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旧的国家官僚机构已几乎完全消失。由于旧制度的官僚机构残余不构成前进的障碍，因而共产党人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创造自己崭新的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的形式。但是，这并没有解决可能是尚未解决的官僚主义问题。思想和行为的传统官僚主义模式的顽固性，尤其是革命胜利后特殊的社会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那种列宁主义组织结构，都是迅速产生官僚主义结构的重复，那么他们很快背上了他们自己产生的新官僚主义的重荷。

迈斯纳分析，毛泽东从民粹主义者对官僚政治敌视的立场出发，对新政权的专制和极权进行了极为痛苦的自我批评，考虑到毛以极端的民粹主义态度敌视一切形式的官僚主义——一种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视为最大的社会邪恶加以谴责的现象——就不难想象革命内部这种潜在的官僚主义制度化在他看来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同样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随着官僚主义的发展，还出现了危险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趋向，它加大了知识分子和群众，特别是与农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鸿沟，同时加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都要求缩小这个差距。美国其他一些学者或人士也有类似看法，他们断定，毛泽东对民主制度的倾心和对官僚主义不能容忍的态度，使他对官僚主义发动猛烈的攻击，既包括意识形态上的，组织上的，甚至是制度上的。他亲自创建的民主制度，如果变成了官僚主义制度，他甚至于不惜把它摧毁。

我们认为，美国人士强调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关注是有道理的。的确，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建立、维护和发展民主制度而奋斗，使中国变成一个高度民主的国家，一个人民有权享受文明和进步成果的国家，是他的终生理想。但是，如果想要把毛泽东的民中政治的理想和实践纳入西方民主的模式或框框予以解释，那便大错了。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91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97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110页。

首先，判断毛泽东创立的中国社会制度是否是一种民主政治制度，决不能使用西方标准来判断。民主是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没有千篇一律的民主，也没有超阶级的民主。把凡是不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制度称之为“虚伪的民主”或专制，这便是要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为唯一尺度，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照此办法，反过来用社会主义民主作尺度去衡量资产阶级民主，那么是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民主根本就不民主呢？其次，毛泽东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它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前者是国体，它规定了那些阶级享有民主；后者是政体，它规定了人民用什么方式享有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人有效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它既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性质，又具有中国的特色，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把“人民民主”说成是一个民粹主义的概念毫无根据；把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国家政权的作用，说成是一种独裁，也是没有道理的。再次，如果因为中国采用了集权制，便说中国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那么西方大多数国家也采用集权制，它们是否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呢？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因为有集中的一面，便把它归结为“精英政治”，就是把领袖的意志“强加”给群众，那么，如果完全没有集中，岂不又成了迈斯纳批评的“崇尚自发性”了吗？所谓“精英政治”，是指视群众为“群氓”，主张由少数“精英”主宰一切的政治，它和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然后形成政策，加以贯彻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最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一样确实抱着极大的反感，他反对官僚主义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毛泽东强调了二者的区别。专制主义是与民主相敌对的政治制度，必须连根拔除。而社会主义国家机关中产生的官僚主义，则是由旧社会习气感染所致，或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所致。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教育问题，完善和健全制度的问题。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毛泽东的“民粹主义”情绪，也不存在要把他自己建立的制度摧毁的问题，即使在他犯错误的时候也是如此。

毛泽东为民主制度奋斗了一生，他在中国大地上创立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人民将像珍惜布帛粟米一样珍惜它。

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但他坚持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一些美国人士在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的评论中，有“阴谋论”之说，又有“民族主义”之说，其实，这些说法都不符合毛泽东的实际。

所谓“阴谋论”之说，其发起者是美国的魏特夫。他把中国革命说成是莫斯科操纵下一场国际阴谋的产物。“阴谋论”者宣称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做出一种温和的姿态，使人觉得他只是个“土地改革论者”，或者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纲领没有什么特别“激进”之处，他做出这样的姿态，目的是为了换取美国政府的同情和支持，使美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上当”。而诸如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则成为这种“阴谋论”的鼓吹者和宣传者。另一位美国人厄利特认为，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是土地改革派，这是施加给美国公众的核心骗局。

很显然，“阴谋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说法。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政治观点，他决不害怕公开声明中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但是，毛泽东坚

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的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阶段进行。把革命的阶段发展和远大的目标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许多美国人士都如实地肯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卡尔森把这种民主理解为取消社会交往中的等级制度；史沫特莱把这种民主理解为从人道主义出发，关心被压迫者的经济要求，其实质是财产的合理分配；威廉·班德则把这种民主理解为各个阶级都可以参加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度；对于斯诺来说，这种民主就是有人民广泛参与的决策过程和政府对人民的愿望负责任；福尔曼等则把“三三制”理解为有效的民主，因为它在政治上代表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集团；海伦·斯诺则对中国共产党人促进“民主的”社会风气而大加赞扬。总之，他们都肯定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的，但是，他们中很少有人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毫不怀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

斯诺从中国面临着争取独立的伟大要求出发，理解毛泽东目前的具体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关系。他指出，按照共产党的理论，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它进行的斗争不是为了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为了一方面争取民族解放，另一方面清除“封建主义残余”而实现社会民主。毛不但没欺骗美国公众，反而是他提醒美国公众，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共与其他共产党是不同的，只是“改良派”、“民族主义者”。“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而且他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不怕被淹没成为人家的傀儡。但是他们的信仰仍然是国际社会主义；而且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头上’。”

斯诺指出，一些人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产生误解，还是因为他们看到中共奉行一套不同于苏共的政策。他们不理解中共在长期的斗争中因时常被割断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就迫使中共不得不自己分析判断中国的情况，不得不自己做出有关生存和发展的决定，这就培养了毛泽东和中共一种自信、自力更生和独立思考的精神。他们认识到，必须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依靠来自遥远的指令，往往不符合实际情况，而一个决定往往可以迅速导致同志们的生或死。斯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策上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并不妨碍毛和中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相反，这使他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更为有效。

海伦·斯诺深信，毛泽东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中共决不会放弃共产主义的目标。但是毛泽东不仅善于根据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中共的方针政策，而且善于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根据面临的突出任务，妥善安排革命阶段的发展。毛泽东的头脑是高度清醒的，又是现实而有远见的，海伦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中国现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由于中国政治与经济条件的特殊性，当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革命取得一定胜利、达到一定阶段后，它有可能转化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共产党人是坚信这种可能性的。

谢伟思通过他与毛泽东及中共其他要人的接触和谈话，从另一个角度肯定毛泽东和中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他们这样说的含义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和他们的辩

证方法，都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他们主要地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一种着眼于政治、经济发展的长远观点，一切着眼于眼前利益或时机不成熟的权力短期考虑，都要无情地从属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这种解释，使他们相信，经济社会要经过一定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也意味着，不能绕过这种自然发展的顺序。要尝试这样做定会招致灾难，并且会违反他们战略上的基本原则。谢伟思认为说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他的世界观、立场和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严格地按唯物史观办事，这是任何民主主义者都办不到的。其次，毛泽东肯定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生产力发展的自然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中共必须按客观规律的要求来推进社会的发展。因此，谢伟思强调，不能看到中共把注意力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任务上，便断定毛泽东和中共是民主主义者或土地改革派，这是一种目光短浅、缺乏联系的看法。

卡尔逊认为，尽管毛泽东强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长期性，但他的信念是坚定的。他非常注意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的准备。毛说：共产主义并非眼前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能达到的，在它之前必须有强大的民主，然后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只有福尔曼在会见毛泽东之后，认为毛泽东告诉他，中共将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

福尔曼的说法，在美国人中引起了异议，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对他的这一印象的真实性表示怀疑。福尔曼接着说：“在共产党有着那些仍然希望在未来中国，出现一个共产主义政制的。其中一个周恩来，共产党的书记。”

他这个补充说法，更令美国人怀疑，他们知道，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不可能对一位美国记者发表意见不同的看法。福尔曼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

迈斯纳把毛泽东归结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归纳迈斯纳的看法有如下几点：第一，近代中国一直存在一股民族主义的思潮，这股民族主义思潮和反传统联系在一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不能再从传统中寻求出路，而只能向西方寻求出路，所以他们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反传统的。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与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相联系的。“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所预言的国际革命的理想鼓舞下产生的，但是他们是通过一条有着深远意义的民族主义道路而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理想的。第三，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的认同感。和农民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表明他们具有自发的民族意识，而中国共产党在向农民灌输现代民族意识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早在1937年以前，毛泽东和中共就是热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族主义灌输给了农民，而不只是反映它。第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21页。

卡尔逊：《中国的双星》第150页。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200页。

福尔曼：《北行漫记》第201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23页。

四，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他认为：中国革命几乎就是世界革命；他确信中华民族在重建未来国际革命的秩序中担负着近似于救世主的使命；他对共产国际抱长期敌视的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敌人与其说来自中国社会内部，不如说来自中国外部。为了对抗外部敌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可以聚集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民族主义旗帜下，而那些不能或不愿意聚集在这面旗帜之下的人，应当作为帝国主义的代而从中中华民族至少从“人民”的行列中驱逐出去。

泰韦斯也同意毛泽东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他是从另外的角度说明问题的。他认为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属于超凡魅力型权威的类型。而民族主义与传统型和超凡魅力型权威总是有一定的关系。在民族自豪感和伟大传统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纽带。社会上义革命的杰出领袖很难同民族的大救星区分开来。革命的成功塑造了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民族的胜利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权威。中国广大民众更容易把毛泽东看成是得胜的民族英雄，而不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代表。毛泽东的同事们，他们的感情为毛所吸引，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使得民族复兴成为可能，实际上，毛泽东同这个民族是融为一体的。

毛泽东是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民族主义这个概念在一些美国学者那里使用得很混乱，往往在许多含糊不清的意义上使用。

马克思主义把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而使用。马克思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主张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看问题，反对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看问题。民族主义只强调狭隘的民族利益，反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只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而不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总之，它强调“民族利己主义的不可侵犯性，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则要求：第一，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应当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有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正确理解。

为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是不是民族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肯定民族压迫说到底就是阶级压迫。在现代，民族压迫是帝国主义集团剥削和掠夺被压迫民族的权利的各种办法，它们构成了通常称为民族压迫政策的轮廓。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它坚决支持为“民族独立生存权利”而斗争的奋斗。马克思主义肯定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的时代中进行。”因此，肯定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爱国主义的行动。举行民族解放运动与推行民族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正如毛泽东说：“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绝不会也不能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却宣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因为我们是殖民地的党（条件），所以必须为着保卫祖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因为必须首先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才能参加世界的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58、59 页。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 89—90 页。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28 页。

共产主义社会，这就使二者构成了同一性。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相反而又相成”。

具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要求发扬民族自强精神，要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主张一个民族要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不是民族主义？回答是：这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的、狭隘的排外主义，是把自己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敌视其他民族的低级情感，因而民族主义是不足取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任何民族都要具有自尊心、自豪感和自强精神，这些东西是一个民族在历史传统中形成的，既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条件，又是一个民族的发展条件，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主义者，但是它并不盲目地排斥民族的存在，它认为民族消亡是一很长的自然融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而具有自己民族的特征，乃是正常的现象。把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强精神与民族主义划等号，这是一种传统的西方歧视弱小民族的偏见。

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它主张要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这是不是民族主义？回答也是完全否定的。社会主义是共性，各国都将或先或后走上这个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反映，但是，各国经过什么道路到达社会主义这又各不相同，这便是社会主义民族性的反映。根据各国的情况，经过各国人民独立思考，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这就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与民族主义毫不相干。正如毛泽东所说：“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毛泽东从来不隐瞒他的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但是他坚持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道路，这种作法已被证明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道路。

至于一个民族拥戴自己的领袖，称颂自己的民族英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这也是正常现象，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情感的流露。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任何民族都称颂自己的民族英雄，并从民族英雄中吸取行动的力量，这乃是在任何民族中都常见的现象。这并不妨碍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开放和学习，借鉴其他民族的长处，毛泽东既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是二者的统一。他在现代革命史上的地位和在中国民族史上的地位交相辉映，这使他更加崇高和博大。

美国人士对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还作出了多方面的评论，限于篇幅我们不能一一介绍。

《矛盾论》原稿，1937年。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5页。

三、美国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评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吗 美国学者议论最多的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来源于何处？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这个问题引起了美国学者的关注。

一些美国学者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哲学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论据有三：其一是根据语言分析学派理论，语言结构上的差别导致了各种哲学流派。由于中国语言具有独特性，所以中国哲学自成一派。其二是中国哲学在传统上无本体论的观念，毛泽东也是不讨论本体论的，因而他的哲学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其三是根据《毛泽东选集》所引用的资料的统计，证明他读过的书中，中国古书最多，对于马列著作读得很少。因此，可以断定，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虽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共同之处，而从源流说，则属于中国的传统哲学。

另一些美国和西方学者则认为，毛泽东的哲学来源于实用主义。斯塔尔以一定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斯塔尔断言，毛的见解具有把“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他强调，毛的认识论“同美国实用主义者杜威的认识论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和杜威一样，毛也认为思想观点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的，并反过来影响实践经验……事实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实用主义者。”

还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弗赖伯格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直接来自他在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的军事实践”；要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就应当在最能体现他亲自实践的地方去寻找，而这种实践与其说是一个职业家的实践，还不如再确切他说是一个军队司令官的实践”。他认为，从思想渊源上讲，“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是以西方和中国的传统辩证法为基础的。”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费正清、许华茨等人的看法。他们肯定，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遗产和列宁主义。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有着明显差别。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列宁主义那里继承下来，而不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下来。许茨华说：“中国保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但内容没有了。”他认为，列宁主义出现前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识国情没有直接的关联与吸引力，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才把马克思主义与普遍的“亚细亚愤怒”联系起来。毛泽东的观点不是直接从马克思那里来的，而是直接从列宁来的，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列宁，又明显地超过了列宁。费正清强调，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概念”，和儒家思想有“共鸣之点”，同时又和“布尔什维克把理论放在革命实践之中，认为理论本身并没有用处”的思想“部分的一致。”施拉姆原来也持上述观点。但70年代末有了一些变化。他认为毛泽东距离列宁主义传统主流的距离已经缩短了。但是，他更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思想和哲学中，越来越占据突出的地位。他说：毛泽东“始终把一种西方血统的理论

《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中国季刊》1964年第19期。

转见：《日本学者视野中的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亚洲学者公报》1977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织物的经线和纬线。”但是，“纵观毛一生尤其是 1949 年之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归根到底，显然‘伟大’传统对他的影响比‘渺小’传统对他的影响要强烈得多。”

美国学者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的讨论，实际上涉及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性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还是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哲学体系？对这个问题作客观准确的理解，是理解和分析全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关键。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否来源于传统哲学，或如施拉姆所说，传统哲学是毛泽东哲学的来源之一？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诚如前面指出，整个毛泽东思想不是来源于传统文化，这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小农生产力，而毛泽东思想是争取中国独立和现代化的思想，它的基础是现代社会化的生产力。毛泽东思想不可能在小农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理由也同样适合于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来源的解释。

除此之外，说毛泽东哲学思想不是来源于传统哲学，还有如下理由：首先，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具有渊源流长的历史，但在近代它的发展历史被迫中断，它没有实现由古代的形态向现代的形态转化。这个中断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西方的侵略和西方哲学的引入，打断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自然发展进程，取代了传统哲学的地位，这就使传统哲学始终只是和小农经济的基础联系着，只具有朴素的形态，而不具有近代哲学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形态。在这种朴素的形态上，不可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其次，毛泽东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它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是和在大生产、大机器联系在一起。它担负着远大的历史使命，它需要最正确的世界观作指导，才能成为最自觉、最有远见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它的哲学乃是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大杂烩，资产阶级不可能给中国无产阶级创造自己的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中国无产阶级也不可能借助中国资产阶级零碎的哲学思想实现哲学的变革，即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土生土长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宇宙观。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创立了 60 余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已经成了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观，中国无产阶级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重新致力于创造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毛泽东明确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也不是从中国资产阶级哲学而来，相反，它是在批判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而来。

“要使辩证唯物论的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__第三，虽然中国传统哲学不是毛泽东哲学的直接来源，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中国是一个具有优秀哲学传统的国家，毛泽东又主张对于中国古代丰富的哲学遗产，应当加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哲学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成果和民族形式，对其合理内容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和特征，这就使毛泽东哲学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毛泽东

哲学思想怎样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是十分必要的，但由此把传统哲学说成是毛泽东哲学的来源或基本构成却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哲学是否来源于实用主义，或者说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体系？这种说法也是没有理由的。毛泽东早年曾接受过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本书已在第一章有所论及。但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立即抛弃实用主义，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唯一根据，他对实用主义进行了清算和批判。美国学者根据毛泽东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与实用主义哲学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用语相同，便断定它们都是实用主义，这是不加深入分析的形式主义的作法。实用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把实践归结为应付环境的本能活动，把实践看成只是主观需要的满足。实践的主体只是个人而不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认识源于实践，就是来源于个人的经验。而经验不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这样，实用主义便否定了实践对象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它所说的实践也就成为主观意志的实现手段，由这种实践所产生的认识，是没有真正的真理性可言的。毛泽东在批判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时便指出：“资产阶级的实践观——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他们所谓的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毛泽东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它具有客观性、能动性、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实践首先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只有这种实践才成为认识的源泉。他对实践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毛泽东实践观与实用主义实践观的根本对立，说明它们根本不是相同的哲学体系。

美国一些学者肯定毛泽东哲学来源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还不完全。中国革命实践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的基础，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没有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便不能产生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哲学正是在两方面的结合中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单纯地依赖革命战争实践，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革命实践中去作出新的理论概括，要产生毛泽东哲学也是不可能的。

至于那种认为毛泽东哲学与列宁主义有更多的联系，而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联系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和西方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常常人为地制造一些对立。例如，有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列宁与斯大林的对立等等。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他们思想的差别性和独特性是存在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又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后来者坚持了前辈思想的基本立场，又根据自己所处时代特征和实践创造，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坚持和发展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前后一贯性，又具有发展的生命力。毛泽东哲学来源于列宁主义，也就意味着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更何况毛泽东哲学本来是在全面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肢解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事实上拿不出多少证据，在理论上也很难说服人。

毛为何把矛盾问题置于突出地位，对此无疑可以列出许多理由，美国学者对毛泽东以《矛盾论》为代表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

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节第三章“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中，对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作了如下评价和解释：

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动机。施拉姆把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动机，归结为为了树立领袖的威望。他认为，自列宁的时代以来，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的声望，已被认为是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毛为了确立这方面的地位，并和那些从莫斯科受过训练回来的对手进行较量，洗刷他只是一个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名声，才从事辩证法研究的。但是，他在这方面并不成功。他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讲演没有达到目的。他“不加掩饰地抄袭苏联的材料”，“结果常常是非常拙劣”。

在毛泽东的辩证法体系中，为什么矛盾占有突出的地位。施拉姆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

其一，他对辩证法的理解带有道家和其他中国传统思潮的浓厚色彩。毛从道家学说中汲取了什么呢？正如上面提到的，毛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事件是以一系列间歇性的运动为特征的。这些运动构成了斯金纳和温克勒所谓的“依从循环”模式。毛自己将其刻划为“激烈斗争”与“静止巩固”相交替的“波浪式发展”。安格斯·格雷厄姆注意到老子提倡无为而治，并非放弃统治。在毛的生命的最后20年，我们从他担任主席角色的方式中可以发现一些令人费解的对比。他退居二线之初，虽然仍把持他的权力，但此后除红卫兵集会之外，他都保持着隐居状态，遵循着《庄子》中“天道”章所提出的原则：“帝王无为而天下动。……此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其二，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国内矛盾的含混性和复杂性特征。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把矛盾突出到了辩证法的显著地位。

施拉姆认为第一方面的理由造成了毛泽东辩证中的“瑕疵”，而第二方面的理由则造成了毛泽东辩证法的“优点”。毛泽东的《矛盾论》在他的哲学讲演稿中占了全部讲稿的一半。毛泽东所以要加强这部分的讲演，答案实际上在于如下事实：一方面毛正在研讨的不仅是使他感兴趣的概念，而且是这些概念在中国革命环境中的应用。另一方面，在《辩证唯物论》的第一章中，主要是苏联学者所理解的希腊和西方哲学史的概述，在这里，毛无法加入任何自己的东西。

毛的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施拉姆肯定毛的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是反传统。所谓反传统，是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毛泽东的辩证法带有“奇特的”“异端色彩”。毛泽东晚年辩证法的反传统有案可查。他1937年的《矛盾论》中已经包含了一种倾向，就是把对立统一法则置于其他两条法则（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之上。1964年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中的两个，只讲对立统一法则。

毛泽东对辩证法的主要贡献。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对辩证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详尽地阐发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方面”这两个概念。毛使用这些范畴与他对中国现实的透彻理解直接有关。马克思看到的社会是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对于这种类型的社会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来说，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是清清楚楚的。而在中国，由于国内形势和与列强的关系都是不稳定的，不可预测的。因此在一个既定时期内，要确定那种因素或矛盾占主导地位，这不仅仅是个

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迫在眉睫的需要。施拉姆称赞毛泽东：毛关于矛盾问题所作的杰出贡献，是他一生绝无仅有的。毋庸置疑，毛是一个对综合体以及中国中庸社会的特点有着敏锐知觉的人，也是一个能使其洞察力具体化人现实中的人。

除了施拉姆的上述看法外，“美国百万人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美国学者卡尔·A·威特福格尔在《关于毛处理辩证法概念和问题的评述》一文中，对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作了如下考察：

首先，威特福格尔认为，毛泽东 1937 年作矛盾问题的讲演，目的是为了替即将制订的一个新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性作论证。1937 年，毛泽东把对于辩证法的说明放在了他的哲学讲演的中心地位，目的是要增强新统一战线全心全意支持者的力量，而打击那些不愿意接受新统一战线的人（如张国焘），讲演中精心修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被解释成是支持这个新的统一战线的。作者并且提出证据说：1957 年 11 月我在日本访问期间，有一个著名的日本前外务机关的官员对我说，在 1937 年 9 月，上海有一个日本军事情报机关的头目请他，就在这前不久，提到了毛泽东在延安做了一个有关矛盾问题的讲演。

其次，威特福格尔断定，毛泽东对辩证法的修养是不足的。他把辩证法处理为矛盾的辩证法，这个事实本身就表明，他在知识上的参差不齐。威特福格尔举出如下证据作证明：

其一，他举出盛世才在台湾写的《新疆红色的失败》一书中的叙述作证据。在该书中盛世才说：1940 年他看到“毛写的关于辩证法的论文铅印校样”，他读完第一节后对共产党员方林表示他对论文很感兴趣，很想再看其他各节，而方却冷漠他说：“你最好还是不要读它，从理论的观点来看毛主席的‘辩证法’里充满了错误。”1940 年 11 月，周恩来从莫斯科返回时途经新疆，盛世才再次提及毛的论文，并转述了方林的评论。盛世才写道：“周的态度使我很诧异……他回答说，因为那时公务太忙了，有可能疏漏本应包括在这本书里的理论要点。研究哲学无论是对谁来说困难都是很大的。在作者的知识所不及的地方，错误就会流进来。”盛世才打断周的话说：“即使毛主席的论文有错误，方林公开指责这些错误在做法上也是不恰当的，他不应该先于领袖做出自己的理论思想。而应该直接向毛主席建议，指出哪些地方需要修改。”周立即改变口气说：“你做的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对毛主席在政治上或理论上的错误不应该公开指责，他应该先和毛主席本人在下面讨论。”威特福格尔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连周恩来都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讲演水平不高，甚至包含错误。

其二是他以考察毛泽东的矛盾概念的发展为证据。他认定，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养成使用“矛盾”这个概念给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下定义的习惯。毛泽东在 1926 年 2 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第一次使用“矛盾”的概念，用来刻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革命的矛盾态度，但它指示的不是一个客观的经济或社会矛盾，而是指政治和心理的矛盾。大革命失败后，罗明纳兹第一次指导中共运用“矛盾”的概念说明政治局势紧张的方式。这样“从统一战线的灰烬里产生出来的新的革命路线便教条地和一种不断强调列宁和斯大林对矛盾概念的看法的趋势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湘赣边区县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论述了红色政权利用国内外种种严重矛盾而求得生存的情况。他把1927年11月中央全会提供的辩证法词句推进了一步，他在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中建立了确定的联系。1930年毛泽东写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给林彪的信表明，毛泽东用“矛盾”一词描述相互冲突的趋势，已经变得非常熟练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辩证法的公式的熟练使用，并未代替对这些趋势相对力量对比的实际分析，直到1936年，毛开始用哲学武装自己了。那时候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苏联著作的中译本不断传到陕北。1937年正当毛泽东准备他的两篇哲学论文《矛盾论》、《实践论》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包括内容很多的苏联百科全书关于“辩证法唯物论”条目的中译本。这使“这两篇论文可能也包含剽窃的文字”，但“数量可能比较少，而且可能更易于改换，抹去剽窃的痕迹”。不管怎样，“他没有能力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包含的概念做出广博的阐明。”

施拉姆和威特福格尔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的分析，许多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把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动机，归结为树立领袖的威望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很早就开始对辩证法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寻找方法论。1921年1月3日，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喜欢研究哲学”，并强调寻找“方法论”是他追求的目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在实践中运用辩证法成效显著。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引起毛泽东的深刻反思，加强了他从理论上研究辩证法，系统总结革命经验的想法。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形而上学片面性的表现。这些片面性本来已被实践证明是错了的。然而他们中有的人不但不认错，反而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毛泽东深感这种形而上学片面性的危害性，如不从理论上予以纠正，它就将在实践中继续发生恶劣作用。1935年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第二天，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各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特别是“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要求全党坚持辩证法，坚持全面地看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党的政策必须正确地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为此，他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辩证法，养成辩证思维的良好习惯，从各种矛盾出发观察问题。1937年在陕北公学讲哲学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学习和研究辩证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他说：“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要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是违反辩证法的，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发出绝大的效果。”很显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为了革命实践的成功，

是毛泽东研究辩证法的根本出发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他以展开对立统一规律来全面展开辩证法的体系。这正是他的辩证法体系的长处。毛泽东的辩证法吸取了中国传统辩证法的思想资料，甚至接受了一些传统思维的方式，但是他的辩证法绝非中国传统辩证法的翻版；毛泽东形成他的以《矛盾论》为特色的辩证法体系，也决不是为了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他既是以唯物辩证法的既定理论为依据的，又是从中国社会实际需要出发的；它包含了理论建设的需要，更包含了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毛泽东晚年确曾提出过可以把辩证法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想法，主要是想说明质量互变规律和肯定否定规律的实质也是对立统一，对立统一规律是贯穿它们的核心，不能把几个规律并列起来对待。后来，他考虑还是以三个规律为妥，便放弃了他这个想法。显然这只是学术探讨过程中的一个思考反复，不足为奇。1965年他针对这个问题说：“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从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是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从毛泽东这段话中，丝毫看不出他用对立统一规律取代其他规律的意思，他强调它是“核心规律”，反过来说其他的都是非核心规律，否则用“核心规律”的表述就没有意义。他不但没有取消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地位，相反，他肯定其他范畴也是规律，只不过是而非核心的规律而已。他要求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把握其他规律的本质，这既是他的一贯思想，又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个贡献。

至于威特福格尔肯定毛泽东的辩证法修养不足；他的《矛盾论》的讲演周恩来当时就认为“包含着错误”；具有抄袭和剽窃的“痕迹”等等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注重辩证法的研究。1964年他曾向斯诺回忆，他青年时代到1937年前，“读过黑格尔，在那以前还读过恩格斯。”“历史事实是：1915年，他是杨昌济等人在李氏芋园组织的哲学小组成员之一。1919年他在北大参加了哲学研究会，这是中国大学中第一个哲学研究会。1921年他在文化书社的售书中，向读者推荐《赫克尔的一元哲学》（马君武译）、《伦理学原理》、《西洋伦理学说史》、《哲学大纲》等哲学专著。1923年他主持的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第一卷第1、2期刊登了李维汉的《观念史批评》，系统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肯定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篇论文的观点，凝结了李维汉和毛泽东、蔡和森等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结果。在毛泽东的早期书信、笔记、文章、批注等中，提到西方近代的辩证法家就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卢梭等。1927年，他在武昌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请李达为农讲所学员讲“伊里奇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7页。

《斯诺在中国》第284页。

辩证法”。从农讲所学员现存笔记看，学员清楚地了解了伊里奇的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区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同时在实践中探索辩证法的理论。1945年陈毅曾说：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基本建立了一个初步完整的体系，以后则是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好比砌房子，已经有了栋梁、墙壁、屋顶、楼板、楼梯、门窗……而后来则是粉刷、油漆、装饰、家俱布置、室内摆设等等，使之更加完美。1936年、1937年斯诺、海伦·斯诺、史沫特莱、王安娜等都证明，毛泽东在孜孜不倦地钻研哲学。他们在他那里看到了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罗素、卢梭、歌德等人著作的译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以上粗略的材料证明，毛泽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传统辩证法是很熟悉的，而且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辩证法也有丰富知识。说毛泽东缺乏辩证法的素养，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至于1937年毛泽东作《矛盾论》讲演以前，很少使用“矛盾”这一概念，因而断定毛泽东还不能自如地运用“矛盾”范畴，这是只看表面现象的作法。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运用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35年到达陕北以前，由于战争和行政事务繁忙，毛泽东没有机会从理论上系统表述他的辩证法思想，这时他主要是通过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运用他的辩证法。在实践中，在他的文章报告中，辩证法思想的运用呈现逐步加深、自觉、完整、深刻的发展趋势。这是他的辩证法思想理论准备的形成时期。到达陕北以后，为了系统地总结革命经验，他在认真研读了马恩列斯著作和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他的系统的辩证法著作。《矛盾论》的形成，乃是他长期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作出新的哲学理论概括的结果。仅仅从字面上看是用了多少次“矛盾”这一概念，来断定毛泽东的辩证法水平和理论高度，犹如只看一条大河有多少波浪，来判断河水有多深一样，是很不恰当的。

说周恩来在新疆曾当着盛世才的面，承认过毛泽东的辩证法讲演包含着错误，这条“史料”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1939年7月周恩来因胳膊摔伤，中共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疗。他曾在新疆省会迪化（今乌鲁木齐）短期停留。当时新疆政治局势复杂而微妙。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和我党有统一战线关系，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都在新疆活动。随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掀起，新疆的形势也逐步恶化。出现了一股反共的暗流。周恩来到达新疆后，了解到盛世才的情况，要求新疆党的负责同志和党组织保持高度革命警惕。一方面要争取盛世才继续和我们合作，另一方面对可能发生的局势逆转要有思想准备。他在去苏联前和1940年由苏联返回时，都和盛世才有过多次接触。鉴于当时的复杂情况，周恩来对盛保持着高度警惕，并以他一贯所具有的高度党性处理新疆的复杂局势，根本不可能向盛世才议论什么毛泽东的辩证法包含着“错误”的问题。盛世才杜撰出来这样一条史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目的不是要想说明毛泽东的辩证法水平怎样，而是要想借此说明中共核心领导也是不团结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实践论》、《矛盾论》形成之前，即1933年7、8月间，毛泽东的确读过几本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的中译本，并作了批注。其中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的《辩

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毛泽东在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论著时,的确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并和这些著作之间发生了某些联系。但是应当指出:

首先,任何研究都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其出发点的,都是对前人研究成果利弊得失的权衡分析,都必须吸收前人研究中的积极成果,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新的理论深化和升华。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利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资料一样,毛泽东也完全可以利用和吸收苏联30年代哲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积极成果,来形成他的科学的、系统的矛盾辩证法体系。

其次,明白的事实是,毛泽东的矛盾论体系完全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与苏联30年代任何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都不相同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辩证法体系,它是在30年代苏联任何一本哲学教科书中都找不到的。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确有许多关于矛盾问题的说法,如主要矛盾制约其他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起主导作用,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同一性的相对性和斗争性的绝对性等等,但是这些观点是零散的、缺乏论证的、没有中心的。毛泽东对矛盾法则的论述则完全不同,它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层层深化的体系,这个体系围绕着充分发挥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这一根本思想而展开。它第一次系统地充分地论证了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并且将其提高到宇宙观的高度,从而对唯物辩证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最后,毛泽东以《矛盾论》为代表的辩证法体系,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理论总结的体系,它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世界观,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立场、观点和方法。1952年《矛盾论》重新发表时,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8、9期立即刊登了《矛盾论》的俄译本。《共产党人》第2期发表了维·米海耶大的文章,肯定指出:“毛泽东的著作《矛盾论》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粉碎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革命实践的危害性。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本身就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1955年出版的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肯定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1卷的作者肯定:“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摧毁性地打击了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理论,它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也肯定,毛泽东的两本哲学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可见,威特福格尔关于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有苏联30年代哲学“抄袭”和“剽窃”痕迹的指责根本不能成立。

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有目共睹。在《矛盾论》中,他突出论证了矛盾特殊性的问题。施拉姆强调毛泽东对辩证法突出贡献了主要矛盾的理论,这个认识有一定道理,但视野稍窄,分析也不够全面。

总之,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辩证法作了多方面论述。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较多意见的,还有美国学者本杰明·施瓦茨、詹姆士·C·F·王、以及斯塔

尔等。

其中曾在中国学习过的美国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博士弗朗西斯·苏专门撰写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学说》一书，系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并从五个方面分析毛泽东“矛盾”概念的基本要点，把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和汉语、英语的“矛盾”概念以及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概念作了深入比较，肯定毛泽东的“矛盾”概念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动态性。矛盾在毛看来不过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或“动态关系本身”或“关系”，它暗含着一种灵活的和生气勃勃的内容，它总是注重“活动”，注重“相关的作用”或“相互作用的作用”；第二，实际有用性。毛的矛盾概念证明是能恰当地有效地捕捉生气勃勃的现实之全部结构的（哲学）概念。毛的哲学概念作为一个关系术语，在恰当使用时，就能发现关系——自然的和社会的——全部复杂性，并能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任何问题或困难。第三，广泛性。毛的矛盾概念可以用于三个不同方面：自然的、社会的、人的或认识的。矛盾的概念不仅成为他的辩证法的关键，而且成为他的辩证法学说的核心，进而构成了他的关于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全部看法即“世界观”。弗朗西斯·苏的上述观点和他其他一些观点，对于拓宽我们对毛泽东辩证法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视野，是很有启示的。

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社会助理教授 J·B·斯塔尔 1979 年出版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一书，被施拉姆誉为“1976 年之后唯一的一本以整本书的篇幅来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专题著作”。斯塔尔认为，毛泽东的中心理论就是他的矛盾斗争论，它肯定如同在自然界中一样，斗争的变化在政治领域中也是合乎规律的，或固有的。斯塔尔在第一章“毛泽东的斗争论”中指出，毛的矛盾、斗争和变化的观点包含着四个方面的含义：一、斗争的固有性。斗争在社会和自然界同样是固有的、合乎规律的情况；二、斗争的普遍性。斗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况；三、斗争的有益性。斗争对于世界是有益的、可以肯定由于斗争而引起的变化能促进世界不断进步；四、斗争的永恒性。斗争是自然界和社会中一个永恒存在的情况。

斯塔尔认为，毛泽东关于斗争固有性的观点，是道家哲学思想传统的继承，但他逐渐抛弃了这些学派强调的对立力量互补的思想，他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强调自然界和社会中内在对立的特性是斗争，而非互补；由斗争而引起的变化是发展而非循环。关于斗争的普遍性，斯塔尔认为它既来自中国传统，又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毛认为互补性在辩证发展过程中只不过是“一瞬间”的，而斗争性则是永久的。这种认识导源于“毛是一个通晓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原始辩证法的‘天生的辩证论者’，在同样意义上他又是一个‘天生的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否定康德关于自然界的斗争是有益的，人类中间除了顺应自然力量的斗争，其他都是有害的这个说法，他有意识地模糊这种人类和自然界斗争之间的区别，肯定人类斗争最终将变成自然力量的斗争，因为人类目的最终是由他们物质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毛关于斗争永恒性的观点修改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观点，这种修改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思想基础。因此，围绕着斗争这一中心理论构筑了毛的政治哲学。斯塔尔认为，毛如此重视斗争是不合适的。对于斗争的评价，应倾向于否定它，而不是肯定它。斗争被认为是发展的阻力，而不是助力。斗争就是在进步取得之前必须排除的障碍。我们所讲的“控制”斗争的概念，同毛的“正确处理”矛盾的概念不是一回事。我们寻求的是防止斗争阻碍发展，而不是用斗争来

促进发展。

可以看到，斯塔尔把毛泽东的辩证法归结为斗争哲学，是决定其它一切的中心理论。这种观点，在国内学者中也可见到。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它并不符合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实际。

的确，毛泽东高度肯定斗争性在矛盾中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它具有绝对性，是矛盾的根本属性之一。但是，毛泽东强调，这种斗争是事物内部的斗争，而不是外部的斗争；是事物内部的差异性、对立性、否定性、斗争性等诸多状态的总和，而和政治上所讲的“斗争”概念有极大的区别。斗争性存在于同一性之中，既受到同一性的限制，又排斥同一性；既排斥同一性，又依赖同一性；既依赖于同一性，又必须打破同一性。因而离开了同一性便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同一性是斗争性的前提，斗争是同一中的斗争，同一是依斗争而维持着的同一。离开了同一性去抽象、孤立地谈斗争性，是不正确的。毛泽东高度重视斗争性的作用，但他也高度重视同一性的作用。他强调要真正认识事物、认识斗争性，辩证法必须以同一性为研究中心。“一分为二”，“一”是前提，离开了“一”来谈“二”，这种二不是辩证法的“二”，而是形而上学外因论的“二”。

与斯塔尔的看法相反，毛泽东自己认为，他的辩证法理论是以同一性为中心的。毛泽东说：“辩证法的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着重号为引者加）毛泽东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同一性，一是把同一性看作事物自身是它自己；二是把同一性看作是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的联结性质。在第一种意义上，事物周期性发展表现为：肯定（同一性）——否定（对立性）——否定之否定（同一性）。在第二种意义上，事物的发展表现为：同一性占主导地位（事物是它自己）；——斗争性占主导地位（事物向它物转化）；——同一性占主导地位（新事物产生）。在两种意义上，辩证法都必须以研究同一性为中心。这是因为：以研究同一性为中心，可以使我们把对立着的事物或方面联系起来思考，防止片面性；可以使我们着眼于事物的转化，同时着眼于研究转化的条件，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矛盾转化中的科学参与指示方向；可以使我们把握发展和联系的具体内容；可以深刻地理解事物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可以把我们的眼光集注于矛盾双方的制约性以及双方界限的可动性的研究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以斗争性而是以同一性为他的辩证法研究中心的，在这个方面他完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传统。把毛泽东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很明显是一种不正确的看法。当然，斯塔尔的研究对我们还是有多方面启示的，这一点也不可否认。

人们通过了解毛的认识论，就能够预见毛的政策变化吗 对于毛泽东的认识论，美国学者也发表了许多评论，其褒贬不一。

出身于乌克兰，1951年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的学者弗·霍勒布尼奇在他的论文《毛泽东对马克思认识论的贡献》中，对毛泽东的认识论作了如下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80页。

弗·霍勒布尼奇：《弗·霍勒布尼奇论文选集》，加拿大亚伯达大学乌克兰研究院1982年版。

分析：

毛泽东的认识论和他的本体论的关系。弗·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不单独研究本体论，他运用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对本体论作出解释。他不探讨“物质”本身的含义，它把物质看做存在于人类意识、思想、观点之外的一切事物，这使他陷入非欧洲的、中国传统的本体论模式之中。另一方面，由于他不研究“物质”本身的含义，这就使他全部哲学思考集中在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别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认识论在不太注重认识本质和认识方法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是鲜见的，这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他影响的结果之一。弗·霍勒布尼奇与许多美国学者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毛对知与行的关系的传统的中国哲学的解释是不满意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老子的“无为”思想所影响，形成了宿命论、无所作为、苟且偷安，这种宿命论思想见之于孔子的“守旧主义”鲁迅描写的农民的“阿Q主义”。

毛泽东认识论的特点。弗·霍勒布尼奇认为有六个方面：一、特别怀疑和厌恶一切纯观念上的东西；二、同时明确认定他自己的哲学不仅是又一种思想体系，而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

映；三、作为典型的中国人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论者，认为真理是相对的，绝不是静止和永恒的，真理总是不断地运动和变化着的，总是不断地来自外部世界，而其本身也总是包含着矛盾；四、要求不间断地实践和实验，探求真理必须持之以恒，永无止息，因为世界上绝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五、相信实践是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实践本身就蕴涵着真理；六、承认实践和实验在其完全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存在局限性。弗·霍勒布尼奇认为，毛的认识论有与实用主义相似之处，但是他的认识论不能归结为实用主义。

毛的认识论的方法论重点。毛的认识论的方法论，既不特别强调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也不特别强调演绎（从一般到个别），而是特别强调将一般与特殊、抽象和具体结合起来的辩证方法。毛泽东强调特殊比一般更重要。一般仅仅是特殊的一个方面；特殊是完整的、多方面的；只有特殊而不是一般才是认识过程的目的和最后结果，一般仅仅是认识现实的途径和工具。

毛泽东认识论的起源。弗·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反对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认识论，可能起源于他那根深蒂固的、即典型中国式的、相对论性的和辩证的、即辩证的本体论。在毛看来，既然物质是人的头脑以外的整个外部世界，那么物质就要比人的思想所能触及的领域更为广泛，因此人的思想总会受到物质的限制、制约和束缚。因此，只能用辩证的方法才能够认识辩证的现实。毛含蓄地将辩证方法定义为一种不断接近，然而大概又决不能够完全到达和彻底把握现实和真理的反复过程。如果回忆一下怀特海或罗素的当代认识论思想要点，不难看出毛给辩证方法所下的定义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了前后两者之间存在的微妙关联。

毛泽东对实践绝对信任。毛认为没有什么可以绝对相信和长期信奉的真理，只有实践才能绝对信任。认识和实践之间存在着时间的流动，认识要落后于不断发展的现实，这种现象使得新的实践和实验成为必要。在毛看来，实践不仅是检验一切主观真理的标准，也是一切真理的源泉。毛相信实践不仅显露出正确的即所期待的真理，而且也显露出错误的即出乎意外的真理。如果成功终不见端倪，那么失败最终将会作为一种客观真理而显露出来。

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弗·霍勒布尼奇认为。这种区别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毛与诸如斯大林及充满斯大林的唯意志论的现代苏联哲

学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具有某些截然相悖之处。毛认为客观规律天然成就，不可抗拒。这种认识一方面与马克思的认识非常相似，另一方面也与许多中国古典哲学大家的认识论十分相近。而斯大林只是到了晚年才逐渐认识客观规律，同时仍认为客观规律多少要屈从于人的意志，可以被“征服”、“改变”以服务于人类。其次，毛与斯大林的区别还在于：毛认为客观规律是人类实践成功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特别是在失败的情况下，客观规律可以说是不可能性的最后展现，它强而有力，使人们不得不提防或停止错误实践。正因为如此，人们通过了解毛的认识论，就能够预见毛的政策的变化。在处理任何一个具体问题时，毛总会比人们一般想象的要走得更远，总要努力去挖掘万一的时机，提出激进的主张，直到或除非这种时机和主张完全消失或不可能实施为止。

弗·霍勒布尼奇以上对毛泽东认识论的评论，虽然有的观点我们不尽赞同，但无疑是有启示的。毛泽东对本体的研究的确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他不单独研究本体，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本体；他在认识论的角度研究本体时，把对本体“物质”的研究重点放在“规律”的研究上，他对规律的解剖分析形成了深入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这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独特的贡献，是对传统哲学对规律的研究具有的模糊、粗疏、朴素的缺陷的一个大的克服，的确是完全现代化的。毛泽东从重点认识规律的立场出发，把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了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的统一性，强调了实践对于发现规律、掌握真理的决定性。如果说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突出地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着力于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那么，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便突出地抓住了客观规律性。着力于解决客观规律性与实践的关系，由此而构造了他的认识论。弗·霍勒布尼奇，对毛泽东认识论的许多分析是有见地的，他肯定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是毛泽东认识论的主要方法，他对实践的绝对信任，使他不承认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但他承认毛泽东的认识论提供了预见的可能性等等，无疑都是深刻而有见地的见解。

詹姆士·C·r·王在《毛泽东思想》一文中，断定毛泽东的认识论表明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认为毛泽东的认识论的突出特征是，强调实践是认识的一个要素。对于毛来说，认识过程不单是观察和在观察中得到概念，并且要更进一步，认识过程还有一个第三要素，即有目的地使物质世界发生变化而进行的行动或实践。认识不能与实践分离，因为认识发源于人的经验。实践出现变化和有了新经验时，理论必须修改。按照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应该增加中国历史经验的叙述和有解决中国问题的特点。他把毛泽东说成是实用主义者。

弗朗西斯·苏从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结合的角度，评价毛泽东的认识论。弗朗西斯·苏认为，毛泽东提出“现实即矛盾”的命题，第一方面揭示了现实的本体论结构，第二方面揭示了现实的认识论结构，第三方面揭示了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作为一个行动者，毛泽东对超现实的纯主观并不关心，对为理论而理论的纯主观也不感兴趣。在毛看来，既然思维和认识是现实的反映，那么它的结构当然符合现实本身即客观现实的结构。正如客观现实是复杂而又能动的一样，思维也是复杂和能动的。说它复杂是因为它反映了矛盾的简单和复杂的过程。说它能动，是因为这种反映是在矛盾能动过程中获得的，所有这些都是互相影响的。因此，毛的认识论结构也是辩证的。

弗朗西斯·苏认为，毛泽东提出了一种“综合实践的论点作为最有效的方法。它包括如下相互关联的公式：全局——局部——全局；客观——主观——客观；过去——现在——将来；实践——理论——实践。这些公式具有内在联系，这使他的综合实践论，不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一个基本成分。他的辩证法理论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体，它将理论上的认识和实际上变革现实两者结合起来。

弗朗西斯·苏从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毛泽东的认识论，是很有意义的。他的视野开阔，研究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多角度的特点，对于我们来说很值得借鉴。

施拉姆在《毛泽东：初步评价》一书中，从主观和客观相互关系的角度评价毛泽东的认识论，他认为强调主观的重要性是毛泽东认识论的突出特点。早在1917年，毛就十分强调主观的重要性，并把它们作为改变个人和整体习惯的关键。这一思想后来流行于井冈山的特殊条件下，毛把工作重点放在主观因素上远胜于他以前曾经于过的任何事。毛指出，只要改变人的思想，就有可能更改其阶级本性。毛同样也强调了觉悟，甚至强调了人的道德品质，把它们作为限制人类自然本性的标志。这一思想，我们能在1929年的古田决议中找到。毛认为战争是“自觉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人类精神的最重要检验。战争的结局绝少能基于必然性，它部分地取决于主观因素。施拉姆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在毛泽东认识论中的突出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同时肯定“这也是毛政治上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一”。这个判断也有一定道理。

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认识论评价很多，我们不能一一赘述。

毛泽东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吗？ 迈斯纳断定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历史唯心主义集中表现为唯意志论。

迈斯纳肯定，毛泽东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他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是自觉的人的活动，而在人的革命活动中，人的思想和意志起决定作用。所以毛泽东特别注意发展和保持一种“正确的思想意识”，他的“思想”和“思想建设”方法，一直受到人们高度重视，整风运动就是这种方法最著名和最集中的运用，它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一个显著特征。毛把“思想改造”说成是一种“民主”的教育方法，即通过连续不断的集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实现思想转变。思想改造主要不是作为一种惩罚形式，它基本上是用来产生“正确思想”的一种“教育”工具，正确思想又会产生正确的政治和社会行为。

迈斯纳分析，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以唯意志论指导中国建设的。1955年7月，他发表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其意义并不在于他提出了加速合作化的日程表，而在于他复活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唯意志主义的方法；1958—1960年的大跃进，毛否定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现代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理论；大跃进的思想动力是把人的意识和道德当作历史进程决定因素的唯意志论信念。毛泽东的中心思想是，对“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它的产物。毛的不断革命论产生这一梦想的根据，是对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能完成这种转变的深刻信念。与施拉姆对群众路线的看法不同，迈斯纳不认为群众路线的重点是“领导”，而

认为群众路线的重点是人民群众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迈斯纳肯定，毛作为一个唯意志论者，根据他的世界观，新社会的产生是以经过思想改造的人的出现为前提的。因此“人是决定性因素”，“人比物更重要”，主观可以创造客观。因此，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不断的思想革命化和把人的冲天干劲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宣布的、并为中国革命允诺的社会目标和经验目标的关键。

迈斯纳认为，表现毛的唯意志论的另一观点是“落后的有利性”的特殊观点，它构成了“不断革命”概念的基础。“落后有利论”并不单纯是指这样一种看法，即现代世界中经济落后的国家具有可以通过借鉴先进的工业国家的技术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有利之处，相反，它所提出的“有利性”更多地是指由于落后而产生的精神上的长处及革命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在1958年把中国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有利条件归结为“一穷二白”，这一公式最集中地反映了把落后当作革命有利条件的倾向。

迈斯纳进一步对“一穷二白”进行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所指中国最“穷”的是农民，最“白”的是青年，因而毛把它的唯意志论的重点集中在农民和青年身上。毛泽东一方面相信农民最愿意革命，另一方面也相信青年人最能够接受适当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的转变。

迈斯纳进一步分析，他认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所体现的唯意志主义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创造历史”进行字面解释的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对毛泽东来说，人的意识的创造活动几乎不受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用正确思想和意志武装起来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随心所欲”地自由创造客观现实，既不必考虑具体的本国经济条件，也不必顾忌可能包含本国革命在内的国际革命条件。

总之，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构造了一个唯意志主义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就是他的社会历史观全部构架。

施拉姆一方面反对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另一方面他也赞成在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中存在深刻的唯意志论倾向的观点。“强调心理改造为标志，而这正是毛的思想长久以来的特征。”本杰明·施瓦茨也认为，在无产阶级精神和群众路线之间而言，毛泽东在延安时就把精神置于了群众之上。毛认为，把无产阶级精神灌输给干部和群众，比给予他们经济或军事上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党的干部具备了正确的精神，就能够完成任何军事、政治、经济或教育任务；有了正确的精神（德），就能够精通各种专业技能（才）。施瓦茨没有用唯意志论这个概念来概括毛的思想，似乎和迈斯纳还有差别，而且他认为毛的“不断革命”思想，并不是一贯的思想，只是1958年大跃进这一历史条件下才出现的。

詹姆士·C·F·王对毛泽东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他断定毛泽东的政治历史哲学的核心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观念，即群众路线。集中詹姆士·C·F·王的看法，他对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作了如下判断：

第一，群众路线可以概括为“知觉，概括，公认和实行”的过程。首先，党的干部们倾听“分散的和不系统的”群众的意见；其次，干部们研究这些意见，使之成为系统的和概括了的形式向上级汇报；再次，上级以这些系统的观点为根据进行解释和发出指令，把它们传给群众。在这个阶段，由于干部们在群众中间进行政治教育或宣传，他们不只是解释，而且考察他们的正确性；最后，当群众已经自愿信奉这些观点时，就变为具体行动。群众路线经过多次反复，使得这些观点“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第二，群众路线代表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所以它是有效的。詹姆斯·C·F·王认为，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充分说明了，如果那个政策是来自群众的——农民和工人——如果政策中已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党的那个政策就是成功的。政策的实行，不管它本身多么好，必须得到群众的全力支持。

第三，群众路线的运用，成为帮助党获得群众可靠支持的有效方法。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在30年代江西苏维埃时期已有系统的陈述。群众路线的运用，要求领导和群众一起经过一个教育过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通过群众路线的各个阶段，群众获得广泛的社会参与决策，领导者能得到人民的委托去实行政策和纲领。

第四，群众路线并不是不加限制地放任群众的自发力量。当毛尊重群众的力量时，并不意味着群众能无限制的为所欲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表现和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应用，但当红卫兵的各派别之间的斗争到达无政府状态时，毛就毫不迟疑地召集军队去恢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传统秩序。

第五，群众路线是毛对民粹主义理论的贡献。这个概念的根本点，是断言卑贱的人们——农民和工人——具有力量和智慧。毛似乎再一次同意了李大钊所曾经说过的：一个人越接近民众，就越有人情。在群众路线的应用中发展起来的群众运动的方法和小型的学习班，已被迈斯纳称之为“毛的民粹主义的主要制度”。

第六，群众路线和唯意志论是联系在一起的。和群众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毛信仰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人的意志和决心在创造一个较好的世界时，最终会战胜所有的障碍。必须在中国劳苦大众中进行关于人的意志——勤奋、努力工作的自信——的教育，因为他们的潜力在几个世纪里被迷信和无知所压制。

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社会历史观，还有多方面的评价，我们只作以上简略介绍。上述评论集中在两个主要问题上：第一，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吗？第二，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实质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有作简略分析的必要。

说毛泽东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归纳美国一些学者的意见主要是：

毛泽东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客观矛盾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如同马克思和列宁一样，毛泽东严格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自身的发展。在社会存在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社会存在。革命起源于这一矛盾的客观要求，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所谓“一穷二白”是

以上参见詹姆斯·C·F·王：《现代中国政治介绍》第五章，第三节。

指生产力落后，物质基础差，而不是指农民“穷”青年“白”。生产力落后对我们是巨大的压力，但又是巨大的动力，它促使毛泽东要求群众奋起直追，改变现状；促使他们向先进学习，利用先进国家的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当然也促使毛泽东考虑，怎样充分发挥先进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他并没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来谈问题，只不过他更多地强调了辩证认识社会基本矛盾的必要性罢了。

毛泽东强调基本矛盾的次要方面的反作用，往往也被美国学者们说成是唯意志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就是说，它既强调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作用，又强调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反作用。毛泽东的确在许多时候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他的晚年，也的确犯了强调过头而导致严重失误。但是，综观他的一生，他在处理基本矛盾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和次要方面的反作用时，是唯物辩证的，并且对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出了贡献。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突出了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必要，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严格地考虑了经济基础性质对上层建筑的制约和规定。他的“一化三改造”的理论，反映了工业化生产力的形成，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尽管“一化三改造”速度搞快了一些、粗糙了一些，但决没有颠倒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毛泽东在对待意志作用这个问题上犯有错误，但因此而断定他一生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并没有充分的根据。

毛泽东突出强调了意志、决心、思想的能动作用，这是事实，他也有把它们强调过头了的时候，这也是事实。但是，以此为据把他判定为一个唯意志论者，不免过于夸大。毛泽东的确强调意志、决心、思想的能动作用，但他有一个前提：意志的发挥必须以客观规律为依据，决心的作出必须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上，思想为群众接受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只有这样，意志、决心、思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即使在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他也还提出冲天的革命干劲与冷静的科学分析精神相结合的要求，虽然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一点，但在思想上他对搞唯意志论必然导致建设失败始终是有警惕的。对于基层干部对过火行动的推波助澜，毛泽东多次予以严厉批评，并采取措施力图予以纠正。

正如施拉姆所说，毛泽东最后20年是复杂的，有功也有过，有得也有失。迈斯纳试图把毛泽东说成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者，否定他一生对真理的追求，否定他的社会历史观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并进而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说成是民粹主义的产物，这种看法我们不能接受。

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分析，在美国学者那里具有很明显的分歧，施拉姆肯定它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公式，迈斯纳、詹姆士·C·F·王肯定它反映了一种唯意志论的要求。这些意见，我们认为也是有片面性的。

群众路线不是一个“精英政治”的公式。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基础上的。他强调领导的正确的思想、意见、办法、路线、方针、政策只能来自于群众，它必须反映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愿望、意见和要求，任何政策都要代表大多数群众的要求说话。建立在这种充分相信群众的基础上的政治，与“精英政治”有什么相同之处呢？哪一位“精英政治家”能如此相信和尊重群众呢？“精英政治”的思想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它鄙视群众、视群众为群氓，认为群众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命

运只能由少数社会精英来摆布。这种观点，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群众路线也不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公式。群众路线是建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基础上的，但是“群众”这个概念绝非民粹主义的概念，群众是划分成阶级的，群众路线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农民，这和民粹主义者在笼统的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人民”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群众路线也不是崇尚群众的自发性，它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强调倾听群众意见的重要性，同时又强调集中群众意见加以提高和引导的重要性。这和民粹主义崇尚自发性的作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群众路线与唯意志论毫不相干。它既不是强调领导者的意志的决定作用，也不是强调群众的意志、思想、智慧的决定作用，它并不是以人的意志和思想为贯穿群众路线的主线的。贯彻于群众路线中的主线，是对客观实际的尊重。尊重群众，说到底就是尊重群众生产生活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要得到群众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主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可见，群众路线不是建立在由思想到思想，由意志到意志的基础上。所谓尊重群众的意见、办法，就是尊重群众针对自己的生产生活实际提出的意见、办法，这些意见、办法、智慧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在群众自己实践中产生并且反映了客观实际情况的。在此基础上经过集中而产生的领导的方针、政策也不是头脑里的主观臆想和个人意志、而是客观的反映。它们和唯意志论有什么相同呢？恰恰相反，它和唯意志论是根本对立的。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和中共的根本路线，它既是历史唯物论，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这条路线在我们的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还将继续坚持它，并把它作为反对唯意志论的有力武器而使用之。

四、美国人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论

毛泽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是苏联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吗 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分析评价最为尖锐，他们虽然提出许多批评意见，但是，他们很热心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内容的深入研究，对有关资料占有详尽，非常熟悉，视野较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77年美国出版了一部毛泽东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对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研究提供了详细的资料。关于美国学者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论，我们选择两个问题进行简略介绍。

首先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美国学者倾向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毛泽东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受了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

迈斯纳对毛泽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导思想发表了许多评论，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关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原因。迈斯纳认为，这是因为毛和中共在革命中碰到了一种尖锐的历史两难境地。一方面，正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使社会主义者首次在中国取得了政权；另一方面，也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失败使执政的革命者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手段。共产党人既是中国现代资本主义不发展及其遗留下来的经济落后这份遗产的受益人，同时又是它的受害者。他们除了利用于中的政权寻求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外，别无其他选择。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有可能运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权力使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这就使他们感到放心。毛泽东和中共不得不用现成的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去完成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二者不得不同时进行。这就是毛泽东在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根本原因。

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其内容而言，并无创新之处。中国的计划几乎是苏联1928—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翻版。毛泽东毫无保留地选择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原因是：首先，毛和中共领导人认为，苏联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对于中国工业化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几乎不能指望从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这样的援助，特别是处在冷战年代条件下，中国人无论如何更期望获得一个可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其次，采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毛泽东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政治上对俄国人多么不信任，但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将倒向苏联一边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在内战期间支持蒋介石，特别是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更加强了中国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与苏联在政治上结成同盟的必要性。而这种政治联系是服务于强化那种极为强烈的倾向的，即仿效苏联革命后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最后，尽管毫无保留地接受苏联的发展模式，对毛泽东似乎是很奇怪的。中国共产党终究是通过形成自己的革命战略，拒绝俄国人的支配才获得政权的，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也是无视斯大林意见的结果。但是，苏联为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使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模式；而中国人在当时对斯大林的经济发展方法，能否导致实现预期的社会主义目标并未产生过怀疑。因此，尽管毛泽东一直对“形式主义地吸取外国的东西”持批判的态度，但是他却引人注目地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适合中国情况的模式不加

批判地接受过来。

迈斯纳肯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果是积极而巨大的。比起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计划的重点是强调更高层次的重工业发展，诸如钢铁、机器制造、燃料、电力、冶金和基础化学工业。国家对工业投资只有 11.2% 用于轻工业（消费品工业），而 88.8% 的投资用在发展重工业上。如果考虑到国防的基础，以及由于 1949 年以前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中的现代工业的支配所造成的结构不平衡，那么优先发展重工业有其合理性。1952 年至 1957 年间，中国工业发展速度的增长，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已不算低的 14.7% 的年增长速度，根据官方统计数字，实际年增长率为 18%，整个工业产值几乎翻了一番。事实证明，中国是苏联模式的出色学生，中国工业生产在 1952 年至 1957 年间的发展速度远比 1928 年—1932 年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发展速度要快。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城市工业的就业人数已增加到约 1000 万人，城市人口从 7000 万到 1 亿人，超过 100 万人口的城市已有 13 个，而 1949 年只有 5 个。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和稳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尽管与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较，其基础还很弱小。

迈斯纳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和其他人一样积极地投入了迅速发展城市工业化的计划中。但在这一进程发生的方式中，还几乎没有独特的“毛泽东主义”道路。因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独特战略的“毛泽东主义”，尚未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主义只是作为对苏联式工业化产生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的反应而出现的。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毛泽东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予以高度肯定。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加深了苏联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决定性的因素是斯大林的经济战略。它表现为高的再投资率，着重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项目，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第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优先向重工业投资。因而，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则上紧紧仿效苏联的模式。但是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却和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联的农业制度改革被证明是一个灾难，而中国却实现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发展计划”。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在工业方面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农业方面虽然投资只占 8%，但是私人和合作社的农业投资总数却为国家的几倍，农业产值处在上升之中。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都注意到，即使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对苏联的模式也不是一味照搬，而是采取了适度修正。例如，与此相适应在农村政策方面，合作化的计划是逐步的、有阶段的发展的，没有采取苏联的突然的和混合的形式；采取了限制富农而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避免了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政府着眼于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既满足了工业发展计划的需要，又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发展水平。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过程中，当毛泽东获得了一定对比经验之后，他开始修正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是在远比中国工业基础高的条件下起步的，但发展速度却远比中国慢，这个事实为毛泽东反思苏联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突出地注意到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意义。他们承认，这表明中国已经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论十大关

参见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 155—165 页。

系》广泛地涉及苏联的缺点，在重工业与农业问题上，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毛泽东对苏联发展模式提出了批评，在中国的许多领域中，诸如在农业领域中，中国的实践一直有自己的特色。《论十大关系》导致了苏联发展模式的修正。

总的说来，美国学者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成就是肯定的，对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经济思想也是肯定多于否定。这是因为“一五”计划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一五”计划的编制，的确受到了苏联的很大影响和帮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1952年中央编制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由周总理亲率代表团赴苏联，征求苏联政府对计划的意见。斯大林对“一五”提出了原则建议。他认为，以20%的年增长速度发展是勉强的，可以降到14—15%，做计划不能打得太满。1953年4月，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我国“一五”计划提出如下建议：（一）“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工业的年平均速度调低至14—15%为宜；（三）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四）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五）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不足；（六）要十分注意农业发展，要保证农机、肥料、工业品供应；（七）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八）保证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苏联的以上建议，对“一五”计划的修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但是，毛泽东并非毫无保留地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的经验是经过自身消化后再吸收的。1953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审议修订后的“一五”计划。11月，由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用11天对计划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这样反复地讨论修改，就是要使计划切合于中国实际。

毛泽东指导“一五”计划的思想是：苏联的经验必须借鉴，但必须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例如，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虽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主要是从我国国情实际出发的。1945年初，毛泽东在与谢伟思的谈话中，曾设想战后中国的建设应以优先发展解决人民生活有关的轻工业人手，促进农业发展，逐步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他这个设想是建立在如下前提上的：在中国成立了民主的联合政府；美国对中国持友好合作的态度；亚洲的局势呈稳定状态；各国之间保持正常经济往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能用和平过渡的方式得以实现，在这样的前提下，国防的压力不大，有可能首先解决人民生活恢复问题。通过优先发展轻工业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并为重工业的发展筹集资金，这样做是必须的，也是合理的。但是，建国之后，上述前提条件完全不存在了。美国对中国采取完全敌视态度，在朝鲜发动战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并派兵进驻我国台湾、在亚洲制造紧张的局势。国际形势也处在热战和冷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不建设一个强大的重工业基础，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其他部门发展的可靠基础。所以毛泽东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的。人民的生活要改善，但只能适度改善。局部利益不能损害整体利益，生活消费不能冲击国家建设，毛泽东曾指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指出：

以上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27—187页。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84—296页。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试想，不优先发展重工业，怎么能改变这样落后的经济状况呢？可见，毛泽东的“一五”计划的经济思想，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它虽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绝不是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照抄、照搬，否则它就不会取得比苏联要大得多的成功。

美国学者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评论 关于“大跃进”，是美国学者以此为据评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话题。

特里尔认为，“大跃进”主要是一种发展思想，但是它不明确，不是一个详细的发展计划。毛指导“大跃进”主要是以他的变动哲学为依据的。在经济学上，他很少考虑马克思，甚至马克思也变成了他应加以反对的迷信。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大跃进”是一场灾难。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新长征中浪费了五年时间。这位美国的毛泽东传记作者，似乎没有深究毛泽东“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思想。

泰韦斯对“大跃进”的研究比特里尔深入。他认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基于一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态度。这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态度，和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检验苏联模式的那种自信和有把握的乐观不同，这种激进主义的乐观，期望取得迅速突破和惊世骇俗的成就。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将主观因素的作用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毛泽东提出“一穷二白”，是指“不发达的经济和文化科学的低水平”。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特点的态度在大跃进前后发生了变化。1956年，毛泽东将这一特点视为一个弱点，又看作一个优势。作为弱点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限制；作为一个优点它能激起一种主观力量，促使人们去改变它。但是到了1958年，毛泽东避而不谈“一穷二白”的弱点，而只强调它的优点。他对主观力量作了“空前推崇”。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政策，标志着毛泽东更加强调平均主义，更加诉诸意识形态。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纠正过平均主义，但是本质上说他不是对平均主义的否定，相反他纠正平均主义，是为了向着一个既定的更加平均主义的社会前进。

在“大跃进”中，毛泽东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平衡的追求和对左右的调和，而“偏爱左的综合”。泰韦斯认为，毛泽东设想要迅速发展经济，设想完成一个由群众的创造性与大胆、灵活的领导相结合的技术革命，设想构造一个以空前的速度消灭种种不公平的社会。但是毛泽东的设想逐步落空。泰韦斯着重探讨了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指导思想。他倾向于把毛泽东“大跃进”中的经济指导思想归结为另一种主观意志的发挥和平均主义的追求。

施拉姆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也发表了许多意见。关于发动“大跃进”的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表示了深刻的不信任，他把建设的希望转向了借助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57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深深失望。1958年他的观点已与1956年的观点相左。当时他认为科学家是决定性因素，而到了1958年他强调“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其次，促成毛泽东政策转向农村的

参见特果尔：《毛泽东传》，“体制的修补”一章，第319—330页。

参见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一章第六节“急速的改造”，第34—37页。

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适应机械化和水利建设这类任务的需要而创建较大规模农业组织的趋势日益成熟。出自促进水利设施建设需要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必须建立大型的社会组织，动员大量的群众投入。再次是毛泽东的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中国人民可以从其“一穷二白”这一事实中获得某些积极的优势。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文盲”优于西方的财富。中国农民虽然是最无文化的部分，但他们的品德、能力都显得更加优越。

关于“大跃进”的特征，归纳施拉姆的意见，有如下几点：第一，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并不只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这些改造都是同时进行的。当然，在1958年中，技术和物质生产这两个方面的地位急剧提高，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毛泽东决心加速经济发展，但他肯定经济发展并不是“大跃进”的唯一结果，这一进程必须与人的变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毛泽东把“政治是统帅”，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主动精神和控制权的下放等要求，并行不悖地包含在“大跃进”中；第三，毛泽东把不平衡看作“普通的客观规律”，在这种意识形态公式中包含了这样的信念：动员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的作用是绝对必要的；第四，1958年12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口号又重新提了出来，他要求订计划要又冷又热，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他虽然对在实现重大突破的时间表上作了比较现实的修正，但经济发展高速度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却原封不动。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对“大跃进”中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作了详细分析。他们总的认为，“大跃进”是中国革命转变的起点。大跃进方案是建立在乌托邦乐观主义基础上的，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他们的评论包括了如下几点：

第一，关于“大跃进”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的观点与施拉姆相似。他们认为：

首先，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他对仿照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出现的问题的反思有关系。“大跃进”主要是毛主义用来替代苏联发展策略的另一个选择。毛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农业作为出口物的源泉，政府对农业保持高征购的固定水平，以致给农民带来严重后果。中国农村情况有两点不同于苏联：一是农村人均产量低，1957年人均均为290公斤，比苏联1928年人均566公斤低一半。二是苏共党员70%在城市，而中共党员70%在农村。上述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共不愿意采取以农村的痛苦和成百万农村居民挨饿为前提来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毛泽东在1957年后期开始探索一个在中国可以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又使资本占有量多的重工业能够迅速发展的战略。这就使毛泽东转向利用政治和组织的手段来提高农民产量的战略。

其次，双百方针运动的失败，及其由此导致的1957年反右运动，大大损害了城市知识分子和主要依靠他们的贡献的任何发展战略的声誉。对知识分子的惩罚改变了人力资源的参数，而这种参数必然会影晌政府所采用的发展战略。毛泽东相信适当地动员民众就能完成“资产阶级专家”认为不可能而不予以考虑的工作的人的地位。这样，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便出现了由专门技能向动员群众的转移。

以上参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六章，第164—173页。

最后，在根本层次上，产生“大跃进”策略的动力，来自中共历史中非常深远的思潮。在中共领导的斗争史上，革命处于成败关头时，一批创造性的以广泛动员各种力量为核心的军事和政治的政策保证了胜利。由于毛嫌恶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带来的政治结果（组织机构的官僚化，经济工作的专门化和专家地位的显著化等），以及他渴望工业迅速发展的机会似乎构成了威胁农业基础这一薄弱环节的想法，因而他转而回头注意延安精神及其方法，并把它作为希望的源泉。他企图用动员群众、社会平等、抨击官僚主义、藐视物质上的障碍来再次拯救革命。

第二，关于“大跃进”的策略。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毛的“大跃进”的策略有四个主要部分：一是靠充分动员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以弥补工业和农业两者资金的缺乏。二是通过为中国经济的主导部类制定宏伟目标，以及在根本上真正鼓励使其他部类赶上这些主要部类的任何改革来完成“计划”。三是在工业中，既依靠现代的也依靠传统的方法来提高产量。四是在所有领域，蔑视技术规范（以及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以利于获得用这个年代的词汇来说是“多快好省”的效果。实际上“多快”淹没了“好省”。

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认为，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直到1958年晚期，仍然认为大跃进的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但是毛还是采取了有力措施来抑制“大跃进”的过分行动。1959年，他决定采取强有力措施以防止把“大跃进”变成灾难。他要求减小公有化的程度，但是各省的干部不肯从他们的立场后退，不愿意承认这个运动中的问题，在1959年春季以前毛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抑制“大跃进”的过分行动上，尽管没有奏效。

迈斯纳对“大跃进”的研究也倾注了热情。他认为“大跃进”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热情和期望以外，还和毛泽东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的独特理论有关。这种独特的毛泽东经济理论是在试图解决如下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一，直接和紧迫的问题是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与农村半失业的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解决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而第二个五年计划看来也无能为力。其次，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如何加速“原始社会主义积累”的进程。由于不太可能使用外国投资，这个问题就变成如何最有效地使用中国的主要资源即人力问题。但这反过来又使集中发展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成了问题。除了城市工业化的社会结果外，毛泽东主义者还提出了继续依赖于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否能适应中国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这个问题。第三，人们普遍承认中国需要“技术革命”，但问题还在于，在不产生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的前提下（在不允许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阶层发展的前提下），如何才能迅速地掌握现代技术和现代科学，又如何才能获得这种掌握。

就第一点而言，现代世界经济落后的国家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的速度比工业化的速度快得多。从1949—1957年，中国城市人口由5700万增加到1亿人口。他们在城市企业中找不到职业，造成了城市中失业和半失业人数不断扩大，城市失业问题接近于发生危机的程度。尽管毛泽东对人口控制也表示了支持，并采取了诸如下放运动等措施，但是即使从希望而言，也需要5—7年的时间城市才能吸收多余的人口。这样，就使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经

参见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七章，该章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肯尼思·利伯塔尔撰写，第310—328页。

济发展的新战略，继续强调大规模的资金密集型的现代工业发展战略，便必然要使失业和半失业的人口进一步增加。这就迫使毛泽东主义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实行重大改革，将发展的重点由资金密集型的项目全部转移到劳力密集型的项目——即从重工业转移到相对来说投资较少且要求最大限度使用人力的农业，轻工业和小规模的工业企业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大跃进”的方针，目的是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城市和农村人口失业的问题。

就第二点而言，促使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经济战略发展的新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决心避免城市剥夺农村，同时相信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特别是利用农民群众尚未发掘的劳动力，就可以更快地积累资金，更公平地进行投资。苏联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有意识地从“集体化”了的农民身上抽取实现工业发展的速成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完全服从于尽可能迅速地制造一个巨大的重工业基础这一压倒一切的目标。如果继续采用苏联的模式，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否实现将很成问题，而且必然将以日益加强对农民的剥夺为代价。毛泽东既不愿意采取继续剥夺农民的政策，又不愿意放弃重工业发展的目标，他决心采取“农、轻、重”同步发展的方针，促进三个经济部门蓬蓬勃勃共同增长、互相促进。这就是：促进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从而极大地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从而为国家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创造前提。要实现这种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中国的人力，通过建立新形式的社会组织和适当的思想指导，便能在一场全面征服自然的战斗中，发挥和发动至今尚未利用和充分利用的中国人力资源。因此迅速发展经济的新战略的重点在农村，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将转向发展需要资金很少的中小型工业。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结合，被认为是适合中国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的，地方工业的发展将会促进中国比较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社会经济的不平等，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

就第三点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方针，并不是“反技术倾向”。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有力地强调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但是，他强调必须从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相结合的角度来考虑技术问题。首先必须打破中国对苏联技术的依赖。一方面苏联的技术不适用于小规模农村工业化；另一方面依赖苏联的技术，会导致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心理，并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实行技术革命需要自力更生。其次，毛泽东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会产生技术特权阶层、培养官僚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因此必须以政治手段保证科学技术的使用符合社会主义的目的。为此，必须依靠工农群众发展现代技术，他们将在日常生产进程中掌握现代技术。正如中国将在技术上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一样，工农群众也将在技术上自力更生，不依赖于知识技术阶层，所以群众发展技术成为“大跃进”目标之一。

此时，威廉·A·约瑟夫对“大跃进”也作了如下分析：

首先，“大跃进”是可以划分为阶段的。

第一阶段可以称之为“稳步革新”时期，时间为1958年夏末以前。它意味着一场全面规划，它要从性质上为人民共和国创造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既要实现经济发展的超速度，又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大跃进”的第二阶段是高潮阶段，即1958年夏末至11月底12月初。

这个阶段转而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把“大跃进”说成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目标的夸大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动员群众的政策提法的改变上面。张春桥在上海市委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鼓吹平均主义的供给制度的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10月转载了张的文章，毛泽东在编者按中肯定张的观点除了“某些方面的片面性”外，“总的说来是正确的”。

“大跃进”的第三阶段是一次退却，标志是11月底至12月召开的武昌会议。这一阶段一方面肯定了公社化运动的主流，并号召在1959年展开“一次更大的跃进”，要一如既往地“增加共产主义成分”；另一方面强调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清醒认识，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贯穿这一全过程的社会，在性质上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要使所有制的

形式的改变切实可行，可能要“花十五年、二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在1959年2月底至3月初的郑州会议上，进一步进行了政策调整，这对恢复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大跃进”的第四阶段是1959年第4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这个阶段经过庐山会议之后，一些较为激进的“大跃进”政策恢复了。例如，虽然农村和城市都经历过1958年至1959年的特别困难时期，但这个时期在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在城市建立了公共食堂。

威廉·A·约瑟夫对“大跃进”的起因，表示了不同于其他美国学者的看法。他认为，“大跃进”的许多具有“革新意义”的政策，其原动力主要来源于基层，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央对于过渡的速度和宣传基调的逐步升级，有明显的责任。毛泽东认为基干部的热情和积极性是非常宝贵的，问题出在负责执行政策的干部的工作作风上。毛泽东对“大跃进”高潮既有肯定又有批评，表现了他的矛盾心理。在毛泽东看来，纠正“大跃进”的过火现象，主要是纠正干部的工作作风，而如果藉此对“大跃进”的根本路线进行怀疑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他不能看到1959年上半年深入地批判“大跃进”策略的重要性。

威廉·A·约瑟夫认为，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政策，基于对以下若干问题的考虑：中国自解放以来，总体上说在经济上的发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和农业迅速地并相对平衡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化；1957年反右斗争的胜利，表明已消灭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残余势力；1957年底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标志，表明国际力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明显转变。在这种乐观估计之下，毛泽东日益感到担忧：如果没有对群众的进一步动员和社会经济等的持续发展，中国革命将有面临官僚主义和退化的危险。因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上，为了加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一种“大跃进”的做法，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对于履行党的革命使命，也是完全必要的。

以上美国学者对“大跃进”时期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研究介绍，只是不完全的概述。他们的研究具有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启发性。

大跃进是应当否定的，但是大跃进中人民群众的热情和主动精神，大跃

进中群众解放思想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首创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美国学者几乎一致地看到了这样一点，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是为了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建设模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一定经验之后，毛泽东的必然思考。许多因素影响了毛泽东采取“大跃进”的决策。最初的动因集中在必须争取较高的建设速度，同时能够避免出现苏联那样把农业整得很苦，国民经济不能平衡发展的弊病，以及避免西方有的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入手，致使重工业发展不快，国力不强的弊病。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决定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这条道路的特色是：既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要实行农、轻、重并举；既要重视科学技术，又要充分依靠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既要实行中央集权，又要下放权力，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既要重视现代工业的发展（洋），又要重视农村社办企业的发展（土）；既要重视经济的发展，又要重视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既要使经济发展获得高速度，又要使社会生活健康化、革命化、文明化；既要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又要依靠革命传统。毛泽东力图构想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应当说，这种最初的设想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可行性的。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决不是小农式的、封闭的、闭关自守的。他放眼世界经济的发展，认真思索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力图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因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现代的、独具特色的。第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不是孤立的，他的经济思想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考虑经济问题时，总是把它和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决不追求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追求社会的全面发展。第三，他在“大跃进”前期提出的若干发展经济的设想和理论，虽然在“大跃进”的继续发展中，这些理论或者被片面运用，或者被不恰当运用，或者被夸大运用、没有取得应有效果，毛泽东自己在“大跃进”的高潮中，在思想上和认识上也产生了片面性，但是他在前期提出的发展经济的理论，无疑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探索，提供了考虑问题的思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政策的思路，是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合理成分的。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十分复杂，内容也十分丰富，有待我们仔细研究。

毛泽东这位时代的巨人虽然已去世 16 年了，但在中国、在世界上他的影响将长期存在。美国各界人士对毛泽东的兴趣并没有降低，他们还在孜孜不倦的探索毛泽东的奥秘。就在我掩卷搁笔时，从美国寄来了刚刚由纽约枫林出版社出版的澳大利亚学者赖特·尼克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81—1989)》的中国学者的论文选集，这个选集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学者对毛泽东研究的情况。拙作《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有幸收录其中。看来西方和美国学者不仅关注对毛泽东本人的研究，也关注中国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这是值得欣慰的事。

毛泽东这位中美友好的关系的缔造者，在中美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

后 记

我写《毛泽东与美国》这本书，资料搜集了好几年，完全是挤业余时间完成的。因为没有科研经费，全凭平日点滴积累，锲而不舍，不免苦辣尝尽。由于能力和条件有限，即使只写成现在这种样子，也颇感力不从心。所幸云南人民出版社卢云昆、陈浩东同志一再关怀鼓励；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如四川长城特殊钢公司张远明、李培春、张文漠、甘永达诸同志，不断给予鼓励支持，才使该书得以完成，在此向上述诸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在写作该书中，参阅了大量材料，除书后所附主要参考文献外，限于篇幅，还有许多没有列出。对于一些研究著作的有益成果，本书也作了吸取，在此也向有关作者表示衷心感谢。

成春、石磊、曹萍等几位研究生帮我抄写了部分书稿，程德蓉同志抄写了多数书稿、并帮助搜集了资料，我也衷心感谢他们。

书中错误、缺点、不妥之处，望能得到专家、读者指正。

作 者

1992年7月于成都

主要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1—4卷，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
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5.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
6.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
7.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
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
9. 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
10. 吴东芝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 J.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
13.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
14. 《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出版社，1985年。
15.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
16. 《斯诺文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
17.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年。
18. 《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
19. 《重庆谈判纪实》（1945年8—10月），重庆出版社，1983年。
20. 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
21. 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
22.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中国的双星》，新华出版社，1987年。
23.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
24. 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1988年。
25. 白修德：《探索历史》，三联书店，1987年。
26. 詹姆斯·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求实出版社，1988年。
27. 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
28. 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
29.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回忆录》，三联书店，1982年。
30. 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31. 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
32. 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
33. 巴巴拉·塔曼奇：《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商务印书馆，1984年。
34. 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

35. 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
36.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年。
37. 迈克尔·沙勒：《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
38.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
39. 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
40. 卜克莱·布莱尔：《麦克阿瑟》，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
41. 《朝鲜战争》，第1—5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
42. 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
43. 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
44. 社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45.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
46.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
47. 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48. 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9.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50. 《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华北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
51. 《毛泽东访问记》，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52. D·怀斯、T·B·罗斯：《u—2飞机事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
53.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54.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55. 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
56.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1978年。
57. 《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1974年。
58. 《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
59. 威廉·富布赖特：《跛足巨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60. 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61. 《新中国的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62. 亨利·欧文：《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三联书店，1975年。
63. 麦克·哈特：《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
64. 威廉·A·约瑟夫《极左思潮与中国》，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